

福尔马尔文选

人民出版社



福尔马尔文选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

028817

封面设计：宁成春

参加本书编选和译校工作的有：
殷叙彝、唐春华、周家碧、苏冰娴、
袁延明。

福尔马尔文选

FUERMAER WENXUAN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87,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600

书号 3001·1910 定价 2.05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领袖，也是机会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虽然不是理论家，但他的著作和言论对于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1850年，福尔马尔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一个贵族官僚家庭。他9岁起在奥格斯堡的本笃派天主教学校受教育，不满16岁就入巴伐利亚骑兵团服役，1866年普奥战争时曾作为步兵少尉同普鲁士作战，1867年自动离开军队，1868年到罗马参加为教皇效劳的外籍军团，同年底离开罗马回到慕尼黑，在技术学校短期学习后进邮电局任职。这时他开始参加巴伐利亚资产阶级软弱的反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政治活动，要求在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他具有浓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因此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立即投效德国军队，被任命为德军在法国的军用铁路高级职员。1871年1月他在法国布卢瓦受了重伤，此后长期靠残废军人救济金维持生活。

在这以前，他已经对工人运动比较关心，并且开始接近社会民主党人。负伤后他进一步阅读和研究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在政治上逐渐倾向于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后，他从1876年起为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撰稿。1877年4月，福尔马尔应萨克森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邀请，担任党的地方机关报《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的主编，正式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并积极参加了党的各种宣传鼓动工作。

1878年5月(也可能是6月)，福尔马尔因所谓违反新闻法罪

2702/3506

被政府控告并被判处监禁十个月。反社会党人法颁布时，他还在茨维考坐牢。出狱后他立即被驱逐出德累斯顿，然后又被驱逐出萨克森。1879年9月，他接受党的委派，担任这时在瑞士苏黎世创刊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1880年8月，他参加了党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在国外第一次秘密召开的代表大会即维登代表大会，并被任命为党驻苏黎世的国外联络站负责人。由于他擅自以这个联络站的名义发表了措词过激、对党在国内斗争不利的通告信，因此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倍倍尔也对他提出了严肃的批评。1881年1月他辞去了这一报纸的主编职务，但仍继续为它撰稿。

这一年秋天，他当选萨克森米特魏达选区的国会议员，他的三十年议会活动的时期从此开始。1884年，他被慕尼黑第二选区选入帝国议会。1886年因所谓秘密结社罪又被判处九个月监禁。1887年大选时他失去了议席，但1890年再度在慕尼黑第二选区当选，并在此后历届选举中蝉联，直到1918年夏天彻底退出政治生活为止。他还曾在1883年至1889年当选萨克森邦议会的议员（在开姆尼茨选出）。

福尔马尔第二次出狱后于1888年当选为慕尼黑的社会民主党选举协会（当时党进行合法活动的组织形式）的主席。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合法地位，福尔马尔和卡尔·格里伦贝格尔等人积极为在巴伐利亚建立党组织进行活动。1892年巴伐利亚第一次举行邦的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由福尔马尔起草的参加1893年邦议会选举的纲领。就是在这次选举中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在邦议会获得五个议席，福尔马尔本人也当选，并且担任了邦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主席，此后连续当选。国会党团成员和邦议会党团主席的身份使他实际上成为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

福尔马尔一贯主张通过和平的渐进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他在

早期著作中就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是用和平方式还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要取决于统治阶级是用恶意还是用善意对待工人。在反社会党人法期间，面对俾斯麦政府的残酷镇压，他是主张坚决进行斗争的。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党的维登代表大会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还是在国会活动中，他都是站在以倍倍尔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边，反对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派，反对俾斯麦的“鞭子和蜜饼”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和殖民政策，他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正确的，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思想上缺乏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即对社会发展和德国现状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因此表现得忽左忽右。

1890年，德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俾斯麦下台，新组成的卡普里维政府宣布实行所谓自由主义的新方针。这时福尔马尔认为贯彻改良主义路线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于是明确宣布要“向善意伸出手来”，并且在1891年6月和7月的两次公开演说（即“黄金国大厅演说”）中主张党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眼前的改良措施上，在对外政策上也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在这以后的若干年内，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特别是在与巴伐利亚有关的具体策略问题（例如邦议会党团投票赞成邦政府预算的问题）上，提出了背离党的纲领和策略的主张。他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都受到党内的批评并且总是被迫让步，但实际上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发展。

在1891年10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和辛格尔尖锐地批判了福尔马尔的“黄金国大厅演说”，指出如果实行他的策略就意味着放弃党的最终目的。大会通过了由倍倍尔起草的、确认党的既定策略的决议。福尔马尔陷于孤立，不得不表示无条件服从大会的各项决定。

1892年6月，福尔马尔在法国的《政治和文学评论》杂志上发

表论述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随着当时国家政权的逐步民主化，国家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将消失，因此社会民主党无需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这篇文章在党的报刊上引起激烈的争论，恩格斯也对它提出严肃的批评。在1892年11月的柏林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受到批判。他只好表示他同党的观点没有分歧，并且同威廉·李卜克内西一道起草了谴责国家社会主义的决议。

1894年10月，社会民主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代表大会，福尔马尔和布鲁诺·休恩朗克一同提出了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并获得通过。两人在大会上分别做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福尔马尔的报告主要论述实践方面。他强调农业将以自己的特殊方式进入社会主义，否认农业中大生产的优越性，要求党的农业政策和农村鼓动工作不仅应当反映农业工人的利益，而且也应当照顾农民（包括中农和富农）的利益和情绪，党应当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农民，使他们免受剥削和不致贫困化（实际上包括保护富农、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等等）。他还称赞法国社会党1894年9月南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绪论关于保护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要求，并且错误地声称这一纲领是得到恩格斯赞同的。为此福尔马尔又一次受到恩格斯的批评。在恩格斯的批评的影响下，1895年的布勒斯劳代表大会否决了法兰克福大会的决议，但是以福尔马尔为首的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公然宣称这一决定对巴伐利亚党组织的工作没有影响。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以后，福尔马尔在几次党代表大会和一些党员集会上发表演说为伯恩施坦辩护，一方面支持伯恩施坦的观点，一方面要求党给伯恩施坦以绝对的批评自由。1903年国会选举以后，福尔马尔积极支持伯恩施坦提出的社会民主党应争取副议长职位的建议。同年9月举行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在经过激

烈争论后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倍倍尔在长篇发言中不仅着重批判了伯恩斯坦，而且也对福尔马尔提出严厉的指责。福尔马尔在发言中继续要求完全的、无条件的“自由发表意见即批评的权利”，并否认党内存在修正主义，但是他在大会的压力下又一次作了退却，最后投票赞成倍倍尔决议，而在大会以后依旧自行其是。

在第二国际创立前，福尔马尔曾经支持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可能派。1899年6月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擅自参加资产阶级联合内阁的事件发生后，福尔马尔积极支持法国和国际上的内阁主义派，因此倍倍尔曾斥责他“至少是同米勒兰不相上下的”。

1907年8月，福尔马尔参加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大会最重要的议题是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福尔马尔是这一问题的小组委员会成员。他在反对法国爱尔威提出的半无政府主义决议草案时认为社会党人只能通过宣传教育以及在议会和舆论中扩大影响来反对战争危险，却丝毫不提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必须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和方法。按照他的这种理解，国际大会关于反对战争危险的决议实际上就会成为空话，而他后来在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态度也证明他正是用这些空话掩盖了自己的沙文主义立场。

1903年，福尔马尔在一次火车事故中受伤，后来基本瘫痪，不得不逐步退出党和议会的活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虽然他已卧床不起，但是他和党内的沙文主义分子爱德华·大卫等人保持联系，并曾写信给党执行委员会表示支持他们的观点。1917年以后他丧失了书写能力。1918年他辞去全部政治职务，1922年6月30日在乡间的住宅中去世。

总之，在1891年以后的二十多年内，福尔马尔无论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上都坚持一条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相违背的路线，而且利用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个人影响，竭力在巴伐利亚

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贯彻这一路线。他公然宣称社会民主党应当有勇气声明自己是一个社会改良的党。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步向机会主义政党蜕化的过程，福尔马尔是起了促进作用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曾经称他为巴伐利亚的“无冕之王”，甚至希望他从巴伐利亚的山上走下来领导全党。当然，在早期的斗争中他对党是有过贡献的，在多年的国会和邦议会活动中，他也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和物质改善作过很大的努力，例如他在反对海因茨法案的斗争中就曾起过良好的作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范围，也没有触动德意志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他自己也承认，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曾经这样评论他：“这种人可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15页。）

福尔马尔的著作印成单行本出版的不多，他的大量言论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和其他刊物上、党的代表大会上、国会和邦议会的会议上发表的，因此比较难于收集。我们在编译这本文选时从《人民国家报》、《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社会民主党人报》、《新时代》、《社会主义月刊》等刊物、德国社会民主党历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以及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挑选了一部分文章和发言，另一部分是从西德狄茨出版公司1977年出版的威利·阿尔勃莱希特编辑的《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中选用的。所有文章都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我们作了一些注释，给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在卷末附有福尔马尔年表和人名索引。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列宁 斯大林

1982年12月

目 录

- 森林的破坏和洪水 (摘录)** (1)
(1876年 9 月 3—10 日)
- 私人声明 (摘录)** (16)
(1877年 7 月 4 日)
-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19)
——一篇关于社会经济的习作
(1879年 7 月)
- 报刊历史的回顾** (45)
(1879年 11 月 30 日、12 月 7 日)
-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成果** (54)
(1880年 9 月 19 日)
- 革命还是改良? (摘录)** (60)
(1880年 10—12 月)
- 在帝国议会反对烟草专卖的演说 (摘录)** (76)
(1882年 5 月 12 日)
- 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 (87)
(1882年 8 月 17、24 日)
- 在萨克森邦议会论证萨克森国有铁路设置制动手
防护室提案的演说 (摘录)** (100)
(1883年 12 月 17 日)
- 在萨克森邦议会论证废除萨克森雇工法提案的
演说 (摘录)** (102)
(1884年 1 月 23 日)

在帝国议会关于外交部预算的演说（摘录）	(105)
(1884年12月15日)	
公布党的议员的表决情况	(108)
(1885年6月18日)	
在帝国议会抨击俾斯麦的个人统治的演说（摘录）	(112)
(1886年3月27日)	
在帝国议会关于殖民政策的演说（摘录）	(116)
(1890年5月12日)	
在不来梅工会联合庆祝会的演说（摘录）	(122)
(1890年8月24日)	
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129)
(1891年4月)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	(132)
——1891年6月1日和7月6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的两篇演说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发言（摘录）	(161)
(1891年10月17日)	
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国家社会主义（摘录）	(169)
(1892年6月)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争论	(179)
(1892年11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关于国家社会主义 问题的发言（摘录）	(200)
(1892年11月18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关于“国家社会主义 和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决议	(207)
(1892年11月18日)	

- 在巴伐利亚邦议会关于巴伐利亚与德意志帝国的关系的演说（摘录）** (208)
 (1893年10月28日)
- 在巴伐利亚邦议会关于实行国家与教会彻底分离和促进教育、科学与艺术事业的演说（摘录）** (213)
 (1894年2月28日)
-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美因河畔)代表大会关于议会活动议程的发言** (217)
 (1894年10月24日)
-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美因河畔)代表大会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226)
 (1894年10月25日)
-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美因河畔)代表大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 (241)
 (1894年10月26日)
- 在巴伐利亚邦议会关于文教预算的演说（摘录）** (244)
 (1896年3月2日)
-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和农民问题** (246)
 (1896年底)
-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发言** (252)
 (1898年10月4日)
-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关税和贸易政策的发言（摘录）** (256)
 (1898年10月7日)
- 在慕尼黑党员大会的演说（摘录）** (258)
 (1899年9月25日)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 问题的发言	(267)
(1899年10月12日)	
在帝国议会关于海因茨法案的演说(摘录)	(274)
(1900年3月15日)	
关于米勒兰事件	(279)
(1900年12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慕尼黑代表大会关于党的报刊 问题的发言	(300)
(1902年9月16日)	
在帝国议会关于预算问题的演说(摘录)	(305)
(1903年1月20日)	
最近几次国会选举的教训和后果	(315)
(1903年7月27日)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关于修正主义 问题的发言(摘录)	(333)
(1903年9月18日)	
在巴伐利亚邦议会关于军事预算的演说(摘录)	(350)
(1906年1月11日)	
在国际社会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 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发言	(355)
(1907年8月20日)	
在巴伐利亚邦议会的演说(摘录)	(360)
(1911年10月26日)	
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年表(1850—1922)	(365)
人名索引	(370)

森林的破坏和洪水(摘录)

(1876年9月3—10日)

一

大约二十年来,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即半个欧洲,照例每逢春夏都有为害极其严重的洪水袭来,令人生畏;成百上千的人丧生;各种财产受到损失,付之东流;土地荒芜,几年不能耕种或者永远不能耕种,——凡是涉及的地方,灾难、不幸、贫困和疾病都会降临。

这种不幸难道是“厄运”造成的,难道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带来的吗?倘若如此,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不知道这种不幸,只是到了当代它才发生呢?这种照例发生的洪水,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幸,不是“厄运”,不是无法逃避的自然现象,而是掠夺性地破坏自然界平衡、首先是无节制地破坏森林(特别是从本世纪后半起,一种贪婪的投机助长了这种现象)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经营方面的种种过失理所当然的惩罚,是资本的剥削欲望无限膨胀的必然结果!

科学告诉我们,森林对空气和土地的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森林从雾和雨摄取大气中的水分,这是通过它的繁茂的树叶和针叶,通过它的干、杈、枝和根,以及通过它所占据的表面松软的土地来摄取的;它又逐渐地把这些水分化作泉水和露珠交还给大地,化作形成云层的水气交还给大气,从而不断向我们提供必不可少的

水，却把多余的水保留下来。它通过它的抵抗能力削弱暴风雨，并且调节气流；它通过树叶和针叶散发氧气，从而对人畜的健康起有益的作用；它通过它的根保持腐植土和耕地，使松散的土壤不致流失。

一旦森林不再存在，就能最清楚地证明森林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大气中的水分没有森林来摄取，就会积累到过分饱和的程度；降雨次数减少了，却因此更加猛烈，它不再是沁人心脾的露珠和带来丰收的雨水，却变成危险的雷雨，变成具有破坏力的暴雨、霜和冰雹。对这样大的水量是无法抵抗的；不再能通过森林得到保持和分散的水，从四面八方汇集成奔腾呼啸的山洪，迅猛地冲向最近的河流，它使山谷荒芜，也使这些河流因接受它的流量而上涨，这就使洪水的范围日益扩大。水量这样过剩以后，接踵而来的当然是干旱，赤地千里，严重缺水；水源减少，蒸发加快；过去唯一还能多少分配和节制一下过量的水的河流——十年来欧洲的总流量大大下降——和湖泊同样在缩小。总之，迄今适宜的气候趋向两个极端，因为以前森林所进行的那种平衡和调节没有了。

这就是说，森林通过降水和蒸发，即水的一进一出的调节，使气候达到必要的适宜程度；湿度是取决于森林的，我们需要气候湿润，以此来保证人和牲畜的健康、土壤的肥沃以及我们的文明程度！

这样的森林，这样非常重要的财富，它的繁茂与衰败同我们的生活条件的好坏有如此重大的关系，难道它真的被当成一种宝藏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和保护了吗？难道人们真的做到了除非在必需时连它的最小部分也不砍伐，而且相反，尽可能地使它扩大，并且采用科学所提供的一切手段使它繁荣起来了吗？特别是过去对它犯下的那些过失已经作了补救吗？我们的各国，我们的各政府，我们的各议会都在十分关心人民的幸福，它们是否十分警觉地注意

不使森林这个人类的伟大保护者和恩人受到违法分子的损害，是否企图在保护森林方面互相争胜呢？

是的，如果我们的各国、各政府、各议会不是目前社会的产物和代表，它们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简言之，如果我们的各国、各政府、各议会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的国家、政府和议会，它们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今天的社会不是建立在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个别人享有特权、即少数一部分人剥削全体人民的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国家、政府和议会只有在公共幸福对少数人、即统治阶级的目的和幸福没有妨碍的时候，才会考虑到公共幸福！

如上所述，森林对公共幸福来说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也是一个绝妙的开发对象，可以从中得到一笔可观的款项。统治阶级即资本把它打算获得的利润、它的幸福投放在天平上，嘿，公共幸福就显得轻如鸿毛了！资本一时得到的好处给整个社会带来持久的缺点和害处，这同它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纯金就是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把林木变成白银呢？

于是森林遭到随心所欲的采伐，荒芜了，毁灭了，资本只看到自己的好处和今天，——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公共幸福和未来它是不管的。但是我们却要提出证据来说明森林受到了滥伐和如何受到滥伐的。在这方面首先必须把公共森林（掌握在国家、市镇和团体手中的森林）和私有森林区别开来。因为森林决不是完全掌握在公团即国家手中；任何人都不会要求当今社会按这样的逻辑办事：每个人的全部生存所依赖的东西也只能不受限制地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而不能不受限制地掌握在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手中。

至于公共森林，那么各国对它的经营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关怀备至地加以保护，有的极不合理地加以破坏。一些国家甚至

在肆意滥伐和破坏方面名列前茅；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况，虽然它的森林由于以前遭到破坏（掠夺）本来已只占它的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这对一个多山的国家来说是太少了），它在1868年却出售三点五公顷的国家森林和团体森林供采伐；又如法国，虽然它的森林由于1791年9月29日的革命法令所引起的滥伐本来就很稀疏，只占它的总面积的七分之一，但在1868年这一年，它除了从国家森林取得约四千万法郎的收入外，还通过“正规的”森林采伐从各省和市镇的森林取得一千二百万法郎，通过“非正规的”森林采伐从那里取得一千四百万法郎；最后例如土耳其，它几乎把它所有的公共森林提供给出价最高者去砍伐，并且尽可能多做成交易，至于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过去犯下的过错，那就根本不必提了。还有一些国家，它们占欧洲国家的绝大部分，由于森林统计方面的资料不足，对于它们的森林经营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或者一无所知，它们仅限于过度砍伐林木，但是毕竟至少没有把树林砍光，而且往往是由于经费困难才这样做的，不过它们由于不重视近代森林科学的学说和经营不合理而使它们的森林受到很大损害；我们把意大利、希腊等国算在此列。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对森林的经营平均说来是好的，部分地是很好的，例如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萨克森。团体的森林，特别是市镇的森林，一般说来遭到采伐的程度要大得多，但是在这一方面，国家也能通过对这些团体的监护关系发挥某些良好的作用，至少能防止发生最坏的情况。

但是占林产一大半的**私有森林**的破坏简直是毫无节制的；德国的私有森林占百分之四十七，巴伐利亚占百分之四十九，奥地利占百分之七十五，匈牙利占百分之八十二，瑞典占百分之九十二。在这方面还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国家，例如在巴伐利亚，正是在森林破坏情况为害最大的地方即山区，私有森林所占的比例还要大得多，例如在上巴伐利亚几乎占四分之三，而在阿利高几乎全部是

私有森林。……

二

如上所述，只有森林破坏造成的洪水泛滥的直接后果，即很多人丧生、各种财产受到损失、土地荒芜和庄稼被淹等等，才是人们一望便知的。但是，这些损失不是唯一的损失，也不是最大的损失，因为大多数损失是可以通过这一或者那一方式加以补救的。洪水——森林的破坏——的另一些后果却祸患无穷，因为它们不仅是一时的，而是持久的，一部分根本无法挽回，这些后果起初是间接的，后来才逐渐发生作用，往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

让我们把对耕地和农业的不良后果归纳如下：供养我们的耕地由于水土流失以及不毛的岩石的覆盖而日益减少，剩余的耕地又由于气候变坏，由于交替发生的炎热干旱（整个水源也随之减少）和过分潮湿（这对枯干的田间作物往往弊多利少，而且会形成沼泽），由于暴风雨、冰雹和霜冻频繁，以及由于大水的洗劫，产量严重下降，——而这是在人口日益增加和劳动人民在生活享受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合理要求的情况下发生的！

当然，气候的变坏、气温的急剧变化不会不对人的健康发生有害的影响，除了给体弱的人，给肺部、胸部、喉部、关节等处患有疾病的人带来恶劣的后果外，特别是会引起多种多样的新病症、传染病和炎症等。家畜的情况同样如此，被水淹过的饲料地和地面潮湿的牧场对它们也特别有害；甚至农作物也出现了种种可以说是因气候变坏造成的新病害。……

其次，这个问题除了物质的一面外，还有道德的一面。我们在

一天或一周的辛勤劳动之后，走进美妙的森林并在那里稍事休息（我们最美妙的诗篇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此而来的），不是十分令人心旷神怡吗？我们在上巴伐利亚、在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的森林等处恐怕还能零星发现一片山毛榉林或槲树林，山中的一片针叶林或甚至一片原始森林，这难道不是很美吗？……

如果人民看到，“上层”阶级（同时是教育、训练和剥削他们的人）本身否认并且践踏道德原则，把他们的卑鄙的利己主义、可耻的私欲奉为他们唯一的行动准则，那么，人民的“正义感”、“法制观念”、重视道德的思想能够增强吗？因为在我们看来，道德的界限同宗教和国法的界限不是一回事，“神圣的”法典和世俗的法典并没有加以禁止甚至还作为美德宣扬的很多行为，我们却认为是不道德的。没有掏人家衣袋里的怀表的人，没有持枪抢人家钱包的人，没有杀人的人，还远远不能因此就被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我们倒是认为，某些由于迫不得已或者轻率而进行偷窃的小偷，某些在盛怒之下杀了他的敌人的凶手，比很多“富有的和可敬的”创业人、有钱人，一句话，比各种各样的剥削者要道德一些，这些剥削者公然有计划地骗取“小人物”衣袋里的钱，冷酷地剥削“他们的”工人，通过高利贷盘剥他们的债务人，最后逼得他们去自杀！在我们看来，简单地说，道德就是个人要考虑到整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简单的伦理规范，一切宗教在口头上都传布这一规范，实际上却加以否认，一切国家都用这一规范来教育人，但是一切国家的种种制度、整个的社会组织却是对它的极其辛辣的讽刺！

统治阶级否认这一道德，践踏公共幸福，发展极其卑鄙的利己主义，这只会对人民的品德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且也已证明产生了这种影响；如果健康的人不是立即拒绝这种腐朽的东西，如果他长期受到这种腐蚀，那么他早就彻底腐化了！

三

谁承认我们对发生洪水的原因和后果的阐述,他就会懂得,那些洪水不是“偶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人们无法消灭自然现象,只能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它的害处尽可能减少),而是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手段使之大大减轻并且有朝一日加以消除的灾害,尽管由于已经造成的损失,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

一旦病症和病因被弄清楚了,那么只有傻瓜才会对可以采取的手段抱怀疑态度。必须采取一种治本的办法,必须消除酿成灾害(它使我们的农业生产、并从而使我们的文化生活遭受极其严重的困难和损失)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在后果上去做笨拙的补救工作。

应当采取的措施必须是预防性的,不是堵塞性的。不要等待发生洪水,而要设法使它不致发生;一旦大气中的水分形成洪水,那么总的说来再同它作斗争是完全无益的,为此用去的经费、劳动和时间绝大部分是白费的。因为,只要消除不了发生洪水的原因,洪水就会一再发生,而且自然是一次比一次更迅速和更猛烈,在几小时之内就会使成年累月用于建筑调节和防护工程的劳动化为乌有。这种办法至多能够保护个别的地方,而且多半要靠牺牲别的地方才能做到,但是绝对制止不住普遍的破坏;相反,一旦洪水猛烈地冲决堤坝,那时它的危害比没有阻挡它时要大得多。

因此只有采取消除原因的治本办法。必须在大气中的水分凝结起来并且变得过多以前就开始同它进行斗争。森林、大的菌类植物会做好这件事,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们从大气中吸进水分并且逐渐根据需要又散发出去,森林是我们这个星球的肺,但就是这样的森林正在遭受十分苛刻的虐待和破坏,而且是最大限度的

破坏。

.....

靠政府吗？它们不是从根本上去对待这种灾害，一劳永逸地消除产生上述破坏现象的可能性，而是企图以少量的资金和办法去应付。它们制定关于森林保护、森林合作经营和允许赎买使林业深受其害的森林采伐权的法律，这就是一切！它们企图在不触动根本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当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幸福与公共幸福发生冲突时，它们总是到处都这样做。

.....

消除产生上述弊病的主要原因和根源，导致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可靠的改善以至最后痊愈的办法是简单的：剥夺，即把全部私有森林收归国家所有，收归整个社会所有，这些森林只能属于国家和整个社会所有！当然，统治阶级中的“有权势的人物”是绝对不会想到采取这一办法的；我们今天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具有只有教会过去才具有的那样好的胃口，但是它们对于这样的果断办法却经受不住，并且变得神经衰弱起来了，因此，我们在谈到应急的对策时，对这一激进办法不予考虑（在结尾时再谈这一点），几乎所有国家现行的宪法对于采取这一办法来说，都是既不够软弱，也不够坚强的。我们要物色一种代替办法，当然要始终记住，这一代替办法决不能取代真正的治疗办法，而只能起同它近似的作用并且为它作准备！

但是，如果那些国家不打算对破坏森林的罪行进一步扩大并且造成危害（大部分危害是根本再也无法补救的）这一点承担责任，那么它们至少能做、也必须立即去做的事情是：迅速（因为每天都在造成重大的损失）制定一项法律，对私有主规定种种由公共幸福和森林的合理经营所要求的限制办法。把全部私有森林置于国家的严格监督之下，由森林管理机构依靠森林主的经费、以森林科

学的规律为唯一的准则来经营；不愿遵守这一规定的人可以把他的财产卖给国家。不仅要对他擅自轻微滥伐自己的林木的人严加惩处，而且要用强力禁止他这样做；对于多次触犯这一法律的人，国家要剥夺他的森林，因为他不配占有森林。不久前伐去林木的地段要用它的原主的经费进行造林；如果这些人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他们可以把上述地段卖给国家。这种办法对于其他一切适于造林并且为它所必不可少的地段也是适用的。应当宣布，对于阻碍森林的合理经营和真正繁荣的那些放牧权和割草权，即所谓取得饲料的权利，必须进行赎买。总之，国家根据森林学理论确定，必须有多少森林，必须在哪里有森林，应当怎样进行经营和什么树木是可以砍伐的。

是啊，我听到有人说，这样一来哪里还有所有主对他的财产的权利呢？哪里还有使用和滥用自己财产的权利，容许任何人忽视他的财产的权利，总之，哪里还有这样的“神圣的权利”呢？那是共产主义学说！是啊，如果这种学说可以达到目的，而且只有这种学说才能使人在无须运用本来意义上的激进手段的情况下达到目的，那么为什么不运用这样的学说呢？其次，共产主义的设施在我们今天这些国家里绝不是闻所未闻的东西。难道容许我让我的位于交通线上的房子年久失修以至倒塌吗？不能，因为必须走过这所房子的人们也关心它是否处于良好的、不会危及他们安全的状况。如果修筑一条铁路、一条道路等等必须征用我的一块土地，难道容许我打算把这块土地用作菜园等等而拒绝不给吗？不能，因为一切打算使用这一交通路线的人的共同利益显然比我的个人利益更有价值。如此等等。当问题涉及到森林这个人类和文明的保卫者，涉及到根据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多半会决定我们的繁荣、我们的文明程度的一项财产时，难道个人的“权利”、利益会比全体人民的幸福更有价值吗？只有傻瓜才会这样主张。

这就是说，个人权利必须受到干涉，政府不应当不管，当属于全民的权利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时候，那简直不容许采取别的做法。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全部历史无非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不断干涉。封建制、农奴制和奴隶制同个人“权利”有什么不同呢，它们难道不是和无限地使用和用掉土地和森林，任意对其加以经营并使之受到破坏的那一权利一样“神圣”吗？

当然，上面指出的限制办法根本谈不上会对森林主进行非法的损害。迄今一直合理地和善意地进行经营的那些森林主，不会感到情况有什么改变，或者至多感到这是向好的方面改变，因为由受过教育的森林管理人员来经营，情况多半会好得多，森林也会因此而更有价值；那些对合乎自然情况的采伐感到不满足而打算竭力进行掠夺的森林主，可以作价把他们的森林卖给国家。

说到国家购买森林和土地，那么即使它必须一并买下所有的森林，就问题的财政方面来说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当然，普鲁士大臣弗里登塔尔 1875 年在众议院讨论一项关于森林保护和森林合作经营的法律提案时正是把经费问题作为国有森林为什么不能大量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来论述的，因为他计算，只要普鲁士邦占有的森林增加百分之三，在每一莫尔根（合 39.1 公亩）平均价格为一百塔勒的情况下，就要付出一亿四千万塔勒。

就是说，当问题涉及到文化目的（而且同时还是大有收益的）的时候，经费问题就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还从来没有听到在涉及军事问题的时候发生过这种情况。如果人们认为以新的杀人武器代替刚刚购买的杀人武器、建筑要塞、建筑军舰等是“必要的”，那么即使所需款项极大，人们也不会因为费用问题而大伤脑筋；人们设立新税，增加旧税，总之，哪里有钱就从哪里去弄。当人们就帝国购买全部德国铁路一事进行争论时，敌人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即这笔钱“是微乎其微的”。一句话：当我们的那些政府

认为某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时候,对它们说来,人民为此必须作出的经济上的牺牲从来嫌太大。当然,如果问题涉及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涉及到改善农业和卫生等状况时,他们就不提“巨大的财富”了,只是冷冰冰地表示遗憾,表示无能为力,再说几句老掉牙的关于人民幸福之类的空话了事。

但是购买森林是根本不需要现金的。可以象购买铁路那样办这件事:发给所有者以债券,对这笔贷款付给适当的利息,逐步分期还清。我们知道,除了铁路公债以外,没有任何国债会比这样做更加合理、更有效益和更不强加于人;因为森林在经营得当的情况下不仅会提供足够的利息,而且它的价值会不断提高。

这就是说,你们这些国家、你们这些政府就放心地去干吧!应当在这里进行一场真正的文化斗争,你们就在这里把你们时常夸耀的那种对人民的幸福的关心表现一下吧!请你们大刀阔斧地首先进行这项工作,不要长时间地犹豫不决,因为否则你们就会发现不再会有很多东西可以挽救了。这里是罗得斯,就在这里跳吧!

但是我们担心,而且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的警告会充耳不闻,或者不如说不会遵照执行的,正象对待我们之前的很多人的警告一样。你们将象从前一样袖手旁观!也许当呼救之声日益紧迫的时候,这座轰鸣的大山会生出一只小耗子,由警察局发出一项指令之类的东西,因为你们没有别的办法!不能期望任何人有意危害自己的生存,而命运却是肯定会要实现的!

四

这就是说,尽管森林保护问题十分重要和紧迫,但是最近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或者进展很小。那些本身竭力破坏森林的国家将毫不在乎地干下去,当然也不会禁止个人干国家自己也在干的事

情；但是，那些相信森林对文明十分重要而确实把它们自己的森林经营得很好的国家，也毕竟将多少容许而且必须容许资本放手进行毁灭性的采伐！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因为上述唯一能取得某些成果的限制办法是对“神圣的”财产展开猛烈的进攻，后果是严重的，这可说是在夺取一个重要的桥头堡，从那里可以立刻将主要堡垒夺取过来；因为对土地的私有权的那些限制只能是取消这类财产并将其转交全民所有的第一步，是一个过渡阶段！这就是说，尽管今天的各国都知道，唯有上述手段才能卓有成效地抵制并且消除使公共幸福遭受重大损害的森林破坏现象，但是它们却不能使用这一手段；因为它们一旦使用这一手段，自己就会破坏它们的基础，即破坏通过对劳动资料（首先是土地）的私有权而取得的个别人的特权，人对人、个人对民族的剥削和统治，它们就会砍掉它们坐在上面的那个树杈，或者至少把它锯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

我们从上面所说的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森林的破坏是土地问题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由于森林的破坏，公共幸福受到难以医治的严重创伤，我们的整个文明受到非常严重的威胁。今天的各国却没有加以制止，也无法加以制止。因为这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组织的基础即个别人对全体的剥削的一个合乎自然规律的结果，只是这种剥削的无数形式之一。因此，森林的破坏象其他所有文化问题一样，只有指望在将来而不是在现在才能根据公共幸福，根据文化进步的要求得到解决，只有指望通过消灭当今的社会、消灭当今的各个国家和建立真正自由的人民国家，也就是只有依靠社会主义才能解决！

因此，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实现社会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取消劳动资料的私有制，首先是土地的私有制。……

整个人类必须呼吸空气，而空气是变好还是变坏要取决于森林经营得是好还是坏；整个人类必须靠土地生活，而土地的肥沃程度是提高还是降低同样取决于森林的经营情况；整个人类的全部存在是依赖土地及其产物，即空气、森林、粮食、水、矿泉等等的，它的幸福和痛苦、它的文明是取决于土地的。因此，这个大地按照道理和根据权利确实只能属于整个人类，只能是所有的人的共同财产。

.....

总之，有几十条理由一致证明要废除土地私有制，科学、经验、正义、经济上的考虑都证明这一点，一切都在证明这一点；要反对这样做，只有一条理由，这就是一小撮人的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要作出决断是不应当有困难的。

但是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式废除私有制呢？这还是很成问题的，而且首先取决于统治阶级本身。除了自愿或者被迫卖给整个社会即国家外，最合理的办法恐怕是逐步限制继承权。但探讨这个问题不属于我们这篇论文的范围。我们就此结束吧。

人民是一个患病的人。人民的疾病不是生来就有，不是存在于它的机体之内的；不是的，不如说疾病是人为地造成的。一个医生在病人幼年发现了它，他决定剥削他，靠他生活。这个狡猾的和丧尽天良的人使患者伤了元气，从而人为地使他生病，使患者缺少不了他。从那时起，他经常给病人吃粗糙的食物，而他却吃着规定给病人的富有营养的食物；他每日每时地吮吸病人的血，敲骨吸髓，他尽量频繁地这样做，如果尽管如此病人有一天还显示出有些力量，他就会给病人狠狠地放一次血。在这段时间里，这个江湖医生使用了种种方法，从来不让患者变得强壮和健康，但也不让患者死去，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没有生意了。尽管如此，这个病人还是长大了，成为一个高大的相貌堂堂的人，只要服用一种滋补的药剂，

立刻便可以康复并且生气勃勃地站在这里。江湖医生完全知道，一旦患者痊愈，他的寄生生活就会结束，他会不会把使人康复的药品交给患者本人呢？当然他会看到，尽管病人服用了那么多他的剂量日益增大的伤身药品，却仍旧逐渐地强壮起来，他甚至几乎可以预料到什么时候这个病人将要求服用他也知道的那种药品。他是否如此明智，要去顺应不可避免的情况，同这个患者和睦相处呢？由于他知道患者的思想高尚而且乐于宽恕人，他是否企图通过逐步给患者本人服用这一药品来取得和解呢？如果他的利己主义还允许他保持足够的理智，那么他是会这样做的。如果一切都和和气气地进行，不致引起任何暴力行动，无论对他本人来说，还是对他的迄今的患者来说，都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江湖医生不能顺应不可避免的情况，却相信可以与之对抗，那么对他来说灾难就会临头，他就要自食恶果。固然他会从患者身上吮吸尽可能多的血，会用种种方式使他虚弱；而且他用铁门和铁条严密地把药品封锁起来。这是徒劳的。这个病人受到一些好心的朋友的支持（其中甚至包括欺压他的那个人的子孙），弄清他的医生的行动方式和他的病症的性质、他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的收藏处，他会不顾医生使用任何对抗药剂而日益强壮起来。有一天他会从他受苦受难的病床上挺身站起，用严肃的语言要求把能使他的被人用卑鄙手段夺去的健康得以恢复的那种药品给他。江湖医生现在也还是可以得到挽救的；但是他也许会看一看他的无所事事、生活优裕的过去，再看一看他不得不同其他人一样劳动的未来，于是拒绝给予患者所要求的药品，因为他相信铁门和铁条是结实的。遭到拒绝的人发出愤怒的目光，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近里面装着药品的大门，用强有力的拳头撼动铁条，这是一场短暂的激烈的斗争，——这个奸诈的医生结束了他的诈骗生活！难道这是患者的过错吗？不是的，这是医生的过错；他是可以

作出抉择的。这是你自讨苦吃!

但是,患者在吃完最后一滴药以后充分恢复了他的元气,再也不会会有任何人将它夺走了!

但愿患者,即人民,一次再次地,不要停止要求得到非法地从他那里夺去的东西,把他的朋友的无私忠告铭记在心,试图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力,并且准备迎接他的康复之日的到来。

不过,医生要认清形势,并且在还有时间的时候慎重考虑。

译自《人民国家报》1876年9月3—10日第103—106号。

私人声明(摘录)

(1877年7月4日)

我从来不愿意在我担任编辑的报纸上讨论我本人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是普遍受到人们关心的，因为我认为，一家报纸的领导人在这类需要克制的问题上应当向读者提供一个范例，宁可让得过分，而不要做得不够。最近，无论是敌对的报刊还是党的报刊都在忙着讨论我的一些事情——起初是四月份敌对的报纸发出了一份正式的通缉令，现在是争论是否取消我的年金——，由于上述原因，这两次我都在《人民报》上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态度。但是，现在一部分自由派报刊谈论我本人时所采用的方式使我迫切地感到有必要发表一点意见。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总是新鲜的办法：人们要想直接战胜社会主义原则可惜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就中伤那些捍卫这些原则的人，中伤那些为这些原则而在第一线作战的人，企图以此间接毁谤那些原则。一个战士刚刚加入我们队伍，立刻就有人打听是否能在他的私人生活或者经历中找出一点点错误或者缺点来。有哪一个人不为年青时干过某一件蠢事而感到内疚呢？好吧，敌人现在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就象市井无赖一样，拿不出任何中用的法宝，干脆就甩你一身污泥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一套做法也会被用来对付我，在我之前已经发生过几十次，在我以后还会发生几百次。……如果说我曾经为罗马服务过，那是完全正确的。^① 我出

^① 1868年福尔马尔曾在罗马教廷的外籍军团服役。——编者注

生于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在修道院里受过教育，过去是个一本正经、十分狂热的天主教信徒。我在十八岁时满怀激情地认为天主教教义就是我的生活的理想。为了这一梦寐以求的理想，当我听到驰援罗马的呼吁的时候，我便毫不迟疑地豁出了最宝贵的东西——生命，而现在，由于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和学识的增长，我的认识比较清楚了，我再也不是为了一个幻影，而是为了伟大的自由事业、为了伟大的人民事业，拿出我的全部知识和才能，愉快地贡献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了！

官报^①和与它观点一致的人的处境当然不会与此相似。这些人作为一种最可悲的忠实走卒，总是——当然没有危险地——在那正在节节获胜并且战利品最多的旗帜下进行战斗；与此相反，我却总是置身于战败者和受压迫者的阵营之中，那里只能给人造成创伤，招致迫害和带来牺牲。这是一个不同点。另一个不同点是：过去在民族兴起时曾经向往自由和平等的自由派，现在怯懦地抛弃了人民的事业，并且为了得到心爱的好处而替暴政效力——他们倒退了；而我呢，由于出身和教育，从前是个相信肉体和精神都应受到管束的人，是个相信君主制和宗教的人，但是由于真诚地和摆脱一切顾虑地进行学习，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反对那些与人民为敌的权力的不可调和的战士，并且破釜沉舟，割断各种联系，抛弃种种利益，勇敢地加入了人民的行列，就是说我进步了。就是说，一旦我认识到了自由、真理和正义，我便站到了它们一边，与此同时，那些对此有所认识并且一度为之而战的敌人，出于极其可鄙的原因，却背叛了自由、真理和正义，而且每天还在背叛、否认和糟蹋它们！

我的同志们和所有公平无私的人几乎都不会怀疑，哪一方面

^① 指德累斯顿《官报》。该报和其他自由派报纸曾刊载一篇短评，指责福尔马尔在1867年未获许可就脱离巴伐利亚军队。——编者注

有更多的正义和更多的尊严。追随现行政权、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人，本来就已采取人所能采取的一切手段来对付社会民主党，对于我更是异乎寻常，辱骂、控告和迫害我，——这些我都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按照他们的利己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我确实是个“叛教者”，是个不可救药的人，而这些人在他们那个阶层的眼里向来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罪犯，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对付的。但是，叛教者们也从来是他们所背叛的事业的死敌，而我之所以也会成为这个社会的无比愤怒和绝不调和的对手，并且愿意为了尽快地以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来代替这个社会 and 造福人类而全部贡献我的微薄力量，正是因为我部分地根据密切的观察认识到了我们现行的腐败社会的全部荒唐可笑的现象和罪恶的非正义性。

一些地方的报刊曾以上述方式报道有关我的情况，我向所有那些地方的党的机关报提出这样的请求：希望它们或者按照原文发表这个声明，或者介绍它的精神；或许也有一些可敬的敌对报纸会注意到这个声明。

格奥尔格·福尔马尔

载于《德累斯顿人民报》1877年7月4日第39号；又见《前进报》1877年7月8日第79号。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35—37页。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篇关于社会经济的习作

(1879年7月)

科学社会主义所要开拓的领域是一个极其广阔的领域，因为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与此相比，全心全意和头脑清楚地开垦这个领域的勇敢的先驱者的队伍却是多么小啊！从前，驻扎在帝国边境防备日耳曼人的罗马军队只能在无尽无休的反对德意志人入侵的斗争中抽出短暂的时间从事和平耕作，同样，社会主义先锋战士置身于令人筋疲力尽的党的斗争中，只剩下极少的时间从理论上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体系。

在这一垦区里还有广阔的地段很少受到注意，而且有好些地段根本没有触动过，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相反，我认为，社会主义至今已经在理论方面取得如此多的成绩，这一点倒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社会运动象社会主义运动那样，从它存在的那天起，就在实践中出色地发挥作用，同时又不断地使它的理论趋于完善，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如此发展呢？

我们不仅应当把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完全献身于事业的“鼓动

* 这篇文章是福尔马尔 1878 年夏在茨维考监狱里写的，起初发表在卡尔·赫希柏格(化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 1 年卷上册，署名为 G·V·；不久以后，由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并且署了他的全名。——编者注

家们”的忘我精神，而且还要部分地归功于敌人。那些罗马军团如果只能依靠战士们的极少可供使用的劳动力，它们的谷物和葡萄是不会种好的，不如说，它们依靠的主要是那些暂时没有使用武器能力的人，即为了消除疲劳和养伤而暂时离开部队的人，这些人和少数始终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一道，极有成效地进行耕作。这和我们这一领域的情况完全一样。如果说在任何时候最富有成果的思想都是和监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不论贡献大小）大部分也是在牢房里实现的。

目前我也是这样地站在火线后方，我想利用我得到的闲暇来略微耕种一块由于各种事件纷至沓来而至今几乎完全不受注意的土地，它是非常值得为之花费一番气力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它的经济计划，是否必须在整个文明世界，或者说在所有经济上比较发达的民族那里同时取得统治呢？或者说，一个单独的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是否可能，并且是否具有生命力呢？

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无论在口头宣传上（就我所知）或是在报刊上几乎只不过是进行过一些十分肤浅的讨论，尽管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通常满足于宣称，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很有可能必须在文明世界的各个主要国家同时发生，甚至是必然如此。我想寻找这个观点的充分论据，却是白费力气。

我的意见与上述意见正相反。我认为，（我将尝试在下面证明这一点）不仅从历史角度说，首先仅仅在单独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更加可能的，而且也丝毫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繁荣。

在认识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最容易犯的**危险**是把一种新获得的经验立刻运用到一切方面，打算根据一个新认识到的真理解释一切事物，而对于其他应该考虑的情况却不加考虑。由于不了解整体，于是把局部看成整体。这种错误我们遇见得非常多，而且在

日常生活和科学领域里都是如此。举例来说，良好的营养当然是身体健康的重要前提，但是如果象许多人所做的那样，认为健康和力量唯一地取决于营养，这是不对的；因为还要考虑到许多其他的东西，和这些东西结合起来，营养就有可能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东西也可能部分地或甚至全部地抵销这个结果的影响。水当然是一种出色的药剂，但是如果象许许多多水疗法的拥护者那样，认为在水中可以消灭一切疾病，这是可笑的。水就是药剂，但不是秘方，并且除了水还有许多别的药剂，水必须和它们一道发挥作用，才能对大多数疾病产生有益的效果。又如：一个国家的地质构造对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会有重要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地质构造对人民的最主要的从业活动及其划一性或多样性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其他方面的生活方式和气候等等也有部分的影响；但是如果认为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唯一地取决于地质构造，这个看法是十分荒谬的，我简直没有必要提出相反的意见了。

但是很多社会党人在判断社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的时候就是这样片面和愚昧的。这些人做事非常容易，因为不管说的是法国革命还是迦太基的灭亡，是基督教的产生还是成吉思汗的侵略，他们都冷静地以很大的口气说：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当时的经济状况为基础的！这个解释方法当然有优点：简单，不必花费时间去进行研究。但是这种解释方法“解释”不了什么。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和制度的基础，因此经济关系的任何发展都必然对这些组织和制度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无疑是真理。但是，如果说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历史因素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认为除此以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历史因素就是错误的了。只需看一下今天的主要文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特别是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的地位，就可以了解这个论断的荒谬。社会主义必

须以发达的经济关系为前提。如果这仅仅看经济关系发展如何而定，那么在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社会主义也必然是最强大的。但是事情绝非如此。英国无疑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在英国还只是起十分次要的作用，而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德国，社会主义却已经是这样一支力量，它使整个旧社会再也不觉得安全，并且联合起来“铲除”它了。同样也不能单从经济关系出发来解释英、法、德、意等国的政治和宗教情况。

历史不是幼稚简单的原始工具，这种工具是最不熟练的人也能一眼就看明白其构造的，历史是一个由无数交错连接的部件构成的非常复杂的机械装置，这些部件固然大小不等，重要性不同，却各有自己的作用，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在经济状况这个主要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动力在活动着，这些动力和主要因素之间当然存在因果关系，它们绝大部分是直接由主要因素产生的，至少是受主要因素影响的，但是这些动力在历史进程中变成了如此具有独立性的力量，以致本来的那个力量的表现方式（不论是就形式还是就时间来说）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力量以及这些力量的组合。这些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的、法律的、科学的和宗教的状况，种族特性等等，也不应忘记个人的因素。虽然有一般的规律性，但是合乎规律的东西绝不等于机械的东西，因此在个别情况下，个人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比一些历史宿命论者愿意承认的要更大，更富有影响。

显然由于这么多力量的共同作用，任何一般的人类运动过去和现在都很难成为在几个国家、更不用说在一切国家（当然是指一切文明国家）以同一时间、同一方式发生的运动，不如说过去和现在这个运动都必然是极其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也将服从这个规律。当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现在极力阻挠社会主义传播的那些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的传统和制度（尽管它们在一定情况

下也可能对它起促进作用,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将越来越失去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直到最后这些存在于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将完全消失。但是由于巨大的习惯势力,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并且恐怕很难认真地设想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对事物的改造推迟到那个时候。

在今天和今天可以预见的未来的标准情况下,社会主义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这样一种假设看来是完全可以排除的,根据同样的理由,另一种假设,即认为一切其他的文明国家必然会立即仿效一个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的榜样,也完全可以排除。

相反,社会主义在两个或三个经济最发达、思想最进步的国家大致同时取得统治地位,这一点倒是更有可能的。在这些国家里,今天已经达到很高程度的经济矛盾还在日趋尖锐,资本垄断和群众的贫困化迅速发展,由于这种情况,这些国家的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民越来越抛开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无聊废话(这些东西迄今一直如此使它们的注意力和力量离开主要目标),而转向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感情上和思想上彼此接近。再也没有任何对于权威的信仰能制止群众争取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努力,面对这批日益增多的群众,统治阶级不得不采取不断翻新的暴力镇压措施,甚至在迄今不常使用这种手段的地方也是如此。由于贫困的均等化(我们越是设想今天的“制度”的末日会往后推,那么那时贫困状态就越会趋于均等)和普遍的紧张状态,由随便哪一件令人忍无可忍的事件触发的运动当然能够同时席卷好几个国家。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它的出现是合乎人们愿望的,因为如果社会主义在两个主要文明国家,例如法国和德国(连同奥地利的各个德意志邦)获得成功,那么一方面反动派卷土重来的危险就

会显著减少,另一方面我们事业的最终的、普遍的胜利将得到巨大的推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我们大家都希望在行将到来的伟大变革中,大陆的两个主要文明国家将携手并进。

但是,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陷于严重的、致命的错误,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所期望的可能性是确定无疑的。只要用毫无偏见的、不被愿望弄模糊的眼光看一下上述国家及其政治的、宗教的、民族的和其他的差别,就足以使我们明白,必须有什么样的有利情况才能引导这些发展程度如此不同的国家大致同时和齐心协力地走向共同的目标。我们把实行变革的时间设想得越近,也就必须把两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思想觉悟设想得更加落后,那么这些有利的情况就越靠不住。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首先只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相反的情况的可能性却小得多。至少这个比较有利的机会是没有把握的,因此我们不能指靠它,因为实际的政治家(现在敌人已看出我们绝非象他们从前认为的那样“不切实际”)不能只从乐观的方面着想,而只能记录最可靠的数额,不管这些数额还是多么小,否则,他们的估计就站不住脚。

这样一来我们就要谈到**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恐怕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对来说最可靠的立脚点。我在研究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能力**的问题时,有意完全不讨论社会主义在这个国家以什么方式取得(或者取得了)统治地位的问题,虽然不仅从任何方面来讲思考这个题目都会是十分有趣的,而且在重新组织国家的时候,采取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要考虑到一切的发展可能性,诸如逐渐地从旧的制度向新的制度和平过渡,或者由于长期压制的结果而发生的突然的、因而更加剧烈的变革,或者在上述两种可以设想的情况之间的各种可能性,考虑到变革发生的时间的迟早等等,那么我就会埋头于细

节的研究,而我根本不愿意这样做。相反,我认为应当尽可能一般地把基本的条件确定下来,在我看来,这些基本条件对于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它的经济组织和它同其余那些不是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有一个唯一的前提:我不是把渺茫遥远的未来,而是把今天在世的人们能够活到的日子看作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刻。

这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取得绝对统治的国家,而在所有其他的文明国家,事物还保持着旧的秩序,即保持着旧的经济体系,至于它与什么样的政治形式相联系,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国家将采取什么方法,一方面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国内建设,另一方面对外站在有利于新的经济制度的立场来解决新旧经济制度之间的冲突,并且一般说来确保新的经济制度的蓬勃发展呢?

关于**改造国内关系**(在这里我是单纯就经济领域而言,并且不言而喻要以同这一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行政的、政治的、教育的和其他的制度为前提),看起来下面的办法无论如何是最简单的:坚决把全部彻底失败了的旧帐一笔勾销,重新开始,也就是说通过一次立法行动把全部生产工具从不合理的私人占有转为公有,从而以有计划的集体生产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私人生产。历史在某些重大的转折点会加快它平日的平稳步伐,在坚决向前迈进的时候会一脚踢开它平日要小心翼翼地排除的障碍,但是即使如此,历史仍然不会作冒险的跳跃,谁想迫使它这样做,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我们的国家的最初时期,必然会出现一种**过渡状态**,在这个时候,旧的事物、生产工具的私有制还存在,当然,要尽可能提供保证,反对私有制迄今对公共幸福的有害影响,并且逐步地废除私有制,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立刻由我们的国家没收生产工具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

将以已经屡次讨论过的规定为准则，即应当在所有实际上已经集中化的企业实行，而尚未完全集中化的部门和按其性质难以集中化的部门则暂时在国家监督之下留给私人企业，主要是置于市镇的影响范围之内。本文的目的绝不是从上述的观点观察各种不同的生产，这个任务将会有其他比我更能胜任的人来完成，并且一部分文章已经发表了。我认为，要立即没收暂时还在私人手中的生产资料，尤其是要使它们不能为害，使它们服从普遍的经营计划并且逐步转为集体所有制，必须遵循一些原则。为了说明这些原则，我选了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农业**作为例子。

无论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必要性还是它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者当中都丝毫不必为之费唇舌了；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由于资本主义邻国可能采取敌对措施，哪怕只是暂时地全部或部分停止输送货物，因此在我们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保证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会比过去更有必要，有时会成为真正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虽然如此，是否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够立刻使全部土地或绝大部分土地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这是十分令人怀疑的。今天在几乎全部土地面积都已经被为数很少的大私有主垄断、小私有主几乎无足轻重的英国，也许还有意大利，“剥夺剥夺者”不会有任何困难，国家不会遭到大的抵抗，几乎可以说一下子就能占有全部土地（因为或许会允许小私有主享有的那种例外，不必经过任何法律的强制，仅仅由于新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就会很快结束）。但是对于法国和德国的分散的土地状况来说，提出同样的要求会是错误的。全体中小农民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处于严重的贫困状态，却仍旧顽强地依附自己的土地，他们没有远见，尽管对他们的剥夺只不过是纯粹名义上的，而且他们会因此得到实际的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自己的恩人，而是看作自己的死敌，他们不仅会消极地、而且会非常积极地反抗这个死敌。

所以，我们所设想的国家只能先占有现有的公共地产，即一切国有土地和皇室地产，教会、学校和其他慈善事业的地产和村社地产。应当按照什么比例立即剥夺私人的大地产，或者说，考虑到下面要谈到的我们国家对继续存在的私人地产采取的、确保集体所有制迅速发展的各项原则，必须进行到多大的程度，这些都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我在这里不想加以讨论。无论如何要立即没收所有的巨大地产、王公贵族的世袭地产等等，这样一来公共地产增多了，我们的国家通过占有这些地产——如果对这些现在并没有集中经营的地产实行集中化的话——就会对农业生产发生重大的影响，这首先是由于合理的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其次是由于工人的经济地位的提高。当然，只有通过下面要加以说明的那些其他方面的规定，这种影响才能起决定作用。

因此无论如何，很大一部分土地还是归私人所有。我们的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不仅防止私有制象过去那样对公共幸福造成危害，而且迫使它为公共幸福服务呢？为了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首先提出一个反问：是什么东西使生产资料的私有主有可能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来危害公众呢？有人会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生产资料是他的“财产”，他可以用它来为所欲为。这个回答在一般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个别情况下，特别是对我们的情况来说，则是无论如何不能令人满意的。

“财产”这个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确切地说，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把它解释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举例来说，财产的狂热崇拜者今天还特别喜欢把罗马法的不受限制的财产概念（使用和滥用自己的财产的权利以及忽视或破坏自己的财产的权利，简言之，不受限制地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说成是至高无上的、不可企及的、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的神圣的东西，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区的扩大，这一概念的影响范围是极小的。财产概念

过去和现在都几乎处处受到数不清的限制，甚至往往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了社会的幸福，不允许财产的私有主处置自己的财产（出售权除外）。希腊人和罗马人等等的历史提供了足够的例子说明，国家、也就是说公众拥有无可争辩的支配个人财产的权利，我完全把过去的这种情况撇开不说，只想谈谈当前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例。根据奥地利和维尔腾堡的最新森林法（林务官们力争把该森林法推广到一切文明国家），不经森林管理当局的许可，森林的私有主绝对不能动这片森林。如果森林管理当局根据森林经营方面的理由认为伐木是有害的，私有主就不得砍伐他的任何一棵树木，哪怕他多么急需这根木头也不行；反过来，如果当局认为必须砍伐（例如由于木材腐朽），私有主就得执行，即使他根本不想这样做。生产工具的私有制之所以对于公众成为最危险的东西，是由于私有主有权完全自由地支配生产工具，不管使用得是否合理，现在这一支配权被剥夺了，私有制不仅不能反对公共幸福，而且在一切事情上都必须为公共幸福服务了。留给私有主的仅仅是构成财产概念的基本内容的那一权利，即私有主或迟或早可以从他的“财产”中取得公众无权享受的特别的利益，虽然由于受到上述限制，这种利益已绝对不能随意增加，但是和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比起来，这总还是一项重要的特权。

如果我们确认这种财产定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绝对不想引进纯粹是“闻所未闻的”和“从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想在任何方面都仅仅从现有的情况出发，我们只需要发展在现存“制度”下已经存在的许多萌芽），那么要在过渡时期达成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和私有财产之间的、为公共幸福提供必要保证的协调方式（不但为眼前的幸福，也为将来的幸福，就是说为了逐渐从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这个任务看起来绝不是太困难的。

已经为整个农村提出一项根据科学的农业学说的原则和消费

统计的成果而拟定的经济计划，私有主和国营农场经理在法律上都有义务严格地遵守这项计划关于土地耕作(用于种植谷物、饲料和园艺等等)和为此而使用的方法(管理方式、品种等等)的各项规定。为了贯彻这项经济计划，要把全国划分成一些农业区，每个农业区都必须有负责监督和协助管理的政府官员。那些由于私有主固执或无知而没有按照经济计划的规定进行管理的私人土地暂时由私有主自己承担费用，置于国家农业管理人员的特别监督之下；但是，如果私有主长期不愿服从或没有能力执行为了实行合理的经营而提出的规定，就实行剥夺，当然在私有主流亡国外和叛国时也要实行剥夺(在下一情况下当然不予补偿)。正象私有主在土地问题上必须按照国家的规定办事一样，他们在对待他们所雇用的工人方面也应当如此。不仅在劳动时间、必要的保健设施和劳动保护所要求的其他设施问题上采取法律措施，而且也规定了最低工资(当然，国家在自己的农场里在任何方面都要作出良好的榜样)。

至于农产品的出售，当然要杜绝对公众有害的投机买卖。这一点同样可以在不触动财产的实质的情况下做到。我们的国家在整个市场上对价格规定起决定性的作用。国家以固定的、除全部生产费用外只加上抵偿被剥夺者的补偿年金(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在整个产品量中所占的百分比无论如何已经相当大了，而且要不断增加。因为私有主现在既不能出于自私自利的打算而不把产品提供消费，也无法例如通过出口替自己找到更加有利可图的市场(因为商业是由国家独占的，这一点我们还要谈到)，因此只要真正的“市场”即竞争还存在的话，那么对私有主的产品出售来说国家规定的价格基本上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通过逐步设立国家粮食局，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私有主的产品除了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没有别的办法。由于

前面所说的那些措施使私人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很难比国家更低廉,因此私有主的全部所得将仅仅是管理企业的报酬(如果他们愿意并且能够从事管理的话),再加上出售价格中包含的补偿年金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国家付给被剥夺者的,不过私人生产者可以把这一部分据为己有。

在这些情况下,私有财产的各种优点当然都很不牢靠了。私有主再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等等而随意用他的土地来剥削工人和消费者,相反他对国家负有重要的义务和重大的责任。私有主从他的财产还能得到的唯一实际利益和他自愿接受剥夺时所能得到的一样多,而在后一情况下他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没有任何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较大的业主的绝大多数恐怕很快就会自愿放弃他们的“私有主”的称号,带着国家付给的补偿年金退隐。他们当中那些憎恶怠惰的享受生活、愿意劳动的人或者将继续干练地管理自己的财产,这样对自己和对公共幸福都有益处;或者他们将担任国营企业各部门的经济官员,为自己找到能挣钱的用武之地。但是小业主很快就会看出,他们作为国家工人过的生活要比从前当“私有主”时有益得多,因此他们将从集体所有制的敌人变成它的挚友。

由于这一切情况,国家的(集体的)财产将会迅速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进一步加快取消私有财产,还需要一项法律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任何到某一确定日期还不把自己的私有财产交给国家的人在受到剥夺时,只能得到在这一时期以前所付的补偿年金的一部分,而在一个更远的限期以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就会完全结束。

关于上面提到的“补偿年金”我还要作几点说明,以免对我使用这一词的意思产生任何误解。象有些人例如洛贝尔图斯^①和谢夫莱^②想象的那样,按照对德国封建义务或俄国农奴制赎买的方

式进行正式的“赎买”，即按照十足的金钱价值给予补偿，几乎是谈不到的。否则通过世代继承如此大量的消费品，仍然会保证靠其他公民的劳动养活的懒汉组成的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继续存在。这是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完全相违背的。当然在迄今享有特权的人们当中，把拒绝给予这样的补偿称作“不公正”的不乏其人。然而实际上我们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首先不承认被剥夺的剥夺者的这种“权利”的人。雅典的世袭贵族在梭伦^③废除封建义务的时期究竟得到哪些“补偿”？法国的封建主在1789年8月法令废除他们的“领地权”时，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在解放黑奴时，许多国家的行会师傅在实行行业自由时，他们究竟得到哪些“补偿”呢？都没有。

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正性在于它保证它的每个成员都过着同样的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得到同样的一份精神的和肉体的生活享受，只要他尽自己的力量参加维护和改善社会的工作。不仅从前的穷人，而且从前的富人也从这种保证得到好处，因为他们的财产的不稳定性带来种种物质上和道义上的缺点，现在他们却用这种不稳定性换取了生活的绝对保障。当我们的国家使从前的所有主过这样的生活时，它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而且这也就是它的全部职责。如果尽管如此国家给予这些东西暂时还要多些，那么

①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Johann Karl Robertus-Jagetzow 1805—1875) ——德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代表，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温和派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袖，后来成为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编者注

② 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谢夫莱 (Albert Eberhart Friedrich Schäffle 1831—1903) ——德国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宣传放弃阶级斗争并鼓吹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合作。——编者注

③ 梭伦 (Solon 公元前约638—约558) ——古希腊雅典的政治活动家，公元前594年任执政官，施行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债务，特别是农民由于欠债而负担的义务，废除债务奴隶制，鼓励工商和对外贸易，颁布“土地最大限度法令”，试图限制土地过分集中。——编者注

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因为它承认一种并不存在的、取得这种额外补偿的“权利”，而仅仅是出于实际的原因，即为了更加容易从事物的旧的状态向新的状态过渡。

唯独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证明上面提到的补偿年金是正确的，由此也不难看出应当以什么方式付给年金。这笔补偿费（更加正确并且更加表明特点的说法是慰藉和安抚的钱），正如它的名称一样，不是一次付给的，而是以消费品终身年金的方式付给。它将是适度的，就是说不会超过公民的平均收入太多；由于这个原因，被剥夺的财产数量愈大，补偿的百分比将相应地减少，并且在达到一定的数额后就不再增加补偿费。只有被剥夺的这一代人本身才得到这笔年金；这一代人之后旧的不平等的最后残余也消失了。

我们的国家将在一切生产领域采取和我在前面关于土地耕作所指出的同样的措施，因此不仅防止私有财产（除非有关的企业的高度集中化已使它有可能并且有必要立即转为公共占有，例如采矿业；不言而喻，也包括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如果现在的国家没有对这些部门采取这种措施的话）损害公共幸福，而且迫使它为公共幸福服务，而私有财产本身却因此逐渐消耗净尽。我感觉到自己没有资格来探讨以什么方式把上面提出的原则运用到各个生产部门，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原则本身；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根据今天的情况和最近将来可能有的发展而进行一次这样的研究，那是很值得赞许的。

我还必须特别提到一种私有财产，因为由于事物的本性，上述原则肯定不适用于这种私有财产，确切地说必须作重大的修改。我指的是那种财产，今天在俗话里只有它被称为“资本”，这就是货币占有、借贷资本的占有。在我们的国家，随着这种资本的前提的废除，它的作用当然就彻底结束了；资本在一个仅仅以劳动为基础的经济组织里绝对没有任何位置。因此在这里也谈不上逐渐的剥

夺，而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剥夺，一次完成。一切种类的债权证书和不动产证书，不管它叫什么：抵押贷款、期票、私人债券、股票、不动产押据、各种交易所证券，在法律上全部收归国有。被剥夺者获得按照他们从前的财产的实际价值计算的补偿年金。国家督促有财产的债务人，也就是还拥有私人产业、并不单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的债务人相应地对国家清偿他们的债务。但是如果说剥夺已经能生息的资本必须是强制性的，那么对待私人手里的现金绝非如此。因为废除金属货币，也就是废除同商业无法分开的、或者不如说同商业对劳动的剥削无法分开的世界货币，是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我们的国家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所以在我们的国家里从前的货币今后不过是单纯的金属，所有主可以用它制作工具、艺术品等等，但它已不再是所有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来买到任何消费品的普遍的流通手段。金属货币的所有主只可能用两种方式把他们的这一财产变成消费品：或者他们把自己的货币交给国家，国家需要它来支付给外国，为此给他们一笔补偿年金。或者他们带着他们的钱袋到外国去，我们的国家完全没有理由阻止他们这样做——懒汉越少越好；至于他们在那里继续苟延残喘多少日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过的，我不打算列举那些与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同时进行的一切政治和行政等等方面的改造，我只打算开垦一个迄今被忽视的领域，而不去谈论那些过去和现在已经谈得够多、因而至少可以假定已经被人们普遍理解的事物。但是请允许我再简单提一件事：通过这些改造，将会有多么巨大的一批劳动力可以用于生产，而这些劳动力迄今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被闲置不用或者起着破坏作用，例如常备军、一部分官吏、有时失业的人们等等。

由于劳动力大大增加和合理的经营，一句话，由于所有的物的

和人的生产力展发和综合成一个计划周密地实行管理的整体，生产就会出现现在还无法预见的巨大增长。举个例子说，德国处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再也没有必要每年用一亿马克进口谷物、面粉和肉，因为这个国家只要正确地耕种大片的、根本没有耕种的、耕种得很坏的或很不得法的土地，并且建立合理的、用一切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进行工作的大企业来代替浪费劳动的细小经营，这个国家不久就能自己生产这些食品。在所有的工业部门，而且尤其是在上述这些部门，也会增加产品，以致看不出敌人所预言的在我们的国家里不久就会盛行的贫困甚至饥馑会从何而来，倒不如说更有可能恰好出现相反的情况。

但是，如果要达到我们所力争的目标，就必须在对生产**实行组织**的同时也对**消费**、也就是对消费品的分配**实行组织**。在这个领域里流行的完全无政府状态、通过投机买卖、欺诈、伪造、大量的中间商业等等对人民的剥削，与我们的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是不协调的，这一点根本无需讨论。但是尽管在这里国家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做起来却并不困难，因为人们在这里要对付的根本不是什么固定的“财产”。国家可以直截了当用私人的消费品分配本身具有的最独特的武器把它置于死地，也就是国家作为最大的竞争者把自己的较弱小的对手从战场上赶出去。国家建立许多粮食局，在这里以成本价格既出售自己的产品，也出售只由国家进口的商品（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详细谈）。商人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无法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国内产品和外国商品；其次，由于商人也必须遵守劳工保护法关于最低工资等等的规定，他们的营业费用也绝不能更加低廉；最后，完全为公众谋福利的粮食局在商品的质量方面为消费者提供的保证比关心自己私利的商人多得多；所以，商人不可能长期同国家竞争，相反粮食局的顾客将越来越多，从而对增加粮食局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直到私人贸易完全被粮食局排挤掉。商

人不会因此失业，这一点无需特别提出保证；他们的一部分就由粮食局任用，而由于取消了中间商业和消灭了迄今的、惊人的劳力损耗所造成的浪费，另一部分人在这个工作部门将成为多余的，他们将在别的劳动部门找到工作。谁只要具体设想一下由于运输方面的惊人浪费、同样大量的场地和劳力的浪费、赝造和毁掉商品（欺诈哄骗等等不算在内）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谁就会了解同生产的组织一道发挥作用的消费的组织将怎样有力地促进我们的国家和公民的福利。

但是，建立了调整国内关系的组织决不是万事大吉了。没有一个文明民族是仅仅孤立自在地生活，不需要任何不是自己生产的东西，也不生产自己不需要的任何东西；文化越发达，数不清的生活之线就越把各民族联结在一起，一个民族就越需要另一个民族。我们的国家需要（精神财富除外，它本来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自己所没有的、必须从其他国家获得的许多产品，反过来说，这些国家也需要我们国家生产的许多多余的产品。必要的平衡由国际贸易来实现。这一重要的经济职能同国内的生产和消费是分不开的，它们密切地相互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必须象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一样服从完全同样的经济规律。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改造它的经济关系，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生产和消费摆脱私有财产的任意控制，那么在商业方面国家也必须贯彻这个原则。因为现在商业也象生产和消费一样是以剥削的原则为基础的，正如上面那些论述商业在我们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的段落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商业，它就根本无法进行。只要旧的剥削者的经济制度还有可能通过商业进行投机，它就不会让位于另一种经济制度。因为这一点，还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对商业来说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这一方面的私人经营不致损害公共幸福，并且能够为逐步向集体经营过渡开辟道路，

所以在这一方面关于所有制的过渡状态是谈不上的（至于对被剥夺者的补偿当然是另一回事，关于这一点，已经说过的有关原则都是适用的）。相反，全部商业和船舶运输业必须立即向集体财产、向国家所有制过渡。

任何一个商人都不会否认，象我们的国家这样的掌管整个国家的出口和进口并且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管理的经商者，必然会在世界市场上取得十分有利的地位。我们的国家为国外市场和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都不是象私人生产那样盲目，不是必须纯粹靠碰运气，而是通过它在国外的代理人进行调查，按照需求或订购来调整生产，从而了解出口的大致需要。另一方面国家也不随意进口，只进口那些真正能消费掉的东西，国家是从粮食局的报告或者根据报告编制的消费统计中详尽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这样我们的国家几乎完全避免承担由于对全面的经济情况一无所知而造成的贸易风险。我们的国家即使不是在一切细小事情上，但是在大体上是有把握的，无需凭可能性和盖然性办事，也就是无需进行投机。因此它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商业公司。私人生产利欲熏心，哄抬价格，弄虚作假，我们国家的商品质量不受这些影响，所以它也是最有信用的商业公司。它不需要寻找好买主和好卖主，确切地说，全世界都会愿意同我们的国家做生意，因此它可以提出条件；的确我们的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比世界市场对我们的国家的影响大得多，这是因为世界市场只不过是成千的时而互相排斥、时而互相吸引的利害关系的混合，这些利害关系的组合状况是经常变动的，而我们的国家本身则是一个统一的、本质始终不变的、有明确目标的力量。

可是现在敌人反对这种合乎逻辑的主张，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证实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甚至社会主义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他们提出如下的论证：你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劳动人民

境况的显著改善(劳动时间减少而收入提高)将使你们的产品如此昂贵,以致外国不再会购买这些产品。外国将用廉价得多的劳动力自行生产这些产品,这些低廉的劳动力大大抵消了运输或其他方面可能会发生的涨价。但是如果你们出口不足,就无法买进成千种生活必需的或者使生活舒适的外国产品。你们就会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贫困的生活,充其量只能靠农业和几家可怜的工业艰难度日。

这种反对意见是马志尼早就提出过的(见《制度和民主政治》),它似乎真有点道理,但是实际上只好骗骗不动脑筋的人。这种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制造产品的工人的工资同今天相比提高多少,产品的价格也必须提高多少,但是这种极其精明的打算只忘记了一件小事,即取消资本利润和提高劳动工资是相当的。但是今天资本利润平均不少于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根据博卡多^①,在英国为21%,美国为25%,法国为36%,意大利甚至为58%);所以工人的收入可以提高整整三分之一,即使我们把付给被剥夺的资本家的补偿年金(这当然远远达不到从前的资本利润那么多)算在内,那么毕竟还是可以增加一个相当大的份额,即商品价格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可以比现在增加65%到75%(按照马克思的假定,资本从工人生产的价值中平均取得的扣除额占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的80%到100%),而丝毫不会因此提高产品的价格!除此以外,由于彻底消灭了当前生产方式的上述许多弊病并且极大地增加一切经济力量,物质的生产费用将显著减少,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生产工人,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们国家的公民的状况可以进一步得到改进,另一方面竞争能力可以提高。可见,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在世界市

① 杰罗拉莫·博卡多(Gerolamo Boccardo 1829—1904)——意大利经济学家。
——编者注

场的竞争力也远远不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却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极大的好处。

如果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在物质状况即工资和生活需要方面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改造以前的工人处于大致相同的情况（这种均等性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多半已经达到而且还在日益增加），那么作为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这样的非社会主义生产决不会给我们的国家造成威胁。因为那时由于已经举出的原因我们的国家的产品绝不会更昂贵，所以非社会主义生产只能靠更廉价地提供同样质量的产品的办法来同我们的国家的产品进行有成效的竞争。但是不言而喻，这一点决不能靠削减资本利润来实现（这样做对企业主究竟有什么益处？），所以，除了减少生产费用，就是说减少工资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在使用这种生产方法的情况下要减少生产费用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下，工人的处境本来已经很糟了，他们眼看着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们的有利地位，是否会心平气和地容忍自己的境况进一步恶化，这至少是很值得怀疑的；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种企图也不会完全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上面那种情况就更值得怀疑了。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由于出口不足而减少生产，反而更有可能会扩大出口，并因此扩大生产，这一点是再也不容怀疑的了。但是这样一来那种进一步的反对意见也就站不住脚了：在（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那些生产供舒适享乐、豪华生活之用的奢侈品工业将由于缺乏销路而毁灭，一大批工人将因此失业。因为外国出于上面已经阐明的原因将一如既往继续购买这种类型的产品（当然是在趣味爱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但是集体生产至少能和私人生产一样好地满足这个变化）。其次不要忘记，人民的境况显著地改善了，许多过去只供富人享受的产

品将转为大家使用，国内对一整批这种产品的消费量将大大增长。但是，如果这一个或另一个生产特别奢侈品的工业部门由于愤怒的外国富翁拒绝消费并且国内完全没有销路而真正停止生产，那也不会因此造成多大损失；迄今在这个部门就业的工人将干脆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在那里他们会用比以前更有益于人类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

关于我们的国家作为输出者的情况就说到这里为止。至于谈到输入，人们只要想起我们的国家是唯一负责输入并且分配进口货物的，那么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误解我们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这个事实说明，现在全世界为之争吵得非常激烈的国际贸易的两种形式，即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对我们完全无效。在我们的国家里根本不实行私人进口，无论征收进口税的或不征收进口税的私人进口都没有。而国家也确实不需要为自己确定关税。我们的国家和外国之间或者说社会主义生产和非社会主义生产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以简单得多、直接得多的方式进行的。除了已经谈到的较便宜的外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之外，对我们的生产来说，最大的危险在于外国廉价制造我们也生产的某些产品，以致尽管加上运输差价，这些产品还是比我们自己的产品便宜，因而将和我们的生产进行危险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家将必须采取两种办法。为什么能够提供这么便宜的产品，其原因不外两个。一种原因是持久的，不能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消除的，也就是同一定的地点和自然资源等等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放弃已经无利可图的生产，更加合理地把过去用于这些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另一种生产；另一种原因是暂时的，变化不定的，例如特别低的工资（奴隶、苦力），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完全不进口这类产品，要么在许可进口时使它的出售价格与本国产品的出售价格完全相同。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我们的国家当然不会有任何形式的间接税，本

国产品自然不得不降价,但是不会因此造成损失,因为少付给本国产品的钱由多付给进口产品的钱抵消了。

我们的国家不容许在自己内部有任何外来的、不按照我们国家的生活条件而存在的事物,因为我们的国家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可以随意改变组合关系的分散的力量的综合,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机体,凡进入这个机体的东西,就必须适应它,被它同化。

还要提到我们国家同外国的另一种经济联系,当然这方面的问题不是要继续维持这种联系,而是要迅速摆脱它。这种联系就是外国人(个人和国家)在我们国家里的私人占有,包括生产工具的占有和借贷资本的占有。不言而喻,就受限制或被废除这一方面来说,这种占有必须和本国国民的占有服从完全同样的法律。只要这些外国私有主成了我国公民,那么不言而喻,对于他们有权享受的补偿年金,同样的规定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对那些仍然保留外国籍的人则是另外一回事:首先,由于实际的理由,消费品补助年金在我们国家以外当然是不适用的。其次,我们的国家对外国的长期债务关系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因为任何象历来那种方式的交付利息是一种附属关系,一种奴仆的身份。由于这两个原因,为了立即废除外国私有主的占有权,对他们的补偿要一次付清并且用货币(现金或外国的价值凭证)支付。这种补偿是全部偿还借贷资金或财产价值,还是不全部偿还,以及按照什么比例偿还,这恐怕将根据无法预见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此外,我还要就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国家的一般关系,或者确切地说,就它一方面同这些国家的人民,另一方面同有特权的人的关系说几句,因为这些国家当中的任何一个都象柏拉图谈到希腊国家时曾说过的那样,是由两个国家,即富人的国家和穷人的国家组成的。我们的按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保证它的每个公民享有完全的政治和社会平等,并享有在其他国家中只有居民中百

分之几的特权分子才享有的那种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消灭了任何形式的奴役和剥削，才给它的人民带来了真正的自由，并从而带来了真正的人的尊严和生活的乐趣；这个国家对一切意识到自己处境的民族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这一点在明智的人们中间决不会产生任何意见分歧。

这种吸引力的第一个后果（这是最不重要的）将是**外国工人大批移居到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民族或种族的差别，每一个人在这个国家中都有同等的权利，就象他们都有同等的义务一样；因此，不言而喻，我们的国家原则上丝毫不反对新的居民移入我国定居。然而我们的国家将不得不对他们大大地加以限制。如果我们假定，外国或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陷入困境，甚至也许连这种困境都不需要，外国工人对我们国家的状况的普遍向往就足以使他们大批迁移到我们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我们国家的人口最终将比国家能够养活的人口多得多的危险。因此，对我们的国家来说，防止这种危险是一个生存必需的条件。通过限制移民除了可以维持我们国家的生存以外，还可达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这种限制将激励那些被阻止迁移的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实现他们想到我们国家寻求的较好的状况。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仅仅由于它的存在就会促使全世界**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各国人民**考虑如何改善他们本国的状况；因为它以活生生的榜样向他们指明，如果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话，他们能得到什么东西，并且怎样才能得到。我们的国家决不会仅仅限于进行这种直观教学。我们的国家毕竟不是由只要自己过得好就心满意足、不再关心人类的其余部分的那种冷冰冰的利己主义者组成的。确切地说，我们国家的公民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不是要把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种族，而是要把整个人类从旧的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只要还有一个被压迫的人和不受法

律保护的人，这项伟大的解放事业就还没有完成；只要还存在一点经济和政治的专制，他们也就不会认为自己的自由与幸福是有保障的；因此不把最后的特权从世界上消灭掉，社会主义者就不会罢休。因此我们的国家也将以一切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手段积极帮助其他国家也尽快实现社会主义。

因此可以预料，各国人民将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欢呼，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却会对它恨得要死。在这里将会而且必然会发生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时同样的情形，那时所有其他的政府也都对它采取敌对态度。因为它们确实知道，胜利了的革命很快将越过法兰西的国界；它们也知道，在一个有生命力的（革命的）共和国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推翻它们国家的独裁的和贵族的统治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同丹东、马拉、阿贝尔的共和国和旧欧洲的各国反动政府之间不可能真正友好一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余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府之间也不会真正友好。但是这还不是说双方就要手执武器不断地打仗了，至少我们的国家不会先发制人，因为它原则上反对战争，只承认在万不得已的防御情况下可以进行战争。更确切地说，只要这场斗争取决于我们的国家，它将是一场完全不流血的斗争，但是它的激烈程度并不因此就减轻，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它要以各种方式促进各国人民争取政治和社会解放的意图，并且用这种方式不断努力“破坏”那些压迫形式。

但是，尽管统治阶级对我们的国家的仇恨是很自然的，这种仇恨却是软弱无力的。主要是由于各国内部社会运动日益壮大而产生的困难极大地消耗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它们不会自愿地制造外部困难并且向一个它们有一切理由感到害怕的对手寻衅滋事。首先因为这个对手本身是一支团结一致的、强大的力量；其次因为在统治阶级自己的国家里支持这个对手的力量也十分强大。但是如果统治阶级还想用敌对行为对付我们的国家的话，它们想从哪一

种方式着手呢？它们想通过经济制裁、通过禁止进口、阻挠出口使我们的国家遭受损失吗？完全撇开我们的国家有力量相应地对付这种行动不说，外国是这样地需要我们国家的产品，就象它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必须向我们的国家为它自己的产品寻求买主一样。所以，就外国本身的利益而言，采取这样一种措施也是谈不到的。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小规模摩擦和捣乱当然是不值一提的，因此剩下的就只有**公开的暴力**了。

那时，面对有史以来武力最强的共同体，那些政府和那些统治阶级会有哪些机会呢？要知道我们的国家对于它的公民来说不是虚幻的“祖国”，而是自由的和幸福的生活的集中体现，这种自由的和幸福的生活将随着我们的国家一同遭到损害和消灭。因此，我们的国家拥有一支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国防军；此外，它还无限地掌握一切物质的防御手段。同这比起来，我们国家的敌人的力量又怎样呢？它们的人民并不在它们的阵营中，相反却是他们的统治者与之交战的那个国家的最好的朋友，并且将以任何方式、也会根据情况直接用武力支持这个国家。常备军呢？就他们的基本群众而言，他们恰恰是由人民组成的，而人民的事业同他们与之交战的那个国家的事业是牢不可破地连结在一起的。他们的胜利将是对他们自己的最严重的打击，他们的“敌人”的胜利却将解放他们。他们来自人民，而人民却作为他们的“敌人”的公开的支持者站在他们后边。

那时还能怀疑斗争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吗？“浩浩荡荡的大军”将第一次遭到失败，而有关的统治者会象风暴中的秕糠一样被他们自己的人民和军队扫掉，他们的统治将永远结束。

所以，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不管愿意与否只好放弃向他们所痛恨的社会主义国家寻衅。但是，我们的国家既然是这样不可战胜的，这就不仅会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和独立不受外部影响，而

且会保证它的优势，保证它对国际事务、也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生活的几乎无限的影响。

这种影响只会对人类起着极为有益的作用：通过这种影响，过去的、由于掌权者肆无忌惮的专横而造成的普遍不安全将会消除，代替它的将是自然的发展的稳定性。难道不是专横造成了战争的大屠杀吗？还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内战，无论是人民被后膛枪和霰弹、或者“法律”和警察镇压下去也好，还是他们在绝望中终于自己拿起武器向虐待他们的人施行可怕的报复也好，难道不也是专横造成的吗？这些都是统治者的专横造成的，是那些不愿意服从人类发展的规律并且加以反对的掌权者造成的，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惜毁灭千百万人的幸福。

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同盟和依靠这一同盟支持的各国人民，统治者的专横将变成虚弱无力的状态。今后，社会的发展将畅行无阻；它再不会受到暴力的阻止，也再不需要用暴力为自己开辟地盘，这样一来，我们大家所努力企求的、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改造就能实现。但是，如果迄今的掌权者不肯顺从必然会出现的事物，并且再一次盲目地阻止滚滚向前、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那么这场斗争也将是短暂的，就象它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一样。

在消灭了迄今的、阻碍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障碍之后，它们将达到目的，即不是同时地，而是根据自己迄今的发展或迟或早地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国家很快就将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译自《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年
苏黎世德文版第1年卷上册第54—74页。

报刊历史的回顾*

(1879年11月30日、12月7日)

搞垮和颠覆任何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毁灭道德，破坏财产和一切文化，制造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贪求掠夺和统治，这些和另一些罪名现在天天都有人加到社会主义头上，不仅政府及其老盟友即贵族和僧侣这样做，而且直到最近才加入这个统治者同盟的资产阶级也这样做，因为资产阶级现在热衷于拯救社会而完全忘记了在他们变成锤子以前还曾经是砧子，他们今天斥责我们社会党人所犯的全部“荒唐的罪行”在几十年前人们也曾经拿来斥责过他们自己！而且今天凭借的理由同当时完全一样。人们只要翻阅一下现已不再存在的德意志联邦议会和德意志各邦政府直到1848年为止针对“革命的”自由党及其报刊颁布的法律和法令，就可以确信上述论断的真实性，并由此看到对于内容完全相同的反对社会

-
- * 这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载的文章曾被恩格斯怀疑为出自苏黎世三人团(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奥·施拉姆)中的一个人之手。恩格斯在1879年12月16日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5—408页)中尖锐地批判了文中关于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论述，指出那是明目张胆地对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抱怨，并说，“只要还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机关报就等于根本不存在。”据福尔马尔的传记作者理查·杨森考证，这篇文章是格·福尔马尔写的。——编者注

民主党的论调应当作出怎样的评价,也可以看到,事物的自然发展对那些眼光短浅的、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没有忘记的“国务活动家”的倒行逆施是多么不予考虑啊!

1819年9月20日,联邦议会主席布奥尔-绍恩施坦伯爵^①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为了商讨压制正在德国有力地传播开来的革命思想的最有效对策而特地召开的卡尔斯巴德大臣代表大会^②上这样说:“这种使人堕落的妄自尊大(指报纸撰稿人而言)最终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因此引起多么大的概念上的混乱、多么严重的人心骚动,使一切权威遭到多大的蔑视,使人们多么激烈地争吵,造成多么狂热的迷误和多么严重的罪行,这就无需再加以讨论了。几乎难以设想在德意志民族那部分正直的和真正开明的人士中间对这样一种有目共睹的灾祸还会有不同的见解和判断。”

难道人们在阅读这一段话时不会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期特别有趣的、向社会民主党危害治安的倾向大声咆哮的半官方的《省报》^③或者自动支持政府的《北德总汇报》^④吗?还是没有能力运用新观点的反动势力也许确实归根到底仅仅是照抄他们的早已故去的“名人”的言论来证明当前的某些东西呢?

由于1820年那不勒斯爆发革命,次年,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

① 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坦(Karl Ferdinand von Buol-Schauenstein 1797—1865)——伯爵,奥地利外交大臣(1852—1859)。——编者注

② 为了镇压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生)中的民主思想和自由运动,1819年在梅特涅的倡导下,在卡尔斯巴德召开了德意志联邦各邦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残酷的警察恐怖制度推行到德意志联邦各邦,决定在德意志各邦实行书报预检制度,对大学生进行严厉的监督,禁止大学生结社,并成立中央审讯委员会在全德对有反政府嫌疑的人(所谓“蛊惑者”)进行迫害。——编者注

③ 普鲁士政府的报纸,1866年在柏林创刊。——编者注

④ 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编者注

同普鲁士国王聚会于来巴赫^①，在1821年5月12日发表了一份由他们那时的大臣签署的宣言，其中声称有一个反对一切神的和世俗的权威的“大阴谋”，接着就对“在暗中偷偷地进行活动”的目的作了如下的描绘：“纯粹的君主专制，有限的君主专制、联邦宪法、共和国，这一切都已在一个宗派的判词中被宣布为非法的和应加驱除的，这个宗派把一切以无论怎样的形式超出幻想的平等之外的东西都看作寡头政治。这个卑鄙的宗派的首领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破坏社会的基础，他们对自己企图造成的普遍破坏的后果无动于衷，他们无视任何一种固定的、永久性的组织。推翻现存制度，同时打算用他们凭自己的混乱的想象力或自己的可怕的狂热信手拿来的东西去取代它们，这就是这个宗派的理论的本质和它的全部阴谋活动的秘密。”

被这样描绘的“混乱的想象力”和“可怕的狂热”究竟期望得到什么呢？不过是那种除了俄国和卡弗尔人^②的国家以外在全部为人熟知的国家今天都合法存在的君主立宪制而已。这些面对现存的君主立宪制还认为在事变的前夜可以通过这样地大放厥词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国务活动家”所表现出来的领导国家的聪明才智和天赋是多么了不起啊！今天这些“有天才”的国务活动家对待即将要求取得统治权的社会主义的办法和这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在对付社会主义时取得的成就难道会有不同吗？

那次来巴赫会议通过1822年的维罗那会议获得了补充，达到了圆满的结局。从这份在这里再次发表的冗长的宣言中我们摘引这样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只要一个一心只想进行革命和颠覆

①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1818年的亚琛会议，1820—21年的特劳波会议，1821年5月的来巴赫会议，1822年的维罗那会议。——编者注

② 对非洲东南部的班图族人的旧称。——编者注

的派别的贩卖性教唆活动和未遂罪行仍然在不止一个国家里扰乱人心；只要这个派别的首领和工具（不论它们是公开攻击王位和宪法，还是在暗中进行极其有害的策划，玩弄阴谋诡计和毒害公众舆论）继续对当前情况进行阴暗的、欺骗性的描绘，并且编造一套对未来的忧虑，从而使人民感到苦恼，那么，大国之间的这种和约尽管很牢固，却不可能充分造福于社会。”

《省报》难道不是确实仅仅照搬照抄吗？难道今天的国务活动家不是仅仅依靠从他们以前的、早已腐朽了的同事那里借债来为自己发表反对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的毁灭性言论和公告支付费用吗？

同1824年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①有关的言论我们就略去不谈了。它同上面所引用的完全一样。据说“那一小撮不知厌倦地竭力贬斥一切权威的人要动摇一切基本原则，歪曲全部事实真相。”——这些言论肯定又为长篇大论的忠贞不二的演说提供了材料。这些演说用它们全部的内容证实，人民的“朦胧的渴望”同他们的国务活动家的目的又一次表现出有多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经常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没落阶段出现，后来越来越大，直到最后有一部分人——只要存在历史，这部分人就总是国务活动家那一伙——淹没在事变的漩涡之中为止。

人民的思想在同一切现存制度决裂时，从自身汲取力量去进行新的创造，这是人的精神的一切崇高行动的标志。库诺·费舍^②曾说过：“在某些转折关头，人的精神对现存制度厌倦了，它发挥自

① 德意志联邦议会于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成立，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主席由奥地利担任，由德意志各邦代表组成，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但并不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而只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编者注

② 库诺·费舍(Kuno Fischer 1824—1907)——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家，黑格尔主义者，曾在耶拿大学和海得尔堡大学任哲学教授。——编者注

己本来的力量，并且依靠这一永不枯竭的源泉使自己获得新生。”历史上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转折点，精神也是在这里同一切现存制度实行决裂，并且依靠本来存在于人民中而不是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的阶级中的力量获得新生。在这些转折点到来之前，人民的目的同他们的政府的目的之间自然会出现长久而深刻的分歧。而且“人民的意见很少有错误，他们的感觉则从来不会有错误！”

二

1832年7月5日的联邦决议更令人发生兴趣。我们完全撇开书报检查的有关规定，现在来谈谈这一决议的第二条。“应在全联邦各国禁止一切怀有政治目的或在其他名义掩盖下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团体，应对这些团体的创建人和成员给予相应的惩罚。”至今尚未获得批准的群众集会和民间庆祝活动未经事先请求批准不得举行。绝对禁止公开发表具有政治内容的演说。“凡滥用(!)群众集会提出请愿书或决议案并要求签名或口头同意者，应受最严厉的惩处。”这样，当然就只剩下可能会有的为现存制度的永存而祈祷的群众集会了！然而今天的德意志各邦政府对待集会权（就涉及社会党人而言）的态度难道有多大变化吗？

所有这些气势汹汹的法令和律法都没有把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不满的资产阶级致于死地。对于任何一个通晓人类发展进程的人来说这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它只有对于那些专职外交家才是深奥莫测的，他们完全不想懂得历史的精神是不能按照他们没有远见的行动步骤和阴谋活动的狭隘模型来铸造的。1834年初德意志各邦政府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当时的“天才”、“伟大的”梅特涅在开幕词中说了这一番话：“从时代的风暴中产生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的勇敢（即使不是表现在迎合上，那也是表现在屈从

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敌视任何权威,因为它妄想自己能胜任统治,它在普遍的政治和平中进行一场内战,毒化人民的思想感情,把青年引上歧途,甚至愚弄年长的一辈,搅乱和破坏一切官方的和私人的关系,处心积虑地煽动人民群众对他们合法的统治者采取全面的不信任态度,鼓吹摧毁和消灭一切现存制度。”我们不再继续引用下去了,并且也不想去研究在维也纳炮制的冗长的会议记录;那一切都表现了同样的茫然不知所措的思想,说明他们由于软弱而求救于严酷的措施。何况为了看到他的内心的流露,也确实不需要一直追溯到梅特涅那里。前面所说的已足以表明,人们那时关于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同人们今天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话是完全相同的。班贝尔格尔^①和拉斯克尔^②的报纸现在天天原封不动地刊载那时封建主在伪装神圣的愤怒之下拚命编造出来的诽谤他们的言论。现在资产阶级也象从前的封建主一样把自己装扮成人类的一切守护神的卫士,而由他们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宣扬的个人主义事实上必然要把人引向极端的堕落和空前的浅薄。今天发生的所有有关的论战不过是过去论战的翻版,甚至反社会党人法意义上的“破坏”一词,拉斯克尔先生也不能自夸是他的独创!

在同一年即1834年的12月10日,联邦议会作出了一项值得德国人民深深保留在记忆中的决议。决议开头是这样说的:“最近终于在德国形成了一个以‘青年德意志’或者‘青年文学’^③命名的

① 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Ludwig Bamberger 1823—1899)——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伐尔茨起义,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编者注

② 爱德华·拉斯克尔(Eduard Lasker 1829—188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支持俾斯麦政策的民族自由党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编者注

③ “青年德意志”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和白

文艺派别，他们毫不隐晦地致力于在纯文学的、各个阶级的读者都可以接受的著作中以最厚颜无耻的方式抨击基督教，贬斥现存的社会状况，破坏一切纪律和秩序——在这以后德意志联邦议会由于考虑到迫切需要通过联邦各政府的合作立即制止这种有害的、破坏全部法律制度支柱的企图，并且在不妨碍联邦或各邦政府为达到这一目的根据不同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情况下，一致作出下列决定”……接着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出自上述文艺派别的著作的作者、出版者、印刷者和发行者应当和怎样受到惩罚。亨利希·海涅、卡尔·谷兹科夫、亨利希·劳贝、卢道夫·文巴尔克和泰奥多尔·蒙特被列举为这一派别的成员。这些人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最优秀人物之列的，为他们作任何的辩护都会是多余的。历史和德国人民早就把外交家们作出的那个决定提交审判，并把它企图打在“青年德意志”身上的烙印打在立法者们自己身上了。海涅早已是受自己的民族爱戴的人物。他的这句话：

“如果人们列举最优秀者的名字，
我的名字也会被提到。”

已完全得到证实。谷兹科夫和劳贝在民族的记忆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这里也和通常的情况一样，人民在仿效青年德意志的榜样时，在自己朦胧的渴望中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他们的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政府和外交家走的却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诽谤宗教，贬斥一切现存关系，破坏一切纪律和秩序”等等，人们当时赐给他们的这些光荣称号现在原封不动地扣在我们头上了，然而，和这些人相比，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会感到自豪，而且这也有助于使

尔尼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中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编者注

明智的人得到启发。

虽然颁布了勅令和禁令，但革命的鼓动工作日益发展起来，无论是在宗教界，在世俗团体等等中，还是在等级议会、在报纸上，都表现的是这样。为了挫钝这个不安静的、危险的党的锋芒，1847年普鲁士国王对普鲁士人民颁布了一部新“宪法”，在这部宪法里，对于各等级的权利固然作出了几点小小的让步，但是距离当时呼声最高的要求即实施一部象目前这样的宪法仍然相差很远。不仅如此，对资产阶级的这个要求，国王在1847年4月11日联邦议会的开幕词中是这样说的：“朕不得不严正地声明：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促使朕把君主同人民之间这种自然的、直接的、在我们这里由于它内部的真实性而起如此强大作用的关系变成条约式的、按照宪法规定的关系；朕也永远不会允许一张写满字的纸片象第二个神一样闯进我们天上的主和这个国家的君主之间，用它的条文来统治我们，并且用它们来代替往日的神圣的忠诚。”这话是皇帝在1847年说的，1848年来到了，无需“世上的力量”，君主立宪制就得到了法律的承认。皇帝的话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如此。

在这篇开幕词中，皇帝对资产阶级的意图作了这样的描述：“尽管通过一种高尚的、坚定的思想去提高报刊水平这样一种可敬的努力应当得到尊重，但无疑有一部分报刊是受邪恶的、败坏人心的思想支配的，这种思想使人心瓦解并倾向于颠覆，进行最无耻的欺骗，这对德意志的忠诚和普鲁士的光荣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朕知道，真正的民意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受邪恶之树的邪恶之果的诱惑。这种邪恶之果曾经在不和、猜疑和用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可耻的威胁的形式下反对我们，并曾借助于更坏的经验即公开的不服从，阴谋叛变，坚决背弃一切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神圣的事物，企图谋杀国王。”

我们要结束了。四十年的措施未能扭转1848年的局势。那

时发生的事件是**必然要**发生的；如果各国政府满足了时代的要求，那就会带来和平的一切幸福，但由于各国政府没有这样做，因而，很遗憾，**除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难道确实有眼光如此短浅的人、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们居然相信自己用来对付强大的、震撼世界的工人运动的老一套卑鄙的警察手段会比它们在1848—49年和这以前用来对付资产阶级自由运动时取得更大的成就吗？你们这些自欺欺人的骗子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胜利之日即将破晓，你们既不能用大臣和僧侣的饶舌，也不能用锁链和武器的铿锵声来赶走正在升起的太阳！你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选择用怎样的方式去实现旧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向新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转变！是让**这个转变具有平静的、渐进的发展性质，还是使一场社会革命以暴力的方式，蓬头散发，脚穿铁的凉鞋突然到来！**

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1879年11月30日、12月7日第9、10号。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成果*

(1880年9月19日)

党的维登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首先令人信服地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屈服于一个无耻的政府和一个同样无耻的资产阶级的迫害，它不顾这些迫害，仍旧和过去一样，无论从人数和影响来说，还是从对原则的忠诚和革命的行动力量来说，都和过去一样。

代表大会看到，旧的党组织由于受到卑鄙的非常法的破坏而陷入的瓦解状态已经结束，被警察的粗野拳头部分地切断的线索绝大多数又联结起来了，在反动派为所欲为的最初冲击中，在由于对谋刺狂的愤怒而受到迷惑的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曾经造成一些损失，现在也得到了弥补。代表大会高兴地看到，旧的久经考验的战斗队在一小撮叛变分子和可疑分子退出之后只是变得更加强大了，而且由于很多新人加入而得到扩大，这支队伍经过好好整顿又集结了起来，它仍然具有原来那样的为事业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

* 这篇文章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时未署名，它的内容和在这以前不久福尔马尔以苏黎士国外联络处名义发出的一份宣言式传单的内容基本相同。据福尔马尔的传记作者理查·扬森考证，它也是福尔马尔写的。由于发出这份传单，联络处受到奥·倍倍尔的严厉批评。倍倍尔明确指出：联络处的权利只限于同国外同志保持通信联系，无权越过中央领导机构向他们发出任何号召；这份传单已使中央领导机构处于被动地位，而为敌人迫害党组织提供了借口。（参看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3卷第126—127页）——编者注

具有对那个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恐慌和对自己的万能权势发生怀疑的敌人重新发动一次强大进攻的迫切愿望。

同时代表大会也看到，形势对于重新展开一次进攻是十分有利的：旧社会的腐败过程、各个旧的政党的破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觉醒了、对受到欺骗感到气愤，对通过旧“制度”来解救其日益增加的贫困的可能性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的情绪已经基本上转向有利于我们的方面。

面对这些事实，党的代表们的决定不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他们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体现他们的委托人的愿望，决定在一切领域强有力地重新积极开展党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在今天的专制制度下是“非法的”，我们的压迫者厚颜无耻地宣布我们不受法律保护 and 毫无权利。为了对此作出相应的回答，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删去哥达纲领中提到我们要“采取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我们目标的句子。

这不是说，似乎通过这一决议，党会采用一种和旧的学说不同的新学说。因为绝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沉湎于这样的幻想，即认为他们会十分平静地通过纯粹“合法的”道路来贯彻自己的原则，也就是说，特权阶级会自愿地、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特权地位。不如说，我们经常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上面那句话的：一方面，我们赞成运用一切现有的合法手段和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权利”来促使我们的目的得到实现，即反对任何在政治上的弃权行为——这是笨拙地把可以利用的武器扔在一边；另一方面，我们愿意通过相互对立的阶级双方之间的协商以及由此产生的逐渐的、有机的发展的可能性来求得社会问题的和平的、“合法的”解决，因为我们相信，即使在只有一些活动自由的情况下，我们的学说也有力量在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但是，要说我们会因为统治阶级切断我们的一切“合法的”道路就放弃贯彻我

们的原则，那么还没有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想到这样做。我们在这样的——根据历史经验可以想见的——情况下必然有权采取任何手段，这样做从来被看作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上面不肯向下让步，那么下面就必须让上面屈服！

今天我们在德国就是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敌人，即政府和资产阶级，竟盲目到这种程度，把和平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彻底地排除了，从而必然和不可避免地迫使事情向暴力的结局发展。今天德国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者不打算进行协商和取得谅解，却打算进行战争，进行毁灭性的斗争。好吧，如果他们要战争，那么他们就会得到战争，而且是全面和彻底地得到，不过罪责要由他们的首脑去负！

因此，我们的义务是向全世界发表这样的声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我们的敌人的行动方式中得出了无可辩驳的结论，它将不顾它的压迫者的拳头的“法律”，为了废除这一法律和废除全部现行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它将采取它所拥有的、同变化莫测的情况相适应并且能够促使它的目标得到实现的任何手段。

我们党迄今的深谋远虑、目标明确的行动保证它从来没有陷入一场既是幼稚的、又是罪恶的玩弄革命和制造革命的儿戏，在人民今天对革命的准备还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一定会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使革命的爆发推迟几十年，而且会丧尽天良地、极其轻率地使人民的宝贵鲜血白白流掉。

不如说，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通过把我们的原则传播到人民之中并且日益深入地使他们卷入我们的运动（依靠生动活泼的和广泛的宣传鼓动），通过提高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有领导天职的政党的防卫能力和行动能力（依靠统一的和坚强的组织），通过削弱敌人和迅速制止他们对我们的攻击（依靠明智的策略），通过所有这一切全力为即将到来的震惊世界的革命及其使用暴力的表现形

式做准备,这是革命节节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也是每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革命者的首要职责。那时如果终于在不可阻挡的过程中发展到最坏的情况,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将表明他们也懂得去尽自己的义务,那时他们将不是只好依赖纯粹的偶然性,而是装备精良地、满怀胜利的希望进入斗争!

我们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按照**这样的精神**表述的。

一个与改变了的形势相适应的**组织**建立起来了,它把党内存在的各种力量有效地联结起来,并且使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迅速地得到使用。无疑,这样的组织不会是没有缺陷和十全十美的;人们毕竟不能从理想出发建造空中楼阁,而是必须以具体情况为根据,被人们认为最好的事情在实行时会由于具体情况而遇到很多障碍,并且不得不作一些迁就。但是,经验和实践很快就会发挥它们的作用,克服现有的缺点,使组织这一重要武器不断得到完善,因为我们的力量会由于各部分准确地协同动作而增加几倍,并且会随时随地充分得到利用。建立并保持国外的德国社会党人和各社会党人协会同德国党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使德国的党能保持一大批干练的力量,并保证它能始终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也是为团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切现有的力量这个目的服务的。为了保持这样的重要联系,以及为了交流情况(这对现在德国国内的那些党组织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也是不妥当的),在苏黎世建立了一个**国外联络处**。

随着建立组织而来的是,在许多地方已经松弛的、为保证取得成果必不可少的**党纪**也得到了加强,从而内部的混乱(这些混乱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是由于任何公开的党的活动都受到了压制,由于某些较老的党员的私心、行动不受约束、甚至一些更加恶劣的品质造成的,是由于党的意愿难以得到理解和贯彻而造成的)就会得到克服,今后也可以避免。为了执行这一必要的纪律,代表

大会几乎一致同意最后把两个极其有害的制造不和的人^①开除出党,虽然他们过去在党内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样做对党的团结不会不起良好的作用。

自从我们的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一切其他公开的鼓动工作都被取消的今天,参加选举已被承认为重要的鼓动手段,因此对党来说,从宣传鼓动的角度考虑,最好是参加一切(有某种成功希望的)国会选举、邦议会选举和市镇选举,特别是最普遍和最坚决地参与今后几年的国会选举,为了保持原则的纯洁性和强调我们同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必须最坚决地禁止一切选举妥协。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任何时候在议会中都必须最坚决地维护我们的原则和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且必须利用这个讲台在人民中进行有效的宣传,以代替秘密集会和结社,我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被宣布为沟通党员思想的手段,党在报刊方面的代表,确定和阐明原则的读者园地,标语口号的发布者,以及德国运动同其他各国运动进行思想交流的媒介,——总之,迄今作为党的临时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被一致宣布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但是,在谈到党的所有这些内部事务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同其他国家和操其他语言的兄弟党的联系,没有忘记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互相声援。我们兴奋地收到了法国、比利时、瑞士、匈牙利、荷兰、意大利、葡萄牙、波兰和俄国的兄弟们发来的庄严的、充满对我们的共同事业的同情和热烈祝愿的致敬信和声援信。为了重新并且比以往更加有力地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向承认和坚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在我们党和各国的以及操不

^① 指约翰·莫斯特和威廉·哈赛尔曼。——编者注

同语言的兄弟党之间建立了一种经常的、不间断的联系，而国外联络处的任务就是保持这种联系。但是，代表大会首先声明，它一致地、完全地同意召开一次**社会党人世界代表大会**，并且决定派遣代表参加，这是因为它考虑到：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者的事业**；为了富有成效地进行他们所从事的反对旧的压迫势力的斗争，绝对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国际同盟来对抗反动派和资本主义的强大的国际同盟，这一同盟使所有的社会党人有可能不分语言和学派而携起手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如果党员同志们考虑到代表大会的这些成果，并且根据——当然一定是扼要的——记录来考察它的作用，那么他们就会认识到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具有伟大的意义，并且会象我们一样，对代表大会为整个事业作出的成果感到满意。他们也会竭尽全力通过彻底实现这些成果来使它们充分发挥效力，并且促使社会民主党得到新的发展，不断壮大，成果日益增多，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社会民主党万岁！

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1880年9月19日第38号。

革命还是改良？*（摘录）

（1880年10—12月）

.....

就象有君主制的、宗教的和其他的神话一样，也有一个革命的神话。一些缺乏理智、不负责任的人不仅在某些隆重的场合或遇到紧急事件时把这样的神话当作信手拈来的口号，而且不停地加以重复，津津乐道，却又枯燥无味。按照这种神话，一个民族，或者更正确地说，一切民族都具有革命思想，并且始终做好了革命的准备。我们不想在这里谈论别的民族；但是要说到德意志民族，那个论断简直就是荒谬的，——如果这不是关系到一件如此严肃的事情，我们就会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德意志民族或者（如果人们不愿意用这个说法笼统地表示国家和社会的、部分地也超出德意志民族范围的各种活动着的力量，而愿意用别的说法来表示的话）德意志的状况，决没有做好直接革命的准备。今天这个民族不仅就其多数来说还没有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是用温和的方式还是用暴力的方式，去彻底改变国家和社会的现状，而且有这样准

* 这组文章最初匿名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当时福尔马尔担任这一报纸的主编。1881年初出版了单行本，也是匿名的，但是署了一个代表记者的天秤宫符号（黄道十二宫的第七宫，符号为♎），内容也作了一些删节和补充。这里是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本摘译的。——编者注

备的人所占的比例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点听起来固然会使我们感到很不愉快，也不符合那些有觉悟的革命工人，或者换句话说，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愿望。但它却因此更加符合真相，而我们的任务和我们取得成就的先决条件就是认识真相（不管真相的味道是多么苦）；而不是欺骗自己和别人，迎合人民和迎合我们自己的愿望。在这方面迎合就等于背叛。谁向人民讲述虚构的革命神话，不论是故意还是由于无知，他就应当和给航海者绘制错误海图的地理学家受到同样的惩罚。（利沙加勒《公社史》前言）

肯定地说，德意志民族是不满意的，对国家的压迫和榨取不满，对自己的悲惨的、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更不满。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德意志民族就其绝大多数来说，还丝毫不了解、甚至还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以什么方式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普遍缺乏教育，政治上不成熟，有计划地培养偏见，这些情况即使在这个“思想家辈出的民族”里也还是如此严重，经过五十个世代继承流传下来的关于财产、信仰和统治的观念还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观点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力，而被这个民族的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或者是经过认真考虑，或者是不分青红皂白）认为不是发疯，就是犯罪，因为这种观点认为，实行普遍的变革，从根本上全面改造现存制度是解救苦难民族的唯一出路，这种观点因此既不会在王位，也不会祭坛，也不会钱袋面前止步，它动摇一切传统的东西、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因此，德意志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虽然常常并非出于本意——处在自己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者，即官吏、贵族、教士、“雇主”和富翁的影响之下，而且没有深刻思考自己贫困的根本原因，鼠目寸光，糊里糊涂地打发日子。

那么“直接的、即将来临的革命”（不管人们现在设想它会在一

年还是几年内爆发)怎么会发生呢?当然,谁如果象某些布朗基式的“社会革命家”那样认为,有“一千个果断的人”就不仅足以消灭德意志民族的压迫者,而且甚至足以消灭欧洲的整个暴力统治,那么这对他来说就是不需要费脑筋的事情。他认为,在德国随时可以找到一千个,必要时也可以找到一倍甚至五倍这样多的革命的人,即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果断的人,而且由于实行普遍的兵役制,他们也会使用长枪和战刀。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这一千个人涌上大街,——为首的当然是一个多少令人生畏的、专程渡海而来的首领——捡起躺在那里的权力,凭着这种权力顺着楼梯登上那座无人守卫的市政厅,在那里把红旗升起来,向大吃一惊的城市和世界宣告,社会共和国的统治现在开始,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权力和权利都被剥夺,一切臣民和奴隶都得到了自由。庸人们大概将吓得浑身发抖,尤其是当武装力量不在附近时更会如此;这一千个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丧失,却可以获得一切,因此他们会勇敢战斗,他们在面对匆忙组织召集起来的“维护秩序的”人的战斗队时,也许是不无成绩的,尤其是在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离得相当远时情况最好。当然,各级政府包括高级的和最高级的政府都将大大降低它们的调门,傲慢的总统、严厉的市长、厚颜无耻的警察、自负的教士、趾高气扬的工厂主,所有这些人都会立刻忘记他们的“职务和地位的尊严”,惊恐万状地躲进各自的避难所;而所有的庸人,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将效法他们。相反,成百的热情和愤怒的人,不少谋求职务和想捞到好处的人以及许多好奇的人将投奔这一千个人。然后压迫者就会受到屈辱,一些正义的复仇举动就会平息下来,革命委员会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改造世界的决定,直至……命运以“威武雄壮的大军”的形态走向前来!

接着又如何呢?那就是:五月流血周。大批枪杀,特别军事法

庭,炮塔,萨托里^①,新喀里多尼亚岛^②,一切都在德意志人或者不如说顽强的普鲁士人这里重演,而且数以千计地参加这类“行动”的人越多,规模就越大。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由于统治阶级对它所遭受的危难感到激怒,它将同意使“拯救社会”的政府称心如意的任何一项反对“卑贱”阶级革命精神的法律。而人民由于理解力差而被关于“杀人”“放火”等等的骇人听闻的报告引入歧途,误以为那些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而斗争、受苦和牺牲的人是自己最凶恶的敌人和头号坏蛋,并且凭着这种错觉热烈欢迎对这些人采取的任何一项迫害措施和镇压措施。这样,旧的“秩序”和十分宁静的教堂将重新进行统治,血泪将流成河,革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扼杀,人民不知所措,被压迫者还要更加受到奴役,残暴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却更加强大,更加得意忘形,一句话,整个发展进程将倒退几十年,苦难人民久已渴望的解放又将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能实现!谁觉得这种情景是迷人的,或者谁——模仿我们所反对的那些铁血人物——为了满足自己的无法抑制的急躁情绪、自己的功名欲望和充当伟人的野心而不惜疯狂地、罪恶地、丧尽天良地牺牲人民的鲜血和把他们对于解放的希望推迟几十年之久,他就可以“尽快地”制造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找得到一些盲目助长他的妄想的人,而周围又没有一些真正的革命家在这个害群之马能够这样为人民的死敌效力以前就及时地阻止他的话,他就可以这样做。

二

.....

在我们转向讨论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性任务之前,我们还必须

① 凡尔赛附近的一个平原,不少被捕的巴黎公社社员在这里被处决。——编者注

② 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些岛屿,是巴黎公社社员的流放地。——编者注

简单地谈一个属于革命和暴动那一部分的问题。我们指的是个别人起来反抗压迫、行刺国王或者说进行暗杀。无知的和不动脑筋的人们是怎样喋喋不休地责备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就象“绵羊般地容忍”德国警察的一切闻所未闻的无耻行径和挑战而不进行“报复”和“惩罚”！相反，这些人却称赞说，任何反抗一个苛待工人的雇主、反抗警察、甚至也许反抗一个守夜人的行动，任何斗殴和任何骚扰，都是“体现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是一种英雄行为。照这么说，最不考虑现状、最不冷静、最不懂得自制并且最容易受敌人引诱而草率行事的人倒是正确的，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和最危险的革命家！

事情完全被颠倒了！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一个人的思想一旦误入歧途，他很快就到处再也得不到支持，并且根本无法理解明智地进行思考和作出结论的规律。在明智的人看来，最聪明和最有可能成功的人是最善于判断情况和进行思考并且同样能慎重地采取行动的人，谁只要稍微思考一下，他就必然会说，人们决不能单枪匹马地同国家或者社会这样一个十分强有力的、牢固地连结在一起的整体作斗争。这同个青年向一所住着折磨他之人的房屋投掷石块差不多。他是能够恰好击中一扇窗户的，但是在这之后他就更加肯定会受到惩罚。把一个无耻的搜查住宅的人从楼梯上扔下去，惩罚一个无礼的警察，把一个卑鄙的法警拒之门外，痛打一个狂妄的剥削者或者毁坏他的财产，嘲笑法庭——这些都不难做到。一般地说，不需要很大的勇气，只需要愤慨就可以做到。但是以后怎么办呢？每一次反抗之后，国家的暴力就加强，因此不得不或者逃跑，或者忍受这种暴力。人们要给暴力帮忙，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使它有机会表现自己，当然只有在它有胜利的希望的时候它才会那样做，而当它针对个别人的时候它当然始终有胜利的希望。举例来说，如果在赫德尔—诺比林案件^① 那年我们听凭自

已卷进去，用轻率的暴力反抗行动发泄我们对资产阶级和政府加于我们的一切数不清的侮辱、欺凌、咒骂和虐待的正当愤怒的话，我们会使政府感到多么高兴啊！我们会多么好地实现我们的敌人的最隐秘的心愿呵！警察和政府为了能够使用公开的暴力，确实巴不得有人起来反抗。大家知道，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对任何挑战都置之不理，柏林的一个警官曾经公开地对此表示十分愤怒。当每一根神经都由于愤怒而震颤的时候，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拳头的力量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自愿地采取克制态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样做会挫败敌人的阴谋，并且是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尽力，这种态度对一个明智地思考问题的人来说，不仅比愤怒的攻击更有价值，而且需要百倍的道义上的勇气。我们对柏林同志们在发生谋杀案的那年夏天和接着进行选举时的表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钦佩。那时咒骂、侮辱和挑衅接踵而来，每一个知名的社会党人都会在大街上受到侮辱，从旅店里被赶出来，受到任何一个警察的粗暴呵斥，甚至在公开场所遭到检查，然而每一个人都明白，为了更高的利益他必须把他的合乎道理的感情压下去，必须按捺住对复仇的自然而然的迫切要求，直到“一并清算敌人对公众和对个人欠下的债的那一天”。

三

在结束关于我们不应做什么的论述时还要谈谈在最近时期议论得较多的**谋杀国王问题**，或者消灭个别的担任特别重要职务的、或者特别危险的人民敌人的问题。我们绝不打算否认被压迫者有权使压迫他和他的民族的人不能为害。……但是，今天在德国谋杀

① 指 1878 年谋杀威廉一世的两起案件。——编者注

国王，一般地说就是使一个单个的人不致为害，难道是恰当的吗？这样做能对人民有好处，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吗？

总的来说，人民的苦难不是个别人的罪过，而是制度造成的，个别人是这个制度的工具和产物，这是认识政治和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汉斯还是昆茨当国王或者当部长，在个别情况下会改变某些事物，但是从整个历史这个大的方面来说丝毫不起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论最好的或者最坏的统治者或部长，只有他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或者换句话说，按照目前政治的和社会的力量对比行事，他才是强大的。但是，可以想象，如果一位德国首相或者皇帝接二连三地违背这些利益，他立刻就会丧失权力。如果这位皇帝触犯贵族的特权，那么保守党人就会完全不顾“上帝的恩典”和“世代的忠诚”，隐蔽地或者公开地反对“剥夺”他们的“古老的特许权利”；如果这位首相不压迫工人而压迫资产阶级，并且压制他们的特权的话，那么民族自由党人立刻就会改变屈从的态度，转而进行顽强的抵抗。客观情况简直比那些最强有力的人都更有力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在操纵别人并且自以为能够操纵的强者只不过是那个被操纵者。

如果谋刺引起的人员变动基本上无法改变现状（我们始终就德国的状况而言），那么为什么要“谋刺”呢？有些人反驳说：“必须让敌人害怕。”不错。但是被恐吓者有的软弱有的强大，因而恐吓的作用通常也不一样。如果对方是弱者，那么当然会起使敌人瘫痪的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来不是可以采取简单得多、适当得多的手段，即不是铲除一个代表人物而是一下子推翻整个阶级吗？然而我们的敌人并不是软弱无能的——完全相反！“恐吓”强者是一件不妙的事情；人们激怒他，却不能真正给他造成什么损害。恐吓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是一副毒药，但只有当我们能够迫使敌人把它喝光的时候才是这样，如果我们只让他尝一口，那就不是

伤害他而只是伤害我们自己了，他会狂暴地把这杯酒摔到我们头上。……

所以，暴动、骚扰、过早的起义、个别人的反抗、谋刺以及各种方式的“出击”都是毫无用处的；那样做会带来混乱、不幸，把事情弄得更坏，却不能使人民的命运得到改善，尤其不能得到社会民主党为之奋斗的那种彻底的和永久的改善。

但是以后怎么办呢？谁也不会认真地否认事物不可能保持现在的样子；也根本无需向人民的朋友解释说，不可以仅仅听任统治者随心所欲地改变事物，人民也应当在这方面有发言权。……

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时期，许多同志，甚至大多数同志，很少绞脑汁去考虑，我们将以什么方式夺取统治阶级手中的权力。这是我们党的青年时代，它只考虑眼前的事情，这一支年轻的力量，充满生气。但不会深思熟虑，它从来不怀疑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冲击而实现自己的那些理想。不错，成绩是有的，这些成绩似乎证明它抱有这些最激动人心的希望是正确的。几年以前工人们只不过是被人看不起的“家伙”、“做工的”、“粗汉”，人们作梦都没有想到他们竟能够参与政治，而且是独立地去参与。后来工人这个称号突然变成了一种荣誉称号，变成了一个政党的旗帜，这个党把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并且一个接一个地夺取惊恐万状的统治阶级的阵地。最初在国会有一名工人代表，很快增加到五名，然后增加到九名，最后是十二名。工人们看到了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且随着敌人的动摇，他们斗争的兴趣和胜利的信心增加了。人们向他们过去几乎没有想过可以得到的阵地发起了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社会民主党挤进了市镇管理机关、工商业仲裁法庭和邦议会；统治阶级被迫越来越多地讨论工人问题和社会党人的要求；科学界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大学把它们列进教学科目；国家和资产阶级不得

不承认令人痛恨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政党并时常同它进行谈判。在党员群众和他们的不少代言人看来，无疑我们正在最顺利地、迅速地将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在这以后一切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

当时是**多数派理论**的全盛时期，虽然这种理论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党纲的承认，并且有许多同志对此表示异议，但它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并且作为一种共同接受的臆说而受到眼光远大的人们的尊重。当时多数派理论的坚信不移的代言人之一是约·莫斯特。……

四

反社会党人法很快就使多数派理论家这些甜蜜的梦想破灭了。

固然，有一部分同志未能从他们已习以为常的那些幻想和希望中摆脱出来，并且在反社会党人法统治的初期人们已经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见：这个法令“不可能长期维持”，很快就又将撤消，然后运动又将按过去的、通常的方式发展下去。但是政府对我们党采取的行动很快就打破了这个梦想，今天恐怕只有很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还在期待政府自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并且不相信1878年夏季以来的事件已经引起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社会主义运动永远不可能回到从前的发展阶段上去了。

1878年夏季以前，不少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相信和平的道路，或者至少在理论上承认它。约·莫斯特这样说过：“是改良的道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希望选择这条道路）还是革命的道路，要由统治阶级来作出选择。”很多人不仅表示赞成这种提法，而且也

约·莫斯特一样认为实际上有可能通过改良的道路达到目的，甚至已经对逐步实行和平改革的方法作了详尽具体的说明。……今天则相反，那些坚持相信人民只有通过顽强的改良道路缓慢平稳地上升到解放顶峰的人可说是屈指可数了。统治阶级永远不会自愿让位，人民能够获得多少权利，命运能获得多大改善，全看他们能为自己争取到多少东西。谁要是还没有从各民族较远的历史中懂得这一点，那么他也会从最近时期的事件中，并且部分地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人民的先锋战士、社会党人必须致力于尽快地使自己有能力争取到这些东西。统治阶级绝不会把斗争仅仅限制在思想领域，确切地说，它会尽力用真正物质的手段（例如军队、警察、法庭、教会和诸如此类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准备进行一场生死搏斗，所以我们必须对不可避免的事情、即对革命有所准备！

……

我们已经说明，决不会“立即”爆发大规模的革命以及为什么不会爆发；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康恩^①预料明年爆发革命，汝拉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②估计它在两三年内爆发，莫斯特也作了大致相同的估计，但是他也承认一点：可能他们都同样地估计错了。如果我们确定，只需要十年时间（这个时间与其说太多，不如说太少了），反动派就会破产，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吸引地位低下的人，教育群众，一句话，使人民革命化，那么很清楚，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光说些革命的词句是不够的。永远老一套地重复那种革

① 鲁道夫·康恩(Rudolphe Kahn)——巴黎公社社员，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1876年重建国际的瑞士洛桑支部，这个支部后来加入汝拉联合会。——编者注

②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克鲁泡特金(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 1842—1921)——于1881年被瑞士驱逐出境，前往法国汝拉省。他是巴枯宁主义者的汝拉联合会的成员。——编者注

命的词句会使人们感到厌倦，他们很快就会开始打呵欠，然后睡着了，或是跑去听一种比较富于变化的音乐。当然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我们和某些认为关于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简直谈论得太多的人是一致的。相反，我们必须向人民讲述革命和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我们必须向被奴役、被剥削的人们，向所有的劳苦大众指出，唯有革命才有可能获得富有成效的和持久的改善，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还必须指出，对于有觉悟的人来说革命是救星，是报答者，对于没有觉悟的和胆怯的人来说，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使他们觉醒的暴风雨！我们用这个可靠的希望，用对于最后胜利和彻底解放的这种信心唤起人民的勇气和行动的力量，并且使他们有能力一直坚持到适当的时刻。相反，如果夺去了有觉悟的被奴役的人们的那个希望，夺去了对于最后胜利、而且是对于不太遥远的将来的胜利的那种信心，就是削弱他们的行动力量，使运动陷于瘫痪！

但是，仅仅指出革命这一解放者和复仇者即将到来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大吹大擂地叫嚷革命尤其不行。

五

我们说除了指出革命会带来解放和幸福以外，还需要做别的事，这不是指宣传、鼓动、争取越来越广泛的人民阶层赞同我们的原则，以及把已经争取到的群众集中到一个（由于客观情况这必然是秘密的）组织里并且加以训练。这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在这些方面应当如何行动，部分地在党的机关报上，部分地在机密的通告里以及通过其他方式也已经谈得够充分了，今后根据需要还会进一步谈到这类问题。今天我们想讨论党的活动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同样是为行将到来的变革及其斗争（就这个字的最好的

意义来说)作准备,为了证明我们采用“革命还是改良?”这样的标题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讨论这种方式。

奥艾尔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由于采取某种克制态度并且**强调和要求实行某些有利于工人的改良才强大起来的**,失业者所得到的那些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改善为我们赢得了工人和小资产者。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社会党人都不会在本质上反对这种意见。大家知道,统治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不相信革命会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以谁希望统治阶级在尚未处于非常特殊的困境并受到过些时候要爆发的革命的威胁的情况下就作出让步,那他就错了。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得到这种局部的让步,只是由于我们利用了暂时有利的形势,通过工会运动、文字宣传和议会活动等等和平道路,使工人的某些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是,就劳动人民而论,或者就劳动人民中在我们看来目前最需要加以考虑的那些阶层而论,事实上它对于单个的、在它眼前的、立即可以得到的改善它的命运的那些措施,诸如限制工时、提高工资、防止过分露骨的和无耻的剥削、消除操作中的极其严重的危险、发给意外事故抚恤金、免费医疗以及发给养老金等等,比对于一场同它迄今的整个传统直接相矛盾的推翻政权的斗争(在他们看来,这场斗争的结局是毫无把握的,其结果能否改善他们的命运也是完全不清楚的)要感兴趣得多,也容易理解得多,这是很显然的。甚至可以说,工人们生来只理解这些眼前的改善,只有长期的、辛勤的社会主义教育才能使他们确信,千方百计的个别的缓和办法都不可能彻底地、长期地改善他们的命运,需要使用完全不同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这个彻底解放的目标尽管今天在工人看来是绚丽得无以复加的——它对于每日处于忧伤的重压下、首先只为每日的生活而操劳的人来说确实始终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目标,因为人民绝不能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地为着遥远的未来而努力奋斗,而对现在却没

有一个哪怕十分微小的希望。

其次，如果我们对工人们说，我们连进行小规模变革的力量都没有，工人们怎么会相信我们具有变革整个世界的力量呢？我们如何保持并且增加这种力量呢？是把它闲置不用，任其浪费，还是加以运用？磁石的吸引力、手臂肌腱的力量如果总不运用，总不练习，就会丧失。这一点连古代的军人也懂得，所以他们在和平时期也进行一种战争，即狩猎。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为工人的某些要求进行“和平的”斗争，我们用这种小规模的战斗来达到经常保持朝气并且为更大的斗争做准备这个目的。

一个政党——而且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既不是一个单纯的反对派，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流派——不可能仅仅靠遥远的理想来生活，它象人需要每天的面包一样，也需要近期的目标和成就，每天作出努力并且每天有所收获，总是能够从其中得到新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可以调查一下，成千上万的选民是否只是被社会主义的美妙诺言吸引到我们一边，还是不如说最吸引群众的是为公众所理解的、近期可以实现的一系列要求。工会是承认需要取得这一眼前成绩的一种形式。没有工会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呢？人民具有健康的现实主义的本能，这种本能必然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那种纯粹的未来政策持保留态度。但是下面这种态度，即退出政治生活、袖手旁观的态度，也会给人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造成最坏的后果。社会状况越糟就对我们越有利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贫困的腐蚀作用比它的革命作用大得多，由于饥饿而精神萎靡、在肉体和思想上都堕落了的人们能够采取绝望的行动，却没有力量进行一场把群众组织起来、在努力消灭坏事物的同时从事建设的革命。相反，工人们在各个具体方面每一次物质上的提高，都同时引起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提高；唯有精神上和道德上坚强的人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能够使用的材料！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自己的革命原则，但是它必须一如既往参加全部社会活动，因而也参加帝国的、邦的和市镇的选举，而且不应当从根本上拒绝政治的、尤其是经济的改良，要分别情况加以对待；必须努力参加这些改良，甚至根据情况协助实现这些改良，这并不会损害它的原则。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把我们认为可以在社会主义尚未取得胜利这样的时期内提到日程上来的一切改良都一一列举出来，并且我们对这些改良也绝不抱任何过分的希望。但是，谁密切注视德国形势的发展，并且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工人已经得到一部分成功的努力和其他事件必然对德国形势的发展产生影响，他就会看到，在德国，尽管有反社会党人法，这些要求也会以这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出现在议会活动的舞台上。如果谁还进一步了解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相互对待时的独特态度、它们彼此争夺对方所依靠的群众的需要、社会主义思想界的巨大精神影响和其他事物，他也会理解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存在反社会党人法，我们党也能够在讨论这些要求时施加影响。在这方面，机智的行动会大大促进我们的事业，而愚蠢的行动则会同样严重地危害我们的事业。

当然，我们在采取一种改良行动的时候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永远不当那样的改良政治家，他们误以为依靠这样零星的改良、并且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状况；我们永远不会拿社会主义的长子继承权应得的丰富遗产来换一碗可怜的改良主义红豆汤；我们永远不会发展到把改良主义行动看作党的主要任务而对革命精神怕得要命。改良主义行动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做法，只可以当作手段，永远不可以当作目的；我们只能通过改良主义行动来锻炼和增强我们的力量，但是不能在这方面浪费我们的力量。我们不能用全力来做这一次要的事情，否则我们在自己漫长的进军中就会流连在第一家劣等的小酒店而忘记光辉灿烂

的最终目的。为了时刻牢记这一目的，现在正加倍需要唤起并且鼓舞革命精神，反复引导工人们不要只看局部，而要看到全局，使他们不致半途而废，而坚持到底。我们必须始终意识到，所有这些小规模改善只不过是修修补补，而人民、人类却需要一所崭新的房屋，这所房子只有通过彻底的变革才能建成。

我们来结束吧！当今的国家和当今的社会这座歪歪斜斜、年久失修的房屋确实是一座劣等建筑，而当它土崩瓦解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感到高兴。但是眼前它还没有塌，而且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也不得不住在里面。我们是应当由于敌视旧的破烂房子、期望出现较好的房子而让自己遭受风吹雨打、冰雹袭击，让种种不愉快的情况降临自己头上呢？还是相反，我们应当力图减轻我们住在它里面时必须忍受的那些灾害，同时练习造新的房子呢？我们将因此而减少我们对于一座崭新的房子的渴望吗？我们想，恐怕不会的。当我们所盼望的时刻，也就是这座破房子在它的主人的痛惜声中轰然倒塌的时刻到来时，我们将比那些因为不能立刻用脑袋撞倒墙壁就固执地、愚蠢地跑到森林里去的人们更有准备，并将表现出更多地盖新房子的本事。

如果人们所说的革命仅仅是指用暴力进行颠覆，那么这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就其本身而言，既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坏，是好还是坏要看使用这种手段得到的结果如何。改良也是一种手段，而且同革命一样，它是一个好的还是一个坏的手段，同样要看使用得是否适当。但是我们应当欢迎一切推动我们走向我们的目标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革命还是改良？”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革命和改良。如果现在我们觉得改良对我们有利，那么我们必须实行改良。一旦到了革命更能推动我们前进的那一天，我们就放弃改良，就象我们在使我们的力量百倍增长的现代机器面前抛开原始工具一样。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把人民从精神上

和肉体上的、国家和政治造成的奴役、贫穷和痛苦中彻底地真正地解放出来，并且建设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我们交替使用各种手段，但决不会忘记这个崇高目标；这些手段之所以有价值，全在于实现这个目标！

任何人都不要受教条主义词句的迷惑，这些词句象神秘的公式一样使诅咒或祝福取决于一个词。同志们，请你们不带偏见地考察一下人们赞扬你们什么，同样也考察一下人们咒骂你们什么。对敌人不利和对你们的最小的一群兄弟有利的东西，使你们思想明确和身体强健地进行伟大斗争的东西——就拿所有这些东西当作你们优良的武器，不管它们叫作什么。你们要做好准备，并且动员你们的朋友们参加我们的事业，你们要谨慎地工作，集中力量而不加以浪费，把这些力量共同锻造成一把将会把锁链连同制造锁链的人一同打得粉碎的铁锤。要从各个方面征集军队，组成一支无敌的自由大军，使它具有钢铁般的力量并且加以训练，那时我们所期望的伟大时刻就到来了：

当你们看到日夜盼望的火焰照亮大地，
你们就要象闪电般向敌人冲去，
把专制制度的巢穴打个粉碎！

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1880年10月30日 -
12月26日第44、45、51和52号。

在帝国议会反对烟草专卖的演说*（摘录）

（1882年5月12日）

先生们，在围绕专卖制进行的这一斗争中屡次有人引用我的党即社会民主党表示赞成或是反对的意见，关于我的党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存在许多疑问，因此尽管时间很晚了，我还是要请你们听一听我的一些理由，当然这些理由和你们的理由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我的党已决定——而且已经在上一次会议上答应过——冷静地和实事求是地检验一下政府要向我们提出的那些提案。我必须向你们承认，对当前的这一提案进行这种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检验在我们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它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认为这项提案就其所提出的全部计算和表格来说是一篇真正华而不实的浅薄的东西。在以前的几次会议上时常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仅仅是“能言善辩的钻营者”（有一次首相先生就曾这样讲），我们在政治上原来仅仅是不明事理的门外汉。现在，我必须根据我的经验向你们说，如果你们让随便哪一个工人协会起草这一烟草提案，那么我向你们担保，你们拿到的东西是不会象这一提案和一系列其他法律草案这样不成熟的。（左边：很对！）

说到对这件事本身的评价，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确实象往

* 1881年10月，福尔马尔当选为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这是他第一次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他在其中表示坚决反对帝国政府实行烟草专卖。7月14日国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有关法案。——编者注

常一样采取一种根本不同于一切政党的态度。我们在这件事上同政府毫不相干，同它没有共同之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我们进行投票的理由来说，我们同样同资产阶级政党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表示反对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绝不是作为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进行反对的，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

你们所有的反对烟草专卖的人，不管你们懂得还是不懂得，不管你们想不想承认，你们反对烟草专卖主要是根据私人权利的理由，主要是因为这种专卖会大规模地严重地侵犯私人的权利。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我只打算考虑这一理由的话，那么我必须向你们说，我出于这一理由是赞成专卖的。抽象地说，就问题本身来说，我们社会党人倒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专卖的，因为专卖肯定带有一点社会性商品生产的性质，专卖会表明社会性生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至少它在原则上会使国家成为唯一合法的生产指挥者。（左边：听，听！）通过专卖（不管人们想不想承认）可以在原则上肯定，就商品生产来说，面对公众的利益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合理的私人利益的，（左边：很对！）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我们由于反对这种财产而时常受到惩罚），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会由于专卖而受到一次狠狠的冲击。（左边：很对！）简要地说，如果你们今天实行某种专卖，不管是什么专卖，那么你们就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提案的理由中的那一主张是绝对正确的，——这一主张来自政府席，这当然使我颇为感到震惊——它认为那些被剥夺了烟草工业的赢利的人在法律上没有理由要求得到补偿。这一原则是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原则。（左边活跃。）根据我们的原则，商品生产和用于生产商品的工具是属于社会的，它们的任何一部分的异化是永远不能依靠时间的作用而成为合法的。我

们并不主张“既得权利”，按照这个理由，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要求享有剥削权利的法律根据。按照这个理由，你们恐怕会理解，我们不会提出赎买的原则，而只会提出收回的原则。（左边：笑声，活跃。）在这方面，至多有一些“政治上的”理由，或者——象政府的草案向我们说明的那样——有一些衡平法^①方面的理由能在过渡阶段起作用。

……

如果象你们那样，把利润看作是决定性的；我是说，如果你们提出这样的主张：因为烟草专卖会取得很多利润，因此国家有权把这一生产部门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我就必须说，你们决不能在我们的全部活动中发现一种如此露骨的物质原因。……我认为，你们可以凭完全同样的权利和完全同样的理由来剥夺任何其他的财产，只要这样做有希望给国家带来好处。这里提到的“免受剥削的保障”的情况也一样。据说，把烟草工业收归国有比较好，因为那样就会较少地出现骗人的现象。同样的理由完全可以用在一系列其他工业上，而且更加正当得多——我认为，议员冯·斯陶芬贝尔格^②先生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首先从一种享乐品着手（这种享乐品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奢侈，因为缺少它也是可以的），而不是宁可从绝对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着手呢？例如，我要向你们提出谷物贸易，为什么你们不谈由国家进行谷物贸易以及其他贸易呢？（左边：赞同声。）

专卖的所有这些理由都是以法律根据为基础的，而法律根据

^① 英国法传统中与普通法相对称的一种法律。根据英国封建制传统，臣民在民事补偿等案件上得不到普通法法院公平处理时最后可向国王申诉。这种申诉案的判例在十五世纪前后逐渐形成衡平法。——编者注

^② 弗兰茨·申克·冯·斯陶芬贝尔格(Franz Schenk von Stauffenberg 1834—1901)——男爵，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属自由同盟，即后来的德国自由思想党)。——编者注

未
夕
一
工
夕
丁
光

5

一

又总是这样：只有社会才是一切权利的泉源，当我们社会党人听到几十年来招致人们对我们进行人身惩罚的那些原则已经部分地取得胜利并且进入了联邦参议会议席的时候，我们当然只会感到满意。（左边：十分活跃并且叫好。）

先生们，我们没有理由为受到压力的资本进行辩护，而是完全相反；你们将十分自然地想到我和我们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如果我们打算推行恶作剧的和感情用事的政策，那么我们是宁可在这场当前反对资本的斗争给予帮助的，因为资产阶级政党从来对我们也是不很客气的；你们只要回顾一下反社会党人法的历史就够了。但是先生们，我们不推行感情用事的政策，这就使我们决心成为坚决反对这一法令的人。我想向你们说明一下决定我们这样做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经济上的原因。根据我们的原则，应当首先把集中化的企业转为国家的财产和企业。例如铁路、采矿业、炼钢工业、制糖业等等就是如此；特别是大地产也属于这种情况。（左边：很好！）

.....

先生们，下面谈一些政治上的原因。首先我们认为，企图把烟草工业转为国家财产的原因主要是财政方面的，这一点也是得到承认的。关键在于，要获得巨大的财源，同时也顺便把个别邦的负担、主要是普鲁士邦的负担转嫁给帝国。……至于说到我们，我们并不总是生来就大声疾呼反对日益增长的国家需要的人。我是从经济发展将迫使愈来愈多的企业从私人经营转到官方经营这个观点来说的，从这一点自然得出的结果是，官方的开支必然不断增加。但是，这是文明的开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但是这个法令涉及的绝不是这类文明的开支，至少人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一点，而且我们迄今取得的经验决不会使我们作这样的假设。这里涉及的恰恰又首先是众所周知的主要国家开支，即军队。如果这些先生

还能弄到更多的款项可供支配，而且新的联队和新的大炮会迅速出现并耗费掉一切，那么他们当然会感到很满意。

我们不会支持这种做法，这是清楚的，而部长朔尔茨^①先生关于外来的威胁、关于来自一个外国的危险的著名滥调，也许在议会里会有人赞成，但在我们这里是绝对起不了作用的。我们十分清楚，如果谈到一种威胁的话，那么由我们方面采取主动的可能性要比我们受害的可能性大得多；何况两个主要的有关国家即法国和俄国的军队的情况是并不使我们特别感到害怕的。……

其次还必须指出，我们一般地说是反对间接税形式的。甚至政府都指出，专卖实质上无非是征税的另一种形式。为了使我们对实行烟草专卖感兴趣，还指出“德国同其他文明国家相比，我们在间接税方面还是很落后的”。先生们，我就要说，如果人们的眼光已经超越国界而看到其他文明国家，那么需要学习的不是间接税形式，而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如果你们从法国搬来共和制给我们，从瑞士搬来人民直接立法，如果你们给我们以政治自由，那么，先生们，我们也许将进一步就这一点同你们进行讨论。但是我们暂时认为，人们用不着为了间接税而去注意外国。

……

我们反对烟草专卖的第二个政治上的原因是，政府的权力将会由此大大增加。从政治上考虑，这种间接税制度无非是君主国反对掌握纳税批准权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固然这一点多次受到否认，但是情况仍然如此：问题主要在于摆脱不愉快的控制权——不是人民的控制权，因为人民很少参加——，要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权。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当然毫无理由把资产阶级作为我们的特别的朋友加以帮助，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做；不如说，如果资产

^① 阿道夫·亨利希·威廉·冯·朔尔茨 (Adolf Heinrich Wilhelm von Scholz 1833—1924)——普鲁士财政部长和帝国财政部长。——编者注

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自己铸造的、它自己向政府提供的那些武器的惩罚，那么我们毕竟是可以嘲笑一番的。但是对我们也重要的是，对于现在已经在某一方面拥有国家的全部权力、已经最大限度地支配着全民族的辅助力量的政府，对于现在已经权力过大的政府，绝对不能再提供更多的权力给它支配了。

如果你们同意烟草专卖——在这以后，其他一些事情就不可避免会接踵而来——如果政府掌握了足够的款项，那么，先生们，你们可别相信，国会的权力会比它现在更大。当然你们的权力已经算不了什么，但是今后你们还要远远比迄今的情况更加微不足道。

还要加上政府对于在烟草专卖事业中就业的人所拥有的全部权力。烟草工人、烟草零售商和烟草种植者总共恐怕超过五十万人，他们将直接依附于政府，这种情况是空前的……

如果你们想一下，在实行烟草专卖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发展下去有多少工人必然会遭到解雇，那么结果将绝不会象先生们向我们描述的那样乐观。对于多余的人应当怎么办呢？特别是对于必然会消失的家庭手工业的全体人员应当怎么办呢？这里提出的补偿办法，我不能认为是别的，只能认为是滑稽可笑的，当然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符合国会的礼貌。如果只想给最小部分的人以补偿，而且只给这部分人以很少的补偿，如果还想把这称作补偿办法，那么我就不知道应当怎样理解“补偿办法”了。我只能把这看作是一种捐助或施舍，而绝不能说是一种补偿。

……

先生们，你们总是谈到小手工业，而且有一些人相信，你们是独家承担保护小手工业的责任的。使我感到惊讶的只是，那些总保护人同时又是最大程度地损害烟草工业中的小手工业的人。德国的小手工业是很少象烟草工业中的小手工业那样缺乏生命力的。如果你们消灭这些小手工业，那么你们正是使它们无产阶级

化，并且对我们自然是有利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但是我认为，那些这样做的先生们没有权利把自己打扮成小手工业的拥护者和保护者。

.....

对待烟草种植者的草案比对待烟草工人更坏，而且我必须承认，我佩服政府同时还有勇气冒充为烟草种植者的“保护者”。先生们，你们十分简单地使烟草种植者成为国家工人，成为一般的国家工人，却又不给他们以这样的人的好处。如果你们设想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你们可以从你们的观点把它随便设想成多么坏），那么你们毕竟将向我承认，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国家劳动的工人固然享受不到你们从财产得到的那些享受，但是也没有它带来的那些不愉快。但是先生们，你们在这里剥夺了烟草种植者由财产带来的全部好处，却把使他感到不愉快的一切都留给他。如果你们是前后一致的，那么你们就必须把德国的全部烟草基地没收，并收归国有。这是你们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这样一来，种植者就会简单地成为国家职员或者国家工人，象你们想称之为的那样，但是他无需对不属于他的东西承担责任。

.....

先生们，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反对烟草专卖，这个原因迄今很少或者几乎根本没有被提到过，我说的就是**烟草专卖同经济改革或者社会改革的关系**。的确。在众所周知的、声名狼藉的“被剥夺继承权者的世袭领地”这一说法被用来作为竞选诱饵并且已经达到目的，或者即使尚未达到目的以后，这一说法没有再在提案的论证中出现。但是毫无疑问，而且部长朔尔茨先生自己已经指出，社会改革同这种财政改革（烟草专卖也就是属于这一种）是紧密相联的，由财政改革取得的一部分款项无疑将用于社会改革的目的。因此，财政改革和社会改革是相互联系的事情。先生们，这对我来

说是使我宣布自己是提案反对者的又一个原因，因为我不想成为一场政治欺骗的同谋者——要知道，社会改革无非就是政治欺骗。（活跃。）

当以前人们谈到被剥夺继承权者、人民的不幸、对人民的剥削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时，那是一种“犯罪”。先生们，请你们回想一下社会主义的宣传吧——难道我们所说的和所传授不是这些道理吗？完全是这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用的词句都是同现在那一方面（右面）所用的词句一样的。我们向工人们说过，他们是被剥夺继承权者，是被压迫者和被统治者，他们受资本剥削，这一切都是你们（右面）目前已经采用的词句。（非常活跃。）那时人们把这叫作煽动阶级仇恨，而且根据情节判处两年以内的徒刑；如今这被看作爱国主义，它得到了它的应有的报酬。（左边：很对！）

以前人们很少关心工人立法，只是由于我们，他们才不得不对此表示关心。当人们看到我们的鼓动和我们的学说对群众有什么样的影响的时候，他们就对自己说：如果这些人产生这样的影响，我们就可以把好处拿到我们自己手里来，正象现在通过烟草专卖那样！（很好！）他们企图得到工人、人民的好感。首先他们利用贸易实践来摆脱我们的竞争。这一点通过使我们保持缄默的反社会党人法而做到了。现在已经能够通过实行社会改革来大干一番了。

先生们，社会改革的思想丝毫不是新的东西，而且绝不是独创的东西。我们也预料到，他们这样做不会走得太远，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思想所表现的那种形式。先生们，我倒是承认政府在某些事情上是很有本事的，但在这一领域它却是笨得该死的。

.....

先生们，但是他们的成就是非常少的。也许开始的时候，他们曾叫一些人上当，然而这样的影响又早已成为过去了。我只需要

指出，虽然反社会党人法时的情况对你们有利，虽然我们没有报刊，但是这方面的指导性的机关报《国家社会主义者》前一些时候停刊了。这是玩火，而火烧起来了，这对我们没有损害，你们自己却恐怕会因此烧伤指头。如果他们连续不断地唆使人一般地反对资本，特别是反对犹太人的资本，（左边：听，听！）那么这样的话绝对不会对人民毫无影响的。人民不会细致地加以区别，认为犹太人的资本是坏的，基督教的资本却是好的，如果有人向人民说资本是坏的，那么就会被理解为全部资本。当我们为此受到惩罚的时候，你们却使人民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只会为此感谢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以为，你们通过这些半真半假的让步就能阻止我们的攻击，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你们这样做只是火上加油，为我们效劳。

警察在对付我们时的无能已经表现得很明显，这是你们现在大概都会承认的。先生们，迫害丝毫无损于我们，而且即使你们当前只看到我们有一点点运动，那么你们毕竟有时也会在这头或另一头听到那个魔术师的讥笑声。巨人挥拳要打他，却看不见他。

先生们，你们在对付社会问题、对付社会难题时从来没有比现在这样更加不知所措。先生们，你们提出这个议案来重新决一胜负，要在争取穷人方面再次继续进行竞赛，在这一时刻请你们容许我再对你们坦率地讲几句话。

先生们，社会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理解成文化问题，或者理解成权力问题。把它理解成文化问题是容易的，这一观点就是，尽可能地排除人民思想发展道路上存在的障碍，逐渐地——满足人民提出的最迫切的需求，从而带来一个不断改革的时代。先生们，这是一条缓慢的道路，但它是一条文明的和真正人道的道路，我们根据这样的理由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次机会不去表示——而且我要求所有的人为此作证——我们完全准备

采取这条道路，采取使思想获得胜利的道路。先生们，如果理解成权力问题，它的特点是可以简单地用“血与铁”这句话来说明的。你们失去任何理智；你们以已经享有的特权来维护自己；你们同那些也打算从生活中得到一点东西的人进行血战；最后你们同绝大多数人处于交战状态，宁可导致一场灾难来解决问题，而不愿放弃你们最小的一点特权。

先生们，你们是可以在这两条道路之间进行选择的，可惜你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而且我必须向你们说，我认为，你们在这后一条道路即较坏的道路已经走得很远，无法回头了！先生们，因此你们在这方面必须走的道路就已经给你们规定好了。

但是，这条道路不只是给你们规定好，而且也给我们规定好了。从人民对当前这次讨论的关心来说，这一点特别起作用。你们倒是回想一下，我们从前在我们的报刊上针对这类法律和提案是怎样对待的。那时我们社会党人从事研究，那时我们就逐步发展即逐步国有化、就垄断、就随便什么只要略微能带来改善的事写了很多小册子和书。先生们，如果那时提出社会改革的草案，那时人民和我们就会对之非常关心。但是，先生们，今天的情况根本不同了。广大的人民阶层已经绝望，不再认为总还能从政府和议会方面取得一些好处了，而且你们实际上已使广大的人民阶层习惯于只指望从人民那里、从人民的解放行动那里得到解决办法，你们在为实行戒严状态提出论证时就提到这种情况。这是对反社会党人法的报应！

如上所述，即使我对目前在这里就经济改革进行的讨论不大感兴趣，你们也会理解的，因为我根据整个事态不再相信在这样的道路上会取得什么成果，因为我相信解决的办法应当是完全不同的。

先生们，即使在从前，从我们参加议会以来，对我党来说从来

就谈不到本来意义上的议会党派斗争。但是，先生们，今天的情况同过去相比就更加不是这样了，今天我们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并且是你们向我们宣战的。先生们，现在问题已不在于讨论原因，讨论“是否”或者“怎样”，而是简单地在于消灭我们，而且是使用各种武器，四年以来就是这样了。先生们，从现实的政治立场来说，——要知道在这里说一句慷慨激昂的话是无济于事的——我用不着对这一点加以反对，我只能让你们自己去看一看你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多么远。但是，先生们，如果你们要搏斗，如果你们打过来，那就请你们也注意用正直的战士的逻辑来对付我们，这就是说，对手也有权利打过去和同样有权利为自己选用他认为适当的武器，而不只是你们向他提供的那些武器。

根据这个原因，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公开作为对手互相对峙；但是，先生们，请你们把关于道德、和平和合法性的说教抛在一边。武器既是你们选择的，你们对于创伤就也要负责任！（社会民主党人席上叫好。）

载于《帝国议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卷第156—162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03—111页。

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

(1882年8月17、24日)

一

臭名远扬的“反对社会民主党危害治安企图的法令”得到通过并且生效，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在出现新形势的初期，当暴力行动象暴风骤雨一样从四面八方同时袭来，德国工人的智慧和双手所创造的数以百计的成果遭到粗暴破坏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的所作所为正象流浪者在野外遭到一场暴风雨时所表现的那样：他背向暴风雨并且把头缩回去，使毁灭性的风暴对他的伤害尽可能小一些。这种方式是否就没有害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探讨这个问题，不属于这次论述的范围。反正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行动。

过了一段时间，风暴小一些了（这正是由于它初期特别猛烈），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人多少习惯了这种风暴的时候，他们环顾周围，看看形势。各种被扯断了的线索又逐渐接上了。联接得越广泛，就越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场破坏性的、加害于人的暴风雨

-
- 本文最初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发表的，也是以代表记者的天秤宫符号署名，同年又以“略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为副标题由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单行本，署名为苏尔土尔。小册子的文本和社论基本一样，只是在接近结尾处就革命和改良问题补充了两节。这里是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翻译的，并参考《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刊载的小册子文本作了补充。——编者注

所危及的范围。需要治疗很多的创伤，需要使还有生命力的东西适应新的情况，并且需要创造很多新的东西。但是，无论人们想在哪儿着手做些什么，到处都碰到无所不在的非常法的阻挠和威胁。从前曾经保证说，应被置于法外的不是整个社会民主党，而“只是这个党的危害治安的行为”。但是现在违背了这一保证，警察用拳头粗暴地对付所有只要稍微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成员有关或者似乎有关的一切。

那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无所不在的东西也是无所不能的，而且非常法的网眼是如此严密，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漏掉，这个网又是由如此坚硬的黄麻织成，任何东西都无法把它扯烂。要在反社会党人法控制下开展强有力的运动，这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废除非常法。不能让它存在下去”这样的竞选口号曾经响彻四方。这对那些在初期曾长久深深地低着头并且因而有些忘记挺胸抬头习惯的人产生了一种很坏的影响。这些人开始声称，要是风暴发现人们岿然不动，它就会立即停止。他们的意见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但是风暴当然没有考虑这些幼稚的想法，非常法还在有效期期满前又延长了几年。

现在，当这场美梦理所当然地化为泡影之后，人们不管是否愿意，不得不踏上现实的崎岖道路——起初是踏上一只脚，很快就两只脚都踏上了。人们开始捉弄警察，反抗警察；在“合法性”的魔力解除之后，事情越来越迅速地发展成完全自觉地、有计划地采取“非法的”形式，而且也采取我们今天所进行的那种革命斗争的形式。放弃长期习惯的“合法”运动的道路，投身于没有边际的、急速奔腾的违法行动的激流，这对于许多人来说会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卢比孔河已经渡过，桥在我们走过以后断了，我们的旗帜早已在遥远的对岸飘扬，任何遗憾和胆怯的思想都再也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前进了。

最近一个时期又一次出现了非常法延期的问题。还应由本届国会作出延期或不延期的决定。而从这届国会的组成看来，它不是不可能拒绝再一次批准。于是，某些人旧有的希望又复苏了，而且有的人可能已经在美梦中看到我们在1884年将使我们的报纸、集会和结社以及过去宣传工作的一切附属机构又生机勃勃地复活起来。人们特别是在旅途中可以很多次听到工人和同志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就证明，这个问题正被反复讨论。我认为人们对这个问题关心得太过分了。这样做不仅造成了并且助长了错误的观念和希望——这些观念和希望一旦破灭，必然会使人松懈和丧失勇气——而且也会产生将因此忽略很多更加重要的事情的危险，无论如何会浪费一部分为追求那些重要事情所必须的力量。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向同志们说明，为什么希望取消非常法是徒劳的，以及为什么所有以这些期望为根据的打算是错误的。

开始我根本不否认：鉴于国会目前的组成和现在的情绪，它无论如何是有可能拒绝关于再次延长那项法律的政府提案的。那项法律的很多奠基者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他们已认识到没有力量做到用警棍“消灭”社会民主党，而且经验证明由此只会加速革命的发展，这就使得他们成了那项法律的迫不得已的反对者。事实上，中央党、分立主义者、进步党，连同人民党分子的小组，波兰人，亚尔萨斯人等组成了反非常法的多数派，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总是要具备这样的前提，即在那以前，不要发生任何事件或者警察的花样，从而再一次使资产阶级对红色幽灵产生那种高度的恐惧。必须有这样的恐惧才会使资产阶级盲目地追随政府并且乐意把各种权力交给政府。

但是我们假定，已经形成多数反对派并且废除了非常法。难道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竟会十分幼稚地相信，这样就能再次简单地恢复非常法以前的老样子吗？如果是那样的话，社会民主党党

员必须首先完全忘掉：不是法律支配力量对比，而是相反，法律无非是表达那种力量对比的“法的”形式。但是迄今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是暂时还保持现状；其次，没有人会相信圣灵现在突然降临到政府和统治阶级头上，并且教导它们对社会民主党的要求必须作出真诚的和彻底的让步，以致它们会自愿地放弃他们对付我们的强大权力。

由此可见，一旦表达现行力量对比的目前这种形式不管出于任何一种原因而遭到破坏，它立刻就会被另一种形式所代替，后一种形式会以其他形态来表达同样的力量对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对我们同样是不利的。**事情已经确定无疑**，而且作为延长非常法的反对者而多少与此有关的所有党派的发言人都公开地和秘密地承认：**随着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而来的必然是普通法的相应地大大的严酷化！**还是在去年冬季，进步党人汉奈尔就曾经在他的同志们的热烈掌声中声明：他保留他在颁布那项法律时就已经提出的建议，即“根据普通法”来制止社会民主党的“放肆的胡作非为”，因为其他所有政党都谴责“象社会民主党那样使用新闻、集会等自由”，并且打算加以取消。我想，这是肯定的和明显的。何况这种呼声还是出自比较起来“思想最自由”的党呢！

用几个条文把失效的非常法重新塞进“正式的”法律，这对于狡猾的、善于曲解和制造法律的人来说并非难事。的确政府在不久即将提交讨论的工商业条例草案——除了爱国的、宗教的著作和历书外，该草案禁止一切通俗读物——中已经指出了这条道路。如果此外再把新闻法、结社法和集会法向倒退的方向加以“修改”，而且叠床架屋地把以前被拒绝了了的臭名昭著的俾斯麦刑法补充条例重新搬出来——该条例规定，凡攻击“作为国家与社会的基础的财产、家庭、普遍兵役制等等”者应受惩罚，直至判处二年徒刑——那就会得到足够的补偿了。至多还剩下小范围的戒严状态或驱逐

出境——这些是同样可以根据必要的善良愿望用普通法规定下来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幸又回到老样子了。

常常有人说，尽管如此，废除非常法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普通法的恶化也同时会使我们的“自由派的”反对者遭殃。乍一看这个理由似乎有些令人信服。这种理由首先是出自看到我们的敌人落入他们自己挖掘的陷阱而产生的幸灾乐祸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它得出这样的结论：进步党人之类的先生们为了不再使自己掉入陷阱而宁可把它盖上，这就是说，很快又会消除普通法恶化的情况。但是这后一个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即使假定，对待我们的尺度同对待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尺度一样（这是不大可能的），因而反对党必定希望废除欺压人的法律，但是那时从“法律的”观点来说，废除这些法律要比废除一项非常法困难十倍。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不能用任何正式的阻挠手段来对付国会，但政府却可以不管国会而通过简单的否决来阻止对普通法作任何修改。

但是还要考虑到对我们更加重要的另一点。非常法单凭它的形式已经表明自己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党和阶级的镇压和迫害措施。反社会党人法也是作为这样的法律得到了普遍承认的，而且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德国人民不是把根据非常法而受法律制裁的人看成罪犯，就是说不是看成一般的罪犯，而仅仅是看成受到迫害的反对政府的人。政府本身的确经常强调，反社会党人法根本不是法律，而仅仅是一种警察条例，一种行政条例。但是，如果非常法的重要条款变为正式的立法，那么这些条款就不只在形式上成为“法律”，而且很快会使人忘记它们的来龙去脉，而违法者在不甚了解情况的局外人（这是大多数）看来似乎简直就是违反大家都要遵守的制度的人了。因此我们在造成舆论方面失去了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因素。

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宁可让政府通过非常法，而不要通过“常规立法”对我们进行斗争。

二

谁因违犯非常法而遭受迫害，就只能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仅仅由于被迫害这个事实就已经在公众面前表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被剥夺了公民权并且被打上了“国家和社会的敌人”的印记，并且不能通过任何一种小的妥协洗掉这个印记，只有彻底逃跑或者直接背叛才能做到这一点。警察就象一条警犬那样进行盯梢，资产阶级齐心协力要帮助“消灭”被迫害者的“生存”，杜塞尔多夫“霍亨索伦”钢铁厂的经理最近就以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对我们的柏林同志这样讲过。任何求和、怯懦和请求都帮助不了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当前的社会毫不留情地把他排斥出自己的圈子之外，而且象回避一个鼠疫患者那样回避他。因此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今天谁受到社会民主党的魔力的影响，他就陷在里面了；法律和警察、仇恨和偏见、政府和资产阶级都迫使他继续当社会民主党党员，并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人！

结果，所有的被迫害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所有自觉的和出自本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社会民主党人同现今国家和现今社会的决裂将越来越彻底，我们和我们的敌人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不可逾越。事情正好是这样。正因为这样，被驱逐者和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同属一体的精神和团结的精神就会受到大大促进，我们的党性就会得到大大提高。一切希望、一切信仰、一切知识、一切友谊、一切力量、一切欢乐、一切满足，一切的一切只有在党内才能得到。在党外，周围除了敌人什么也没有，我们和他们只有一种关系：敌视和战争，而且打倒敌人是

我们争取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的强大力量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党的团结性、纪律自觉性、自我牺牲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一个主要条件就在于此。这一强大的团结精神也就是使我们顺利地度过了困难时期的那种精神，在非常法的初期补偿了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几乎一切工作的不足的那种精神。

然而，非常法不仅使我们的敌人，不仅使统治者认识我们，而且也使人民认识我们，不仅使富人和有权势的人，而且也使穷人和受压迫的人，不仅使愚笨的人，而且也使明智的人都认识我们。如果说，人民在被欺骗了一百次以后终于将对迄今所有的党都丧失了一切信任，并且只剩下一个救星的话，那么对自己身上的锁链感到厌恶的人民要寻找这个救星并不困难，他不会把我们同任何人混淆起来！

但是，一旦按照普通法办事，除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之外，其他方面的人，如进步党人，分立主义者，人民党人和受到政府讨厌的其他人士也都逐渐受到迫害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会慢慢消失，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会不是朝着被迫害者所抱的信仰，而是转向越来越严重的迫害本身，最后的结果是一锅缺乏鲜明色彩的、不明确的、笼统的反对派和“自由思想”的稀粥。很明显，这样我们只能遭受损失，必然遭受损失。与此相反，进步党人和自由党人先生们付出一些可以忍受的“牺牲”，却能稍微使他们褪了色的反对党的光轮重现光彩，这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曾经存在过一个连目光最短浅的人都能辨别的严重分裂，那么这就是1848年六月大屠杀之后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保皇派的）和巴黎工人之间的分裂。散发着血腥气味的“秩序党”的英雄们和被战胜了了的、被分化了的无产阶级，彼此之间除了深仇大恨没有共同的东西。此后几年，当社会的拯救者

波拿巴置资产阶级共和国于死地时，无产阶级袖手旁观，因为迫害者之间的斗争同受奴役的人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十二月帮^①的十八年统治，通过同样的“常规立法”进行普遍的迫害，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成员和工人的成员在被告席上和在狱中相遇，所有这一切都使矛盾逐渐缓和，并且最终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共和派、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几乎只有极少数人辨别得清，最后实际上是共和派阵营的极右派同极左派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盟，因此就很难辨别。人民最终只知道谁拥护帝国，还是拥护共和国；它至多注意到温和的共和派和坚定的共和派之间的差别，而恰恰很少注意到资产阶级共和派与社会主义共和派之间的深刻差别，然而激进派、雅各宾派和社会主义者混杂在一起的这种现象甚至在公社中也同样出现了。

这一倒退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1870年9月4日辨别不清的巴黎人民又一次把伪善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推上宝座，这些伪善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很快就和各种色彩的保皇派联合了起来，在血腥的五月一周里第二次对人民进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残暴得多的屠杀。而且甚至在今天，法国无产阶级尽管富有革命本能和革命传统，却显然缺乏明确的认识，就是说缺乏阶级觉悟。

显然我们不可能愿意冒类似这样的危险，尤其是因为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的反对有权批准赋税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足以大大搞乱人民的观点，并且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人们很容易或多或少恰当地拿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等人同卡尼格先、福尔肯贝克、欧根·李希特尔、汉奈尔等人相比较，并且把德国和法国的有关政党相比较，每个人自己都可以随意这样做。无论如何是存在这样的危险的，即在多

^① 这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正式名称为十二月十日会。——编者注

数人民参加的一场普遍的反对派运动中，他们越来越不了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别，而且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由于拥有强大的新闻力量、为数甚多的议员以及其他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会使一部分人民暂时辨别不清。——我要说，无论如何，我们对这样的危险总是估计得太低了……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对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不抱任何希望，而是认为，通过相应地改变普通法来代替反社会党人法，会使情况大大恶化。如果一定要我作出决断，是赞成使普通法恶化，还是赞成延长非常法，我将毫不犹豫地赞成延长非常法。

三

因此我们的口号不应当是，“废除恶劣的非常法”，而应当是：“**废除使这种非常法有可能实行的罪劣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

在这个口号上当然党是一致的。在涉及到需要使用的方法时却相反，还不是到处都存在应有的明确性和统一性。但在我们现阶段的斗争中，造成这种明确性和统一性是绝对必要的。

最近时期的整个发展，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发展——特别是非常法对政治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都使决战的时刻（从前这是遥远未来的事）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如果说在我们运动的纯宣传时期，关于我们需要经过多长的道路以及使用什么武器才能取得胜利，存在着形形色色截然不同的意见，这是关系不大的。“未来”毕竟看起来太遥远了，而事实上今天使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比目光远大的未来计划更必要的事情要做。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至少在形式上还存在或者似乎存在通过协商即和平的谅解来解决敌对双方争端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而且是一去不复

返了。事实上社会主义在今天不再是理论问题，而纯粹是“一个力量问题，这个问题在议会内得不到解决，而只能在街头，在战场上解决。”两个阵营之间的最后关系破裂了，战争开始了。双方都很激愤，敌对双方队伍的冲突只不过是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就会发生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每个指挥者都有自己的作战计划，而队伍在讨论这些计划时弄得四分五裂，纪律瓦解，力量分散，那就再也不行了。要下决心制定出作战计划，然后团结一切力量来坚决贯彻这一计划。

我坚决相信，客观情况已充分地向我们指明应当采取的行动，也就是我们党应当遵循的政策是这样的：

一旦宣布战争开始——不管我们是赞同还是反对——也就必须打消所有的和平幻想。这些幻想只能削弱毅力，并且妨碍果断的行动。我们每个战士和全体人民应该相信，妥协和和约都不能结束战斗，只有武力才能解决。尽管很多人都不期望有这种前景——他们却要服从这个公认为不可避免的情况。谁一旦要知道他不能逃避斗争，他就会全力以赴。假如我们因此而把愚蠢的、微弱的希望从心中抛弃，并且在战士的后面破釜沉舟，那么战士所想的就不再是负伤和死亡，而只是复仇和胜利。因为没有东西可丧失的人是凶猛的。相反，谁要是相信事情也许还会和和气气地进行，谁要是认为敌人还有可能保持清醒态度，或者谁竟然软弱到会期望通过采取一种“温和的”行动和尽可能放弃一切强劲行动就可以感动敌人，使他们宽宏大量地放下武器——这种人就是一知半解的，而且会成为一个缺乏热情的、胆小的、半心半意的战士！谁要是想使斗争有成功的希望，他就不应当有无穷无尽的担心和顾虑；他就必须放弃希望，把一切置之度外。^① 最终抛弃现在既无意义又

^① 以下两节仅仅见于小册子。——编者注

有害处的关于“和平发展”、“逐步改革”，关于“唯一真正的”、可以说是客观的、实在的**革命**（“我们正处在这种革命之中”，并且这种革命会完全自然而然地、无需我们出力就在某种程度上和谐地发生）的这些提法吧！我们肯定是最不愿意仅仅按照狭义即突然使用暴力、暴动、起义的意义来理解“革命”一词的；不用说根本谈不到采取几个幼稚的革命赌徒所采用的那种形式了。如果把革命这个词科学地解释为一次深刻的彻底改革过去事物的变革，改革科学的、道德的、经济的、国家的和社会的以及所有其他的制度和机构的变革，那么尽管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和重要的，但是人们却休想通过这样解释而否定这个概念的全部政治含意。一切和平的，即使是对国家和社会状况的十分深刻的改造，从政治意义上讲——关键就在于政治意义——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或演进，也就是逐渐的发展。一种纯粹地方性的、不成熟的、偶然的或任意的暴力行动同样也不是革命，这是盲动，至多是一次叛乱，一场暴动。如果国家和社会内部对迄今的思想体系和实际情况的变革在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而且必须继续发展时受到暴力的阻碍，如果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力求发展势力的社会阶层在那些为他们利益效劳的变革受到已经产生的障碍的影响而不能贯彻时不愿忍受，却企图以暴力对待暴力，推翻这一暴力，这时革命就发生了。当然这一革命的根源是以事实和力量对比为基础的暴力，但是我们也愿意参加这种革命，而且不仅使用道义力量，还要使用真正的物质力量，帮助人们先去挖掘挡住咆哮的潮水并使它越涨越高的堤坝，然后拆毁这个堤坝，最后则尽可能给泛滥的激流指出方向，使它又能按照这个方向既破坏又造福，为社会主义取得最广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革命，我们所努力争取和准备的革命。

因此，不仅从科学的意义上讲，而且从政治的意义上讲，我们都是革命者，我们既不应当听见这个名称就害怕退缩，也不应当出

于可鄙弃的顾虑而打算给这个名称作出牵强的、不真实的解释。^①

只要我们的全部行为都是正直的，坦率的，光明磊落的就好！人民不熟悉外交手腕和遮遮掩盖，只会被这一套搞糊涂，并且最后对我们对自己不满。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应该是这种性质的，即它一切阶段和一切行动始终都会得到群众理解。因此要坦率和公开——公开的斗争是强有力的斗争！我们不要胆怯地或自作聪明地收起我们的旗帜，我们应该让它自由飘扬，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它。我们不说大话，同样我们也不试图把自己装扮成无害的和没有危险的。我们认为躲躲闪闪、否认事实和伪装虔诚都有损于我们的尊严，让我们抛弃这种态度，并且公开而顽强地告诉我们的敌人：“是的，我们是‘危害国家的’，因为我们要消灭你们！是的，我们是你们的财产、你们的婚姻、你们的宗教和你们的整个制度的敌人！是的，我们是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们将以武力对付武力！是的，我们坚信革命和解放就会到来。我们期待革命和解放，并且通过秘密组织和宣传，采取一切你们的‘法律’所禁止而我们认为适合的手段，全力以赴为此进行准备！你们提出了权力问题——我们乐意接受这一挑衅。不久的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要交锋，胜利者将制定法律！……”

这是最简单的、最有价值的和唯一适应情况的政策。这个政策使我们避免错误的希望和软弱的让步，排除任何模棱两可和摇摆的态度，使敌人不由自主地尊重我们，并使人民喜爱和信任我们；从各方面说，这个政策使我们处于光明正大、内心真诚、因而是有利的地位。然而这个政策也不排除所谓的“建设性”活动，这就是说，目前通过采用所有的议会的和其他的“合法”手段小规模地尝试改善劳动人民的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状况，但是它对这些手

^① 以下的最后几段同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小册子。——编者注

段的运用和估价划定了必要的界限。

这个政策必须在党的一切行动中,在新闻工作中,在宣传工作中,在法庭上,在议会中,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可更改的行动准绳。这样我们党才能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不可侵犯而且坚强有力,遇到任何情况都能应付,因为我们的党是不会被任何情况吓倒的。

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1882年8月17、24日第34、35号。

在萨克森邦议会论证萨克森国 有铁路设置制动手防护室 提案的演说*（摘录）

（1883年12月17日）

先生们！我们党的代表在议院提出的提案通常都要遭到反对，说这些提案是“煽动不和的”，是“旨在实行颠覆的”，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提出的”。我们多次听到人家说，与其说我们是对议院说话，远远不如说我们是向议院外的人们说话。议员阿克曼^①先生就是常常这样说的。他强调说，人们可是知道，我们的建议是为哪个阶级效劳的。

先生们，我要说，你们根本不能对你们面前的这个提案提出那种异议。不如说这只不过是对过去的一次玩忽职守的过错进行补救而已。我和我党同志们所要求的也决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萨克森周围的所有的邻邦几乎都早已设置了制动手防护室。

.....

如果合理的职务上的考虑并没有表明不能设置密闭的制动手防护室，那么我要问：为什么以这样一种粗暴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萨

* 1883年9月福尔马尔在开姆尼茨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他在第一次出席邦议会时提出一项提案——萨克森铁路局应当在列车末节为制动手设置防护室。政府答应考虑他的要求，在这以后有一大批新建造的车辆设置了制动手室。——编者注

① 卡尔·古斯达夫·阿克曼（Karl Gustav Ackermann 1820—1901）——德累斯顿律师，保守党党员，国会议员和萨克森邦议会议员。——编者注

克森的制动手呢？先生们！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在政府方面的人士致力于著名的社会改良以来，这就尤其不公平。他们到处对人民说必须改善人民的处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说，必须铲除资本的压迫，必须消除工人阶级公开发出的“合理的抱怨声”。国家派工厂视察员到私人企业去；在缺乏预防事故的保护措施之类的地方，工厂视察员们在那里制定规章，禁止某些做法，规定必须采取某些措施。但是为了对所有这些做法拥有道义上的权利，国家首先必须为私人企业做出一个榜样。但是至今在铁路方面也好，在别的方面也好，我都丝毫没有看到国家的这种模范行动。如果当局打算要求私营工业实行改善和限制过度的剥削，而在它本身的工厂里却并不比私人资本做得更好，那么国家将何以自处呢？它难道不会遇到这样的回答：首先自己做好，再来教我们应当如何实行“实践的基督教”吧；首先用你自己的榜样来告诉我们，为了有利于人民和工人阶级，应该做什么吧；但是不要给我们规定你自己遵守得最差的章程？！

.....

载于《1883—84年萨克森王国议会下院会议公报》第1卷第217—218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12—113页。

在萨克森邦议会论证废除萨克森雇工法提案^①的演说(摘录)

(1884年1月23日)

先生们！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在这个议院里提出议案时是处于独特地位的。他们必须根本放弃自己的提案会取得实际上的议会成果的想法。假如我们在这里提出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案，而这些提案立即遭到拒绝的话，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任何一个其他的政党大概都会由于自己的提案这样一贯地遭到拒绝而感到气馁。然而我们绝不是这样。我们还可能有许多提案遭到拒绝，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气馁，而是会一如既往继续审查邦的立法，并且对于那些我们认为最不合理和最站不住脚的法律提出修正案或者建议撤消。毫无疑问，1835年1月10日的雇工法就是那样一项最最站不住脚的。极其明显地需要加以改革的法律，是那样一项与现在的整个立法精神以及我们现在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最相矛盾的法律。

……

人们不想继续留在农村，而是想到城里去，农业方面对这一点有过多少抱怨啊！除了其他重要原因外，恰恰也还要加以考虑的是，不管城里工人的经济地位和其他地位如何糟糕，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低下，然而除了工作之外，他们的人身是相当自由的。

① 这项提案是由福尔马尔代表四位社会民主党议员起草和提出的。提案未能提交委员会和列入全体大会的重要议程。——编者注

而雇工，即使他比他的主人年长，比他的主人有经验，即使他已有自己的家庭，但他的全部生活，他的起床和就寝、穿着、外出、到娱乐场所、与人交往，一句话，他的一切，都象一个小孩子那样要听任主人支配，这难道不是不能容忍的吗？（活跃。）我真不明白，你们发现了什么可笑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好笑的，那就是这类法律条文！我重复一遍，在我们这里要长期继续维持这样一种法律也是不可能的。

从宗法式与家长式的雇佣关系得到好处的人对这种关系的消失表示遗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迄今还没有人愿意放弃他们占有的、对他们有好处的权利。但这样一种感情完全是倒退的冲动。这种关系的任何松弛都是向社会自由前进一步。请你们自己考虑一下，你们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提出这种要求：仅仅为了你们的利益和舒适，就应当使一部分工人比其他公民少享受一些权利？如果说现行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到处都已经公认为不够了，如果说处境还算较好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已经越来越大，而实行社会政策已经越来越困难了，那么我相信，要想继续维持这样一种古老的、完全过时的法律关系，那就太不合时宜了。

发展趋势是要取消束缚劳动的那些规定，对此你们是无法长期阻碍的，这一点你们恐怕自己也应该看得出，尽管财产和利益当然还经常曾使人们在这一类事情上陷于盲目。但在这方面象在整个经济与政治领域一样，你们当然能够有另一种做法：你们尽可能地拖延必要的改革，并且由此使情况复杂化，为解决问题制造困难。但是难道这符合你们的利益吗？

先生们，请你们不要由于这一建议是出自社会民主党就影响自己认真考虑这项提案。我相信，你们不能否认我已试图尽量实事求是地阐述我的提案的理由，并且试图放弃你们通常称为“泛泛而谈的漂亮演说”的那一切东西。我只希望你们那一方面也会这

样做，希望你们不要仅从通常的那种感情用事的角度出发来反对我的发言；不要再一次象近几天多次做过的那样用这样一句话开始：“我们不应当在目前这个危险正在增加的时候拆除堤防，即使它已快要崩溃。”你们不要满足于指出迫在眉睫的“颠覆”危险和使用类似的说法。相反，你们要冷静地、只凭理智来处理这些事，并且从你们那方面尽力而为，以便从现行的立法中取消那些令人憎恨的规定，那些明显的权利不平等的情况。我请各位下议员考虑我们的提案。

载于《1883—84年萨克森王国议会下院会议公报》第1卷第503、509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14—116页。

在帝国议会关于外交部 预算的演说* (摘录)

(1884年12月15日)

先生们，如果仅仅是为了提出削减预算，我本来是不会发言的，这是因为，我党认为这种根本无足轻重的削减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我党有权，它将实行完全另一种样子的削减！但是我认为我必须对首相先生就人民代表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所发表的那种观点提出反对意见。

先生们，我和我党的同志们固然就个人来说绝没有理由来特别对维护这个议会表示关心，因为国会在很多情况下恰恰象政府本身那样损害过我党。但是，先生们，如果问题涉及到国会这个机构以及它对政府的地位，那么在原则上我们毕竟有一切理由要表示一点意见。

先生们，在首相先生讲了这一番话而且右派方面对那些有关的段落报以热烈掌声之后，德国的人民代表机构看起来似乎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如果你们总是不得不听到人家说，在所有和一切

-
- * 这是福尔马尔在外交部预算二读时发表的演说的一部分。在这以前，国会预算委员会已以多数否决了政府关于在外交部设置一些新的机构的要求，俾斯麦却在全体会议上继续为自己的要求进行辩护，同时又否认国会具有为作出决定所必需的知识。在二读结束时，预算委员会否定这一提案的决议得到全体会议的批准。然而俾斯麦在新年一开始就对国会的这一多数派发动一场猛烈的新闻战，并且用解散国会来威胁他们，1885年3月该提案三读时终于获得多数人的赞成，福尔马尔仍旧发言表示反对。——编者注

的事情上，政府都远比人民代表机构懂得更多，那最后你们一定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你们是毫无价值这样的令人痛心的感觉了。首相先生确实是这样说给我们听的，不过他用的是挖苦的反话。他说：“对军事问题，你们自认为比将军们了解得更清楚；对预算问题，你们自认为比财政部长了解得更清楚；对外交部的事务，你们自认为比我了解得更清楚。”

先生们，如果我们站在这种立场，即认为坐在联邦参议院席上的先生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唯一的专家，那么就请你们尽快地关闭国会大厦吧，因为那时整个国会都没有什么价值了。（左边：很对！）

我本人在这方面所持的是另一种立场，那就是认为国会有权对任何事物进行批评的立场，这同时也是符合宪法的。国会在这这样做时无非是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对这件事如此生气，尤其是因为这笔款项是相当小的。

国会议员汉奈尔^①博士先生已经指出，如果有经费来设置新的官职和增加薪金，那么首先必须从下级官员开始做起。而我却毫不犹豫地相信，即使在不再应当被视为下级官员的那些官员之中，有些人的收入也不是很高的，因此提出加薪确实与我所理解的那种人民代表的职责是一致的。但是我所持的立场是，鉴于一般说来在人民中，具体说来在下级官员中也存在着巨大的社会贫困和社会不幸，我们有责任推迟改善高级和中级官员的处境，直到处境最恶劣的人得到了他们特别应有的和必须的照顾以后再来做这件事。仅仅从这个立场出发，我就必须声明，在处境决非令人羡慕的千万个下级官员终于有一天得到照顾以前，我本人将必须反对增加官职较高的人员——不管用什么称呼都一样——的薪金。

^① 阿尔伯特·汉奈尔（Albert Hänel 1833—1918）——德国自由思想党党员，基尔大学国家法与国际法教授，国会议员，邦议会议员。——编者注

国会议员哈默尔施坦^①先生已经谈到议会统治。我不知道德国自由思想党最近是否公开声明过他们赞成议会统治。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对此只会感到高兴;我本人当然是站在主张议会对政府拥有绝对权力的立场上的,是主张政府不应当站在我们之上,也不应当站在我们旁边,而应当站在我们之中的(右边激动,活跃。)——你们现在对此发笑;但在其他国家也有另些人对这种事笑过,后来他们就不再笑了!

载于《帝国议会第六届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卷第365—366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17—119页。

^① 威廉·冯·哈默尔施坦 (Wilhelm von Hammerstein 1838—1904)——男爵,保守党员,国会议员。——编者注

公布党的议员的表决情况*

(1885年6月18日)

党的机关报在上一期的评论栏发表了一位议员的信，这封信评论了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通告信，在这以前，我是不知道这个通告信的。投稿人的意见主要是针对伦敦人公布投票反对轮船公司津贴案和反对党团声明的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名单。这位议员认为这种公布党的代表机构成员表决情况的做法侵犯了议员的言论自由，也损害了党的利益。党机关报的编辑部似乎也认为公布表决名单是一种“间接地革出教门的尝试”。

因为我不了解伦敦通告信的原文，所以我当然无法知道，这个通告信是否包含不适当的内容，即把某些议员“革出教门”的内容。

* 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其国会党团应否投票赞成政府津贴通向非洲、澳洲和东亚的轮船航线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社会民主党人报》支持党团内以倍倍尔为代表的革命派，反对赞成政府提案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后者为此发表了企图压制该报的声明。在伦敦的部分德国党员以“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名义发出一份通告信，指责《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因为屈服于党团多数派的压力而没有发表一些反对党团上述声明的决议。《通告信》还在结尾列举了坚决反对轮船公司津贴案的议员和反对党团声明的议员的姓名。《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收到该《通告信》的同时也收到了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来信。后者指出《通告信》上的两个名单都不准确，而且表示反对《通告信》提出的这种公布党团内表决情况的做法，认为这会使议员受到压力，妨碍他们冷静地进行讨论和自由地作出决定。《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5年6月4日一期的《社会主义评论》栏简单介绍《通告信》的内容并且摘要刊登了这位议员的来信（未署名），编辑部还表示基本赞成他的意见。此后福尔马尔给编辑部写了这封信，表示反对这位议员的意见。编辑部在发表这封信时加按语表示只反对《通告信》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做法，而在原则上是同意福尔马尔的。
——编者注

但是，如果这位投稿人认为公布我们国会党团的表决名单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容许的，是损害党的利益的，那么我就必须坚决地反对他。

公布被委托人的表决情况，是一项彻底民主的原则。在一系列共和制的行政机构和法院中，成员的表决是公开进行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公开表决的做法必然会使委托人即人民（在我们的情况下是党员）有可能持续对他们的被委托人实行监督，而人民为了真正行使他们的权利，是不能缺少这种可能性的。人们从表决的名单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各个被委托人的情况是怎样的。

但是，如果竟有一个集团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讨论的（我们的国会党团的情况就是如此，而且现在不能不如此），那么只有公布表决名单才能使委托人对它实行监督。

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怎么可以认为他们的党员对当选的议员实行这样一种监督会是损害言论自由，是妨碍自由讨论，是“对议员实行一种非常法”，这我是不能理解的。在我来说，我至少认为，这样一种监督对我的自由所作的某种限制完全是我们的原则所必需的。如果我的表决与委托我的同志的意见和愿望一致，那么我只会乐于看到这种情况经常得到确认。反之，如果我的委托人对我的表决表示不满，那么我的责任是向他们作出解释。

那时或者我能够说服我的同志们相信，当我根据对上述问题的更加全面的考虑而作出与他们不同的判断时，我毕竟是有道理的。这一情况又只会是对党有好处的。或者事实证明，我的观点和我的委托人的观点无法取得一致。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谁的意志更高一些，是我的委托人的共同意志，还是我的个人意志呢？对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在这个问题上片刻都不能犹豫不决的。如果引起我的不满的表决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或者是我

的同志和我之间偶然出现的意见分歧,那么,同志们提一些要求或者谴责几句,使我在今后表决时必须加以考虑,他们也许就心满意足了。反之,如果我和我的委托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不断出现的,深刻的,那么我的责任就要求我把受到的委托交还给那些委托我的人,并且由他们在改选时最后决定,他们今后是否能够和愿意仍旧把我当作他们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提出这个问题甚至有时对代表个人也可能是很不愉快的。但这恰恰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公众的权利和利益的问题。

正象被委托人的公开表决是民主的一样,故作神秘,即就讨论和表决的情况实行“职务保密”,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专断的特征。如果一旦由于敌对的法律和敌对的党派等等,一个被委托人组成的委员会必须把秘密进行讨论和表决当作惯例,如果人们一旦开始谈到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即使面对自己的委托人群众也要保持“同事间的团结”和“一致”;如果人们习惯于认为,这个委员会中的少数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多数人的决定,甚至不应在自己的委托人面前说出自己的观点,并且认为这是保持那种同事之间的和谐一致的一项义务;如果在所有的问题上只表现那个团结一致的集团的一种观点,而不再使委托人群众能够从人和事两方面来检查他们选出的代表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那么,这就确定无疑地表明,被委托的人开始感到自己脱离他们的委托人群众而形成了一个比较高的特殊集团。这样一来,代表们将从一个由选举出来的、具有随时有可能被收回的全权的被委托人组成的民主的委员会,变成一个专断的、发号施令的集团,这个集团绝不是一定会立即忘记自己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是这个集团毕竟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专制的特征了。

我仅限于纯粹客观地、原则性地论述这一问题,并没有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如何运用原则。我的意图只是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避

免一种由于反社会党人法的颁布及由此造成的党内情况已经特别增大的危险。因此我和上述投稿的作者相反，认为公布党团内部表决情况的名单这件事**本身**——就是说，不在事前作出结论，作结论是委托人即党员同志的事情——对党的利益不仅没有危险，而且相反，是一个避免行将到来的危险的很有效的手段。所以我在上次国会会议期间的党团讨论中一再提出确认并公布表决情况的建议，我也认为，凡是在党团内的事件进程对党员同志具有原则性意义的时候，我在这一方面是不受任何“职务保密”约束的。

但是为了使这件事能在原则上得到解决，我将象我在柏林已经宣布过的那样，在党团复会时提出如下建议：今后在一切问题上，除非考虑到暴力而不得不作为例外，**我们的代表在党团讨论中的表决情况均应在党报上公布。**

最后再附带发表一点意见。

上述文章的投稿者显然属于党团的多数派，他认为公布表决情况是对投票者的“告发”，因此对之提出异议。但是如果象党团多数派成员最近在德国的敌对报纸上所声称的那样，“绝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确实是会站在党团多数派一边的，那么通过公布表决名单显然只会使少数派的成员、而不是使多数派的成员受到“告发”。

但是我认为，公布我的表决情况决不是对我“告发”，不如说，如果这样能使党员对我的活动作出评价，那只能受到我的欢迎。就我所知，少数派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想的。

因此，通过公布表决情况也会使象目前这样悬而未决的党内争端更加容易得到解决并且大大地促进它的解决。

格·福尔马尔

1885年6月9日于慕尼黑

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1885年6月18日第25号。

在帝国议会抨击俾斯麦的 个人统治的演说^{*}(摘录)

(1886年3月27日)

先生们，我这次发言不是为了讨论草案的细节。烧酒专卖已经被处决了。如果这期间不是首相先生昨天发表了演说，我或者我党的任何同志可能都不会在这次宣读时再要求发言。他那次演说的某些地方使我有理由发表如下的意见。

首相先生也把社会民主党算作了“敌视帝国的”党派。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新闻，也决不会使我们感到难过。今天在德国，而且很久以来就是这样：所谓帝国的敌人，就是现行制度的敌人，也就是首相的敌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就是这种人。但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决不是国家的敌人，也就是说，决不是共同体的敌人，决不是德国人民的敌人！

.....

先生们，首相先生已经指出，国家的基础有三点：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良好的财政状况和公民感到满意。我党的观点是，上面举出的第三个条件，即公民感到满意，是社会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条件，那么其他两个条件就自然存在了。如果人民感到满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仅会热心地提供为保卫

* 1886年3月底，德国国会否决了俾斯麦提出的实行烧酒专卖的法律草案。福尔马尔代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发言，但是他几乎只字未对草案本身表示态度，而是利用他演讲的机会尖锐地抨击了俾斯麦及其“个人统治”。——编者注

他们的共同体所必需的力量，而且乐于为公共福利以及为维护和发展共同体在财力方面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是目前在人民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满意的心情。相反，目前我们面对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是：重税，榨取最贫穷的人的膏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个人的统治！

个人统治今天在德国占主导地位，大概没有一个动脑筋的人会怀疑这一点。只是很多人不敢讲出来，或者认为对此保持沉默为宜。但是，首相先生昨天的演说再一次向我们指出了个人统治正处于全盛时代！首相先生对国会说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恭维话。他认为国会本来就不代表德国人民。他说，政府将决不会由于国会的决议而偏离自己的路线。请求国会批准一项征税是他作为一个立宪制政府的成员的职责，他却把这称作一种耻辱，“一次无与伦比的卡诺萨^①之行”。他接着说：如果国会继续表现得象这些时候以来那样不驯服，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德国的诸侯们会为建立帝国并向帝国和国会让出一部分权力而感到后悔，他们会想到再一次破坏著名的“永久联盟”，并且建立另一种秩序。首相先生提到了斗争年代，提到了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并且意味深长地提到了1866年的流血内战，他认为，全体德国人民，至少是绝大多数人民，是赞同这次内战的。关于最后这一点，我只想说明，首相先生在这方面是大错特错了，至少在南方决不要忘记1866年的那些日子！成功是会使人办得到某些事情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推崇象那次内战那样一种应受谴责的事情！……首相先生进行了一番威胁，虽然说的含含糊糊，在形式上无法据此得出明确的看法，却足以使人从字里行间去领会他的意思。据他说，也许为时不会太久，国家及其按照宪法建立的体制就不会再维持现在这个样

① 意大利地名。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到那里去向教皇认错。

——编者注

子了，而且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变来进行的。在首相先生第二次回答李希特尔^① 议员先生时，他在一怒之下还算说的比较明确，他说：“您只管笑吧；谁笑在最后就笑得最好。到您早已不再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政府方面的人就要笑了，那时您也许能在另一个什么地方笑了！”

先生们，我想这个讲话是清楚的；这不是一个遵守宪法的国家公仆的讲话，——这是一个独裁者的讲话！

他竟可以向德国国会这样讲话，社会民主党人对此除了感到愤怒而外，还必然会感到有些幸灾乐祸和感到满足。从前如果有某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指出，在目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和长期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有可能在未来发生暴力革命；如果有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警告说，在人民的处境没有及时得到改善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和政府可能会再一次后悔；那时议院的各党派通常都要大发一通雷霆。……

我们从政府席听到了什么呢？首相先生谈的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判断，而是对完全正当地行使符合宪法的权利的人民代表机构公开进行威胁。他以1866年流血的阴影进行威胁，并且声称，如果国会表示不顺从他的意志，他将不仅要废除根据宪法产生的人民代表机构，而且甚至要废除这个国家本身。先生们，人们可以背后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许多坏话，但是说我们想瓦解、摧毁或消灭国家，也就是德国人民的共同体——这样的谴责是任何人都不能公平地向我们提出来的。这样一种威胁还是留给自称国家的奠基人之一的那个国家的第一位官员吧！而这个人却把我党作为对帝国的存在和安全的一种所谓的危险而加以迫害。

如果人们用衡量社会民主党的那些言论的同一标准来衡量首

^① 欧根·李希特尔(Eugen Richter 1838—1906)——国会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的创建者和领导成员之一。——编者注

相的这些言论，那么他们在其中看到的无非是他一直在准备用暴力推翻德国的帝国宪法！我想，人们从而可以估量到最大的威胁——不是对政府和统治制度的威胁，而是对国家和德国人民的共同体的威胁——来自哪个方面，是来自社会民主党这个人民的党，还是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绝不肯放弃迄今行使的权力，而只是一直想加强这种权力，甚至不惜冒因此给人民和国家带来最严重的损害和坏处的危险！

首相先生然后又把德国国会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代表机构作了一番比较。虽然我相信首相一切可能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但是使我有些惊讶的是，从逻辑上说，首相怎么可能按照他自己的意图使这种比较表现为对国会不利的呢？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的议会没有一个会容忍象首相先生昨天对国会所讲的那类话，哪怕是片刻也不会！当然，为什么首相能讲出这种话，其原因恰恰在于国会容忍他讲这种话。一个人配怎么对待，他容许人怎么对待，人们就怎么对待他。如果国会继续对这种事处之泰然，那么当首相走的更远的时候，国会就不必感到奇怪了！如果相反，国会只要有一次给个人统治一点厉害看，那么政府也就立刻会以另一种样子出现了。

首相先生说：“迫切需要使国家巩固起来！”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事实上我们的共同体之所以迫切需要巩固起来，尤其是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掌权者至今没有做什么能使德国共同体真正巩固起来的工作——只有取得人民的信任并使他们获得幸福，只有尊重他们的自决权，才能做到这一点——相反却越来越多地做一定会使国家最大限度地遭到削弱的事！（叫好声！）

载于《帝国议会第六届第二次会议速记记录》第3卷第1675—1677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20—122页。

在帝国议会关于殖民政策的演说(摘录)

(1890年5月12日)

先生们,我要发言反对这个提案^①,也一般地反对由帝国推行的任何官方的殖民政策。我党和我从一开始就宣布反对这个政策。当东非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象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那样放弃原来的过分的希望,同样,我们也不会由于现在的形势变好而改变意见。我们的态度正是一种原则性的态度。并不是我对开发非洲的事业不感兴趣,对致力于开发非洲的勇敢的人们不够关心和尊重,而是相反;但是这种个人的和科学上的兴趣是与我的政治态度有所不同的。作为人民的代表我不得不要求,不要使帝国和德国人民承受所有这些事业的负担。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把他们的钱和其他力量用于如此遥远的事业是否合适,这我可以姑且不谈。尤其是在由国家推行殖民政策的各国,意见是很不一致的,而反对这一政策的意见明显地在增长。不过我现在不想进一步谈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我认为把由于殖民政策的目的而产生的负担加于德国是件坏事。

先生们,我们德国在民族、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是长期落后的,这本来已经使我们的任务比其他很多国家的任务都大。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强行阻挠自然而然的发展并且造成错综复杂

^① 指联邦议会建议为德国在东非的保护领地进一步提供几百万马克津贴的提案。——编者注

的情况(这一方面是由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由一种无法详细描绘的暴力统治引起的),这些任务的数目又增加了很多。我们现在必须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消灭大量旧的和新的残余事物,才能达到其他国家的水平,并且进一步繁荣发达起来。欧洲各先进国家的任何一个都不象我们这里那样,必须完成那么多头等重要的文化任务,而这些任务拖延下去是有危险的。这一事实需要我们把我们的人民和国家一切可供支配的道德力量和物质力量集中起来,用于我们本身的目的。

但是殖民政策是这方面的一个严重障碍。殖民政策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企图掠夺和冒险的思想以及沙文主义的思潮进一步加强。发生国际争端的机会也随之增多。我倾向于相信,德国拥有权势的力量(可惜我们还不属于这种力量)愿意维护和平,尽管我国巨大的、不停的、狂热的军备扩张确实显得是同这种看法十分矛盾的;相反的做法恐怕也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谁要是不仅自己想维护和平,而且打算给自己提出捍卫和保障普遍和平的任务,那么他的任务和首要职责就是,使任何最小的火星都远离堆积在一起的火药桶,把全部防止危险的注意力和能力都集中起来,而不是加以分散,从而使之削弱和消灭。我们在皇帝敕语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力量对比的任何变化都会破坏政治平衡,从而妨害旨在维护和平的政策取得成果。”众所周知,这句话是用来支持增加军事拨款的。先生们,官方的殖民政策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且是对我们不利的。把我们的力量转用于和投放在遥远国家的任何行动都意味着削弱。

.....

先生们,把民族因素渗入殖民地问题正是最危险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是怎样明确地说也不为过分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会进行冷静的考虑和思索,而代之以一种不可捉摸的感情。失败对于深

思熟虑的人来说是促使他变得明智的最可靠的手段，而对于感情用事的人却相反，只会使他愈来愈盲目地向前冲。这里就再也没有什么道理和自由的意志可言了。一个好的政府的主要条件是，冷静地进行考虑，有意识地、审慎地进行权衡，保持自由的意志和完全的自决。所有这一切将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地被一种官方的、受“民族的”观点驱使的殖民政策断送掉。一些最无法预料的偶然事件，某个官员在殖民地的任何愚蠢行动，都可能推翻从前的打算，而导致人们如果按照自愿几乎不会、很可能决不会选择的目标和事业。

先生们，接着而来的就是**花钱**。目前姑且不说，谁的计算更加正确，是帝国首相先生的计算还是班贝尔格尔先生的计算更加正确，总之这都是花几百万的事情。我现在要问：既然在我们自己这里有一系列极其迫切的需要年复一年地得不到满足，据说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那么德国难道会富裕到可以随便准许为了国外的目的挥霍几百万吗？何况我们本国涉及的金额常常远不象人们在这里又想慷慨拨给非洲的那么多；我只提一下普鲁士众议院关于教育事业以及其他类似事业的讨论情况就行了。国内到处都有困难，劳动人民的广大阶层、工人、职员和农民，大家都要求帮助。人们承认必须给予帮助，至少部分地给予帮助；可惜没有钱。但同时却批准给东非几百万几万万款项！

请允许我在这里附带讲一点小小的意见。当我们过去连同组织工人参议会和帝国劳动局的建议而提出劳工保护法草案时（现在我们又把这一草案提出来了），你们曾经向我们宣布，由于要花一大笔钱，这种设施根本不能考虑；那时估计要花三百到四百万。现在务必请你们取得提案中所要求的花在德国的款项，并以此建立所要求的职业组织吧，这种组织无论如何将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我要问：浪费在欧洲大规模军备竞赛之中的人民的马克难道还不够吗？难道还要把其他军事项目的

新的固定开支(首先是扩大海军的任务,其次是殖民政策的直接费用)加到里边去吗?但是,这种可以用数字表示的金钱上的损失绝不是唯一的损失,更不是最大的损失。更加重要的是,殖民政策在不小的程度上把对我们人民的迫切需要、对宪法所要求的、有关自由的、政治上和社会经济上的改革意图的兴趣和注意力吸引过去了。你们回想一下殖民狂热处于真正全盛的那个时代吧!那时由于对人民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的兴趣被这样吸引过去,由于殖民政策的海市蜃楼迷住了人们的眼睛,就在广大的范围内起了败坏作用。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再次出现;特别是对最重要的问题即社会问题存在着这种危险。

先生们,我们不是你们邀请来的,而且几乎不会使你们感到满意,我们现在却有这么多的人出席了议会,坐在这一边(活跃),——的确有一个时期,其他的政党以为自己是“主人”,它们出于一种好意容忍我们呆在这里——我要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坐在这一边的人可以向议会发表一种论调:为了广泛地使人相信,当前的危险局势不容许继续下去,应当通过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而打开局面并加以解决,那是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辛苦、劳动、斗争,克服各种形式的成见和仇恨,放弃各种形式的迫害,甚至也需要你们取得多么痛苦的经验。看来我们终于做到了这一步,以前人们不敢梦想的那些阶层已开始考虑,如果一种制度一方面决定了精神享受和肉体享受日益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把大多数人民排斥在这种享受之外,以至为了群众的需要而生产的东西群众却得不到,那么这种制度该是多么荒谬。由于开始有了这种认识,统治阶级开始发展某种程度的社会义务感,这种感情愈是使绝大部分有关的人物感到讨厌,就愈必须更加引人注目地坚持和加强。

殖民政策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使人可以重新逃避这些义务,并且再一次传播关于我们的社会弊端的原因和克服办法的

糊涂观念。他们简单地说，德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弊病在于出口不足这一情况；应当通过开辟殖民地销售市场而增加出口，那时一切就会安排得非常好了。每一个真心诚意地打算发展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人民幸福的人都必须担负起这一任务；全力以赴地同这样一种骗人的幻想作斗争。

先生们，从德国人的角度来说我是绝不会热心于反对东非的殖民化的。首先，这可能是与风车进行的一场斗争，因为任何人、甚至任何政府都无法阻挠这种殖民。其次，这些努力无疑归根到底毕竟是为文化目的效劳的，哪怕常常也要通过很痛苦的阶段，发生很坏的事情。我们最近的白皮书整页整页都谈的是杀人和放火，我也把这种情况算作这种坏事之列。在这方面肯定有很多人是可以不必丧生的，虽然另一方面我愿意承认，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总是能顺利地干净地进行的。但是，我不想进一步涉及这一方面，因为这方面或多或少是任何一种殖民政策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如果人们不喜欢那种现象，那就根本不应当进行殖民。如上所述，可见我在这里绝不是反对殖民本身；但是我要求，所有这类的事业应当简单地交由私人去发起和进行。

.....

先生们，我对问题的态度简短地说是这样。研究人员可以到非洲去；他们愈是按人道主义办事，我就愈对他们抱好感，并且赞同给他们拨款，象我们已经做的那样，如果必要的话，还要比以前给得更多。各种宗教团体的传教士可以到非洲去，并且努力使黑人理解他们的宗教观念的优越性；我们将毫无忌妒地让他们去，而且这样的人走掉几个我们也过得去（活跃）。种植园主和商人可以到非洲去，并在那里寻求取得利润；但是希望他们只依靠自己的经费和自己承担风险。政府并不放弃对于此事的一切监视和监督的权力，这是正确的；它可以做出一些总的规定，也可以时常指派管

理人和领导人；但是所有这一切原则上一概由公司承担费用和
风险，国家不应因此承担什么义务。

.....

载于《帝国议会第八届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卷第
43—46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
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209—213页。

在不来梅工会联合庆祝 会的演说*（摘录）

（1890年8月24日）

尊敬的与会同志们！劳动人民有许多不幸，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们的敌人即上等阶级称心如意。如果工人保持从前那个样子，如果他们机械地进行劳动，好象他们不是具有人的需求的活生生的人，那么人们就称他们为愚昧粗野的群众。如果他们向前进了，如果他们考虑、设法、努力上进，那么人们就称他们是不满分子。如果他们参加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在这些斗争中尽其所能，促使本阶级和全体人民获得幸福，那么人们就称他们是煽动分子即革命者。如果他们由于营业不景气、情况不利而暂时停止斗争，如果他们随遇而安，哪怕是满腔愤怒，那么也会象现在这样，敌人出来讥讽他们说：“瞧，工人能变得多么恭顺，多么低声下气，多么有耐性啊！”我们的大部分敌人，即上等阶级、统治阶级的大部分人既没有感到也没有理解劳动人民的需求、利益和思想方法，既没有感到也没有理解本世纪一些最重大的问题即社会问题和工人问题。推动我们大家的不是朴素的不满情绪，而是人类思维和感觉的一切领域中的一种新的世界观，那些人对这一点

* 1890年8月24日，不来梅和郊区的三十五个工会和行业协会举行了一次联合庆祝会。在市内的一次庆祝游行之后，福尔马尔在几千人面前发表了这篇演说，阐述他的改良策略的要点，第一次提出了“对于善意要伸出手来，对于恶意要给以拳头”的思想。——编者注

是不能理解的。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全部想法和愿望是一窍不通的。

因此，那些人也就不能理解我们的庆祝会。一旦工人在某一个地方集会进行庆祝，不管规模是小还是象这一次这么大（这次盛大的集会给你们的城市和你们大家带来了荣誉），那时就有人说：大吃大喝！你们看，工人并不那么穷，手头并不那么拮据！只要看一看他们怎样举行庆祝会就够了！你们看，他们怎样不知饱足！这纯粹是追求享受！

我的可敬的与会同志们！我们要问：在我们祖国的整个范围内，而且超出这个范围，在整个文明世界，难道只有工人无权享受生活的乐趣吗？难道一切生活的乐趣都仅仅是为那些享有权力和财产的人而存在的吗？难道不是首先为那些创造世间一切美好东西的人而存在的吗？人民不是享受得太过分了——你们把你们的想法拿出来对大家讲讲看！——不，人民不是享受得太过分，而是享受得太少了。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拉萨尔说过“可恶的”一无所求这个词。在禁欲主义者的国家，人们都是尽可能地节制一切饮食，放弃一切生活乐趣，在这样的国家文明从来是不会有进步的。一切进步都是劳动人民、人民大众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福利的提高。一句话：劳动不是生活的目的，而是真正称得上象人那样去享受生活乐趣的手段。

但是，我们的庆祝会还是加强共同属性、友爱感、意向一致性的手段。对于工人来说，这些都是最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这种感情，工人就没有力量，就微不足道，因为这一基础、这种感情构成了工人固有的、唯一的、但也是最大的力量。……

可敬的先生们和女士们：请你们回顾一下三十年以前的情况。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但在各个民族的生活中却是一个短暂的、极其短暂的时刻。请你们回顾一下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呢？关于人民的真正利益、关于人民必须首先在经济上、

随后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解放这一点，只有极少数人，即少数仅仅在科学领域开展工作的博学的和杰出的人物才知道一些。另一方面，我们的拉萨尔却满腔热情地、滔滔不绝地向工人们发表演说。但他起初也只能争取极少数人跟着他，而且在很多年内都是这样。而今天呢？今天，在我们三十年来走过了一条十分痛苦而又极其光荣的道路以后，在我们经受了嘲讽、仇视和迫害这些使人受到锻炼和纯洁起来的烈火考验（对于这些我们今天即此时此刻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以后，在我们三十年来进行了反对整个世界，反对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强权的斗争以后，今天我们在全国成了最强大的政党，今天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战胜了你们，不是你们战胜了你们。（叫好声。）

与会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我对迄今已经做到的事情的作用估计过高了。我们还有很多数不完的工作要做，而且我们没有到达终点，而是刚刚开始。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大厦，我们所追求的那样的大厦还是不存在的，几乎连一块石头都没有。但是基础是建立起来了。……比人强大的环境的不可改变的进程，我们自身的阶级本性和党的本性，我们的教育和力量（这我们必须归功于我们的敌人），尤其是我们的敌人的始终不变的愚蠢，这一切将发挥作用，使我们今后也象过去那样继续前进。

在这一进步的情况下，今天特别提上日程的**工会运动**尤其必须发挥重大的作用。我不否认，在这一运动的范围内以前也已做了一些事情，是在付出牺牲的情况下做到的。但是可敬的与会同志们，我们绝不能以为，似乎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起了几分模范作用，做得足够了。相反，应当说（因为我们是你们自己选出的，我们在这里不能吹捧你们，而要对你说真话，哪怕真话听起来是刺耳的）我们的那些在许多方面很好的行业协会组织还跟不上时代。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比这个领域更加需要热心、勤奋和毅力。本年的要

求提高工资的运动向每一个有眼睛能看和有耳朵能听的人表明，事情有点不对头。我们具备的有利情况，远远没有象应当利用的那样利用起来。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大工业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雇主即大工业家是了解这些情况的，特别是他们考虑到反社会党人法即将废除，便结成了一个自卫同盟。他们同我们相对立，形成一个集中制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团体，对我们充满敌意。我们不是集中制的，我们象从前一样是分散的，一个行业不顾其他行业，一个地方不顾其他地方。在这一方式下，有许多时候我们本来能够取得胜利，结果却吃了败仗，使敌人占了上风，而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的。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效法我们的敌人。应当使我们的敌人已经做的并打算以此加害于我们的事情给他们自己造成损害。我们必须按地区在各个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必须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在整个德国联合起来，我们必须真正建立起一个新的大型中央管理机构（至于怎样对付法律，这是另一个问题），在反对敌人的斗争已经开始的那一问题上打击敌人，这在有了较好的组织的其他国家已经做到了。

你们看一下英国，那里的罢工规模是巨大的，一次就是二十五万人或五十万人，整个地区、整个国家停止了工作！你们看一下铁路、矿山和煤气工厂的罢工！在那里，人民的集中起来的力量表明，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手中掌握的威慑力量是多么大！

但这是不够的。国际联系必须建立起来。……我们必须象我们的敌人所做的那样，在国内和国际集中起来，一句话：我们迄今所采取的整个斗争方式在一个时期曾经是对的，现在却过时了。我们必须采取一种适应客观情况的新方式，我们必须重新组织队伍，按照新的战略前进，才能有些新的作为。

目前必须最大限度地平静地完成这一工作。德国的营业情况是不利的。我们似乎处于一次经济衰落的开始阶段。一次罢工在

任何情况下都会起有害的作用。我们必须首先集合起来，我们必须首先积聚财富即反抗基金、罢工经费和罢工储金，一句话：把我们全副武装起来，不在零星的战斗中分散我们的力量，而是集合起来去进行唯一的一次大战。

可敬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国家援助越小，工会就越要这样有效地集中起来，工人就越要这样实行自助。如果国家即公团对自己的任务有正确的理解，那么，当工人这样做的时候，它就有义务去感谢他们。因为只要我们今天的经济情况中的严重无政府状态存在一天，要在其中哪怕建立某些秩序，恰恰除了通过一个有效的、非常友好的中央的工会组织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即使在政治领域，目前我们做起工作来无疑也要比以前容易得多。现在投身运动的青年人可能想到，不管他们将要做出的牺牲会多么大，但同经历了最近十二年的老一辈曾经每天必须作出的牺牲比起来，就是微不足道了。在德国，无与伦比的恶劣政府已经越过我们头上呼啸而过了，已经被摧毁、被粉碎了，这主要是通过工人的毅力、行动力量和顽强精神而做到的。关于那个带来灾难的人^①我们今天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他已经变得没有害处，而且每天都使自己越来越没有害处了。（叫好声！）这个人不久前还公开承认，他的志向在于进行流血的国内战争来对付工人，开始得越早他越高兴（呸！），他宁可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宁可使用大炮和实行大规模的戒严，而不愿放弃统治阶级最小的特权和偏见；我们知道，主要由于社会民主党即工人的态度，他被消灭了，被清除了。（喊声：他还活着！演讲人：不，他使自己死亡了。）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的、越来越必定导致一次暴动的紧张状态，松弛了，缓和了，那些似乎牢不可破的、顽固的、僵硬的东西活动起来了。在公

^① 指俾斯麦。——编者注

共舆论中和议会中，我们的运动即工人、人民的运动强大起来了，我们的运动已成为德国头等力量因素。

在政治领域象在经济领域一样，情况已经表明，存在着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社会思想、意向和观点。不错，它们的作用至今很小，几乎等于零。资本的权力和官僚政治的盲目的狭隘见识迄今是善于把任何社会思想扼杀在萌芽中的，而且能够从根本上阻止人们去实现也许已经希望取得的改善。我们，工人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德国巨大的工人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久经考验的、良好的武器，而去盲目地相信某种诺言。绝不能这样。对我们来说，问题是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一切理由对各方面所作出的诺言进行公正的检验，看一看是否真的懂得、是否真的希望改善情况，哪怕只是部分地加以改善。

其次，我们打算探讨一下，是否也有可能根据十月一日对我们实施的普通法来维护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如果我们认为检验的结果很好，那就没有人会比我们、比你们大家对这一点更感到高兴。因为我们不是为斗争而斗争，而只是为斗争的结果而斗争。如果我们更加简便的途径能取得同样的结果，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当前我们必须对各个方面保持警惕，必须准备停当，必须对可能发生的一切有所准备。今天我们是一支力量，我们不再是向人们乞讨一点什么并且可能受到拒绝的乞丐，我们已经能夸耀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权利，今天我们已强大到足以同各个方面实行对垒，足以泰然自若地对待一切要求、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德国的工人，自觉的工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对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的苦恼、对劳动人民的希望充满热情。但是同时他们应当具有沉着冷静的理智，不应盲目冲击，而要冷静地考虑。对于向我们表示的善意要伸出手来，对于恶意、恫吓、攻击要给以拳头。通过

这一方式我们将在德国取得进步，而且我们的事业在各个领域都是人民的事业，都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事业；世界是属于这个事业的，而且不管怎样，都是属于这一事业的！（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载于《慕尼黑邮报》1890年8月29、30日第196、197号。
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30—135页。

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1891年4月)

没有任何一个运动能比社会主义更加热心地通过言论和文章来传播它自己的原理。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最奇特的设想还是广泛地流传着，尤其是人们常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混淆起来。空想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臆想出明智的和美妙的制度来解决社会问题，并且打算为人类指出未来发展的道路，连细枝末节都给规定下来。

现代社会主义是以完全另一种方式着手的。它彻底地研究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得出结论说，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情况、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对它的整个社会的、国家的和精神的情况具有决定的作用。经济因素是基础，经济上的依附是各种形式的依附和不幸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一依附是劳动手段和劳动相分离的情况造成的。工人阶级是不占有最广泛意义上的劳动手段的，就是说不占有工具、机器和土地，而劳动力只有通过这一切才能发挥作用。全部劳动手段，或者换句话说，资本，成了一个阶级独占的财产，这个阶级借此使一无所有的工人在经济

-
- * 这篇短文是和另外三篇短文一起，由左翼自由主义作家米哈伊尔·格奥尔格·康拉德以《短论》为总标题在他的《社会》杂志上发表的。那三篇短文是：《徒劳无益！》（论述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迫害措施是不会取得成果的），《虔诚的艺术见解》（指责某些“虔诚的”艺术评论家“害怕裸体和奇装异服”），《懒惰的工人》（反对关于“大众的喜悦欲日益加强”的抱怨，参见本文选所收《在不来梅工会联合庆祝会的演说》）。——编者注

上从而也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处于依附地位。

劳动手段的所有者可以为工人使用这些手段规定条件，劳动手段愈是大型的和复杂的，条件就愈苛刻。机器工业的发展使人类劳动摆脱了大量最沉重的和最不愉快的劳动。但是，由于节约劳动的机器今天在为私人资本效劳，所以人类的发明成果主要不是有利于整个社会，而只是有利于这些成果的占有者，即少数人。不断发明新的机器就不断创造出新的千百万个机械的劳动力，但同时却没有使人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相应地缩短，因此机器尽管就其本身来说并且在较好的社会制度下可以带来很多幸福，今天却对劳动人民起着有害的作用。因为活的劳动力和死的劳动力进行竞争，而且无计划的商品生产导致生产过剩和营业停顿，人的劳动力就受到排挤，一部分劳动力简直完全成为多余的了。

现代大生产的本质决定劳动手段所有者手中积累的财富不断增长，因此当前的社会制度发展下去会使一切财富最终为少数人所占有，而整个人类对他们负有纳税的义务。

但是随着这一认识的传播，人们也接受了另一种看法。人类的历史是同自然、同贫困、同人类最初所表现的各种无知、怯懦和依附作斗争的历史。文明是对盲目支配动物界的自然法则的不断克服和驾驭。这一文明的最繁茂的花朵、最后的结果难道竟是整个人类为少数的几千人效劳，而千百万人却不得不最终放弃无数世代的人不倦地创造的大部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仅仅使一小撮有特权的人能够得到更大的享受吗？不是的！文明是整个人类的共同事业，因此它也必须把为整个社会谋求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当作目的。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劳动手段与劳动相分离和劳动手段由一个特殊阶级所独占是各种依附和贫困的源泉。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医治社会缺陷的道路。劳动手段必须从有害于公众的私人占有转

为社会的财产。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解决现在使社会分裂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的利害冲突，使人类的共同利益达到较高的统一。这样，人类的不自由和贫穷的源泉便枯竭了，而知识和才能方面的每一新的进步将不再制造新的桎梏，而是真正对社会的一切成员都有好处，使他们沿着人类发展的轨道前进！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通向社会主义有两条道路：这要看人们是把社会难题看作文化问题还是看作权力问题而定。社会主义者反对任何暴力行动，他只能希望把这个难题当作文化问题来解决，使必要的社会变革平静地、逐渐地进行，并且能享受到和平的全部恩惠。人类唯一值得进行的斗争是思想之争而不是拳头之争。但是问题的解决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取决于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的面貌要看人们怎样塑造它而定。它同一种自然力一样，既可以造福，也可以降灾。它将带来这一种还是那一种后果，将以什么方式把这场大斗争进行到底，这主要取决于掌握国家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人的明智态度和良好愿望。

载于《社会》第7年卷第489—491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27—129页。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

——1891年6月1日和7月6日在慕尼黑
“黄金国大厅”的两篇演说*

一、1891年6月1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 公开举行的党员大会上所作的演说

长期以来，我们党内党外都在讨论两个问题：俾斯麦的统治结束以后，德国政府的政策是否起了显著的变化，是否出现了一种“新方针”；在现政府统治下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有理由对自己迄今所持的政治态度作某种改变。

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极其矛盾的。赞扬现状的人不厌其烦地列举政府更迭以来德国人民、尤其是工人所得到的各种改善和福利。我们党内的情况却相反，固然有些时候同样也有一些方面的人承认有某种相对的改善，但在另一些场合却有其他方面的人否认有任何改变方针的迹象。关于我们党在俾斯麦下台、非常法状态结束之后所采取的立场，意见也是矛盾的。敌人方面嘲

-
- * 福尔马尔的这两篇演说于1891年由他本人编辑成小册子交慕尼黑的姆·恩斯特出版社出版。第一篇演说基本上按照他的详细手稿刊印，第二篇演说则是根据他审阅过的与会者的笔记编印的。1899年他出版了该书的增补第二版，并且把他的“论乐观主义”的一组文章和他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的两次发言收了进去。第二版的文字基本上没有改动，不过显然纠正了一些印刷上的错误。我们是根据《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所收的第二版的文本翻译的。——编者注

讽地声称：我们已不再是从前那样了，我们失去了坚固的基础，陷于分裂状态，我们在走下坡路。在我们自己的阵营里却相反，有些过分热心的人宣布社会民主党人是决不改弦易辙的。

关于**我们是否要有一个“新方针”**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尽管政府有过许多动摇和踌躇，尽管有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事实上政府的政策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

俾斯麦统治的最主要标志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完全僵化，象铁一样凝固不动。帝国政策也始终是对最微不足道的先进思想都彻底地、顽强地加以封锁，尤其是在工人运动领域也是这样。社会关系被顽固地，甚至故意地推向极端激化；俾斯麦在垮台以后仍然毫不掩饰地宣称，他曾经打算在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占优势的时候就尽快地“用武力解决”他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今天这种危险的形势不再存在了。凝固的状况在松动了，当然起先是缓慢的运动，有时还停顿下来，可是发展下去必然会日益生气勃勃，不知停顿。过去的僵化状态已经缓和，旧日的冰已经融化，一批迄今被压抑的力量开始萌芽，开始活动了。帝国蒙受的最大祸害——反社会党人法撤消了。毫无疑问，反社会党人法的撤消首先应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既有力又谨慎的行动和它对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一下点的认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那些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放弃反社会党人法的人是明智的。对任何方式的改革和改良都采取彻底抵制的态度已行不通了。的确，统治阶级，特别是农业和大工业中的强大利益集团还握有极大的统治权。但是这一权力不再象从前那样是绝对的和不可动摇的了，不如说，它到处受到打击，而这些特权人物将不得不准备至少降低他们的毫无节制的要求。在劳动保护方面，至少也已经向改善迈出了第一步。的确，皇帝敕书中的美好诺言和由政府提出并最后经国会通过的工商业补充条例之间存在着可悲的天壤之别。资本主义猛烈施加的影响，官僚的发

号施令的欲望，人民生活中的利己思想和愚昧无知，几乎把这个本来包含着良好愿望的事物弄得面目全非，不可辨认了。因此我们也不得不拒绝工商业补充条例；我们理所当然地反对它的软弱的、甚至部分地敌视工人的规定，然而这并不排除这个法令含有若干无疑是微小的、却是确实的改良。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总算已经走上了制定劳工保护法的道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不顾一切反抗而被事实的逻辑日益推向前进。同过去的区别首先表现为这一事实：我们今天基本上是站在普通法即形式上的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并且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对公共事务的状态施加某种影响。

这个变化不能不对**我们党和党的政治态度也**发生影响。如果人们说社会民主党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按理这只能是指我们的一些基本观点，即关于产生一切人类的剥削和压迫的原因、关于消灭这些剥削和压迫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关于我们为了这一目标而不断努力和斗争的责任的这些观点是不可改变的。至于这种努力在各个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形式和社会民主党为了促使自己的意图实现而在各个时期必须使用的方法，却没有**有什么不可改变的**。我们的党在这方面象其他任何生物一样，也经受不断的变迁和发展。一句话：我们的原则由我们自己决定，但是把原则运用于生活，即政治策略，却要以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和需要为准则，并且绝大部分取决于当权者的态度和**其他的政党**。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的策略不能和非常法时期的策略一样。当然我们那时也没有放弃国会活动和对日常政治活动的关心。只不过当时党最主要的任务必须是最猛烈地、不顾一切地反抗这样一个政府：它把我们彻底地置于法律之外，力图在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我们。因此当时只能和政府战斗，不能谈判。今天情况不同了。政府固然没有放弃反对我们的斗争，但这已经不再是野蛮的

消灭战，它承认我们是交战中的一方，同我们进行正常的战斗，我们可以在这种战斗中靠我们的才智去赢得重大的成就。

至于放弃我们的运动的原则，不言而喻，那是谈不上的。我们也没有理由放下手中的武器，我们迄今所取得的成就绝大部分是应当归功于这些武器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走上谈判的道路，谋求在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性和政治性的改良，这是符合工人运动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也不违背我们党的摆脱一切空想和冥想的、注重实际政治（就这个词的最好意义来说）的本质。我们党起初斩钉截铁地宣布反对任何谈判，后来勉强地、犹豫不决地走上这条路，当它在途中遇到许多困难时又常常想往回转。现在，党的力量和才干增长了，条件更加有利了，我们将必须放心大胆、顺理成章地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我提醒你们回想一下我在去年10月1日的盛大集会上说过的话：“我们应当对许下的诺言做一次诚实的检验，看看是否真正存在进行某些改良的愿望，并且做一次尝试，看看有没有可能在重新获得的普通法的基础上充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如果这次检验和尝试成功的话，那么没有人能比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更加感到高兴的了。因为我们不想为斗争而斗争，而是要为取得斗争的代价而斗争。如果我们遇到善意，看到真正对工人友好的意图，我们将是首先承认、支持和发展这些善意和意图的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梦想仅仅靠一次打击就能改变现状；进步的过程是逐渐的、逐步的和有机的。但是如果这些期望被证明是虚幻的，如果人们试图欺骗我们，或者很短时间以后又要恢复旧的暴力政策，我们也没有任何损失。因为我们的经过斗争考验的盔甲仍旧是现成的；我们在最近十二年里也学会了如何克服最严重的危险。那时我们将丝毫不容争辩地向全世界证明，哪一方面是善意的，哪一方面是恶意的。形势对我们是十分美好的，是大有希望的，但同时

又要求我们承担重大责任。如果说以前只要有激情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就够了，那么现在首先需要的是谨慎、明智的考虑和坚韧的耐性。”

向善意伸出手来，给恶意以拳头吧！如果我们发现善意，我们就必须加强它，要消除和纠正成见，全力以赴地克服坏的影响。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利害冲突是主要敌人，但是无知和成见使不少善良的人成了我们的意图的敌人，在这一方面不仅令人信服的理论能对我们大有用处，而且明智的行动更加能这样。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党作为一切被压迫和被压抑的人们、一切蓬勃向上的力量的代表，必须发展成为一个不断加强的政治力量因素，鼓舞善意的人，反对自私者。因为有力量和有权力的人才能提出种种要求，无依无靠的乞丐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我们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般又走向个别，这是与运动的这个阶段相适应的。我们应当看到未来，但不能因此忘记现在的、眼前的和最迫切的事情。从一种崇高的世界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个别的事情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只有梦想家和傻瓜才不理解它们的必要性和意义。有见识的人知道，进行持久斗争的能力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冲锋陷阵的力量。

一往直前、冲决一切的思想确实有它的道理。要建立一个体系、一种世界观，要透彻地表述一个理想并鼓舞人们去实现这个理想，要提出一个在变化不定的道路上指示方向的最终目的，是必须具备这种思想的。人们越是仅仅把这种思想限制在理论方面，并且阻止它化为实体，它就越是感觉不到与自己抗衡的力量。但是，把思想变为现实，也就是采取行动，就不会那么轻易和迅速地越过障碍了。有时确实曾出现重大危机，那时历史作了或者似乎作了一次飞跃。不过一般说来，发展是缓慢的、有秩序的。各种自然情况不是在跳跃式的、突然的、不经中间阶段而相继出现的变革中发

展的，与此同样，各种社会制度也不是作为孤立自在的个体，不经中间阶段而前后接替的。在这里也是既没有人为制造出来的事物，也没有突然的中断和重新开始，而是旧事物在逐渐地成长为新事物，虽然在好高骛远的人看来这是过于缓慢，然而却是可靠的。今天的事物植根于昨天的事物，明天的事物也同样植根于今天的事物，由于这种千头万绪的联系，任何绝对的事物都是不会出现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状况都是相对的事物，都是过渡形式。利用今天的形式对明天的形式施加影响——这应当是我们的任务。

但是，谁要想在整个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广阔领域中不仅发挥批判和否定的作用，而且取得积极的成果，谁就必须首先精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在人数上的确是德国最大的政党，而且我们有理由为克服重重闻所未闻的困难而取得这一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但是尽管这一成绩本身很大，尽管工人运动对一切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影响日益增长，不可阻止，但是工人运动对立法、对公共权力的体现者和对经济权力的执掌者的直接影响，无论如何是与由于利害关系和同情而同工人运动相连的那一部分人民的数量不相称的。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彼此敌对，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联成一气反对我们的。面对由强大而装备良好的敌人组成的这样一支军队，首先必须避免自己的力量发生任何分裂。队伍越小，就越是要灵活地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越是要坚决地反对陷入不必要的争吵，争强好胜和哗众取宠就越成为多余的，因为这会把力量分散用于次要的或不适当的地方，而与此相反，应当谨慎地集中力量，以便能够用在适当的地方，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党现在要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克制的方面是很多的。一般来说应当指出，进行批评的人思想容易偏激，陷入根本否定和轻率地指斥一切事物的错误，并且认为，凡是存在的东西单凭它是存在

的这一点就已经是坏的，是必须加以反对的。这种情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期，一种幼稚病，对小规模的、处于开始阶段的运动来说还不要紧。但是一个受到各方面注视的大党，却必须避免一切能够理所当然地在舆论面前对它造成不利的事情，而舆论正是党想要争取的。

在个别情况下，对于一种从事实政治的运动来说，过多地关心过去是不能起促进作用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应当排斥对于历史的批评；这种批评始终是未来的最好的教师。但是如果人们无尽无休地抱怨和责备既成的事实，这就可以说是进行荒唐的批评了。在这里我特别想到了1866年和1870年的那些事件。我们曾经充分地对这些事件中我们认为不公正的和错误的地方提出抗议。如果能自由选择的话，我们本来肯定可以使德国的统一成为另外一种样子。但是现在既然德国的统一已经成为这种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无尽无休地、无结果地讨论过去的事情上，而应该立足于事实，把我们的心思放到努力改正这一事业的缺点上来。

这使我立刻想到另一个问题。你们都知道，德国、奥匈和意大利三国同盟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的一部分报刊不赞成三国同盟，这恐怕主要是出于这一假定，即来自各国政府的一切东西都必然是坏的，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我们对外交和它的成果很不信任，这一点是完全确实无疑的。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为三国同盟辩护，因为它的倾向无疑是为了维护和平，因而相对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和意大利的领土收复派当然试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和平不是受到他们的威胁，而是受到三国同盟的威胁。1870年至1871年的事件，两个相邻民族（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当然也是造成今天的危急形势的条件之一。没有人比我们更为此感到惋惜的了。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说，并

不是德国和它的盟友在威胁和平，而是它们在努力抵御来自另一方面的对和平的威胁，这是一个事实。如果外国方面，不仅那里的执政党，而且连激进的甚至社会主义方面的人都因此试图公开进行反对三国同盟的宣传，如果人们竟然试图把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拉去干这种事，那我们就必须大声疾呼地表示反对和提出警告。

我们党无疑是个国际主义的（就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来说）党。我们始终反对错误的民族优越感，始终把使人们联系起来的东西即人类的共性置于使人们分离开来的东西、即民族的特性之上，特别是当这样做是最危险和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在战后的初期，我们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事情之一。如果说，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向来都履行了或者愿意履行国际友好的各种义务，那就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也有民族的任务和义务。一个人尽可以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但只要他不是梦想家，他就必须承认，经济条件不是绝对地和机械地起作用的，而民族性的差别和社会差别是有深刻根源的。我们还得长时间地等待“欧洲联邦”出现。那就让我们一发现有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就同它们进行斗争，让我们高瞻远瞩，把人类的共同利益置于人类的个别分支的利益之上。但是我们也不要接受另外一种诱惑，去荒谬地否定合理的、健康的民族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我们也要承担的义务。我们既要努力避免民族优越感，也要避免另一种怪现象，即否定民族和自我侮辱。

我们从来没有附和反对法国民族的叫嚣。我们在法国民族遭到放肆的攻击时，指出了它的许多优点，当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就指出我们自己的民族也有许多这样的缺点。但正是这种公正的立场使我们有权利象看待德国本身一样，不是怀着一种神圣的敬畏心理来看待法国，对它象对我们自己一样，不是姑

息民族的敏感性，而是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在法国我们有社会主义的朋友，他们反对推行沙文主义，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既然那个国家的当权者盲目推行沙文主义，并从沙文主义出发令人作呕地向俄国沙皇献媚，因而应为欧洲的不安宁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承担许多罪责，那么为什么否认这一点呢？世界历史上有过许多可耻的事件，但很少有比这种事更加卑鄙的了：一个共和国，一个象法国如此进步、自视如此之高的国家的决策人物竟在欧洲最落后、最霸道的政权面前卑躬屈节！固然，另一方面，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是值得大大赞许的；他们的一位代表还在我们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象这样谴责了他的国家的当权者的那一行为。但是可惜这样开明的人为数不多，他们的意见就是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也并不总是到处得到赞同的。人们咒骂这些勇敢的人是“普鲁士人”和卖国贼，他们不能对舆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无力阻止沙文主义者玩火。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明确无误地对和平可能遭到破坏一事表示态度，这无论如何只会有利于法国和其他地方的一切真正爱好和平的朋友。如果任何时候在外国的任何地方曾经有人希望，在德国遭到进攻的时候，侵略者能够指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这种希望将完全落空。一旦我们的国家遭到外来的进攻，那时就只有一个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履行我们的义务绝不落人之后！如果所说的侵略者同时又是整个文明的敌人，即俄国的野蛮人，那么我们将更加乐于履行这种义务。

现在我马上还要谈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好地表明，如果民族事务处理不当，不管是向哪一方面发生偏差，都同样有害和必须加以避免。我们杰出的党员同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前些时候在伦敦为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新版本写了一篇导言，在我们党的周刊《新时代》上发表。导言中这样写道：“最后，备受饥饿折

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它是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国民自卫军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订立了停战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胜利者们自己处于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①

要是不知道连大人物也都固执地坚持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某一个设想的话，就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把这样的神话拿给我们看了。要不是文章署了恩格斯的名字，人们将宁愿认为这篇东西是维克多·雨果编造出来的。要用这样的东西达到什么目的呢？每一个人，只要稍微冷静地考虑一下巴黎投降时的实际情形，就一刻也不会怀疑，实际上德军不是由于“尊敬”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才“不敢”进一步侵入巴黎。这样的入侵固然有可能引起巴黎人的武装抵抗，但是抵抗肯定会被打败，将使双方付出新的牺牲并且再一次给签订和约造成困难。德军指挥部可能考虑到，这一场屠杀和它的后果从哪方面来说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因此满足于暂时占领“小角落”。不需要由于这种节制特意为他们唱赞歌；因为从实际情况来衡量，他们的做法是聪明的和合乎人道的。如果他们采取另一种做法，把巴黎变成战场，那么全世界就会一片哗然，而且是不无理由的。但是现在，因为他们避免了这样的恐怖行为，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8—329页。——编者注

的意义，他写道：“这样看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不是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想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这不是为了那块本来就很瘦的骨头即今天的世界上能够得到的生产赢利而争吵，而是为了人类的普遍进步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谁反对八小时工作日，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保护他的个人利益不受侵犯的一种自卫行动，而是触犯了普遍进步的利益。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它要想在这一斗争中反对缩短工时，就是掉转枪口来反对它本身繁荣昌盛的基础，反对它的全体居民的物质力量和福利的增长。”今年的五一节远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使我们感到“失望”，相反，恰恰在德国，它是党和工人运动的强大、团结、谨慎和克制的光辉证明。群众庆祝五一节而不庆祝三月节，敌人应该高兴才是，不应该毫无希望地去反对有这样的领导和具有这些思想的这一运动。

2. 争取真正的结社权。固然我们有整整一系列的、甚至多而又多的关于集会权和结社权的法律条款，但是这样的权利在任何方面都是有限的、不完备和不充分的。对单纯职业上的结社和政治上的结社作出区分，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还有各邦的结社法五花八门，这也是一个障碍。必须朝确立全国统一的结社法的方向努力。在这方面首先要努力争取容许各个政治团体相互进行联合，而这种联合迄今是被禁止的。人们也许会说，不能期望得到这种让步。然而各政党和各种经济联合组织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它们对建立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组织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方法又是如此多种多样，层出不穷，以致迄今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已完全失效，仅仅使人觉得它们是卑鄙的、令人愤怒的刁难了。相反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由很大的、坚强的、公开活动的组织进行在目前生产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工资斗争和同样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这是最有秩序的，因而对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工人的职业联合会应当获得和企业主的同业联合会同样的结社权。

最后必须通过法律有效地保护结社权不受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的任何侵犯。

3. 在工资斗争和罢工方面，必须要求阻止国家进行偏袒一方的干预。但是，除了已经谈到的扩大结社权以外，这一方面的大部分工作是能够由工人们自己直接去做的。我不想在这里重申我们党对罢工所持的立场。但是我请你们回想一下，长期以来，即从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以来，我们党的许多代表，其中也包括我，是怎样恳切地警告大家不要进行新的工资斗争的，而这种警告又是怎样令人遗憾地常常不起作用的。如果情况并非确实忍无可忍，迫不得已，那么今天举行任何罢工就纯粹是发疯，是对工人运动犯罪。尽管劝阻被压迫、被激怒的工人放弃反抗是多么困难，现在也必须这样做。现在需要忍耐，一直等到时机更加有利、工人为新的斗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毫无疑问，就组织状况而言，企业主不止在一个方面胜过工人。他们不仅就行业来说，而且就地区来说都是严格实行集中制的，工人们却在这两方面远为落后。因此，现在工人首先必须学习，并且补做耽误了的事情。只有在队伍重新集合起来，按职业和地区实行集中制的新组织建成和安定下来的时候，并且首先是在已有必需的斗争经费的时候，才可以考虑进行新的斗争。但是如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新的斗争是必要的，这些斗争就将是而且必然是决定一切的关键，而局部性的个别斗争，将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①

最近，所谓“总罢工”成了经常谈论的话题。据说可以一下子使所有工业国的工作同时停下来，从而向企业主表明：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资本，没有工人他们就什么也干不成。这种思想长期以来就特别在拉丁语系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作怪了。有个诗人写道：

^① 第二版中说得缓和一些：“而局部性的个别斗争的意义将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减少了。”——编者注

“只要你那粗壮的胳膊想这么办，一切轮子就将停止转动！”当然这句话肯定会使工人陶醉的。但是首先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的意志还没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如果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真的已经有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力量，党可以设想在某个确定的时候人民将如此团结一致和不可抗拒地表明自己的意志，那么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根本不会举行总罢工，而是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用来达到它的人道主义目标。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上也有几个法国南部的小组提出过总罢工的主张，但是所有国家的大多数代表都表示坚决反对，特别是德国代表也反对。何况人们想自作聪明地预先确定总罢工的日期和时刻，那是梦想；而工人应当做比梦想更有益的事情。

4. 制定关于工业“瑞恩”^①的法律。近年来在德国，瑞恩、卡特尔、辛迪加对整个生产部门的控制取得了特殊的优势。据一种专门杂志记载，1883年至1890年期间瑞恩从五十四个增加到一百零四个，据施穆勒年鉴的另一种记载，1890年竟有一百三十七个。常常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这些瑞恩的意图是整顿和控制迄今完全无计划的生产，就这一点来说，它们包含着良好的萌芽并且是一种必然发展的趋势的开端。但是这个本身是正确的意图在资本主义赢利欲望的支配下却变成了加重剥削的一种手段。瑞恩常常简直是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有系统地人为地提高价格，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瑞恩不过是组织良好的强盗集团，它们随心所欲地首先掠夺工人，其次掠夺全体消费者，最后也直接掠夺国家本身。人们不止一次地说，工人由于按照威斯特伐利亚煤矿罢工那样的方式举行罢工而损害了公众，因为他们使公众得不到生活必需的煤，或者使它的价格提高了！可是同瑞恩所起的实际作用比起来，工人的

^① 英文 ring 一词的音译，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

必要的工资斗争的那些多半是想象出来的后果有什么意义呢？瑞恩有计划地限制生产、有计划地造成煤和其他必需品的短缺；它们这样做并非迫不得已，而仅仅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瑞恩就这样引起了阶级矛盾的最大限度的激化和尖锐化，并且证明它们自己实际上是有害于公众的，对国家和社会是一种威胁。所以必须立刻制定法律以对付它们。

5. **取消粮食税。**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屡次讨论过，并且即将极其详细地进行讨论，所以我今天用不着进一步谈这个问题了。我只想说，我们绝不能放松反对人为地提高粮食价格这种做法的斗争。正是在目前，谷物税问题和由于谷物税而引起的面包价格大幅度上涨的问题突出起来了，我们党将必须发挥它的全部影响，来使困苦不堪的人民的呼声得到满足，来抵制农场主的影响，并且使政府理解，真正的国家利益是公众的福利，而不是特权阶级和阶层的利益！

要使这个思想首先在工人当中，而且也超出这个范围在各阶层的明智人士当中日益深入人心并发挥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力量和决心，以及它利用实际情况是否巧妙和得当。这个发展过程越和平，越有秩序，对于我们和社会就越是有益！（热烈的赞同声。）

二、7月6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举行的选举协会答辩会上的演说

我认为，重新观察一下帝国对内对外的一般政策，以及我们对这个政策的态度，比列举本届国会中的各种事件重要得多。本届国会成立以来，德国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常法取消了，它的炮制者、从前拥有无限权力的帝国首相也倒台了。上台的是一些新人，

他们不顾四面八方对新事物的抵抗，进行了不少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改革。这个新的阶段已几乎历时一年半，现在是以研究的眼光考察这个新阶段的时候了，应当看看它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有理由改变我们的政治态度。

五个星期前的今天，我正好也是在这个大厅里详细地谈论了这一点，当时在座的人中有很大批今天也来了。我那次发表的意见居然成了我们自己阵营内外发生的一场相当广泛的书面和口头争论的起点。

多次有人断言，我的那次演说包含着一些崭新的东西，也就是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党迄今的整个策略。然而这是绝对不正确的。我所推荐的策略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早就有了，只不过执行得不很彻底罢了。至于我本人，长期以来，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这个政策，你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方面，我请你们回想一下去年10月1日召开的会议、我在不来梅工会庆祝会上的演说^①和我在这里向你们发表的其他演说。

你们在所有那些会议上听到了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发表任何异议；不如说，你们总是对我的言论鼓掌表示赞同的。这就表明，你们大体上认为我对德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对我们这里的运动的想法是正确的。就是在全党，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根本性的反对意见。直到现在，当我把我们同非常状态时期相比已经改变了的策略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个策略在国会内外的表现概括成一套完整的東西，并且明确地作了概述的时候，反对的意见才突然公开发表了。

首先提出异议的是那一派人，他们去年已经就所谓党的毁灭大肆喧嚷了一番。他们所提出的从根本上说不过是那种陈旧的设

^① 参见本书第122—128页。——编者注

想：似乎只有响亮的言词和吵吵嚷嚷的示威才能引起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逐步地、积极地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任何意图都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是浪费时间，甚至是对我们的原则的一种背叛。

他们说，这样做就会使人产生如下的信心和希望：似乎在现今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下，总算已经能够为劳动人民取得某些成果。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确实是能做到的，尽管这同我们的未来理想相比当然暂时只是小规模。现代各国的历史，特别是还有一些劳动立法的历史，最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否则从英国的第一个工厂法起到最近时期止，每个经过艰苦努力并且终于达到的发展阶段，每个对企业主从前完全不受限制的剥削权的逐步实现的限制措施，难道对工人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吗？

他们说，统治阶级可从来是不会自愿放弃它们的任何一点特权的。是的，他们当然多半不会自愿，而只会被迫这样做。但是，如果以为只有靠拳头才能实行这种强制，以为赤裸裸的暴力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问题上都起作用，并且是起决定性的作用，那就错了。除了拳头也还有另一些巨大力量，这就是有明确奋斗目标的组织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顽强的工作，由此引起的看法上的改变，尤其是经济事实的力量。特别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也通过这条道路从统治阶级那里夺得了不少成果。仅就经济领域来说，从统治阶级起初踌躇不决地接受工厂视察员制度到最近的工商业补充条例，这是走了一条多么长的道路啊！还有另一个例子：今天在我们的 1875 年纲领中还保留着针对工伤事故而提出的一项实行“有效的责任法”的要求。但是今天的“意外事故保险法”实际上已超过了这一要求，当然决不能因此就否认这一法律的缺陷。

当然，现在柏林有人斩钉截铁地断定：一切劳工保护法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对工人毫无益处，只能危害和阻碍人民的解放。谁搞点滴的、眼前的改良，谁就“背离了革命”。在目前，我们的眼睛

只准看到贫困，看到它是不可救药的，除此而外只应看着人们所向往的未来……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无疑认为这是特别忠实于原则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不过是没有结果的和悲观失望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原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句话：人们的境况越糟越好！

但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他恐怕才有力量凭一时的激愤参加一场街头骚乱、一场暴动，去砸碎窗户，或者去打破脑袋，但是对于长期的、严肃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工作来说，他就不再是有用的了。因此，我们历来主张，要努力工作以求逐步地、不断地改善工人的境遇。我们不仅仅是科学理论的代表，而且同时也是受苦的人民群众的代表，这一点已经说明我们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主张。是的，我们之所以当选，首先是因为人们把我们看作一切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先锋战士，是因为人民知道，他们的一切控诉是可以通过我们生效的。如果我们采取偏狭的党派政策，即我们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原则性的要求，此外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我们将很少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并且把他们争取过来。问题在于，在丝毫不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以及各种要求之间的关联的情况下，我们也进行实际的日常政治活动，在任何个别问题上不断地向舆论和立法因素发起猛攻，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工人境遇的任何还很不显著的改善都在增加人民精神和肉体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实力，使之壮大以继续进行斗争，激励他们，使他们有能力作出新的努力。所以一切反对进行这种政治活动和议会活动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柏林的人们责备我说，不能和政府“谈判”，必须向它“提出要求”。这话说得很好。我们在国会的所有代表总是提出要求，而且毫无顾忌。但是光这样做还不行，因为对方也有利害关系和权力，所以需要就这些要求进行谈判。比方说，我们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日的要求，经过对方长期的支吾搪塞之后，我们最终将达到十一

小时工作日。难道我们能够因此认为这个让步是毫无意义的吗？那种主张“如果我不能心满意足，我就根本不干”的政策，不是严肃的男子汉的政策，而是孩子的政策！严肃的男子汉有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实现这些理想还要走很长的路，还要越过无数的障碍；他们清楚地知道，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事物是不会一下子让位于一种新事物的，任何发展过程都是渐进的。人们希望并力求获得全部，但是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争取。

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不是由一连串翻筋斗式的跳跃组成，而是由各种力量对比的一系列变化不定的转移和一系列局部成功组成的。我们党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都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宗教派别或一个科学派别，我们当然不需要关心令人不快的现实，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建造我们的空中楼阁。宗派和学派做事都是绝对化的，它们提出要求而不顾这些要求是否可行。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党却不能这么干。它不能用绝缘体把自己隔开，而必须根据日常生活来行动，执行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过去曾经是一个宗派，一个学派。但是今天在德国，尤其是最近几次选举以来，社会主义成了一个大党，这个大党再也不能仅仅提些轻松的、一般性的要求和只限于抱否定的态度。参与实际工作比单纯的示威更为困难，但正是我们的巨大规模使我们对于这项工作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如上所述，长期以来我就是从这些着眼点出发说话办事的，并且得到你们的完全赞同。今天则比以往更加不能离开这个策略。相反，我们必须使它系统化，改掉一些旧的习惯。人们不能一下子就脱掉前一发展状态的蛋壳，这是可以理解的。“激进的”反对派的这种暂时的反动就是因此产生的。在过去的非常法状态下，在工人运动的任何表现形式都完全非法、都受到有计划的迫害的情况下，我们对待我们的迫害者是毫不容情的，对任何残暴行为都作

了充分的报复——我在其中也并不落后。那些情况改变以后，我们依靠合法地位并且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已有可能从事某些工作，形势就改变了。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违背我们自己说过的话。我们曾经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声明：“只要非常法存在，我们决不和你们谈判！先埋葬这个法令，给我们发挥合法作用的可能性！那时即使我们不愿意相信你们有进行某些改良的能力，我们也愿意多少相信你们有这个打算。但是要先取消非常法！”后来我们在国会和许多场合也重申过这一声明。现在，非常法取消了，连带着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征兆，说明观点开始改变了，也出现了转机的微弱迹象。难道我们现在想说：我们过去讲过的一切话都不是认真的，取消非常法状态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和毫无价值的。或许我们要说：由于我们没有在头一年内立即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的，因此我们就失去耐心，重新退回到轻松的否定态度上去了。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必然会损害我们作为严肃的政党、作为德国社会生活中的力量因素的威望。

一方面，出现了上述的政治形势，重新获得了普通法的阵地，从前的无条件抵抗已经失败，有了从事有利于工人的某些工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党的巨大规模，它在千百万人民中的拥护者，我们在国会里的代表的人数，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从议会政治这个已经得到承认的事实引出必要的结论。谁也不可能想到放弃我们的任何一点原则，不如说，在执行我们的实际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念念不忘：这样做只是向伟大的目标接近了一小步。未来的希望使我们力量倍增，高瞻远瞩，但是对于未来的希望不能压倒对于现在的希望，不如说，它正是必然要激励对于现在的希望。在荆棘丛生的漫长道路上走向遥远的尽头的旅行者，不能光靠远方朦胧可见的、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力，否则他们远在到达之前就会饿死或憔悴而死。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忽视总的

目标的情况下，重新从时间上无限的目标走向直接的目标，从绝对的事物走向实在的事物，必须除了提出长远纲领之外，还提出为最近时期规定的工作纲领，必须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符合各个时期的最迫切的需要、本身又有实现的最大可能性的一些个别要求上去。然后必须运用我们的鼓动工作的全部力量，我们的论证和说服工作，我们的谈判的灵活性和坚韧性以及我们的全部社会影响来支持这些要求。人们只注意和尊重强者，所以我们不能放下我们至今使用的武器。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武器仍然是我们唯一的保障。但是我们用不着任何时候都徒劳无益地拿着这些武器大叫大喊。一个野蛮人以为，只要他乱舞长矛进行威胁，并且做出吓人的动作，敌人就会害怕；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即使把枪枝放在脚下，也给自己和别人以强者的印象！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在6月1日指出了应当首先争取实现的要求：1. 继续实行劳工保护，特别是标准工作日；2. 争取全国范围的真正的结社自由，给职业工会以联合的权利，制定反对企业主侵犯结社权的保护法；3. 排除对工资斗争的任何方式的阻碍；4. 国家干预“瑞恩”的建立；5. 取消粮食税。

是不是有人知道还有一些要求更为紧迫，同时又在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呢？我看未必。但是如果有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些要求补充到已经举出的要求中去，只不过必须提醒大家，不要同时提出过多的问题，因为数量多了，份量也就随之减轻了。但是我要问：你们当中有谁认为，全部或部分地实现这些要求对于德国劳动人民是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意义的吗？难道不是宁可说，实现这些要求会改善千百万人的处境，加强他们肉体和精神的力量去为继续争取改良而努力吗？人民为达到这些要求难道不会比为听到最强有力的言词和最美好的未来图景而更加感谢我们吗？我也相信未来，那时，今天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的社会的各种彼此冲突的利

益将溶化在人类利益的更高的统一之中；我也相信，当人类一登上未来这个高度，并从那里俯瞰时，我们今天迈出的这些小步子将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从高处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并不因此在现实中就是微不足道的。最主要的是，人们不会由于憧憬未来的生活而忘记现在生活的痛苦——连基督教也不得不体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竟无知到要尝试一下的话，我们也肯定会有同样的体会。

我重申：我在6月1日集会上所讲的，并不是人们从未听到过的、党内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并不是同党的本质格格不入的东西。我所推荐的策略自从非常状态结束以来已经多次在国会内外实行了。但是针对这个策略出现了几次反动，这部分地可以用刚过去不久的情况来解释，部分地则是由于这种不满：走这条发挥建设性作用和进行建设性谈判的道路，竟需要如此之多的耐心和琐碎工作，得到的成果与我们的愿望相比又显得如此之小。由此就必然屡次产生某些动摇和模糊认识，它们终究必然会发生有害的影响。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党不应当让变化不定的感情左右自己的行动，从而使自己有被事件推着走的危险。相反，它不仅必须预先周密地考虑目标，而且还必须预先周密地考虑应当采取什么道路通向这个目标，估计到它的决定的全部后果，并且承担这些后果的责任。提醒这一点，加以说明，坚持一条坚定的行动路线，——这就是我那次引起许多评论的演说的目的。

对一个社会党人来说，可以有**两种做法**：采取把自己说成唯一革命的**绝对化策略**，它超越平凡的现实中的一切小事情，只想一举取得全部成就；或者采取进行**政治改良活动的策略**，它力争用唯一可能的、即取得实际的局部成就的方法达到目标。后一种策略立足于广阔的、但是因此却更为可靠的现实基础之上，前一种则是凭空制定一条理想的路线，这条路线当然捷近得多，理想得多，但是因此却更加行不通。我是赞成后一种策略的，而且我在走上这条

选定的道路以后，不会一碰到拦路石就踌躇不前，或者怀疑自己是否最好还是飞到天上去，而是要精神抖擞地前进——眼睛牢牢盯住远处的目标，坚定有力而又小心谨慎地前进。

如果那些以为双脚一跳就能进入完整的未来国家的人因此责备我，那么我只想说明，他们的策略理所当然地会导致在政治上完全弃权的政策，从而完全脱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这些人根本不当进行辩论，而是应当去磨刀，磨的时候还要留神别割了自己。但是还有另一些人以为自己可以反对我的意见，他们却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多年来常常说的话和做的事。难道公开地、明确地说出这些，并且要求顺理成章地贯彻实际上选定了的政策，竟会使他们感到恼火吗？

但是我受到攻击并不仅仅由于我关于国内政策的言论，还由于我的那些涉及**对外政策**的言论。在这里，更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人们竟把我的这些见解说成似乎仅仅是我个人的，并且表示“坚决反对”。这不能不使我极为惊讶，因为6月1日我就对外政策阐发的观点没有一点不是我们党的代表们多年来在各种正式场合、首先是在国会发表过的观点。

我是围绕着五个问题进行阐述的，这五点尤其在法国许多政党的报刊上引起了轰动。我把它们简短地逐字复述如下：

在1870年至1871年间，“如果能自由选择的话，我们本来肯定可以使**德国的统一**成为另外一种样子。但是现在既然德国的统一已经成为这种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无尽无休地、无结果地讨论过去的事情上，而应该立足于事实，把我们的心思放到努力改正这一事业的缺点上来。”^①外国看到这一段话的某几句是不高兴的，因为人们在其中发现了对于

^① 参见本书第138页。——编者注

民族统一的关心和对于实际存在的法律状态的承认。这一方面人们看得完全对。难道我们对本民族统一成一个共同的国家会不关心吗？相反，我们希望德意志的统一（完全撇开它的内在缺点不谈）比它今天的情况更加广泛，我们不止一次地在国会讲到过这一点，并且表示承认历史的既成事实，最近奥艾尔还在1891年2月9日讲了一次，他甚至特别就最碰不得的问题说：“对亚尔萨斯-洛林的合并完成了。我们曾经在这个议会里毫不含糊地声明，今天我们承认现存的法律状态。”

“如果说，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向来和在困难的情况下都履行了或者愿意履行国际友好的各种义务，那就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也有民族的任务和义务。”^①1890年10月15日李卜克内西在哈雷党代表大会上几乎用同样的词句说过这番话“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洋溢着多么热烈的国际主义思想，都不会说我们没有民族的义务”。

“在法国我们有社会主义的朋友，他们反对推行沙文主义，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既然那个国家的当权者推行危险的沙文主义，并从沙文主义出发令人作呕向俄国沙皇献媚，因而应为欧洲的不安宁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承担许多罪责，那么为什么否认这一点呢？”^②让我们把这段话同倍倍尔1890年6月25日在国会会议上讲的那番话作一个比较：“我深信，无论是社会的最上层，还是其他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企图把德国推进一场任何方式的战争。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在这方面是处于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之下的。在法国（人们可以谴责我的这一说法，也可以表示遗憾，但事实是不容抹杀的），广大阶层、而且是统治阶层，都一如既往地想重新消除1870至1871年战争的成果……从这样的动机产生了

① 参见本书第139页。——编者注

② 参见本书第140页。——编者注

今天俄法之间存在的同盟。不管这个同盟是否已在书面上缔结，反正它是由于两国在反对德国方面利益一致而存在、而实现的。”

“我们对外交和它的成果很不信任，这一点是完全确实无疑的。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为**三国同盟**辩护，因为它的倾向无疑是为了维护和平，因而相对来说，这是一件好事。”^① 倍倍尔在1890年6月25日的同一篇国会演说中也承认，三国同盟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用于维护和平的一种手段，他说：“如果成功地实现了三国同盟……那么这个同盟之所以会实现，正是因为，针对法国和俄国结成同盟的意图，三国的利益必须是一致的，不管三国的人民在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我深信，只要这种局面保持下去，无论在奥国，还是在意大利，或者在德国，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会想到摆脱这个同盟，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万一另外两个盟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打败，他就会使自己的祖国遭到战争和毁灭的危险。”

“如果任何时候在外国的任何地方曾经有人希望，在**德国遭到进攻的时候**，侵略者能够指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这种希望将完全落空。一旦我们的国家遭到外来的进攻，那时就只有一个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履行我们的义务绝不落人之后。”^② 我本来觉得没有必要提出什么证据来证明我的这句话并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东西，在社会民主党内人们实际上就是这么考虑的。但是，我也可以荣幸地在这里援引议会党团发表的内容相同的声明。1890年12月3日奥艾尔这样说：“我们已经声明过，并且我也可以声明，我们准备象所有别的公民一样，为祖国尽完全同样的义务……我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这一方面有别的想法。” 其次1891年5月16日李卜克内西说：“有人声称……德国国会不象法国议会那样热

① 参见本书第138页。——编者注

② 参见本书第140页。——编者注

情地关心保卫祖国。现在，我愿意说，在保卫祖国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党都是一致的；如果需要抵御外来之敌的话，任何一个党都不会落在后面。”在1888年11月28日的国会会议上，李卜克内西的话还要明确，并且更加能够说明事态的特点，他说：“法国和俄国那边的反对德意志统一的敌人所害怕的，是一个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的德国民族。在这一方面（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担保），我们，还有我个人，已经使有影响的法国政治家们消除任何怀疑（如果曾经有怀疑的话）：如果法国进攻，你们不能指望德国任何一个政党的帮助，那时全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有义务、并且准备奔赴前线抵抗侵略者。”在这里，是矛盾呢，还是一致呢？我想，谁只要还能够作出判断，谁就不会长久怀疑的。

我要说明，我引用上述同志的话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和我一致，这不是为了以此来保护我自己。在慕尼黑，人们都知道，我向来是有足够的力量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的，哪怕我因此会陷于孤立。不过我想指出，让自己承受从外国来的压力就加倍不合适了。有些人自己的演说在一切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他们却突然“反对”我的那些观点了，这怎么行呢？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了吗？要不就是，因为外国有一些人对这感到不满，现在提起这一点就不“合时宜”了吗？不管怎样，我从现在流行的针对我的做法中只能进一步看到这样的证据：好些问题是动摇不定的，必须把它们确定下来。

尤其在巴黎——无论是在敌人的营垒里还是在可惜相当小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营垒里——有人这样描述我的演说，似乎这是一篇正式的鼓吹战争的演说，并且意味着社会党人转入“沙文主义”的营垒。这样说太愚蠢了，这证明说这番话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居心不良。全世界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存在之日起就不仅在口头上宣告国际友好，而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实行了这一主

张。不过除了我们的这个理想，我们也还必须考虑到当前的现实情况。但是很遗憾，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战争绝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对这场战争是进攻战还是保卫战都漠不关心吗？即使有人打算完全不考虑民族的义务，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无疑也一定会对希望看到和平破裂的那些人起真正的鼓励作用。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让外国的沙文主义者和复仇主义政治家知道，他们对于和平的侵犯也将使社会民主党站到保卫和平的阵营里，那么我们正是在最大程度上为和平效力。

现在，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发表对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结盟政策的看法。我愿意立刻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国际友好是建立在双方互惠的基础上的，但是正是最近一个时期，对我的演说最为恼火的那个方面，即法国的统治阶层，很遗憾，还有巴黎的某些社会党人，丝毫没有履行国际友好的义务。由于三国同盟的恢复（大家知道，同意大利的同盟刚刚恢复，并且恢复这个同盟也绝不是理想的维护和平的工具，但在现在的情况下仍然得承认是一个这样的工具），由于这种情况，几年来巴黎方面已经用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进行了煽动。这种反对三国同盟的煽动不是为和平效力，而只会激励暴徒和复仇主义政治家的希望，可惜的是，法国的社会党人也参加了这种煽动。对了，有人甚至试图在民主、民族和睦和社会主义的漂亮招牌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架在法国复仇主义者和意大利领土收复派的车子上。我一直在注视这个诡计，并且不止一次警告过你们不要上当。例如1889年举行著名的米兰“和平友好代表大会”时，该会的一些发起人就曾经令人遗憾地滥用了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名字。还有拉丁语系国家同盟这个一再出现的诡计，得到巴黎方面支持的意大利人向巴黎等地朝圣的事件，为了能够争取工人和社会党人，巴黎市议会的社会党议员参加了这一事件的领导，巴黎市议会也派人在最近

的米兰“劳工立法代表大会”上再次起这样的作用。意大利工人起初为了这些绝非社会主义的目标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可是现在他们早已声明，他们同煽动者毫无共同之处。关于法国的某些社会主义者如何理解他们向我们要求的国际友好，事实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前几天法国议会的十六名社会党议员公开向拼命反对三国同盟的意大利（非社会主义的）激进派和领土收复派、造谣生事的卡瓦洛蒂和公开挑动对奥国战争的因布里阿尼表示对他们的行动的祝贺。

对这样的活动绝不能以沉默表示软弱，而必须强有力地加以反对，必须说，谁以国际主义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肯定始终会在我们这里遇到同样的思想，并将得到我们最有力的支持。但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沙文主义，反对任何打算或者力图妨碍和平的政策，不仅要在德国反对，而且要在外国反对。那些知道这样的政策不是自己的过错的外国社会党人绝不会在我6月1日的讲话里看到什么威胁；不过对另一些人来说，但愿它是一个有益的警告！

令人遗憾的是，连一些本地的同志也由于巴黎和柏林的喧嚷忙乱以及报刊上的议论而把自己搞得神经衰弱。他们邀请部分同志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作出一项决议，它的出发点是想尽可能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左右逢迎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正因如此必然是适得其反。他们一致对我表示信任，“不过”还表示这么个希望：要我放弃我“对政府的信任”。可是我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有表示过这项决议所说的那种信任。我的全部信任在于：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所有对手都是恶意的，而是相信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有善良的愿望，并且认为我们通过加以鼓励和通过反对敌对的利益的斗争来促使这些善良愿望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我重申：我们的任务是，哪里表现出一种善意，就承认它，加强它，克

服阻挠它的坏影响，争取舆论，向政府指出必须同为了少数人利益的政策决裂，转而实行一种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并且依靠他们的政策，但同时坚持不懈地做继续发展工人运动这个政治力量因素的工作，因为一切政策实质上是一个力量问题，一个人只能依靠实际力量的支持，才有希望实现他的一些要求。

我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措辞无论对事情还是对我本人，都是出自最善良、最友好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被曲解了，似乎这不过是夹着甜言蜜语的谴责，并且因此提供了继续攻击我的机会。这使我有理由参加这场辩论，因为我必须向我的同志们和选民们把问题讲清楚。

由我的演说引起的这场讨论对我们党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在这场讨论是对事不对人，是依靠严肃的说理而不是先入为主时，它才能够起弄清问题和促进发展的作用。在这种讨论中，那些正式的声明从来不能要求具有它们本身固有的实在价值以外的任何价值。关于党的问题，应由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当然可以保留坚持自己的信念的权利。

但是你们必须对你们的代表保持信任（如果要他在这件事情上和以往一样起有益作用的话），不是半心半意的、有条件的信任，而是完完全全的信任。如果你们没有这种信任，请在这里坦白地向我声明一下，我会懂得应当由此得出什么结论的。如果你们愿意要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没有主见的、一阵风来就或左或右摇摆不定的、在任何矛盾面前都惊慌失措的懦夫，那么我不是你们所希望的人！但是如果你们不想要这样的人，而是要一位能够坚持和捍卫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信念的人，那么我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属于你们！（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36—161页。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 代表大会的发言(摘录)

(1891年10月17日)

昨天晚上倍倍尔向我们详细地叙述了党的发展和党对它成立三十年来有争论的事情的看法。这一长期发展的连贯性曾经由于大家所知道的反社会党人法而暂时中断。去年反社会党人法出乎意料地被废除了。去年党内大多数人同柏林反对派之间发生的争论在哈雷党代表大会上结束了，人们在那场争论中是很善于对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一问题作出评价的。我要提到，当时经常有人特别喜欢并颇有道理地重复说：这条法令不过是废除一下试试看，他们等我们一做蠢事就不仅要用这个武器，而且要搬出更厉害的武器来对付我们。我们大家当时都要求谨慎从事，再三要求谨慎从事，例如在五一节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而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了较长的时间以后，我们忽然听到有人说：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实际上毫无意义，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继续这样说是不对的，不仅从实际上来看是这样。那些人同从前的执政者相反，明智地放下了一种甚至已变得有害于他们自己的武器，我们绝不需要大大感谢他们，也绝不需要对采取所谓新方针的新政府犯下的极其大量的错误故意视而不见和加以掩饰。他们开头做得比较好，很快就又极其可悲地倒退了（我是激烈反对这种倒退的），这种在二者之间来回摇摆的非常不坚定的态度，可以用俾斯麦留下的业绩来解释，同时也是由于害怕在有权势

的人中间占支配地位的俾斯麦派反对党。无论如何，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同俾斯麦的下台是属于同样性质的事件，它们从一个方面来说至少是一个转折点。俾斯麦在他同新闻记者的多次谈话中，尤其是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最清楚最直率地承认：他认为，社会问题不仅需要战场上、街道上或者“通过军事道路”来解决，而且他曾经自觉地、巧妙地、为尽快实现这种军事解决而努力。——从前我们总是这样说他，而他当时自然是否认的——而且他公然以无与伦比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表示：如果不是半途而废，那样一件大规模的放血是会对现代国家的全部机体有益的。这种露骨的、有计划的血腥政策必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导致国内战争，如果不是社会民主党冷静、清醒和有纪律的话，这场战争恐怕就爆发了。这种血腥政策取消了，虽然笼罩着的紧张气氛并没有因此消除，而且也不可能消除，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因为至少今天毕竟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使我们党的发展和社会情况的发展可以不那么急迫了。我认为，如果我们说即使变化不大，但无论如何有了变化，那么这不会有损于我们，而且在公众面前只能对我们有利。同时，我们在去年大致这个时候成了一个大党。我们的党和过去不一样，成为帝国的一个强大因素，这一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此外，我们有了直接施加影响的可能，我们不再只是对一小部分居民而是对数百万居民进行领导并且为对这一领导负责，这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些事实必定也要在我们的立场、行动和我们的全部策略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去年柏林反对派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不仅应当继续在反社会党人法表现得最严酷的时候那样说话和行动，而且也必须回到运动的青年时期。他们特别喜欢找出党最早期的、我们研究抽象概念比研究它们在实际情况方面的运用还多得多的那个时期的著作。一言以蔽之，柏林反对派认为，可以把党幼年时期的准则和行为搬到党的成年时

期来用。党当时正确地一致驳斥了这种没有道理的要求。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有理由认为，维护人民眼前的、日常的需要特别有助于我们争取群众，并且我很高兴地看到，昨天倍倍尔的一个类似的意见博得了你们的赞同。倍倍尔去年在哈雷说得很对，他说：人民不会从那种不知何时到来的未来理想受到鼓舞，广大人民要求具体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有可能得到的东西。倍倍尔在哈雷还针对威纳尔说过：如果劳工保护和我们从那时以来所从事的一系列眼前的、迫切的改良是次要问题，那么我们至今十分之九的宣传和活动就完全是多余的了。只有头脑混乱不清的人才会产生这种看法。来自党内大部分的补充提案和修改提案是针对我们党的纲领的“实践要求”部分的，正是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人们对于这部分多么重视。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断出现同上述情况针锋相对的反应。我们一有机会就可以一百次地、一千次地听到不只是由“青年派”发表的下述言论：在今天的情况下实在争取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东西是转瞬即逝的，纲领的第二部分只是一种装饰品。所有这些看法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这句有名的话：或许在我们纲领第二部分中的一个要求都还没有实现之前，我们就会先得到完整的未来社会了。倍倍尔昨天又在这一系列异议以外增加了一个，而这一个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他或者是有意地或者是由于在发言时激动起来而这样说：我们在国会提出我们的提案，这些提案是否被接受，这对我们来说完全无所谓，问题在于对现状加以批判。不对，我完全不这样看，也有许多人这样看。如果我们提出民主方面的要求，例如标准工作日，它是否被接受对于我们来说完全不是无所谓的（非常正确！）相反，我们倒是希望提案能够被采纳，否则我们在议会外面就会处于言行极不一致的情况，因为人们会说，他们只不过为了炫耀自己而提出一些要求，却并不想认真对待这些要求。如果这些异议不得到克

服，它们必然会造成言行不一的情况。

我认为（我要同柏林反对派的先生们截然相反地这样说，虽然这一来我会陷入对统治阶层的意图和能力的“幻想”），今天逐步进行的改良尽管很少，但确实是可能的，我们的力量越发展成长，这种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我同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一样，绝对认为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扩大政治力量。至于说在采取这种政治行动的时候不应忘记党的最终目的，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谁需要谈论呢？难道我们在每次发言的时候除了反复背诵陈旧的教义手册之外不能做得比这更好吗？此外，请读一读我的发言，为慎重起见，我每次都特地补充说：至少不要在心目中忘记总目标。但是除了这一总目标或者说遥远的目标外，还有一个较近的阶段；对于我来说，主要的任务是促使人民最直接的需要和最迫切的要求得到实现，不仅是因为这具有重大的宣传价值，具有争取群众的巨大力量，而且还因为我确信，这种逐步的前进，逐步的社会化是依据自然规律确定下来的不断向前过渡的道路。这样确定下来的是平静的、合法的活动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议会活动的道路，因为随着人民意向的变化，在议会里，在国会中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也绝不象有的人那样期望议会出奇迹。我根本不期望任何事情会造成奇迹。反对派谴责过李卜克内西同志，说他曾经说过：一切都能够通过议会来实现。对此李卜克内西反驳说，他无论如何还同时说过一个“但是”。当然是这样的。不过应当按照这句话的正确意义来对它表示赞同。我无论如何是赞成它的。我认为，因为我们必须走这条道路，所以不断反对代议制、反对议会是极其愚蠢的，而特别是柏林反对派的机关报即《人民论坛报》还在继续干这种蠢事。相反，在德国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加强议会制——自然，我们是怀着争取议会制为我们所用的希望来这样做的。在这里，在议会里的行动要看当时怎样有利，有时必须激烈

地干预，有时必须起阻止和拖延作用，这要由当时的情况来确定。

我现在来谈谈我在慕尼黑的演说^①。许多报刊曾认为，我在慕尼黑的第一次演说既不新鲜，又无创见。而倍倍尔却竭力把它说成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他在昨天发言以前，已经在最近一期《新时代》上把我描述成这样，说我的发言的目的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要求上。尊重良好的愿望是正确的，我尊重各个方面的良好愿望，不只是党内的，还有我的敌人方面的。至于把党的力量集中在最迫切的和最重要之点上，倍倍尔把这称为“刹车”和“集中后撤”。据说我说过：永远慢慢地前进！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很漂亮而且很有气派的宣传口号。但是它象几乎所有的口号一样同实际情况不相符。倍倍尔常常研究军事问题（喊声：好极了！），他应该非常精确地懂得集中同集中后撤这两个概念有天壤之别。我并不想拖延，而是想阻止我们因为遵循一种策略（在当前的形势下这种策略还不存在，但如果不澄清问题它也能够形成），因为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而招致失败并从而最终引起倒退。倍倍尔在柏林的几次大会上一再指出，对于我们党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错误地估计我们的力量（倍倍尔：是指低估我们的力量！），也指过高地估计我们的力量，这是当时的看法，因为柏林反对派对我们革命力量的估计同我们完全不同，比我们的估计高得多。去年李卜克内西做得对，他给那些错误估计我们力量的人泼了一瓢冷水，他说：我们还远远不是多数，百分之二十的人赞成我们，百分之八十的人反对我们。要这百分之八十受我们支配，是愚蠢的，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甚至不允许提出这个要求，我们能够做的是，设法把这百分之八十持久地吸引到我们这边来。

^① 参见本书第132—160页。

倍倍尔同志在《新时代》上说：如果他必须在踌躇、延宕和冲锋之间进行选择，那他将声明永远赞成冲锋。我们生活在一切斗争手段都发展得如此精巧的时代（不仅在物质武器的技术方面，而且一般说来在党的斗争方面也是如此），以致于单凭冲锋通常已得不到多大成就了，顶多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倍倍尔认为，如果我的策略得到贯彻，我们将落到搞些可怜的改良的地步。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我建议的那样去做，就会放弃长远的目标，即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如果人们把今天可以争取到的个别改良说成似乎就是一切，那么这些改良就是倒行逆施。如果今天这些改良会导致同今天的社会的最终和解，那么工人状况和人民状况在今天条件下的提高无疑就是放弃我们最终的基本原则，放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但如果这种情况可能出现，那么错误不在于我或者在于支持这种策略的人，而在于社会主义本身，因为社会主义就其最深刻的基础来说是建立在根本不可能同现今社会取得和解的基础之上的。不，任何这种可能的做法和它最终的成就丝毫不会损害最终目的，而不如说会使它离我们更近。

倍倍尔曾经以最有效的方式评论过这种策略。他认为，我的策略，亦即我提出的五点要求，会导致腐化——为了避免误解，我想在这里立即说明：我不是把它们看作我们的目的，看作我们唯一的斗争目标，如果有一点实现了，我们能够补充提出其他的要求。我对腐化这个词并不介意，因为这是无根据的或者是无意义的。我只是为了在这里替柏林反对派说句好话才引用它的。这几天里，对柏林反对派说了那么多不客气的和厉害的话（大部分固然有道理），如果也有人说句公道话，那也很不错。我必须要说：撇开直接的人身攻击和诽谤等等不谈（反对派把对他们的谴责说成这样，其余的我们下面就会看到），我绝不想把他们在实质性方面说过的并

且受到人们严厉谴责的那些话说成是大逆不道的。你们知道，我最不愿意在柏林人面前表白我的特别的善意。我确实曾被称为叛徒、部长候选人等等，这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来是再严酷不过的责骂了。对此我毫不介意。如果我良心上的安宁、我的政治荣誉和社会地位要受到一次在夜间十一点半召集的大会作出的决议的影响，那我会感到遗憾。（活跃。）尽管我不习惯于温和地对待我的敌手，但随着党的扩大，观点上也越来越有分歧，而且我们将不能长久地维持象以往那样严格的纪律，因此我们将不得不主要地限于要求每一个受到中伤和攻击的人都相信：时间久了谎言就要被揭穿，真理终将在他手里。我在这里提到这件事的目的，在于表明，有人可以轻易地使用象腐化、堕落这样的词儿。倍倍尔对我的原则立场是再了解不过的了，此外他还知道，这五点的基本内容的确包含在我们的纲领本身中，它们实际上体现了当前迫切的主要任务，请问，如果他针对我说，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点上就要导致腐化，那么他怎么要由于柏林反对派使用了同样的说法而谴责他们呢？（反对派中发出赞同声。）

如果倍倍尔认为这种政策导致腐化，那他只需查阅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这本书里，马克思用和他往常迥然不同的语言十分欢欣鼓舞地谈到英国实行标准工作日的的作用，他说：英国工业无产阶级体力和精神的复活是随同工厂法的生效而一同出现的。^①我想，既然英国当时是这样，如果我们尽可能认真地进行这方面的斗争，也就是进行争取标准工作日的斗争，并且不要说，我们为此而努力，但是否能够做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那么这样的确不会导致腐化。

倍倍尔在《新时代》上那篇文章中认为，我发表那篇演说的时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8页。——编者注

机是极其不利的。他说：现在到了大家团结起来，使我们的形势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的时刻，立即取得伟大成就的前景已经在望。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怀着胜利的喜悦说：今后我们还能指望取得更多的胜利。这就是问题的核心，这比今夏我们的争论重要得多。最近，各方面的人，尤其是我的朋友倍倍尔不断地越来越多地并且以日益高涨的热情向公众演讲说：我们最终希望的目的现在已出乎意料地近在我们的眼前。他昨天说：这个厅里恐怕只有少数人看不见这一目的得到实现。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这场大战中旧社会将流尽最后一滴血，于是发生破产、灾难和大崩溃。（活跃。）作预言在党内现在已成了时髦（活跃），首先是伦敦方面确定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为1898年，何月何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党内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这是这一年太远了，他们说有可能是1893年，或许1892年就行了。（活跃。）

.....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1 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 179—185 页。

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统治下的 国家社会主义* (摘录)

(1892年6月)

您询问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尤其关于前任帝国首相和当今皇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有什么看法。我的工作使我不能满足您的愿望，不能为您提供“经过深入研究的”成果，固然这些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我不得不只好随便写几点意见给您寄去，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认为，如果想对国家社会主义作出充分的评价，必须把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同它目前所采取的形态区别开来。

如果非常笼统地看问题，可以把国家社会主义理解成这样的基本原则：现存的国家不仅是一种具有政治目的的组织，而且它的主权也延伸到全部经济领域，因此，国家不仅有权调节工人同企业主之间的全部关系，而且有权把任何部分的商品生产纳入国家的总的领导之下或者甚至由国家直接经营。从这种最广泛的意义来

* 1892年初，法国新闻记者布瓦埃请福尔马尔为计划中的一本文集撰写一篇文章，谈谈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福尔马尔寄给他一篇用德文写的短文，并让出版者请人翻译出来。他的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6月18日出版的著名的法国杂志《政治和文学评论》（通常被人称为《蓝皮评论》）上，并且立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十分激烈的争论。福尔马尔于1892年8月发表了文章的最初的德文文本。一次是作为单行本《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部分，另一次则以《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国家社会主义》为题登载在《社会》杂志上。——编者注

说，国家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仅仅在这一问题上有区别：国家应当如何行使原则上属于它的权利，也就是说，应当用什么思想来领导国家和由谁来领导国家？这个问题的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只要从以下一点来看就已经是这样了：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大多是保守分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是民主主义者。但是最终用什么思想来解决这种意见分歧，凡认识到国家政权的不断发展的民主化是不可阻挡的人，都不会对这个问题产生疑问。所以我也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理由特别起劲地去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本身。相反，我们将力求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逐步为建立一个较好的社会组织开辟道路并将最终与别人共同决定，哪些措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社会主义的。1891年在爱尔福特制定新党纲的时候，草案中原有的专门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条被删掉了，对此这种考虑也起了一份作用。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没有受到任何方面的怀疑，而且德国形势的发展早就消除了任何可能利用国家社会主义来为强权政治目的服务的危险，因此删去这一条也就更加不必担心了。

当时的帝国首相俾斯麦采取了国家社会主义，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继续不断的高涨有力地证明，以前采取的反对它的措施完全无效。但是俾斯麦根本不把国家社会主义理解成一种可以真正改善不正常的社会状况的手段并加以运用。不管俾斯麦在别的方面具有多大的聪明才智，但要说认识社会关系的发展规律，他甚至缺乏起码的知识。他是精通统治艺术的统治者，他无所顾忌地运用了这一艺术，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他对内对外都曾征服者和统治者，他操纵皇帝、支配各邦诸侯、贵族，尤其是控制了资产阶级，在他的统治下，这个阶级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力量就让位了。在俾斯麦所进行的斗争中，只有两场斗争不是以征服敌人而告终的，这就是反对当时人们所说的“黑色国

际^①和红色国际”的斗争，这两场斗争说明，这位赫赫有名的国家活动家固然擅长运用物质的力量手段，但对于认识各种的思想流派却不在行。

他不得不在向罗马进军的归途中经过卡诺萨，尽管他无需长时间地站在那个城堡的院子里。^②由于他错误地进行了“文化斗争”，他才使德国的教权至上主义发挥了目前它所具有的那种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一方由于和解和此后与当局的友好交往，其地位和性质自然也并非原封不动，而是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害，这种损害正在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俾斯麦反对社会主义却始终一无成就，这对他来说是最不可理解和最不能容忍的。国内那些最穷困和最无权的人——挨饿的裁缝和鞋匠连同一些愤世的文人，在外交界的行家看来这些人在任何时候都纯粹是“微不足道的量”——难道竟敢干涉公共事务、竟敢反抗他吗？而他，这个对各邦和王侯发号施令、决定他们的命运的人，难道要向这些“贱民”让步吗？不可能！于是他便通过一切可供使用的手段，即通过流血的或不流血的暴力，同时也要弄一点欺骗和诡计，来大力反对和摧毁社会主义。于是他便实行了1878年那项严酷的非常法，同时还采用了人们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改良的制度。要打倒社会民主党，用一种穿着白色工作服^③的社会主义来取代社会民主党。如果工人们不再听从其他任何人的话，他们最终或许会相信政府的诺言并被拴在俾斯麦的马车上，这样就可以同时既使无产阶级又使资产阶级基本上成为无

① 指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反对的天主教会。——编者注

② 这里是讽喻俾斯麦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出了巨大让步。这种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毫无结果。——编者注

③ 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大家这样称呼那些伪装的“工人”。政府雇用这些工人为自己制造舆论，因为他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人民是站在帝国一边的。——福尔马尔注

害的了。但俾斯麦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算对于经济状况加以整顿。这自然完全不是出于对工人的关心，也不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确切地说，国家社会主义对他是一种更有效的束缚人民的手段，一种纯粹追求财政目的和政治目的的国有化体制，它使由上面领导的国家取代私人企业主的地位，并使经济支配的权力和政治统治的权力合而为一。

这种政策的后果大家是知道的。如果是在十年前，在德国工人运动还是很不发达的时候采取这种政策，那么政府嘴上的那些社会主义词句和种种保险法一定会使工人感到惊讶，并可能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推迟一个时期。但情况却是，俾斯麦的社会政策除了公开表明连最强大的政府对于社会主义也是无能为力以外，未能产生任何结果。此外，俾斯麦的力量还不足以彻底破坏党的组织及其对人心的影响，这对德国以及或许对其他各国说来也是一件好事（完全撇开纯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谈）。否则既存在那样一种令人气愤的残暴的高压政策，就几乎不会不遇到一场暴力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是没有希望的，却会引起种种复杂的情况。

但是，众所周知，俾斯麦取得的成就无非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促进了党的发展。因为在要毁灭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存在十二年后被废除时，社会民主党增加了整整一百万选民，从而从数字上讲已成为帝国最强大的党，成为头等的政治力量因素。

现在每个有头脑的人一定都已认识到，一个如此具有生命力的运动是有它牢固的基础的，今后对它必须认真加以对待。但是俾斯麦却只知道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表明过去暴力使用得不够，那就还需要更多地使用它。此后他曾公开承认：他曾考虑“用军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并且“只要我们还有权”就要尽快这样做。但幸好这个博爱的人没有来得及实行他的肮脏的计划。年轻的皇帝——不管他在其他方面的看法怎样——并没有兴趣为满足俾斯

麦的强烈愿望而蓄意触发一次结局无法预测的雪崩。俾斯麦本来想搞垮社会主义，但他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社会主义而垮台了。

威廉皇帝公布了1890年的选举法，召开了柏林会议，免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干预了威斯特伐利亚的矿工运动，如此等等，现在各地尤其是外国都有人从这种行动中得出一个结论，您是这样表述这个结论的：“皇帝施恩于社会主义”。但这是很错误的。

前任帝国首相在弗里德里希斯鲁^①发表了几次有强烈报复心的演说，其中有一次暗示，皇帝的目的仅仅是捞取选票。我个人愿意比这个“勃兰登堡的忠实臣仆”想得好一些。帝国元首肯定也想对整个公众舆论、尤其是对选票施加影响；但同时这无疑也是从一种恰当的、实际的观点出发的。从他那段时间的一系列言论可以看出，事实上他所持的并不是绝对反对工人的任何一项要求的态度。他承认大量的抱怨是有正当理由的；他承认工人有权争取从日益增长的国民财富中得到尽可能多的份额；他宣告国家在生产方面除了保证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外，还有其他的利益；他愿意保护劳动使它不受无限制的剥削；如此等等。所以皇帝的上述行动无疑也有一点是出于好意，这在他那种地位来说是新鲜的，因此必然引人注目。

威廉二世有一次在他的演说中甚至把自己称为“现代的人”，上述那些观点事实上也使他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是这样的。但除了这种现代的特色外，这位年轻皇帝的本质又显示出一系列属于早已消逝了的过去时代的东西，并且——撇开别的不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浪漫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现实主义的时代可能造成灾难。

这位年轻的君主曾对工人说：“你们有权谋求社会改良，但这

① 普鲁土地名，为俾斯麦的领地。——编者注

种改良只能来自上层。把你们的事情托付给我罢，我最清楚什么对你们有益，而且唯独我有权帮助你们。”这种言论到处都听到过。撇开那些把对下层人民的甜言蜜语作为权宜之计来利用的政府不说，各个时期都曾有人考虑，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民的物质状况以提高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但是对一些如此考虑的统治者来说这纯粹是一种冷静的盘算，而在威廉二世那里却显然同他的整个人生观有密切的联系。现在的帝国元首具有绝对专制的性格，在这种性格里，对于实行统治的必要性信念，尤其是对于他本身的实行统治的天职的那种自觉性发展到了最大限度。柏林的政界普遍强调，威廉二世把统治天职和统治才能看作神性的直接表现，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但“国王的意志是最高法律”这句名言绝非单纯的夸口，这一点无论如何是确凿无疑的。威廉二世坚信，他有权、也有能力不只是一般地领导，而是在公众生活的一切领域提供动力，树立榜样和作出最高裁决。但是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同时又接受了某些在其他人看来是直接否定那种中世纪思想范畴的现代观点。然而皇帝相信，完全能够把当代的动力置于他的专制体制之下，能够使君主制——不是那种通过人民代表机构的影响逐步受到限制的君主制，而是实际的、强大的个人专制，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不仅治理，而且统治——同时代的新需要、新思想和新要求相结合，甚至第一次赋予君主制以正确的形式和真正的内容。

无疑威廉曾考虑过建立“社会王国”。他曾经指出，他的祖先维护平民反对贵族，抑制过后者的掠夺欲和权力欲，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指当今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关系。布兰登堡的边疆伯没有废除贵族，而是约束他们，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国家制度。贵族们不得再随心所欲地、不受君主的制约去奴役人民，而是作为君主的军官按照一定的规章进行指挥。威

廉对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应当建立的关系曾作过类似的设想。资本置国家于不顾并凌驾于国家之上而拥有权力，这首先是同他的军事思想相违背的；资本只能在获得国家准许的情况下，以国家的名义和按照国家的规定行使权力。不应使工人受到资本随心所欲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不应当奢侈，但吃穿住都得象个样子，也得时常享受适当的娱乐。也应允许他们对他们长官的专横行为有某种控告权。为此，他们应当更加无条件地服从和信赖那个最高司令官，他们的命运已经托付给他了……

但不言而喻，这种社会理想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他们尽管要求国家进行干预，为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状况作准备，但同时又依据社会改革只能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这一原则。但最剧烈的反抗是来自资本主义方面，它根本不愿理会皇帝的国家社会主义。在流动资本的主要代理人中，民族自由党人在德国起了突出的作用。大家知道，这个政党在政治上对于政府是奴颜婢膝的，最轻微的脱离上面的独立活动向来都被它看作是“同帝国相敌对的行为”。然而，一旦这些先生看到他们无限的经济优势稍有受到限制的危险时，他们多次发誓保证的“忠心”就迅速消失。一场反对皇帝的一系列“具有威胁性”的改革计划的宣传鼓动开始了，起初小心谨慎，后来愈演愈烈，它由于官僚们的同情和让步而得到助长，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很快就达到了目的。

1890年的全部美好诺言今天又怎样了呢？当时皇帝曾许诺实行国际劳工保护，从法律上对工时和工作方式加以规定，设立工人代议机构，给工人以平等权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模范工场，如此等等。人们有一定的道理可以把皇帝的计划同国际社会党人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相比拟，不少人认为，皇帝的这一宣言已使社会民主党丧失了最重要的立足点。但是，此后不久向新的国会提出的劳工保护法便是一个大倒退。但这样还不算。觉察到自己

的长处的资本主义立即从防御转入进攻，政府却节节退让，直至完全屈服，因此冯·伯勒普什^①先生这个皇帝的社会改良的代表人物虽然在一个时期内曾经由于这样的身份成为资本家攻击的中心，最后却终于取得了资本主义代理人的欢心，支持由这些人提出的一切把这一法律改得更坏的建议，以便反对社会党人。于是剩下的只不过是与星期日休息、制定劳动规章和采取防护设施等等有关的个别改良了。这些改良本身固然是可取的，然而微不足道，决不能说是实现了大事标榜的社会改良，并且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差得多的一些国家在劳工保护方面早已达到的水平。但更为严重的是，工人在法律上获得小小的好处，但实际上在经济上和权利上的地位在许多方面恶化了。例如，厂主有权扣留工人整整一个星期的工资作为抵押，只要工人没有按照契约预先通知解约而停工，这笔工资即刻（无须经过任何判决，对厂主所遭受的损失也无须提出任何证据）归于厂主。工人们很快就认识到，这项法律与其说是对工人的保护，不如说是对工人的进攻，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国会中对此投了反对票，自然没有达到“和解”的目的。此后，事态只是进一步恶化了。最近普鲁士邦议会在讨论一个新的矿业法时，就比劳工保护法又倒退了一大截，使矿主们今后有权以法律的名义胡作非为，几乎就象以前他们凭借资本主义的领主权所做的那样，而他们就是由于这样胡作非为而引起威斯特伐利亚矿工大罢工的。

而现在，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代表、即大工业家和农场主天天声称：现在对工人的照顾过多了，不久以后社会改良就不得不停下来。部长们只敢战战兢兢地说：最近几年会根据劳工保护法逐

^① 汉斯·海尔曼·冯·伯勒普什 (Hans Hermann von Berlepsch 1843—1926)——男爵，1890年至1896年任普鲁士工商部长，1901年创立社会改良协会。——编者注

渐采取相应的措施,但不言而喻,对于营业是要大力保护的。许久以来皇帝已经不再谈论社会改良了,相反,人们却时而听到他在不同程度上激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工人们注意到,皇帝赐给资本主义最无情的代表之一、莱茵地区工业大王施杜姆^①以接受一次正式国事访问的光荣,并把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树为“楷模”,而这些工厂的现行制度却被远比社会民主党更为广泛的人们描述为一种前所未闻的、甚至同法律制度不相容的暴政。即使人们不得不怀疑皇帝对他所称赞的境况是否完全清楚,但现在同两年前的情况的对比,仍旧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

我们看到,一个政府可以很强大,而资产阶级却可以很虚弱,但只是在后者的经济利益没有认真得到考虑时才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手段可以用来战胜金融势力,即一个强大的人民运动的天然动力!因此,没有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改良,尤其是在象德国这样的地方更是如此,社会主义运动在那里已经有一个统一的大党作为它的具有明确目标的政治代表,这个党懂得谨慎而又果断地行事。尽管如此,我党还总是被视为一个敌人,固然当局不再使用俾斯麦式的手段来对付它,然而用现任帝国首相卡普里维的一句话来说,任何一项有待颁布的法律和有待采取的措施,都要把同我党作斗争看成一个并行的目的。他们究竟还必须获得什么经验,才能最终懂得唯一有效地反对社会主义的手段就是实现它的合理的要求,懂得社会主义远远不是“对于文化的一种威胁”,而是使人类获得新生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呢?

您问我,事态的这一发展会给德国或欧洲带来什么后果呢?

^① 卡尔·施杜姆(Karl Stumm 1836—1901)——男爵,萨尔省的大工业家和政治家;曾建立具有垄断地位的采矿康采恩(施杜姆康采恩);德意志帝国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死敌。——编者注

我认为，援引确凿的事实比由一个本来就有态度偏颇的嫌疑的作者去进行推测，对您和您的读者来说，会是更有助益的。

1871年，我党在国会选举时得的票数是102,000张，即投票总数的2.6%；1881年上升到311,000张，即6.1%；1890年达到1,427,000张，即19.7%。在这期间有十二年是非常法时期，有一次选举是在人为的战争恐慌和形形色色的迫害之下进行的。不仅如此，选举并不是衡量政党力量的十分恰当的尺度，这对于社会民主党比对于其他政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工人所受到的政治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的影响是很强烈的；其次德国的选举权是从25岁开始的，因此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成年以后要经过整整一届选举才能计入投票数字。不仅如此，还要请您考虑到，一方面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群众的贫困化都按照数学的精确性在进行着，并且考虑到由此产生的对日益变得不堪忍受的社会状况进行改革的经济上和道义上的迫切愿望。最后还请您考虑，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不仅是经济运动，而且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党，是远远超出狭义的工人阶级范围的一切政治上进步的分子的集中点和根据地。

您和您的读者们可以自己作出结论了。

载于《社会》杂志第8年卷第1109—1117页；又见《论国家社会主义》1892年纽伦堡德文版第6—16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62—170页。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争论

(1892年11月)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争论要是一开始就象本刊1891—1892年卷第49期上刊登的考茨基所写的那篇文章那样以实事求是和互相尊重的方式进行,这对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会是真正的好事。可惜情况却不是这样,至于其原因,我在这里不想发表更多的意见了。但结果是,在讨论中间由于盲目的激愤引出来大量的实质性的、以及相当一部分属于私人性质的枝节问题,很快就几乎完全冲淡了问题的真正核心,因此尽管经过长期的反复讨论,实际效果却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

考茨基完全正确地划定了争论的范围,他明确地指出,我在《蓝皮评论》^①上发表的那篇大家都知道的文章^②中所采取的立场谈不上与我们党的基本原则和态度有什么矛盾,争论不涉及原则问题或策略问题,而仅仅涉及一个纯理论的问题,也就是应该如何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概念的问题。

考茨基在这样表明他的公平态度时可惜忽略了对他的规定再补充一条,而忽略了这一条就会很容易再次使读者错误地理解这件事。

谁要是没有亲自读过我的那篇文章,并且现在看到考茨基以

① 即法国杂志《政治和文学评论》。——编者注

② 即《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参见本书第169—178页。——编者注

那样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考查我给国家社会主义下的那个可怜的“定义”，并且从各方面加以歪曲，那他大概就不得不认为那篇文章似乎是一篇或多或少地企求论述重大经济学问题的作品，它打算论证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某种新的、有重要成就的观点。但这是根本谈不上的。我确实一开头就特地说明，我不能写一篇深入研究的论文，而只好限于“随便写几点意见来说明这个问题”。可见这是杂志上刊登的一篇简单的信手写来的文章。对于深奥的科学来说，严密的定义和严格地区分概念是必要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是不容易使用的——日常生活中的办法必须能够很快地适应当前的变化不定的印象和需要。这个事实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考茨基本人可以提供。关于去年的纲领草案中那个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众所周知的提法，他是这样评论的：这个定义虽然在“科学著作中是不够的”，但“对于通俗的阐述却是很充分的”。但是这种按照所要阐述的特殊目的而运用不同的判断尺度的做法同样也必须用来对待我的文章。

如果要假定我在写和说每句话乃至每个词时都一定要经过最周密的考虑，并且抱有十分明确的目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对我是过分恭维了。但是我仍旧不得不拒绝对我的言论的这样一种评价。天哪！议会内外的演说家们、撰写社论的作者、报道形势的新闻记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政论作家——不管他们叫什么吧——，如果要字斟句酌地检查他们的言论，他们应该怎么办呢？要是《新时代》打算从原则上这样理解它的检查职责的话，那么它必然会象浮士德的幽灵一样膨胀起来。实际上谁都知道，幸亏即使真正有人想到干这种事，那也根本没有什么前途；否则政治生活就会陷入不可救药的枯燥无味、迟钝不灵的状态，并且会变得象学院生活那样刻板和一本正经，这就必然很快地把一个本来就不能

令人满意的作品的一滴血挤干，使它的最后一点生气窒息了。不，这种随时都穿着学院长袍、踱着方步的难能可贵的品德还是留给理论吧，我们是不会嫉妒的；除了喜庆的日子外，我们这些人通常愿意而且必须满足于燕尾服，甚至粗呢上衣就行了，这虽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但行动起来却更加方便。

大家知道，我在我那篇文章中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同它目前在德国所采取的形式作了区别。有关前者即理论部分的论述在我的四百多行的文章中所占的篇幅还不到四十行，这一事实最好地说明，我并没有打算对此作任何论述。实际上，这一部分仅仅是对要阐述的本题的一段概述性引言。在这段短小的引言里不可能从科学的意义上定义，只能作一个尽可能一般性的、广义的说明，特别是要从非社会主义的法国读者的理解能力出发来说明。但是自由贸易主义在法国不象在我们德国消失得这样彻底，而且巴师夏^①和孚赫^②的精神还在许多人中间起作用。强调这一群读者所认为的在今天国家的基本法中对经济领域最能发挥深远影响的因素，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此外，我深深地体会到自己还决没有把这个问题说透彻，我在这方面的叙述中所采取的不肯定的假说形式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一点也没有料想到我的叙述会有幸受到如此周密、如此严重的批评。我明确地表示：人们“可以”把国家社会主义“非常笼统地”理解为这样的一种基本原则，并且在“这个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根据既定的前提条件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我想人们恐怕无法再作更

① 弗雷德里克·巴师夏 (Frédéric Bastiat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编者注

② 茹尔·孚赫(尤利乌斯) (Jules Faucher (Julius) 1820—187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编者注

大的保留了。

我提到这件事，但决不是说我想把我那些引起争议的话根本排除在讨论之外，甚至把它们说成根本不需要加以认真对待的。决不是这样。但是我有权这样为自己辩护：在激烈的论战之后，我的文章的性质已经遭到严重的歪曲，现在不能再让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对它做出错误的评价了。谁不喜欢报刊上发表的一条粗糙的意见，他尽可以用类似的武器和它斗争。但是，用一种严密科学的全部重武器来对它发动攻击，这样一种斗争确实是太不公平了，要想由此获得很高的荣誉是不可能的。

我在正当地为自己的权利进行辩护之后，现在来探讨定义本身，首先我要感谢考茨基在开始探讨这个问题时说的那句话，也就是说，他证实，要找出一个能满足各方面要求的定义是“不那么简单的”。这句话不是由我，而是由另外一个人讲出来，是很有益处的。这倒不是因为，否则一个多少熟悉经济问题的人也许就会对此有所怀疑，而是因为，在大声疾呼地参加这场争论的人中间，恰恰有许多人主张并且在热心倾听的团体里广泛传播这种意见：在广阔的世界里再也想不出比给国家社会主义下定义更为简单的事了，只有可恶的持异端思想的人才能对此表示怀疑。

实际上，四个月来在这场争论中发过言的同志几乎每一个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解都不一样。最简单的解释，因此也是特别受欢迎的解释是这样的：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只不过是捏造出来的，是一种伪造。另一种解释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库主义。第三种解释说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是一回事。第四种解释认为一切非革命的、即不是有意识地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改良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甚至还有一种看法，即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只可能意味着个别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即在现存各国中的个别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因

此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争论成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是否能在个别国家里实行，还是需要欧洲联邦或世界联邦作为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后，《新时代》1892—1893年卷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不愿意把思想或行为本身当作识别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志，而是把某些人民阶层对这种思想和行为的认识当作标志。至于在我们所提出的个别要求中有哪些可以被看成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自然也随着这些不同的意见而有差别。有些人认为，根本没有。另外一个人说，只有拉萨尔关于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建议才属于这里谈论的问题；自从我们抛弃了这一建议以后，我们这里就根本不再有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了。另一些人则从一定的立场出发，只把工人保险法，或者只把国有化或劳工保护当成国家社会主义。一句话，有多少人参加辩论，就有多少个定义。

考茨基极力想把我的“有些滑稽可笑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本身的想法”放到他的解剖刀下面。他同时提出了一句我不能不反对的话。他认为，对上面说的那种想法，必须“按照它从探讨它的一位或几位卓越的理论家那里所获得的一定的形式”来加以研究。然后他举出洛贝尔图斯的名字。可见考茨基是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洛贝尔图斯所主张的那样。

这差不多就象是某个人想说：社会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因为毫无疑问，马克思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至少是象洛贝尔图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一样好的。但是这个回答仍旧是错误的。马克思和社会民主主义虽然是彼此相近的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因此就是一样的。毫无疑问，社会民主主义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基础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在不同的时期做了一些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的事情。任何一个运动，只要它不停留在纯粹的派别活动上，它必然要超越它的个别

的、哪怕是如此重要的代表人物，并因此获得或多或少地摆脱后者的、独立的观念内容。因此也不能把国家社会主义的观念仅仅局限于洛贝尔图斯的学说，何况考茨基通过自己的补充论述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如上所述，他在回答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说，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但这种特征对洛贝尔图斯主义是不适用的；因为确定一部各方面都已完全确定了并且完成了的作品的观念并不很困难。此外考茨基谈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如果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那么洛贝尔图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就不是唯一的了。简而言之：尽管洛贝尔图斯肯定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最卓越的思想家，但是不能说国家社会主义的观念已经由洛贝尔图斯阐述无遗了。

因此如果考茨基认为，现在争论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而且归根到底只是关于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一问题的翻新——对于这一问题，当年考茨基和施拉姆曾在《新时代》上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论战——这是不恰当的。在目前这件事上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这些差别丝毫没有遭到怀疑，不如说已经十分明确地得到承认并且被当成先决条件。当我指出洛贝尔图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致命的批评之后，我在我的文章（第 21 页）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尽管如此我们当然是站在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他们的道路是依靠权威的，他们的方法——如果说这种方法总算还能达到目的的话——是如此无力，以致于人类期待的解放还要经过好几百年才能达到。一句话，不管人们对他们的意图和科学贡献有什么看法，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并且正因如此，我站在另外一处直截了当地把国家社会主义叫做“敌对的流派”。我认为，对于一篇简短的叙述来讲，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存在深刻差别的事实已经说的够清楚了。

考茨基指出我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定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是错误的。但是他怎么来证明这一主张，或者说，他自己下的定义是什么呢？

如果我对考茨基理解得不错的话，从他最近出版的关于纲领的著作中的有关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的概念定义：国家社会主义力求由现存国家包办全部经济活动，并且把联合起来的全部生产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它设想目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即生产资料私有制通过这种方法会自行消失；所以它从任何一种经济职能或经济企业的国有化中看到向社会主义合作制迈进了一步，并且相信社会主义合作制可以从经济活动的普遍国有化中产生，而不需要对国家的本质作任何改变……^①但是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考茨基却这样说：不能把国家的任何一种对经济关系的干预都说成是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这样一种干预，其任务是通过一个超越于阶级之上的国家政权来调和各阶级并从而使工人阶级的利益斗争成为多余的和不可能的，才可以叫做国家社会主义。

可见考茨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有两点要求：

- (1) 国家干预经济关系，而且
- (2) 其意图是用这种方法结束阶级斗争，并且完整无损地保存现存国家政权。

现在我敬请考茨基再一次看看我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我是这样说的：“如果非常笼统地看问题，可以把国家社会主义理解成这样的基本原则：现存的国家不仅是一种具有政治目的的组织，而且它的主权也延伸到全部经济领域，因此，国家不仅有权调节工人同企业主之间的全部关系，而且有权把任何部分的

^① 《爱尔福特纲领》（即《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1892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编者）第129页；《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第117页。——霍尔马尔注

商品生产纳入国家的总的领导之下或者甚至由国家直接经营。”^①考茨基引用我的话到此为止。但是他忽略了，我的思路并没有到此就结束。相反，我紧接着就说：“从这种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国家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仅仅在这一问题上有区别：国家应当如何行使原则上属于它的权利，也就是说，**应当用什么思想来领导国家和由谁来领导国家？**”^②现在我要问考茨基和诸位读者，这几句话除了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一样要求由国家政权对经济领域进行逐步扩大的、原则上不受限制的干预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这对二者来说是共同的，它把二者同自由贸易主义区别开来。但是民主社会主义打算通过取得政权的办法把这种干预权当作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杠杆，而国家社会主义却想要维持、甚至加强现存的国家政权，即在它看来是凌驾于各党派之上的政府权力，以便自上而下地、按照政府的意图来引导社会关系的发展。这是二者的差别……为了使不熟悉这一问题的读者不致有任何怀疑，我还要多余地强调补充一点，这一深刻的区别也表现在：“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大多是保守分子，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却是民主主义者。”^③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决不妄想把我“随便写的几点意见”称为科学的定义，我也不想就如下的问题进行争论：纯粹从报刊文章的角度看，我的表述方式是否已符合各种要求，是否在经过认真考虑后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形式。我没有任何倒霉的野心，不想不惜任何代价空谈任何一个随手写下而且还可能有点错误的论点；不过假如我真的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也不必因此过分感到羞愧，因为据考茨基说，在我们党出版的著作中类似的情况决不少见。因此在形式方面，政论家很乐意接受进行深入研究理论家的修改。但

①②③ 参见本书第169—170页。——编者注

是,就事情本身来说,我认为不是根据文字、而是根据思想和精神来判断我的论述的人,以谅解的态度并怀着一些好意来读这篇文章的人,就会发现它和考茨基的定义并不矛盾,不如说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且据我看来,即使对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国有化问题上所持的同我们有分歧的目的的阐述还不如我谈的那么清楚,他的这一看法也还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谈到目前国家的国有化,那么根据我们对国家的观点,这当然要有个先决条件,即国家是按照它自己的意图来干预私有财产,而不是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意图和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我本人为什么不能认为最广泛地、即从语源学方面来解释国家社会主义这一词就会有任何一种“思想混乱”的“危险”,原因也在于此。许多方面的人,甚至往往是经济学界的人,把国家社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应用,也就是说通过国有经济彻底排除私人经济,使迄今基本上属于私有经济的领域服从国家的法律,通过使无产者的生活在经济方面得到保证来促进无产者运动的发展^①,或者说,(不管人们对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怎样理解)由现存国家来运用社会主义思想。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样一种理解太空泛,太不明确,并且要寻求一种更加确切的说法。但是,对于任何一个能思考的人来说,无论如何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国家在采取有关行动时的目的都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要认为现存国家可能有意识地抱着把它自己以及它在政治上所代表的那整个社会制度从地球上铲除的目的来打击自己的各种设施,这确实是一种几乎不能令人置信的空想。就实际效果来说,从而也就是就我们对这一措施的态度来说,国家的意向决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我已经多次谈到,那位“国家官员”在《新时代》第5期上也已推

① 罗仑兹·施泰因《财政学教科书》第一分册第152页。——福尔马尔注

出了；因为重要的不是目的，而是效果，而在任何情况下，效果最终不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意图，而是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意图实现的，关于这些我们大概不必谈的更多了。

可见考茨基的定义与我的定义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区别。何况即使人们想认真地通过深思熟虑去寻找一个完全无可非议的定义（考茨基肯定已经这样做了），那也是多么困难，这一点现在考茨基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义看出来。我清楚地知道，比方说，他决不愿把劳工保护算作国家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他的定义的措辞并不妨碍把劳工保护理解成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劳工保护是对经济关系的干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至于说到国家在采取这类社会改良措施时的意图，那又是明确无疑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图，倒不如说是按照“通过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财产的办法来消灭阶级斗争并导致社会和平”这一意图采取的。这样一来，考茨基为国家社会主义措施规定的第二个先决条件也就具备了。

考茨基认为：虽然人们可以按照他的定义所指出的那样理解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争取并且终于参与决定一系列完全可以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以便逐步通向一个较好的社会组织”，这种做法却是错误的。

针对这一点，我可以简单地举出由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一系列这样的要求，我在我的著作（第29页）中已经一一列举。如果考茨基反驳说，随便哪一种国有化决不会在世界各国全都是一回事，那么我当然不会对这一说法本身表示异议。但是就考茨基运用这一反驳的分寸来说，他并没有说对。我当然不能在这里谈论个别可能的国有化的意义问题，因为这样做涉及面就太广泛了。我只想就考茨基自己引用的例子说几句话。

考茨基认为，在象瑞士和英国那样的“政府如此依靠全体人

民，并且工人阶级本身也是如此强大和具有如此大的影响”的国家，某种国有化今天就已经可能意味着改善。例如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要求粮食贸易国有化，英国的先进工人可以要求地产国有化，而在德国，前一种国有化只会保证粮食生产者任何时候都有利可图，后一种国有化则会造成梅克伦堡那样的情况。我认为，考茨基在这里确实把涵义不确定的“人民”一词与在我们心目中唯一加以考虑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这一因素过分地混为一谈了。

当然，人民在瑞士比在我们德国能对政府施加更多的影响，这是无法相比的；是的，今天在那里，对于随自己的意愿把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变为现实就已经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政治阻力了。尽管如此，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要不就是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发生，这不仅是就整个联邦来说，而且甚至在无产阶级可以说占多数的各工业州也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人民和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个概念。当前瑞士人民恰恰不愿意运用他们的权力来促使按社会主义精神组织面包供应，瑞士的粮食生产者对他们国家的关税政策和其他立法所起的相当可观的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相信，在粮食贸易国有化方面，目前在瑞士并不缺少“有利可图的价格”的保证。

在英国，议会政治已经完满地实现了，而在我们德国议会政治还几乎没有脱离幼稚状态，这也不需要多谈了。但是，尽管英国工人肯定拥有强有力的手段，可以在立法方面促进他们的利益，人们却不能说，先进的、也就是自觉行动的英国工人整个来说对他们国家的公共事务施加的影响能比我们党在德国所能施加的影响更大。因此，并且考虑到英国的其他情况，我看不出英国工人目前在实行地产国有化方面比我们德国工人具备多大的优越性。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恐怕不会忘记，正是他本人认为地产国有化一般说来是、尤其在德国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几项改革之列”，这些改革“在

现代生产方式的范围内为无产阶级创造了方便，而且没有成为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的障碍”，因此他向弗吕赛姆强调指出，如果土地所有权改革运动发展得足够强大，能够实现地产国有化的话，那时这个运动就能够“有把握不仅得到无产阶级的同情，而且得到它在行动方面的支持”^①。

我还能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它们都会说明，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制度当然或多或少地要影响某种国有化的效果，但是在这一问题上，现在所有国家的共同的资本主义性质同政治上的差别相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占主导地位。

至于我特别根据德国的情况举出的国有化要求，那么连考茨基本人也不想“否认有这样一些经济领域，即使在德国目前的政治情况下，这些领域的国有化也会对无产阶级有利”。我所主张的也不过如此，因此这一方面是不存在意见分歧的。然而考茨基认为：即使人们也能把这类国有化称为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毕竟不能把它们看成“逐步通向更好的社会组织”的措施，因为它们对这里的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愿考茨基关于国有化的统计数字是正确的，虽然我在文章中已经指出，除了纲领中所列举的国有化以外，还有一些国有化在实践中已经被考虑或可以考虑。不过我们也不妨只考虑纲领中列举的，并且把考茨基提到的卫生事业国有化当作例子。从纯理论的高度来看，这种手段可能显得是微不足道的。但谁要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转变不能一举完成，而是必须逐步实现，那么他肯定会作出另外的判断。我认为，如果把整个卫生事业从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经营的企业改变成公共服务事业，并因此通过预防和治疗使千百万人保持健康和精力（目前这些人是几乎无法接触到医生和药物的），

^① 《新时代》1890—1891年卷，第393页以下。——福尔马尔注

称。但是不管我们采用这些名称中的哪几个，我们的实际行动却不会因此受到丝毫影响。因此我的意见仍然是，就算有可能就第一个问题取得一致，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而且如果我在平静的时候把与这个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有关的厚厚一大叠资料翻阅一下，那么我在看到由于偶然写下的三四行文字竟使人们花费这么多的力量来进行注释时固然要感到佩服，但最后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本来是不值得为这件小事大吵大嚷的……

我和考茨基之间真正比较重要的意见分歧原来只是由于我的文章中的两处互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地方引起的。那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也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理由特别起劲地去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本身，……。而且德国形势的发展早就消除了任何可能利用国家社会主义来为强权政治目的服务的危险。”^①考茨基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在我探讨他的理由之前，需要在事实方面作一点纠正。

考茨基在他的文章(第706页下半)中提出一个我已经表示反对的观点，他说在我的“定义”中没有强调我们与国家社会主义观点的区别，而只是强调了我们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点。然后他紧接着说：“这样”我当然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特别起劲地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了……。按照这种词句排列，必然会使不了解我的原文的读者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我之所以看不出有理由进行这种斗争，是因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家社会主义者有共同之处。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我的文章的有关段落的意思是这样的：因为我决不怀疑现存国家的利用经济权力来实现自己目的尝试必然要失败，也因为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处于社会民主党的道义和政治影响之下，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特别起

① 参见本书第170页。——编者注

劲地反对”这一经济理论，它固然肯定是想保持或者甚至提高现存国家权力的权威地位的，但是由于事情的必然发展，它却不能达到这个目标。这种观点同根据上面引用的考茨基的说法有可能强加于我（尽管他肯定不是故意的）的观点显然完全不是一回事。

考茨基觉得，相反我们有“各种理由”去特别起劲地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后者特别起劲地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生存要素”。国家社会主义当然会这样做，因此我也指出它是一个“敌对流派”。但是有人对我们抱敌对态度，想伤害我们，单单这一事实本身对我们来说还不能成为激怒我们也去反对他的不可抗拒的理由。有各种各样起劲反对我们的理论运动和实际运动：例如纯粹的自由贸易主义派的最后残余（经济政策方面是班贝尔格尔先生的残余，哲学上是斯宾塞^①先生的残余）；同业工会制度的主张者；精神贵族政治的代表；虔信派和伦理家等等，等等。但我们并没有想到对这些人的狂热进行报复。我们反复讲过多少次，现在再说一遍，我们的斗争方式必须不是针对我们敌人的意图，而是针对其结果。一个敌对的运动越是强大和越是对我们有危险，我们就越是以巨大的热情同它作斗争，反之，这个运动越是弱小，我们就越不必担心它。

但是考茨基难道是想声称，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对我们特别危险吗？正是在一年前，他本人在反对纲领草案中建议的专门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条文时分析得很对。他说，这样的声明也许在十年前官方开始实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是必要的，但是今天，当“国家社会主义本身只不过是一堆废墟”时，声明就是多余的了^②。同废墟作斗争确实是不需要特别起劲的。

① 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者。——编者注

② 《新时代》1890—1891年卷，第789页。——福尔马尔注

考茨基对我上述引文的第二句也作了同样尖锐的批判，他说，他不能同意我所说的利用国家社会主义来为强权政治目的服务的危险已经消除的观点。目前的和平状况不能维持很久；党再取得一次巨大成就就会促使政府再次采取措施阻碍我们的运动。那时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方便的办法，如果有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主持国务，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可能给社会民主党造成危害……

我不得不说，在整个讨论中，再也没有比这种别人也用口头表示过的观点更使我感到吃惊了。

自从上次选举之后，我们愿意并且有权利把我们的党称为德国最强大的党，而且有充分理由怀着很大的胜利信心。去年爱尔福特大会以前的和会上的策略辩论，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我们究竟多么接近我们事业的最后胜利这一问题引起的。虽然我认为总的情况和党的力量都有了可喜的进步，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在最近取得胜利的程度，我恰恰因此而受到谴责。这种冷静的考虑被指责为“最严重的悲观主义”，它会减弱群众的不可缺少的情感和美好希望，而且事实上决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对党来说，现在恰恰是“大家联合起来，造成最有利的形势，并且为自己开辟获取最大胜利的前景”的时刻……“这个党的每个成员都充满这样的火热激情和牺牲精神，而且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况都同样对它有利，有什么障碍它不能轻而易举地清除掉呢”……“资产阶级及其掌权者敢阻拦这个运动吗？他们将亲自看到，这件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已经不可能实现的事，今天将在进行尝试之前就被压下去。”……“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不管我们的敌人做什么，是反对我们也好，或者是赞同我们也好，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为我们的工作操心，他们是违背自己的意志而为我们的事业操心”……“社会问题是本世纪的问题，而且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显然能就此做出重大的决断。没有任何个人的力量能阻止，也没有任何阶级的力

量能阻止。”……“党象上涨的洪水一样冲破一切堤岸、淹没城市和乡村，直到最反动的农业地区，这个党今天处于这样的时刻，它几乎可以用数学精确地计算出自己取得政权的时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取得能保证自己在短期内夺回政治权力的地位”……“我们最终目标的实现已是这样临近，这个大厅里在座的绝大多数都能亲自看到这一天。”……如果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爆发了，它就会使我们“在二年到三年之后取得胜利”（从1891年秋天起计算）；否则党在下次选举中就会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它能使任何一个政府屈服”。……“如果事情按这样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党将有可能在1898年取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不断地提到面前的障碍是“一种错误的和荒谬的策略，它会使一切热情衰退。”……我们的运动“是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流，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挡它。我们只期待胜利！”^①。

这是当时的情况。但是现在同是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难道它突然就根本不再是强大得足以无忧无虑地面对重新利用国家社会主义来为强权政治目的服务的可能性了吗？多么矛盾啊！考茨基认为，这样重演过去的老把戏可能“比1881年的皇帝谕旨更加危险”。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毕竟也经历过那个时期，但我回想不起那时的国家社会主义有多大的“危险性”。当时我们的人数、办法和影响都不多；口头上和书面上的意见交换以及党内同志的联系大部分中断了，不可能进行了；拥有巨大权力和丰富的统治

^① 记不清引文出处的读者可以按下列顺序在这些地方查：《新时代》1891—1892年卷，第35页；《新时代》1890—1891年卷，第119页；《新时代》1890—1891年卷，第717页；《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记录》第176页；《新时代》1890—1891年卷，第10页；《新时代》1891—1892年卷，第582、585页；《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记录》第172页；《新时代》1891—1892年卷，第586、583页；《前进报》1891年9月16日；《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记录》第175页；《新时代》1890—1891年卷，第717页。——福尔马尔注

经验的俾斯麦是政府首脑。尽管如此，政府的国家社会主义失败了。而今天，我们不仅在人数上是最强大的党，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选民人数，我们的实力手段之强大是同那时无法相比的——这时难道我们居然认为自己不够强大，并且害怕某一个我们还没有想到的“精明的政治家”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在阴暗的未来中蕴藏着的“危险”吗？唉！唉！那种认为敌人不管做什么都是在为我们的事业操心的信念究竟在哪里呢？如果单独一个人就能威胁前面所说的发展的自然必然性，那么从这种必然性又能产生出什么呢？历史的铁的必然性在哪里，我们的必胜信心在哪里，怎样用数学方法计算我们掌权的时间呢？为什么一下子又如此缺乏信心呢？

前年的角色奇特地交换了，我这个可恶的悲观主义者成了“玫瑰色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件事例上考茨基把党的力量和党对事件的发展所能施加的影响估计得过低，而且我也相信，我们党的大多数成员将会同意我这样高度地评价我们的力量。即使有来自某一个地方的、比使已故的政府社会主义复苏更大的危险威胁着我们，我们也丝毫不必在我们的希望之杯中注进苦酒，我们仍旧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

考茨基补充说：无论如何必须及时努力进行必要的启蒙工作。我当然完全同意。启蒙是永远不嫌太早，也不嫌太多的，但是这种启蒙当然必须在出现意见分歧的领域进行。这里出现意见分歧的是理论领域。我想暂时不谈继续不断对国家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是否与这一问题的实际意义相称，我尤其没有把握说，长期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是否最后只剩下很小的一群信徒。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只有通过科学研究、论证和说服，才能按这个方向进行有成效的教育和启蒙工作。

考茨基不是这样做，却以令人惊异的方式提出建议，要党代表

大会作出“可以信赖的解释”，以便给国家社会主义下一个他认为必要的统一的定义。这样的建议不是由其他任何人、而是由一个理论家提出来，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党代表大会是决定一切实际政治问题、也就是同党内同志的政治行动有关的一切事情的最高机构。党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的权限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因为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步调一致的行动就不可能有发展，就不可能有成就，还因为在一个民主的党内的这种一致性只有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才可能实现。但在理论观点上，数字是没有力量和意义的，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个别思想家的论证和判断。在学术会议上，多数通过的决议从来不具有重要意义，在党代表大会上这种决议就更加如此，因为它的成员是从其他的角度选出的，根本不是根据他们的理论水平。我假定大会代表就全体来说在组织、宣传和其他政治事务上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之中有多少人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献，或者哪怕只是熟悉我们现在进行的争论的所有资料呢？例如我知道有一个党的地方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它的领导人不仅断然拒绝出售我的著作，而且拒绝在当地的党机关报上刊登我的著作的广告，以免同志们了解我自己的论述。而那里的党员大会却在听了一次报告以后简单地作出判决，说我想“把目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同我们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在这次会上当选的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了限权委托，要按照这一精神发言反对我。类似的对情况缺乏了解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因此考茨基能指望从他所期待的可靠的解释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党代表大会为了方便起见作出决议说国家社会主义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它会因此就从世界上消失吗？或者考茨基难道会认为通过这样一项决议他自己的与这一决议分歧很大的观点就能一下子消除，而且他今后在《新时代》上将把这一

决议当成教条式的指示吗？他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或者我们假设另外一种情况：大会决定，采用去年纲领草案中的说法，也就是宣布国家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财政目的而实行的国有化制度”。我在我的文章中也已经说明，这一定义“大体上是贴切的”；但考茨基自己也赞同我的这一看法，即这个定义还“不够”。事实上这个解释在一个方面已经超出了概念的范围，在另一方面却远远不够。但是它显然不会因为得到党代表大会的确认而有丝毫改进，或者变得更加完善。多数人可以决定采取行动，并为这些行动承担责任，但是不能赋予思想、观念和理论以它们本身不具有的某种价值，也不能强迫或禁止任何人接受它们。因此代表大会的决议几乎不能通过考茨基所期望的行动而增加任何威信。

此外，假如我们一旦开始作出这种“可靠的解释”，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在纲领中和在党内其他方面使用的概念有一大批同样是可以作出狭义的和广义的解释的，因为一般地说，人的观念，特别是在感情因素同思想掺和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特点：它不管什么方法学，而是不那么容易加以调配并按照规定登记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宗教是什么？等等，等等。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的回答将是出入很大的；然而就我所知，这一情况迄今并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害。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养成制定教条的习惯，我们立刻就能把任何一种赞成和反对的意见看成“思想混乱”，并且通过不断增多的教会式的决定来排除这样一种想象出来的危险。然后人们有时可以把这一切编成一本教义问答手册，于是谁都知道他必须相信什么。遗憾的只是，本应成为千百万未受教育者的工具的理论只能被少数得到秘传的人理解和运用。

考茨基大概将要向我大声呼唤：“呵，呵，别这么激动——你太夸张了，我的朋友！”当然我们还没有走得这么远，并且也不想为我

们永远也办不到的事操心。正因为如此，也因为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都隐藏着一点点教会的特性，因此我们要从一开始就加以提防。

也许有人会问我：这件事究竟将怎样了结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要提出反问：争论是怎样发生的呢？考茨基是这样回答的：“要是资产阶级报纸没有转载有关的那些话（而且是经过歪曲的）并且为了自己的目的加以利用，福尔马尔的错误的表述方式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做法迫使我们的报纸表示态度。说我们党内可以容许国家社会主义倾向存在的这种诽谤必须予以驳斥。”我本身也是首先作出这种驳斥的人中的一名，并且说得十分明确。如果说对我们是否抱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曾经有过怀疑的话，那么目前对所有的人来说这种怀疑已彻底消除了。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结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受敌对方面的言论的引导，或者正确些说，受它们驱使的程度比受自己的自觉的意志推动的程度大得多，而按道理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应当尽可能少受这些言论影响的。

不过如果人们主要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还想继续做些什么的话，那么党代表大会却必须在能使它的决议具有充分权力并且切实可行的基础上进行，即在**政治行动**的领域，而不是在理论思想的领域进行。那时万一作出决议说，“社会民主党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没有共同之处，而是把它看成与自己对立的一个派别，”那么这样的决议虽然留下许多问题，但无论如何有一个优点，它使所有的代表以及全党能够按照这一说法团结一致，从而可以结束已经花费了我们过多时间的一次讨论。

译自《新时代》第11年卷（1892—1893）
第1册第196—210页。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问题 的发言（摘录）

（1892年11月18日）

好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项议程被看成这次代表大会的真正的有份量的议程，许多人，尤其是我们的敌人非常高兴地等待着它。这项由李卜克内西和我签名的决议案使他们一开始就失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好处的希望，而对于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一开始时就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继续讨论这项议程的人来说，这项决议案又使他们感到自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我们已经讨论到这样的程度以后，在你们听了李卜克内西的发言并读了这项决议案以后，你们中间会有许多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这两个主要的手（至少在斗争一开始时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相互间取得如此充分的一致，究竟为什么要进行整整一个夏天的争论呢？李卜克内西说今年夏天在党的报刊上和党员大会上进行的这场争论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我不能赞成他的看法。我认为，这场一直到最近七个星期还在进行的争论不外乎是一场词句之争，正象一些同志（不包括我）所正确地表述的那样，它是“手持棍子在迷雾中徘徊”。这场斗争的内容和成果同在这场斗争中作出的努力——参与讨论的任何人我都不列为例外，——完全不相称。如果一场争论不是人们自愿进行而是敌人强加的，那么情况总是这样，并且必定总是这样。这件事情无疑属于后面这种情况。在这场斗争的

过程中，几乎各方面都已承认，我在著名的《蓝皮评论》上发表的那封信就其本身来说同德国和社会民主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或具有多大意义，只是因为这封信是给那种根本不了解德国社会主义的情况的人写的，才使它引起兴趣并具有这样的意义。因此，如果我们这里的敌对报刊没有发表这封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发表它的摘要和概述，那么这封信是根本不会受到重视的——经过这样的摘要和概述，它已被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它的真正意思（这常常取决于个别的语气）已看不出来了。这条消息最初发表在本地的《每日评论》上，我后来才得到这份报纸。《前进报》和其他党报也不是依据《每日评论》的，肯定是民族自由党人的《慕尼黑最新消息》先转载了这篇文章，《前进报》才根据它进行了攻击。……

这以后的讨论是完全根据一家敌对报纸的报道不加任何限制地就我的所谓“我们正向国家社会主义靠近”的言论进行的。在这场争论结束以后，关于这场争论是谁开始的这一问题本身对许多人来说虽然是无所谓的，但对我来说这一点却是肯定的：这场争论不是由我引起，而是由《前进报》起初的那种很不慎重的做法引起的。争论一旦开始以后，由于所有的新闻记者和编辑普遍具有自认为永不谬误的思想（要知道我也是属于记者这一行的），这就阻碍《前进报》承认自己是轻率从事，做得过份了。这纯粹是长话短说，而且我要立刻说明，李卜克内西对于这场争论的进一步发展就算是也有一份责任的话，那无论如何也不大。

这样就产生了一场混乱。在提出这一决议案以后，在李卜克内西作了发言和《新时代》上进行了讨论以后，这场混乱无疑是消除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也已证明，我的这种言论无论是同纲领或者是同策略都毫不相干，它既不可能也不打算对实践活动哪怕施加一点点影响，它的目的无非是要作一次理论上的探讨，

所探讨的也不是**应当怎样**给国家社会主义下定义，而是**是否可能**从另外的立场去下定义。李卜克内西的一个说法有可能受到误解。他高兴地表示，今后不再有分歧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似乎本来是有分歧的，似乎从那以后我才甘愿采取另外一种观点。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分歧从未有过，我在我的文章的第八页上明确地说：

“于是他（指俾斯麦——编者）便实行了 1878 年那项严酷的非常法，同时还采用了人们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改良的制度。要打倒社会民主党，用一种穿着白色工作服的社会主义来取代社会民主党。如果工人们不再听从其他任何人的话，他们最终或许会相信政府的诺言并被拴在俾斯麦的马车上，这样就可以同时既使无产阶级又使资产阶级基本上成为无害的了。但是俾斯麦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算对于经济状况加以整顿。这自然完全不是出于对工人的关心，也不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确切地说，国家社会主义对他是一种更有效的束缚人民的手段，一种纯粹追求财政目的和政治目的的国有化体制，它使由上面领导的国家取代私人企业主的地位，并使经济支配的权力和政治统治的权力合而为一。

这种政策的后果大家是知道的。如果是在十年前，在德国工人运动还很不发达的时候采取这种政策，那么政府嘴上的那些社会主义词句和种种保险法一定会使工人感到惊讶，并可能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推迟一个时期。但情况却是，俾斯麦的社会政策除了公开表明连最强大的政府对于社会主义也是无能为力以外，未能产生任何结果。”^①

如果所有那些各自把一小片木头搬到要焚烧我的火刑堆上的同志（活跃。）事先亲自读一读我的那篇文章，而不是读敌对报纸上

^① 参见本书第 171—172 页。——编者注

的复制品的话，那几次大会肯定就不会做出不同的决定了（对极了！）。最近我在《新时代》上那篇文章中说：党代表大会不可能给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实践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象洛贝尔图斯及其他理论家所设想的那种理论上的国家社会主义）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我在《新时代》上的那篇文章中还说，如果有人只不过是想要说明我们绝对不和国家社会主义发生任何关系，那么在我看来这是多余的，只是白费劲。我从未能够在党内发现任何向国家社会主义接近的倾向，我在这样说时甚至想把党奠定基础 and 开始建立的时期包括在内。因为我完全不赞成李卜克内西把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追溯到拉萨尔那里的说法。凡是了解拉萨尔的人，凡是不仅根据拉萨尔的著作，而是也从他同洛贝尔图斯及其他人的书信来往中了解到（关于这一点李卜克内西恐怕完全没有想到）他是怎样考虑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人，都知道他并不认为这种理论是可以实现的，他想到的只是这种理论在宣传中的作用。当风从四面八方向我吹来的时候，我对我们的整个运动，对我党的全部历史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就我所知，从最初起，我没有发现党内什么地方曾经以有影响的方式表现出或者以公开的形式表明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只有一次例外，我认为在这里不去提它更好，因为这个例外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些人。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而且也不得不在这里进行讨论以后，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现在喜剧结束了，而是至少要作出一项决议，哪怕这项决议所说的没有一点不是人们在此以前就已知道的东西。这样做至少会达到一个目的：从今以后这个问题在各个方面都已解释清楚，我们进行的太久的这场争论也正式结束了。

但是，即使问题确实已经彻底解释清楚了，那也只有当人们在这里的辩论中不再是不根据具体事实而笼统地重新谈论我的机会主义或者乐观主义时，这项决议才有价值。多特蒙德人居然发现

我的小册子对政府是友好的，并且要求对我进行书报检查。对于这种空泛的废话应当置之不理，这不外乎是冻僵了闵豪森^①的号角声，在爱尔福特大会开过一年以后，在夏天的气温中他又苏醒了。今后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这类事情。批评是很好的事，我们党今天之所以这样强大，是由于它对内对外进行了批评。但是批评就象席勒在他的诗篇《大钟之歌》里所描述的火一样。如果对它加以控制，绳之以纪律，把它稳妥地看守在一个不可燃烧的空间里，那它对于我们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如果它不受约束，成为过头的批评，那它就是有害的，尤其是在它不是针对敌人而是针对自己兄弟们的演说、文章和作风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兄弟成为敌人，那时产生的烟火是和敌人向自己袭击时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尽管要互相监督，但不要再让人迫使自己在长达数月的时间中主要对自己的同志进行批评。如果把这场争论中尤其是由党的文人用在解释词义上的力量哪怕只是部分地运用于实践工作，对党也会有益得多。对已有的文件进行校改总是一件吸引人的事情，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党的这种文件的校改者很容易陷入埃姆斯急电的校改者也曾经陷入过的那种危险^②。

我们在这里完全不是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我本人绝对没有作出我个人的定义。我的定义同我们真正的理论家考茨基所作出的恰巧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对实践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作出具体的解释，这在我们中间是不存在疑问的。这项决议无论如何会一致通过。我的发言结束了。而你们将向我承认，我虽

① 闵豪森 (Münchhausen) ——德国文学中一个肆无忌惮的吹牛家和撒谎者的名字，这一名字已成了这类人的代名词。——编者注

② 指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法国大使贝内代提于1870年7月在爱姆斯就提名霍恩索伦王朝的一位王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一事进行谈判的报告。俾斯麦收到这份报告后，有意作了删改，使电文带有侮辱法国的语气，并把它公布在各报上，这对法国是一个公开的侮辱，也成为普法战争的导火线。——编者注

然试图说明——我的权利和义务要求我这样做——这场争论的开始和后来的过程的基本内容，但是我完全回避了一场真正的论战，并且是丝毫没有怨恨以及诸如此类的情绪的。

象以往一样，这项决议没有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也许我们中间也有几个贪吃的人，他们对于突然撤掉他们这道特别的菜肴感到不那么愉快。我希望他们在听了说明以后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对此最感到不舒服的还是敌人，因为他们早就因为将要发生一场争吵而高兴了。他们现在会说：福尔马尔退却了，事情很不妙，拿他简直没有办法。而另外一些人又会感到我胜利了，因为我没有被吃掉。这对我来说应当是完全无所谓的。总的说来，人们不应当象迄今那样受敌对报刊的见解的影响（赞同声）。讨论大多没有涉及这篇文章，而是涉及敌对报纸针对我个人所说的话。大家本来不应当为《奥舍斯莱本日报》关于我的报道操心。我坦率地对你们说，而且慕尼黑黑人将向你们证实，正是在南方（在这里，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党派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同它的人数相比是特别巨大的），敌对报刊对我们的所谓的或者真正的讨论和思想的研究要比其他邦和其他地区通常的情况多十倍，如果我要对南方的敌对报刊关于我的报道每次都给以答复，那么我要做的事情就会非常之多。我也不想这样做。他们从我们的行动得出的结论越糟糕，对我们就越有利。如果自由派认为我是按照他们的主张说话的，并且他们为此而感到非常高兴，那我就让他们天真地去高兴吧，如果教权至上派也这样做，那我也让他们天真地去高兴吧。因此我的行动是永远不可动摇的。有一个可喜的事实是，在今年夏季的这场争论中，恰恰在我所属的选区，争论比任何地方都少，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少公开化。在慕尼黑，国家社会主义一词没有在任何一次公众集会上使用过，公众既没有就此表示赞成我，也没有表示反对我。自从这场争论开始以后，

在德国南部，在巴登、维尔腾堡、北巴伐利亚和南巴伐利亚召开过大约五十次包括各种议程的鼓动大会，凡听过我讲话的人都知道，我从来没有为了反对敌人或者为了说明他们正确而使用过这个词。只有一次，在维尔腾堡的一次大会上，我对一个凶恶的敌人、一位宫廷牧师作过回答，他企图捏造说我和国会党团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我对他作过回答，并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当时我要求在场的社会党人，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在我的话中发现有一点同纲领和策略不符的说法，就起来反对我。没有一个人起来这样做。相反，一位发言人声明他对我的演说完全赞成。请你们在作出决议的时候只考虑实际情况吧，请你们象李卜克内西和我一样（我们一起签署了决议案并尽可能地把一切争议放在一边）以和解的和客观的态度去工作吧。不要去考虑大大小小的敌对报刊可能会对我们在这里的决定说些什么，不管他们所说的对李卜克内西或者对我是否有利，而是按照我们一向的做法，按照党的意向，为了党的利益而行动吧！（热烈的掌声）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892年柏林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2年柏林德文版第183—184、186—190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革命 社会民主党”的决议*

(1892年11月18日)

社会民主党绝不主张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

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是为了财政目的而实现国有化的，就此而言，它企图使国家取代私人资本家的地位，并给予它对劳动人民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奴役的双重压迫的权利。

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是致力于社会改良或劳动阶级状况的改善的，就此而言它是一种由于惧怕社会民主党而产生的不彻底的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微小的让步和各种治标办法使工人阶级同社会民主党疏远，并从而使社会民主党丧失作用。

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忽视要求国家采取这类可能在当前经济制度下提高工人阶级地位的措施，或者在其他方面提出这类要求时拒绝表示赞同。但社会民主党只把这些措施看作少量的分期付款，它们绝对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争取对国家和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努力。

社会民主党就其本质而言是革命的，而国家社会主义则是保守的。社会民主党同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2年柏林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2年柏林德文版第173页。

* 这一决议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福尔马尔共同提出的，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编者注

在巴伐利亚邦议会 关于巴伐利亚与德意志 帝国的关系的演说(摘录)

(1893年10月28日)

.....

先生们! 现在我来阐述我的演说的最后一点: 关于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当然我在这里必须立即说明一下, 对于这一点, 我们以及与我们在一起的巴伐利亚人民表示不满的理由是相当多的。

这里我也必须明确地以我的在座的支持者的名义向那些对我们根本不想实行集中制这一点多少表示怀疑的人解释一下, 因为根据我们的理解, 任何形式的集中制都对自由有害, 对自由是一种威胁。我们是联邦主义者, 这当然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关于这一点我大概是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我们作为联邦主义者的确也愿意巴伐利亚保持相对的独立, 象它现在那样, 以便利用这种独立为巴伐利亚人民并且进而为德国人民谋福利。因此, 从这种见解出发, 我们也绝不认为——最近人们到处都听到这种说法——政治问题今后将专门由帝国议会作出决定。我们不想再看到邦议会、特别是巴伐利亚邦议会进一步受到压制, 并成为一种象法国或类似的实行集中制管理的那些国家的省议会。相反, 凡是在后来有必要和有好处的时候, 我们将在这个大厅讨论全国性事务和重大的政治观点, 并且尽可能作出决定。而且如果这涉及到联邦议会中的巴伐利亚代表曾经和应该按什么样的思想进行投

票的问题,那么我们将尤其要那样做。

至今这种投票只是根据政府的利益和意志,丝毫没有考虑巴伐利亚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喊声:啊!)。我愿意立即为你们举出一个证据。在最近一次国会选举中巴伐利亚人民的意愿是什么呢?他们选出的议员中有38名是反对军事提案的,只有10名表示赞同,这就说明了巴伐利亚人民的意愿。但政府对此毫不考虑,而是简单地赞同这一提案。我认为这是与人民明确表达的意愿背道而驰。否则你们叫它什么呢?

先生们,帝国是一个联邦国家,但不只是诸侯们的联邦。假如它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诸侯们也单独负担经费。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想做。相反,人民必须负担这一切,并且不得不承担风险。因此人民也必须有权参与讨论并决定所有这些事情。先生们!如果我的党在这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自然可惜情况还不是这样(活跃),是的,现在不是这样,但将来还是能做到的,因此我要说,如果我的党在这方面有一天将起决定性作用的话,那时政府当然要准备听取我们所提出的要求,不得不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交付表决之前首先去征询邦议会的意见。当然要这样做,因为政府通过投票不只是使自己承担了义务,而且也使国家承担了义务。如果有哪次表决没有使我们感到满意,事后再抗议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这只具有纯粹柏拉图式的意义,完全是说空话而已。事情已经做了,我们承担了责任,再怎么说明都无济于事了。如果我们不想完全听命于政府,那么顺理成章要做的事无非是使议会在承担义务之前有发言权。先生们,我当然不会如此乐观,会去相信邦议会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总是立即合乎我们心意的。但这是个原则性问题。议会怎么行使它的表决权是另一回事,可能它行使得很糟,当然政府就会受到保护,那时我就要向另一方面发动进攻了。

但是今天已经可以这样肯定，根据宪法的原则，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为我们的代表在联邦议会怎样投票负责。因此我必须控告他们，指责迄今他们在联邦议会的投票绝没有很好地和正确地代表巴伐利亚人民的利益。每逢谋划出一种新的负担，每逢军国主义有了新的扩张，每逢联邦议会采取一项反动的、反人民的措施（近几十年来联邦议会曾多次决定采取这类措施）时，巴伐利亚政府做了什么呢？我们从未听说过，它对这些事情进行过什么反抗。这些有害于人民的表决究竟有多少次是由于巴伐利亚政府和柏林政府内在的思想相近而造成的，联邦议会的讨论是秘密的，我无法了解内情——我是不知道的。我丝毫不想原谅巴伐利亚政府，但我总还是有这种印象，部分表决是由于软弱造成的，是向中央政府、向被视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普鲁士意志采取了软弱的谦让态度。先生们，如果这涉及到巴伐利亚的邮票或巴伐利亚独立性的另一个表面象征，如果是同在外交方面摆样子的巴伐利亚使节有关，那时人们就要突然提高嗓门，大谈起巴伐利亚的主权来，认为它受到威胁了。要是有一个巴伐利亚官员必须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而不是一件浅蓝色的外套的话，——我们对此是不能容忍的。然而，在巴伐利亚的真正独立性成为问题的时候，在巴伐利亚面对其他各邦的倒退意图能够并应该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文化进步的时候，——那时巴伐利亚政府迄今通常只是普鲁士分母的分母，而我们曾经多次经历这样不体面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事实上普鲁士侯国的表决比联邦第二大国的表决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近几年来每一个不管以什么方式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愈来愈观察到一种现象，这就是君主独裁的倾向表现得越来越多了，难道只有巴伐利亚政府对此一无所知吗？有过许多次专横独断的言论和行为，这是完全与帝国的联邦性质相违背的，与根据帝国宪法给皇帝规定的地位丝毫不相称的。近几年来，我

们愈来愈多地听到“朕”这个词，而不是德意志帝国与加入联邦的各个政府的名字，而说出这个词的方式就象是其他所有的人除了按照这个“朕”的愿望办事以外，根本不必再做什么了。在同俄国进行贸易协定的谈判期间，官方甚至第一次使用了一个“皇帝的政府”的提法。但是，只要帝国还不是单一的国家，那么从国法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普鲁士可以有一个政府；但是就德意志帝国而言，只有一个联邦议会，它是由参加联邦的各邦或者说各个政府的代表组成的，但不是集权制的皇帝的政府。

还有，在最近的国会竞选中，我们甚至已经看到，官方的以及由官方资助的报刊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发表这样的言论：如果国会使用宪法赋予它的权利否决了新的军事提案，那么这并不会妨碍那一提案仍旧得到贯彻执行。有人直接地或间接地干脆提出举行政变，并且详细地讨论了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在取消国会的情况下贯彻军事提案的问题。他们说，那时可以简单地把经费摊派给各个参加联邦的国家，万一有一个邦议会拒绝缴纳规定的款项的话，那就直截了当地向有关国家派出联邦的强制执行人员。就是说，普鲁士将占领巴伐利亚、维尔腾堡等，直到经费付出为止。

先生们！如果说存在着一种政治危险，它会导致迫在眉睫的灾难的话，这种政治危险就在这个方面。如果要对付这种危险，那么各邦及其政府和邦议会就有责任不再容忍这种事情，而要坚决反对大普鲁士主义的这种无限制的恶性膨胀。在巴伐利亚这里，正是我们，还有我们的政府有责任代表巴伐利亚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喊声：好啊！）

因此我们要求，如果政府继续把巴伐利亚的主权挂在口头上，我们就要强调我们本身所期望的独立性，要求政府今后也按上述方向办事，不再成为柏林政府的随从。否则我们可以干脆让一个普鲁士省长来领导巴伐利亚的邦政府，这样并不会更差，而且还要

便宜得多。(活跃,喊声:好啊!)

载于《1893—94年巴伐利亚邦议会下院会议速记记录》
第1卷第320—322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
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214—217页。

在巴伐利亚邦议会关于实行 国家与教会彻底分离和促进教育、 科学与艺术事业的演说(摘录)

(1894年2月28日)

.....

先生们！在我简短地指出我对形势的理解以后，现在我必须阐述我党对这笔预算费用所采取的态度。这里我必须立即把两件事——据我的理解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是非常不合理的，——彼此区分开来。就是说，我把预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教育、教学、科学和艺术的经费，另一部分是教会经费。我认为这两部分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它们的地位和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党也必须对它们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

先生们！就**教会经费**而论——我首先不揣冒昧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也象早年自由派所做的那样，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国家与教会分离的原则，这大概是人人皆知的了。从这个立场出发，教会经费纯粹是属于教会本身的职权之内的事情，根本不应提交下议院这样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的政治会议来解决，——教会不受国家任何影响，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它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情。先生们！我曾经对历史的发展一般地作了研究，特别是对德国的历史作了研究，所以我深信，在广阔的世界里，没有比国家与教会更坏的一对了。只要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们就总是吵架、争论、厮打，并且双方互有胜负。这种结合在中世纪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不可能较长时间地保持和平。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必然都要

受害，而争吵也好，和解也好，费用都要由人民负担，都要使进步和文明蒙受损失。因此这种结合终究是必须分开的，要划清双方的势力范围。国家必须仅仅从事世俗的、现实的、实在的事务；它必须面向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工作，面向理性的人。而宗教涉及的是理想，它是针对情绪和感情的。双方的势力范围根本不同。他们彼此是独立的，把它们混在一起只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腐化现象，引起无尽无休的争论和争吵。你们只要回忆一下过去的“文化斗争”就行了。不过这一斗争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这以前它已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而且某一天它还会重新出现，如果没有最终使它们一刀两断的话。

.....

总而言之，我要说：国家也好，教会本身也好，都能从分离得到好处，也就是说如果后者只过问真正的宗教事务，而不是怀有完全非宗教的和世俗的野心的话。只有在这样分离之后，教会才能真正摆脱歪曲真相混淆是非的杂质，证明自己的内在价值。因此，我们决不打算象有些人散布的谎言所说的那样“迫害教会”，而是相反，我们要做的是教会本身不断要求的事情，就是说使教会摆脱国家的监护，做到完全独立自主，使它今后能够仅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全部事务。这就是说，我们作为政党对教会和宗教完全持中立态度，因此我们也就没有权利对它们的财政方面和其他预算方面的事务施加影响。因此我们希望取消国家的宗教预算，而由于支出的金额减少了，就可以相应地减少赋税，并允许宗教团体完全自由地向自己的信徒募集必需的捐款。根据我们这些原则，我们在目前的教会预算问题上怎样投票也就确定了。当然我必须补充一下，在现有的情况下，就是说只要邦的赋税还违背我们的意愿而被用于教会的目的，我们对此就不可能绝对不关心。一般地说，假如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弊病，尤其是当

问题关系到虐待和压制下属人员时，我们当然要忠于我们的老习惯，认为自己不得不也在这一方面进行干预。不过除此之外，在有关教会经费方面，我们愿意尽可能保持克制态度。

先生们，我这就来谈谈预算的其他部分，即关于**教育、科学和艺术**的预算。在这方面我们的态度对于每一个对社会民主党有几分认识的人——当然很多人还不是这种情况——来说也是清楚的。人们明白，政府在原则上对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立的、敌视的态度。政府不仅反对我们的远大的要求（人们仍旧称这些为“空想的”要求，并且也可能认为它们是空想的），不仅如此，政府甚至最顽固地拒绝那些最普通和最微不足道的要求——其中一部分在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前已经在其他国家提出，而且不久前在我们本国也由其他方面提出了——拒绝在目前情况下实行任何哪怕是微小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部分改良。人们把我们当成政府的私敌对待，并从而当成国家本身的私敌对待——历届政府都认为它自己是国家思想的真正体现者，这是从来的习惯。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确有一切理由再一次最坚决地反对政府，并以不信任的态度注视它在各方面的行为。人们也不会看到我们在这一活动中很快变得软弱无力，即使我们不得不以我们的数量尚小的人力来做大得多的政党要做的工作。但是我们在这一斗争中实行的是一种有原则的政策，决不是一种阴险恶毒唯利是图的政策。……

我们在讨论当前的教育、科学和艺术的预算时也不会不这样做。这笔预算涉及国家最崇高的文化任务，如果仅仅为了激怒政府，或对它施加压力，以便从它那里获得事业上或甚至个人的“补偿”，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既是反动的，又是居心不良的，甚至简直就是政治上的一种不道德行为，而我们决不会犯这种罪过。此外，我们也很幸运，不必对议院外的不明智行为有任何顾虑；不过考虑个人的情况和利益对我们党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尽管有一些其他

人很熟悉这一套，我们党对此却是不沾边的。

.....

先生们！最后我还要谈谈艺术。这个问题我只讲几句就行了。当然艺术今天对人民来说可惜还是“珍馐美味”。今天大部分人民没有能力领会艺术作品并从中得到教益。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今天就出来维护艺术及其崇高的使命。由于当代的艺术恰恰是国家和社会的继子，我们因此就更那样做了。部长先生在摇头——关于国家必须对艺术履行的父亲的义务我们显然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文化预算中用于购买艺术品的经费是相当少的。当然我们将非常乐意批准这笔经费——不过有一个条件，这我马上就要提到。就是说，绝不允许把这笔拨款只用于购买单独一个流派或艺术家团体的作品。相反，我们必须要求在原则上完全同等地对待各种艺术流派，国家要购买各种流派艺术家的作品。

.....

我就讲这些。我已向你们指出，我们不得不对上述预算作了一系列谴责，虽然是针对一般的教育行政以及个别的领域。尽管如此，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还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这一声明不仅今天有效，而且在今后的年代，也就是当我们采取的态度会产生比今天更大的影响的时候也有效）正是在上述教育、科学和艺术的领域里始终准备十分乐意和慷慨地提供经费。我们绝不会对当前的不高的预算作任何重大的削减，相反，我们将力求首先使小学校的经费、并进而使科学和艺术的经费得到增加，其程度同我们在其他方面通过自己的影响能做到的大力削减帝国和邦的预算的程度一样。

载于《1893—94年巴伐利亚邦议会下院会议速记记录》第3卷第11—14、17—18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218—221页。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代表大会 关于议会活动议程的发言

(1894年10月24日)

同志们，首先我必须以我的名义和在座的巴伐利亚代表们的名义向你们承认，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的是，从前提出的那些提案在这里居然还要进行讨论。当德国各地开始对我们进行攻击时，我们就已经说过，这些攻击说明人们对巴伐利亚的情况很不了解，因此归根到底不应当怪这些人。只要我们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一下，一切怀疑一定会很容易得到消除。现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党代表大会^①就作了这样的解释，而且说得很详细，因此我们几乎没有想到还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说明。巴伐利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有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半，他们来自巴伐利亚各地。代表大会上虽然也出现了反对派，但在表决时却取得了**完全一致**。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毫无保留的信任投票。此外我们仍旧当选为巴伐利亚党的领导人。我们的代表在党代表大会前后大约作了七十次报告，在一切会议上都表现出完全一致。甚至对那些在这里似乎令人大为恼火的事情，也没有人表示过怀疑；我们的同志当中也有很多的老同志，他们对于纲领毕竟是有所了解的。总之，当你们考虑我们巴伐利亚人在这里向你们谈到的那些问题时，你们必须与之打

^① 189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邦组织的代表大会在9月30日通过决议，支持邦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投票赞成邦的总预算的行动。——编者注

交道的不是我们这些单个的人，而是整个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我们已经极其详细地说明了采取那种行动的种种理由；慕尼黑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在你们手里，但愿你们也看过那份记录。每一个人都能精确地了解我们所受到的攻击和我们所作出的回答。你们从阅读材料中得到的印象必定比从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在这里能向你们讲的话中得到的印象更加强烈。如上所述，我们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之后曾经希望，既然已经作了解释，那些提案会被撤回了。现在却不是这样。是的，我感到吃惊，我发现另一方面也有人生硬地坚持以某种强迫的方式解决问题。我感到有些困惑，不知道还应当就这件事对你们说什么，因为对于那些从慕尼黑的演说和决议还得不到启发的人，是根本无法加以说服的，但是如果我想把一切情况重复一遍，甚至连我也要感到失望了。（活跃。）但是我还是想就这个问题谈论几句，免得今后有人会说我们这方面未能对某些情况作出说明。我把库奈尔特同志当作《新时代》的“帕尔乌斯”来欢迎并为此感到荣幸。（骚动。）他在这里发表的意见至少在主要问题上是在帕尔乌斯的文章的翻版。我们已经说明，我们的预算根本不包括军费。因此库奈尔特撤退到国务用费分担问题上，但是他作为前国会议员理应知道，各邦对国务用费的分担是由帝国议会规定的，我们在邦议会里只应支付帝国为我们提出的数额。他把整个问题说成是巴伐利亚所特有的，那也是错误的；因为多年来巴登人和黑森人的情况和我们一样，而党的新闻检查官（活跃。）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实，在邦议会中就预算进行表决，同在帝国议会中就预算进行表决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帝国议会是决定重大原则问题、确定政策的总的精神的地方；邦议会基本上只需由此得出结论；还有它们必须研究行政方面的政策。库奈尔特同志现在提出了一大堆细节，然后完全象帕尔乌斯的文章一样，由此概括说，我们破坏了原则和背叛了纲领。当然我不能详细探讨

这一切问题，否则我就得在巴伐利亚上一所有关国家法和财政立法方面的大学了。我只想抽出几点来谈谈。他责备我们赞同压迫农民的土地税；但是土地税在我们这里是农民的所得税。如果我们立即赞同废除土地税，我们就会简单地把这种税收转嫁到邦内的其他居民身上。房产税的情况与此类似，按照库奈尔特和帕尔乌斯的说法，任何一间小房都因此而有负担。我也是一所小房子的所有者，其实那并不是小房子，我为此支付的却是整整九十八芬尼的房税。（活跃。）但是房税一项总计可以得到七十万马克！当库奈尔特一项一项（当然是以最有礼貌的方式）责备我背叛了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愚蠢，因为我这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在经历七个月极其紧张的工作以后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应当做什么。据说我们赞同政府预算就是对政府投信任票！您倒不妨去问一问我们的部长们：是否我们的演说、我们首倡的提案——我们比其他所有的议员都做得更努力——就是对政府的信任投票？我们曾进行了最无情的批评，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我们就对部长们进行了最尖锐的抨击并且投票反对整个内阁。现在突然说关于财政立法的表决成为一次信任投票了！但是如果我们打算等到预算中根本不再包括不符合我们的愿望的内容，那么我们当然还得作长时间的等待。库奈尔特同志或者不如说帕尔乌斯认为：否决总预算是议会中的最锐利的武器。不错，特别是当主张实行否决的人处于多数时确是如此。但是正因为那是最锐利的武器，人们不能天天使用它。就象大鼓一样，如果不停地敲，那任何格调和任何旋律都无法辨别了。如果我们使用一次否决预算的做法，这会给人留下印象；但是我们愈是使用得频繁，印象就愈是淡薄。比方说，在发生违反宪法的情况时，使用这种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时候，但是人们不应事先就使这种武器变钝。但是，他提出原则问题来了！人们能提出的理由愈少，他们就愈是要抬出原则来，因为他们以为原则毕

竟是没有**人敢碰的**，这种做法已不新鲜了。倍倍尔和一些同志的提案也把事情说成是这样，好象否决总预算简直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标志，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只要指出，不仅外国的自由党人，而且德国的进步党人都不止一次地运用过这样的策略，却没有因此而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这样的一次单独行动似乎就能体现“原则”，这种假设是以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为根据的：想给一切事物规定一个特征，然后**按照形式去辨别本质**。但是反对现行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既不是靠点名，也不表现在打红色领带。否则我们也就不得不重新回到采取十分惬意的拒纳租税的做法了。当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确定既不左倾也不右倾（“右派”就是我）的策略时，倍倍尔明确地表示，因为预算的五分之四用于军费开支，所以我们在帝国议会中投票反对预算。这确实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但是各个邦议会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不涉及军费，文化支出是主要的。关键完全在于对各项具体预算的态度。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以及整个说来没有通过我们的议会内和议会外的全部活动来维护原则性的立场，即使在最后表决时投反对票，也不能给我们戴上真正的和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光轮。最后的表决纯粹是一种形式，而**一切形式都是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纯粹的实效问题，即纯粹的策略手段**；只有支配这一行动的思想才是决定性的。因此这里涉及的不是原则，而是一个实效问题。但是不仅我个人是这样看，而且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看的。这个党认为，我们的处境决定我们只应当在例外的情况下否决预算。也许来自北方的同志不能一下子就理解这一点；因为甚至那些定居在我们这里的北方德国人也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适应我们的**巴伐利亚方式**。首先他们绝大多数人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从德国北方带来真理的福音，如果巴伐利亚人不是转瞬间就理解这一切，那就往往要听到这样的说法：“巴伐利亚人真有点愚蠢”。老实说，人们应该理解

我们的特殊情况。巴伐利亚人主要是农民。我们的人民不是爱读书的人，他们宁可去参加集会；他们不是由训练有素的、能在政治上辨别细微差异的政治家组成的。如果极光也在我们这里发射出它的耀眼的光芒，也许那样的时刻还会到来。但是目前我们的人是感情用事的人，他们对政治事件和政党是凭感情来从大体上作出判断的，因此只知道非此即彼！他们不会理解，人们怎么可以对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在一度表示赞同后又最后表示反对。我们赞成有利于农村居民的开支，赞成提高小职员和国家工人的工资，赞成增加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费用，我们由此赢得了最大的同情。但是，如果我们的敌人能援引最后表决时的情况来证明，我们虽然说了漂亮话，然而没有行动，那么，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使我们的工作的成果化为乌有。我相信，其他各邦的情况完全一样；但是我首先只是必须为我们自己辩护。我说：**谁想争取人民并在政治上对人民进行教育，他的政治立场就必须是人民能理解的。**我们现行的策略就是这种情况，甚至在人们只是从敌人的报纸上来了解我们的行动的地方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另一种行动，那么任何一个笨蛋都能把我们说成是人民的敌人。人们由于我们的成就给了我们很多赞扬，但是但愿人们也相信我们不会如此偏执，竟在邦议会里进行七个月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后又一下子使自己的成就重新化为乌有。我们的鼓动应当为我们争得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这就是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因此如果要求我们根据你们那里的情况而不是根据我们本身的情况来调整我们的策略，那是愚蠢的。关于人们对巴伐利亚的情况是何等的无知，不久前《前进报》提供了一个事例，它在谈到刑事犯罪率的一篇社论中指出：众所周知，南方德国人是比较粗野和缺乏教养的！（活跃）但是同志们，不管你们怎样想，你们却不得不对下面一点感到吃惊：巴伐利亚的同志尽管包括各式各样的人，但他们的意

见毕竟是完全一致的。明天我们要开始讨论农业问题。我们在这里的人大家都想争取农民，争取农村居民。但是，任何农村鼓动工作的首要的先决条件之一都是，认识和理解人民和农村的特点。如果你们打算从忽视这一特点和从虚假的一致行动开始，**这对我们的农村鼓动工作就会是一种特别糟糕的开端**，因为这种一致性实际上无非是模式化和千篇一律化，是普鲁士军曹精神的产物(骚动)，这种精神打算从一点出发对一切发号施令，并且打算用一块巨大的水平板从整个德国和邻国平推过去。这种精神已使普鲁士的统治在德国如此普遍地遭到人们的憎恨(喊声，很对)，如果这种精神也使我们的环境遭到毒化，那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事情了！(抗议声。)关于全国性事务的原则和一般策略，党代表大会是有最高决定权的；但是说到各邦事务的策略，**那自然是有关的邦的党组织的事情**。否则各个邦的党代表大会究竟还有什么事可做呢？难道它们应当仅仅是党的组织系统的一个方便的初级行政机构吗？目前的这些提案打算为各种前途规定一条确定不移的铁的法则。结果会怎样呢？在不同的邦我们对各个具体的事情的关心往往是不同的。我仅以巴伐利亚关于居住权的规定为例。过去我们在柏林常常就这种规定是否合适进行争论。如果党代表大会打算给我们确定策略，那么你们有一天也完全会突然想到要指示我们取消我们关于居住权的规定。另一个例子是，倍倍尔在上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为一项值得注意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如果能把各个邦、当然也连同邦议会一道完全取消，那就更好。也许倍倍尔能够争取多数人赞成这种观点，并且随后要求我们投票赞成取消我们的邦议会。(倍倍尔抗议声)怎么，倍倍尔，这个结论还远远不象我们通常从你那儿听到的那样大胆呢！(骚动)至于倍倍尔的提案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对此我还要举一个例子：昨天我问过耶施特同志，为什么他们在黑森邦议会上投票赞成

预算。他回答说，很简单，财政立法方面有两个草案供我们选择，一个金额较多，一个较少；如果我们不投票赞成金额较少的草案，我们就必须缴纳更多的税款。如果倍倍尔的提案得到通过，那就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要禁止我党的邦议员在争取缴纳较少的税款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简言之，我和我的巴伐利亚的同志们大家都认为对这样的表决进行任何约束都是缺乏政治眼光和意志薄弱的表现。因此，当倍倍尔也参加其他提案人之列，提出一项可敬的党的执行委员会亲自为之争取票数的提案时，我们对此大为吃惊。（哦！）哎呀，我们办事可得光明正大（活跃。），其实那是书记们自己传出来的。（活跃。）老资格的政治家们竟提出这样的提案，那是令人惊讶的。要知道，一个政治家的首要准则是，决不自动地介入那些必然使人处于尴尬地位的、可疑的事件。他只有在被迫时才做这种事。但是这里绝不存在强迫或者必须的问题。昨天我曾和一些在那个提案上署名的代表交谈。他们说：如果让我们来决定，我们不会那样做；但是既然问题已经拿到桌面上讨论，我们就不得不那样做了。（喊声：说出姓名来！）但是我要说，处在领导地位的人如果十分谨慎，就不应对任何随便一种冲击作出让步，不应在出现一种愚蠢行动时，帮助它加深并且得到确认。这些事情过去一向怎样，今后不管如何也将保持那样，你们只需要听其自然就行了。这就是说，各个邦的这一类表决不是原则问题，而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这样，整个争论就结束了。难道我们巴伐利亚人要求把我们所做的事推广到全党吗？我们不干涉任何人的事情，我们不会这样想的，我们只想求得我们自己安静。（十分活跃。）难道你们看到过我们南方德国人作为党的新闻检查官而装腔作势，手中拿着红铅笔来监视别人的行动吗？难道你们以为我们没有材料吗？哦，不是的；柏林人首先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活跃。）但是，正象我们很不愿意发号施令一样，我们也很不愿意被人摆布；如果我们的

态度在巴伐利亚以外也发生影响，那么这只有通过示范和经验才能做到。不过有一点倒是值得注意的：近些年来，黑森和巴登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谁也没有加以注意。在那里这不是原则问题。现在究竟为什么我们这里的情况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呢？我受到明确的委托在这里声明，我们在巴伐利亚发现，近些年来你们同我们闹的摩擦够多了，如果你们打算到此为止，那就好了。党员同志们，我提醒你们不要作出一项模棱两可的决定，那种决定只会造成持续不断的**不和**，此外**纯粹的狂妄自大也会引起这种不和**。我在针对我们的提案中又一次看到那个老怪物，它打算把一切推向**极端**，近些年来它已经在玩火，并且玩过了头，我希望它终于不再搞这一套了；倍倍尔提案的牵强特点也已经在它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它的**开头**两段——请起草者不要见怪（倍倍尔：绝对不会！）是一套老生常谈；我们早已熟习的东西却被作为最新的真理拿来讲给我们听。（倍倍尔：那是古老的真理，现在还是！）但是人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正是必须从老生常谈开始。以前党团中有人说，巴伐利亚是我们无法接近的。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们已向你们指出，它是完全可以接近的。我们的成绩完全可以同其他一切成绩相比；我们认为自己为党争得了荣誉，并且在我们邦取得了远远超出我们人数的影响。（很对！）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放弃了任何机械的鼓动方式，对我们的邦和人民进行了研究，并使我们的鼓动工作与之相适应。我们的策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巴伐利亚是唯一可行的，因此是确定不移的策略，如果我们改变策略，那么我们的成绩也就会消失。我们巴伐利亚人肯定是最不会对全国的党和纲领不忠实的人。但是要我们亲手去破坏我们本身的事业——你们是不能要求我们这样做的！党代表大会应当使我们更加容易进行鼓动工作，而不应当为它制造困难。我们巴伐利亚人和南方德国人的提案不对任何人实

行强制，却会给各个邦以采取有效行动所必须的自由，因此我们请求你们接受我们的提案而否决倍倍尔的提案！（热烈的掌声。）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4 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4 年柏林德文版第 109—113 页。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代表大会 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1894年10月25日)

农业问题是我们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问题，党在若干年内都要处理这个问题。因此，当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考虑到我长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建议我作一个报告的时候，我高兴地表示愿意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从而尽量促进党在农业领域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我想先说明一句，休恩朗克和我作为报告人达成如下的分工：理论部分我只是在必要时涉及一下，对于大生产以及与它相关的雇佣工人问题——这个问题反正是简单得多——也不作深入的探讨，我所要讲的主要是真正的农民，就象在我的故乡所见到的那种农民。

从实践的和政治的角度看，社会民主党自然是随着产业工人运动而产生的。它必然首先在这样一个生产领域里活动，在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得最激烈，资本主义最初促进文明、最后违背文明的发展结果最为显而易见，社会状况极其尖锐化，最适宜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改造；在那里，资本主义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并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向我们的大军提供精锐部队。党在这个领域所进行的工作，我这里就不需要说明了。它已把城市的和产业的工人大部分争取过来了，剩下的部分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但是经济生活不止包括工业，真正从事生产阶级的另一半是从事原始生产即农业和林业的人员。在德国，他们的数量差不多相当于

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从业人员的总和。在个别的邦，例如巴伐利亚，农业的地位更是远为重要。我们必须承认，迄今为止，社会民主党由于用很大的力量去研究解决各式各样迫在眉睫的任务，进行各式各样的斗争，因此整个说来对农业生产关心得太少了。即使关心了，也多半限于纯理论的。旧的国际的几项决议，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几篇著作——其中李卜克内西的《土地问题》最为出色，读的人相当多，但照着去做的人却相当少，——长期以来，仅此而已。此外，对农业问题之所以往往一带而过，还因为有一种观点占着上风，即认为在工业中所观察到的经济发展规律完全可以无条件地运用于农业，因此，农业问题对社会主义者说来已经解决了。从那以来，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当然，这一切对农业也并不是没有影响的。自然经济被商品生产所取代。国内的粮食生产已经依赖于世界市场，并且被外国的竞争所排挤。结果是收益下降，债务增多，遇有歉收就困境毕露。军国主义化和赋税负担更加剧了这些弊端的后果。农业人口处于日益严重的困境之中。过去他们是统治势力不可动摇的坚实基础，现在已从睡梦中惊醒。在他们当中，不安和骚动与日俱增。他们已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本能地起来反对自己迄今的代表者，他们在寻找一种愿意并能够真诚地对待他们、帮助他们的政策和阶级。简而言之，农业人口，这一伟大的、迄今消极被动的因素，现在已经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了。这些人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我们这个党是一个原则上“不仅反对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与压迫，而且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与压迫”，并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努力夺取政权的党；对它来说，现在是对农业问题给予最大的关注并准确地表明自己对农业问题的立场的时候了。

那么，迄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在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究竟怎样呢？1867年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曾发生过一次小小的争论。在此之后，接下去的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了如下决议：“因为农业生产要求大规模经营、要求使用机器和协作，……所以经济发展本身已使土地转变为国家的公共财产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成为国家财产的土地应租给农民合作社耕种，从而使整体财产“不是完整的”，而是为未来的几代人和现在的耕作者提供保证，对后者说来，主要是保证他们“占有土地的时间十分充分”。因为存在一个力量不算小的少数派，主要是法国人，这个问题在下届即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又提出来辩论。伦敦总委员会通过埃卡留斯建议作如下声明：“经济的发展使耕地转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并由国家把土地租种给合作社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但是所通过的决议是这样写的：“社会有权来进行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已成为一种必要性。”在土地的使用方面，54票赞成由“联合起来的村镇”耕种，53票赞成“租给个体农民，特别是租给农业合作社”。爱森纳赫派1870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又回到原来的立场：“生产的需要以及农业学规律的运用要求大规模经营”，接下去就说：“现代社会的发展，将使土地转变为公共财产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作为过渡阶段，还要求首先从公有的大地产和大庄园做起，此外，还反对把公共所有退回到私人所有。党对于土地问题明确、公开的表态到此遂告结束。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都没有专门论述土地问题，而简单地把它和工业生产完全等同起来。

党对于农业问题的看法直到最近期间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党纲的一般原则已提出了解决办法；资本积累的过程、机器技术的发展、大生产的吞噬性对于农业的影响也完全象对于工业一样。马克思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写道：“如果英国土地所有者人数的减少和地产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么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情

况就会发展到象在古罗马时期那样，当时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最终属于六个所有者。”^①这个针对英国状况的条件句被正面地接受下来并普遍地应用于所有国家，而且人们认为，这个过程将极其迅猛地向前发展。这样一来，无疑是等于向农民宣告了判决，说他们的灭亡是无法阻挡的，而且近在眼前；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大生产被看作是**唯一合理的**。目标是合并成巨大的集体化企业，这些企业由大的工人合作社（我们往往也听到“产业大军”的说法）经营。既然持有这样的观点，社会民主党向农民提供的当然只能是要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要他们服服贴贴地听任自身的灭亡，而农民聊以自慰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彼岸他们会时来运转。这个观点看起来很有原则性，但是不言而喻，拿到农民那里却极少得到反响。我们的**政治**批判连同有关的要求已开始逐渐地取得农民的赞赏，但是当农民想要知道，社会主义对于他们的**特殊经济状况**持什么态度时，听到的却是公有制（而这个公有制他们只能理解为对自己财产的彻底掠夺），那时他们对我们的同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此外还有过去的农村鼓动方式。星期天，工人们象蝗虫一般从城里涌向农村，散发往往很不高明的传单，更有甚者，把那些通篇是党内争执的报纸也拿出来了，而报纸上使用的语言不要说是农民了，就是城里的工人也是难以理解的。那些青年人对事业满怀热情，但却不熟悉自己的任务，他们站在高处向农民讲呀讲呀，那副表情好象在说：“听着，你这个笨蛋，难道还不懂吗？”（极为活跃。）你们可以想象，等他们离开之后，农民们彼此议论些什么。（活跃。）接着又有一批人去了，向农民讲唯物史观，（极为活跃。）讲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讲统计学和其他学科。在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党报上读到，我们的鼓动取得如何巨大的成绩。（极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9页。——编者注

为活跃。)但是,当这类鼓动赢得的鲜嫩桂冠稍许干枯下来的时候,继那些过高的期望而来的则是酒醒后的烦恼。这里所说的是个别情况,但也适用于全党。你们可以回忆一下1890年在哈雷的情景。当时人们满怀希望急不可耐地喊出:“向教权主义者开战!到农村去!”在场的同志们都欢呼起来。可是到了上一届科伦代表大会,调子就迥然不同了。会上有人悲观地宣称:“对于农民目前是无能为力。即使我们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在农民中赢得的支持者总还是有限的。”一句话,我们在农村中进行的鼓动得不偿失,拿不到什么东西了。就是这样,一会儿兴高采烈地上了天,一会儿垂头丧气地入了地。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认为三言两语就可以把农民轻而易举地争取过来,那是幻想;但是认为农民是无法接近的,也不符合实际。只要我们采取的方式得当,现在,当农村人口的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无疑是可以争取他们的;如果说我们还没有把他们中的很多人争取过来,那大半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当然啰,要在农村进行卓有成效的鼓动,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必须让农民看到,我们对他们的日常疾苦是同情和了解的,并且准备尽力帮助他们,不是在遥远的将来去帮助他们——一提将来,农民总觉得是遥远的——,而是从现在做起。(很对!)是呀,产业工人也是要求我们这样对待他们(指产业工人——编者)的。第二,必须使农民同情并理解我们的全部工作方式。必须唤起他们对我们的事业和对我们的人的信赖。只有这样,他们才肯与我们开诚相见,才肯听从我们。(很对!)至于说到鼓动方式,那么,想要下乡的城里人必须首先把自己过去的鼓动手册统统烧掉,先要学会体察农村的生产状况,熟悉农民思想和感情。城里的工人进入的是一个新的天地,他对这个新天地切不可等闲视之,而是要了解它;否则他对农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文不值,就象农民给他讲授工业课一样。也应该放下城里人高傲的架子,不要觉得农民是愚蠢

的，实际上农民只是没有经过训练而已。当然，我们有责任启发农民，但是我们也可以向农民学到很多东西。所有传统的陈词滥调，简单的类推，把工业中的事实机械地搬到农业中去，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容许的。只有全心全意地深入下去，才能对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必要的了解。不要长篇大论地引证推理，不要一长串的数字，不要“科学的”华丽词藻，不要气势汹汹地、咄咄逼人地向听众说来说去。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小心谨慎，对别人的观点要多加宽容，要懂得别人是怎样想的，要用他的语言讲话。所谓抓住农民的头发把农民拉过来的做法，是再荒唐也不过了，这是我们过去在巴伐利亚的一个教训。但是，鉴于农民具有共同的特点，或许有人在其他地方有过这样的教训。如果农民发觉有人无论如何想要从他那里搞点什么去，那他就会寸步不让。（活跃。——喊叫声）啊，你们是说，今天上午已经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是啊，我向你们说过，我们巴伐利亚人属于农业人口！在我们那里，政府所能干出的最笨拙不过的事莫过于派遣一个热心的官员向农民说教。农民会想：“这家伙这么卖劲，准是想从中捞点什么”，于是就跟他对着干。所以，情绪这个因素绝不可以忽视，附带说一下，对于城市居民，这一点也是要注意的。这里我首先想到了宗教，它与一个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政党毫无关系，而且我们对于宗教大半也是不理解的（活跃）。现在我们终于不得不把我们纲领中有关宗教的漂亮词句付诸实现，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了。必须坚决摒弃过去时常采用的那种两面做法，即一方面把宗教说成是私事，另一方面又以极其卑劣、极其愚蠢的方式诋毁僧侣，搞文化斗争，要知道，这给党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呀！其次我们必须从农村情况差别很大这一点出发，学会按照土质、宗系、历史发展等等来评价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特点，力戒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作出轻率的判断，根据走马观花所见下结论，力戒机械式

的概括。如果我们按照上述的规则去做了，那么，在有关巴伐利亚人的辩论中就不致出现那一系列错误的见解了。向农村鼓动员提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无论到哪里，都要从当地农民特有的情况出发，然后向农民说明这些情况和工人运动的联系，在这当中特别要指出，工人低下的购买力必然给农业造成损失，这样就可以使农民认清工农两个阶级具有共同的利益。此外，除了热情还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要等待果实自然成熟。——至于那必要的阳光雨露，自有客观事物和我们的敌人代为操办！当然这一切不是轻而易举的，无疑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是第一，并不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当农村鼓动员。社会民主党今天已经十分强大，它所要完成的任务已经十分广泛，因此有必要进行分工了。党的大部分人将一如既往地活跃在产业工人运动中并深入下去，另一部分人将从事科学研究和著述，再有一部分人就要投身到农业问题和农村鼓动中去。其次，这工作反正是一定要做的。我相信，社会民主党迄今既已表明自己能够实现由于环境的经常变化所造成的各种要求，那它也一定会胜利地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要使鼓动技巧对我们有用处，那就必须不是空着两手到农村居民中去，而是能够实实在在地促进他们的利益。我这里所讲的不是政治性的事务，不是赋税政策、军国主义、对自由的要求等，简言之，不是我们纲领的第二部分——诚然，这些事情在农村鼓动中现在具有而且今后仍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这里所讲的仅仅是经济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向农民提供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农业的现状究竟怎样？毫无疑问，农业是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有人说，整个农业的困难局面只不过是喝着香槟酒的容克地主和跟在他们后面跑的永不满足的农民虚构出来的，这种说法是自由派庸俗的胡言乱语；讲这种话的政党从一开始就看不清社会现象，并且无法理解，正是它的这种态度才

阻碍了农村人口脱离反动政党。遗憾的是，我们的人中也有一些受到这种幼稚说法的迷惑。必须同它断然决裂。要了解事实真相，只须看一眼粮食交易所的行情表就行了。由于北美、南美、印度和俄国的竞争，免税的价格已经降到本世纪迄今最低的水平。再请看一眼农业负债的数字吧，这些数字虽然由于缺少准确的、全面的调查而波动很大，但是它们无疑表明了平均负债额达到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根据最低的估算，德国农业的负债是150—200个亿，而且每年增加2亿5千万，还有的估算要比这高出一倍。这样一来，农业生产的收入越来越流入剥削者的腰包，而耕种土地的人却越来越沦为单纯的管理者，不仅如此，他还要独自承担一切风险；当年的什一税是够叫人辛酸的了，可什一税至少还是按实际收成交纳的，而今天，交利息的奴仆不论什么情况，即使是颗粒无收也得照付不误。再说情况的发展并不象社会主义者从前所预言的那样，他们认为，小生产者将迅速地被大生产者吞吃掉，而大生产者合理的经营方式将很快占据统治地位。诚然，在旧普鲁士、梅克伦堡等地，大地产有了显著的增长，但这主要是那些限定继承的大地产，而且实行扩大的原因和采取的手段并不是利用大生产的好处。此外，并不单单是中小地产负债，骑士庄园也负债，甚至大部分负债更多。根据麦岑^①的统计，在旧普鲁士，农民的实际负债数超过地租纯利的18倍，大地产超过28倍，小地产超过46倍。根据普鲁士政府在42个第一审法院辖区所作的调查，小地产的负债数占生产价值的24%，中等地产占27.9%，自主地产占53.8%。大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虽然增多了，但是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甚至未能引起什么变革。至于说到人们当初曾寄予巨大期望的蒸气犁，那么它在德国的使用直到今天还寥若晨星。是

^① 奥古斯特·麦岑 (August Meitzen 1822—1910) ——德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写有许多德国土地关系史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啊，甚至在英国，蒸气犁的使用新近也倒退了。由此看来，大生产在今天农业的竞争中，除非在具备特殊条件的地方，并不显得如何优越，尽管牺牲普遍的利益而人为地给它大量好处也不行。谷物生产中是如此，在畜牧业中尤其如此。鉴于粮食生产无利可图，而且目前世界市场尚有余地，畜牧业理所当然地处于发展之中。为反对这一点，有人举出北美的几个例子——特大的农场、蒸气饲肥等等。对这种个别现象，我们应该持怀疑态度，无论如何不要认为它们是普遍的，何况它们的成果还没有达到确实可靠的程度。一般说来，在集约化经营的畜牧业，即在真正的牲畜饲养中，畜群的头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最高限额应在60—70头之间。所以，畜牧业特别适应中小规模经营。一般说来，水果、葡萄、蔬菜及其他商业植物的种植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与工业方面的经验是差别很大的。为了解释这个现象，首先要考虑到，土地耕种者不仅生产商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为本身的需要生产。还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个人独自生产（即使有帮工协助）占绝对优势的影响，农村的生活方式等等。不论怎样，农业中的中小地产的破产，一般说来不是由于农业生产内部大与小的竞争引起的，至少不象在工业中那样厉害，促使他们破产的因素基本上来自外界，来自货币资本。有不少农业问题专家从所有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说，大生产在农业中只有当实行粗放耕作时才具有优越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经营的集约性日益加强，经营规模趋向于缩小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无法作出判断。但是，从以上所说无论如何有一点你们是清楚的：农业问题极其复杂，经济发展规律在农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在工业中，因此农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特性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一切很可以表明，农业将以其特有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说很多地区的中小生产，即独立的农民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越来越受排挤，国家若不给他们帮助，将来一定要灭亡，这是个确定无疑

的事实的话,那么,同样确定无疑的是,这些农民今天还存在着,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在经济上还是有生命力的,就是说,有经营能力的。

从以上所述看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广大的农村人口。鉴于现有的形势,我们只有如下的选择:或者是对于农民的负债过程和被剥夺的过程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也就是按照曼彻斯特学派的模式“听其自然”发展。这样做,我们首先就同我们在工业雇佣劳动领域的全部行动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在那个领域,我们并不因为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阻挡而放弃同资本主义的一切有害现象作斗争,特别是竭尽全力同资本主义对工人的腐败影响作斗争。其次,农村状况的继续恶化对于城市工人状况也直接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我们争取劳工保护和改善工人状况的努力将会因此而越来越受到损害,一部分努力将会是徒劳无益的,受不到保护的、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拥入城市的人数日渐增多,会成为廉价劳动力而使工资降低。最后一点,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中,我们使自己扮演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角色,无法施加任何影响,并直接地迫使农民离开我们而投入最坏的反动势力的怀抱。那样一来我们反正就得准备好好地等着。或者是我们应该转向布朗基主义的立场,只想带领无产阶级这个少数去进行社会变革。这样一种策略是行不通的,只说一个简单的道理就行了:在一个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不考虑或者违背农村人口的意志,是无法实现任何广泛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卜克内西在他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说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行事,避免做出任何可能使农民把我们看成怀有敌意的举动来。他举出因城乡对立而失败的法国二月共和国的例子作为鉴戒,并大声疾呼:“没有农业工人和农民,我们的斗争就是没有希望的,和他们在一起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任何违背农民的意愿取得的成果都会是昙

花一现的，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接踵而来的必将是可怕的反动。而且即使出于原则上的考虑，我们也不能走这条路。我们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我们不打算统治人民，不打算把法律强加在他们的头上，我们不打算采取欺骗和威吓的手段把政权抓到手，而是要按照人民的意志夺取和行使政权。

如果我们打算遵照这一原则行动，同时抓紧有利时机使政治上正在觉醒的农村居民脱离那些一直统治和欺骗他们的政党，把他们引导到我们这边来，那么，关于选择应走的道路的问题，大体说来是不可能有什么疑问了。在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曾经有人提出要警惕“热中实际工作”的倾向。如果我们听从了这一警告，那我们当然最好是马上就放弃农村鼓动，因为农民有理由既不满足于单纯的批判，也不满足于对未来的憧憬，他们和工人一样，当前就要求拥有积极的手段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很对！）我们一些外国的兄弟党也已经这样做了。丹麦社会民主党走在最前面，它制订了自己完整的农民鼓动纲领，纲领中提出，“为了在现存的社会状况下，使农业工人取得较好的生活条件”，社会民主党特别要求对封地和教会的土地实行国有化，由国家购置土地租给个体工人和合作社耕种。在匈牙利，人们要求当局采取措施以“减轻”发展过程带来的“痛苦”，要求给小农减免租税、发给低息信贷以及对大地产实行国有化。罗马尼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那里要求把国有化的大地产分配给村社。在意大利，今年在利古里亚、伊莫拉和卡尔皮召开的几次代表大会，要求没收耕种低劣的土地并把它们分配给得到乡镇补助的合作社，要求废除土地税等等。比利时人的竞选纲领包括如下几点：把国有土地租给个体工人耕种，特别是租给合作社，国家银行提供无息信贷，农业委员会里应有农民、佃农和农民工人的代表，委员会应就劳动时间、最低工资额、租佃时间、租金额作出决定。《人民报》就这个纲领写道：“它明确地突出

了集体化的目标，同时又考虑到实际需要和直接需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的 and 改革的意义上进行着，在这方面，最近几年运动取得了长足进展；社会主义者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下子拔地而起的，同样我们所努力争取建立的集体化社会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我们的**法国**同志步子迈得最坚决。1892年在马赛通过的、《前进报》已经刊载的著名的十一点农业纲领已在农村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就，使敌人异常恐慌。戴蒙伯爵对此评论道：“如果社会主义找到我们国家的田间小道，那我们的事业就完了。”当然，他的这番话更加促使我们的法国同志千方百计把乡巴佬雅克^①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在今年的南特代表大会上就这样做了。会上对土地纲领作了改进，同时对于敌人的指责给了明确的答复，敌人至今一直把社会主义者歪曲成“瓜分者”和毁灭者，而现在就要让这帮人看看，社会主义者已向农民表明，唯有他们才能够保护农民免受剥削和贫困化。于是，响起了一片叫骂声，攻击社会主义者的所谓自相矛盾、前后不一、两面手法，甚至说什么社会主义者“笼络农民”（活跃！）。我只想引证几句我们法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拉法格认为：地产继续向游手好闲的人手中强行集中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即使在它掌握政权之前，也可以逼迫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种种改良，以缓和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适当减轻各类农村居民——农民、短工、佃农的困苦。土地是农民的劳动手段，正如刨子是木匠的劳动手段、手术刀是外科医生的劳动手段一样。农民、木匠、外科医生并不使用自己的工具来剥削他人，因此他们无需担心社会主义革命会剥夺他们的劳动手段。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剥夺剥夺者……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夺取了

^① 法国地主给农民起的绰号。——编者注

政权,它决不会干扰农民平静地拥有自己用血汗滋润肥沃的土地。相反,它将取消农民的负担,废除他们的债务,向他们提供机器、肥料、种子、牲畜等等,让他们用实物抵偿应尽的义务。”盖得认为:“小农全身心地投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是可以理解的,除了这点财产,现在他还有什么自由呢!党从一开始就划清了生产者自己使用的劳动手段的个人占有同为游手好闲的人谋取利润的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界限。集体主义绝不是想剥夺农民,而是要把农民从各种负担下解放出来……凡是由于使用蒸气和机器使生产资料获得高度发展,从而排除了个人占有的地方,解决的唯一形式就是把生产资料归还集体。但是有些地方,在现有的情况下,生产资料(诸如土地)在一个时期里还在生产者手中,这里的所有制个人占有形式还要维护。这种形式妨碍了乡巴佬雅克成为无产者或雇佣工人。社会主义政党并不想入非非,而是按照经济发展行事,顺应经济的发展,今天办不到的事不要强求,留待明天去办,让明天研究出解决它的新问题的办法。”饶勒斯认为:“我们必须使小农、佃农、雇佣工人尽可能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既然农民是不剥削他人的,农村的小所有制在社会主义组织体制中就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这个体制中劳动的成果属于劳动者。”最后再请允许我从法国社会党南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引证几段话,这个决议不仅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而且也在党内赢得一致拥护。“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鉴于如果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至于只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那么,目前(至少在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农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

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者分隔开来,就会使无产者化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鉴于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使被夺去了土地的农业生产者对大地产游手好闲的所有者实行剥夺,就象剥夺矿山、铁路、钢铁厂的所有者一样,那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保护自食其力的所有者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所有者方面的侵犯;鉴于上述事实,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利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的纲领,以联合农业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工人去与共同的敌人作共同的斗争。”^① 这里我想补充一句。据我所知,法国同志的行动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赞同。^②

我们德国党迄今还没有就农业问题开展过如此规模的公开讨论。不过令人高兴的是,最近几年大家的认识也在提高。《前进报》、《社会民主党人报》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卫博士的出色著作,我希望其他地区能有相当多人起来热心地效法他。我或许可以把我们在巴伐利亚邦议会采取的行动也提一下。我们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国家保护农民,使他们不要负债过多和被剥夺,同时也使国家具有监督权,并扩大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影响,因此,我们的行动是循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前进的。

党员同志们! 今天的问题不是把某个细节确定下来,此时此地不是确定细节的场合。我的任务只是向你们表明,我们迄今对农

① 关于法国社会党南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农业纲领,参见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3—587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针对福尔马尔的这句话在1894年11月26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予以纠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1—562页。——编者注

业问题的立场已不再适应当前经济、政治和党务的发展的需要，我们今后必须象对待工业生产那样，密切注意和研究农业生产，必须积极行动起来，要求当局采取措施立即保护农民和农业工人免受资本主义剥削，并同时为未来的更高的经济形式开辟道路。我们报告人象各个提案的提出人一样，向你们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农业委员会**，其任务是，深入研究现有的大量科学材料，促进人们在著作和鼓动中利用这些材料，以及提出纲领性的措施。如果这个委员会能由熟悉这项工作的行家组成并享有必要的权力，那么，它所花费或根据它的建议所花费的劳动和资金将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成倍的收益。

时机对我们的行动最为有利。我们的敌人对农村人口的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统治阶级各政党之所以日益狂暴并迫不及待寻求更为尖锐的武器对付我们，其原因之一就是看到了以上事实。面对这种形势，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最好的回答就是，在敌人正计划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的时候，鼓足勇气，向敌人政权最后的、至今没有受到过动摇的堡垒发起攻击。如果我们看准了目前局势并能够左右它，如果我们把机智和热情、深思熟虑和冲天干劲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就会朝自己的目标迈出巨人般的一步！（热烈鼓掌。）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4 年法兰克福（美因河畔）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4年柏林德文版第142—152页。

（李成毅 译）

德国社会民主党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代表大会 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

（1894年10月26日）

农业问题是现代经济方式的产物。国内的农业越是依附于世界市场，依附于同各农业国展开的国际竞争，它就越是受制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受制于银行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农业问题也就越加迅速地尖锐化而发展成农业危机。

在普鲁士-德意志，农业主阶级（它与大企业资本家并无本质的区别）正在和农业贵族斗争。农业贵族今天不过是依靠赠款、保护关税、输出补偿和赋税特权而被人为地维持着。尽管如此，易北河以东地区容克地主的农业经济是注定要灭亡的，其中的大部分由于经营不善、继承人分家、尚未付清的贷款等，已经债台高筑。

除此之外，大地产和小农经济的对立在持续尖锐化。小农身受兵役和赋税负担的重压，深陷抵押债务和人身债务的罗网，内外受制，濒于毁灭。保护关税对他们来说恰如画饼充饥。关税政策和赋税政策限制了劳动阶级的购买力，使农民的市场越来越狭小。农民正在无产阶级化。

另一方面，农业主与农业工人间的阶级对立也越来越明朗化。

* 这一决议案是由福尔马尔和休恩朗克共同提出的，1894年10月25日提交大会讨论，10月26日以大多数票通过。——编者注

农业工人阶级产生了。它受到封建法律的束缚，这些法律禁止它享有联合权，把它置于奴仆规约^①的管制下。它从旧的宗法式的关系中解脱了出来，而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依附性却曾包含了某种生存保障。中间阶层即占有土地的短工、靠出卖劳动作为补贴的小农，尽管有各种表面上的改革，仍然沦为农村无产阶级。由于营业的不稳定、压低工资、待遇恶劣以及流动工人的增多，土地资本和农业劳动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农业工人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

有鉴于此，社会民主党必须极其严肃认真地对待农业问题。对待农业问题的前提条件是，深入认识农村现状。因为德国的农村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各有差别，所以宣传工作必须适合当地状况，对待农民也要考虑他们的特点。

农业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当土地及劳动资料重新交还生产者——他们今天作为雇佣工人或小农为资本耕种着土地——，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最后解决。但是目前必须采取彻底的改革来缓和农民的困难处境。党的最近任务是，提出一项专门的农业政策纲领，以农村人口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阐述和补充爱尔福特纲领中提出的对农民和农业工人特别有利的最近要求。

保护农民的措施应使农民作为纳税人、负债者和土地经营者不致遭受损失。

保护农业工人的措施应该为农业工人争得结社和联合的权利，应把农业工人提高到产业工人的水平上（废除奴仆规约），并通过制订专门的社会政策保护法（劳动时间、劳动条件、视察员）使他们不致遭受肆意的剥削。

^① 奴仆规约是十八世纪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地主专横地对待农奴，该规约直到1918年才被废除。——编者注

应成立一个专门的农业委员会，负责向下届党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建议。

休恩朗克 福尔马尔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4 年法兰克福(美因河畔)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4 年柏林德文版第134—135页。

(李成毅译)

在巴伐利亚邦议会关于文教 预算的演说(摘录)

(1896年3月2日)

.....

先生们!当委员会讨论到讲学自由的问题时,中央党方面发表了如下的意见:不允许在大学里给公开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过多的活动余地;不然一些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假说就会得到讲授;部长先生要更加严格地制裁滥用教学自由的行为;因为谁破坏宗教的基础,也就是动摇国家的根本,因此必须直截了当地免去那些损害国家基础的教授的职务。

如果把这种意见同前几年在这个议院里就这个题目进行讨论的情况比较一下,人们就会承认,这次是以不太生硬的形式,或者不如说以不太露骨的形式干涉科学方面的讲学自由,而中央党的先生们在斗争情绪高涨的那些日子里发表言论时的态度同今天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通常采取的态度相比,是更加粗暴的。但是这些先生们在这一方面的企图和目的是明确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应纯粹按照他们这一次所说的话来考虑。.....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自由派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坦率地说,显得疲疲沓沓。此外还有部长先生所采取的态度,对此我在下面将不得不评论一下。如果考虑到这两点,那么人们只能说——本邦许多方面的人士也都有这种印象——如果在这个全体大会上不是用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反对中央党的观点,那么中央党由于能够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件事,只会增加继续进行他们反科学的斗争的勇

气和热情。(右边活跃。)

我不明白，你们笑的是什麼。也许是针对我讲你们在进行一场反科学的斗争这一说法吧？先生们，你们的确在这样做。因为根据我们的理解，凡是触动了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的人，就是进行反对科学的斗争，而这种基础正是无条件的自由，没有无条件的自由，科学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方面我同意议员昆特尔^①博士所说的。科学如果要配得上这个名称，并且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僵化和没有成果的话，它必须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右边反对声。)—是的，先生们，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科学不应受任何先决条件、任何教条的限制和约束，不管这种教条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还是其他什么形式的。科学必须能够开展研究工作而丝毫不必顾虑结果将怎样，这些结果是否违背和颠倒了迄今这个或那个阶层的人们所具有的、并且不乐意放弃的任何一种观点。讲授科学的教员如果要配得上这个称号，同样必须有能够向青年传授自己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成果的无条件自由。通过这些途径，现代科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荣誉之一，而这个时代在真正的文化的其他一些方面还是十分落后的；不管怎样，德国的科学已对这一事业作出一份杰出的贡献。当然中央党的先生们是想否认科学的这一作用的。他们的报刊和书籍一谈到科学就加引号，好象谈的是一种“所谓的科学”，这确实已成为一种习惯了。(左边：很对！)

.....

载于《1895—96年巴伐利亚邦议会下院会议速记记录》第7卷第251—252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222—223页。

① 席格蒙特·昆特尔(Sigmund Günther 1848—1923)——慕尼黑的地理学教授，邦议会议员(属自由派联盟)。——编者注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和农民问题*

(1896年底)

社会民主党在政治实践中是作为产业工人运动而开始出现的。它当然首先必须在这样的生产领域发挥作用，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得最尖锐，资本主义的腐朽后果最看得见和最摸得着，社会情况最尖锐并且最为迫切地需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去进行改造，资本主义不得不违背其本意而愈来愈多地为党提供最优秀的基本队伍。在帝国议会和邦议会中，在报刊等等上面，社会民主党必须首先替各种雇佣工人说话，因为他们通过资本主义的剥夺过程已经被抛到社会的最底层，只好主要依靠立法的帮助，而在立法方面又没有任何其他政党代表他们。现在敌人为了欺骗农民，把这些事实解释成好象社会民主党根本不为农村居民操心，反而公然对农民怀抱敌意，并且尽力促使农民灭亡。一位教皇至上派的领袖断言，“消灭农民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焦点之一”，因为它不这样做就根本达不到自己的目标。但是谎言即使不断加以重复，也丝毫不会增加其真实性。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始终不渝的态度最好地证明，它同这样一种敌视农民的观点有天壤之别，按照党的信念，这种观点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的全部任务和利益的。

* 福尔马尔根据 1896 年 7 月巴伐利亚邦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为邦执行委员会起草了论述邦议会近四年来所讨论的农业政策问题的鼓动性小册子，于年底出版。这里摘录了其中关于社会民主党对农业政策的态度的一章。
——编者注

因为首先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的学说。其次社会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打算统治人民并且违反人民的意志而把法律强加给他们，社会主义者既不想骗取又不想强行夺取政权，而只想按照人民的意愿掌握和行使政权。他们只有在争取到多数人民站在自己一边时才能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但是，终生只靠工资为生的阶级虽然在巴伐利亚和德国人民中的人数不断增长，但还决没有构成压倒多数，这个阶级是必须依靠同盟者的。因此（既由于原则上的也由于实践上的原因），社会民主党不能局限于一个片面的产业工人政党的狭小范围内，而是每向前一步就要更加发展成为全体劳动的和被剥削的阶层的代表，成为绝大多数为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而奋斗的人民的**最无私和最坚决的先锋战士**。但是，在其他劳动阶级中，没有哪一个比大多数农民与雇佣工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就本来意义的**农业工人、仆役和短工**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而社会民主党本身也从来是最坚决地保护他们的。如果有人**在邦议会中片面地从地主的观点来代表农民的利益**，如果关于农业工人的“高工资”和“追求享受”的谎话竟敢冒出来，那时的确不会没有人给予有力的反击。如果由于工资的降低，由于虐待或者其他自私的举动，农村雇佣工人和农村所有主之间的对立加剧了，那么社会民主党就要完全象反对有类似行为的工业家那样努力反对后者，对于这些，农民是铭记在心的。其次，农业工人只能指望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把劳动保护扩大到农业方面，废除过时的**奴仆规约、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及任何使他们的地位得到改善的措施。使这个阶级活跃起来，并吸引它参加运动，这是最迫切的任务。

但是，大量的小自耕农在思想上同样也是属于社会民主党的。

他们的人数在巴伐利亚是很多的。每有一百个农业所有主，就有九十六个参加劳动的家属、五十九个仆役、八个短工和二十二个没有财产的人。但是就农场的数目来说，约有十分之九属于**自耕农**阶级，即那些通过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属的劳动来经营田产的人，这些农民在经济上只是由于他们还占有自己的劳动手段而与现代的无产者有所区别。这种自食其力的、以独立劳动的个人和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财产，在本质上是与靠剥削别人劳动的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不同的。今天农民的整个经济上的存在是以对劳动手段的这种占有为基础的，这些劳动手段大部分不是用于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提供个人消费的使用价值，因此，如果认为农民固守他们的地产无非是令人厌弃的“财产狂”，那是眼光短浅的看法。消灭农民的存在并使之无产阶级化，的确是资本主义的趋势，但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利益，相反，社会主义要使劳动者占有生产手段，因此它永远不会是资本主义剥夺的共谋犯，相反，它是农民反对资本主义的天然同盟者。当然，社会民主党不会想出使生产的必不可免的发展停顿下来或者倒退的措施，而这两种情况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它同样不会简单地对“各种力量的自由较量”听之任之，不会漠不关心地甚至满意地看着象农民这样一个巨大的人民阶层走向灭亡。那样一种态度是自由贸易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工业领域也绝不由于承认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阻挡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去反抗资本主义的一切有害的表现，不使出浑身力气去同它对雇佣工人的有害影响作斗争。它象关心工人的状况一样关心被压迫的农民的状况。它要在他们同资本和官厅的斗争中大力支持他们，把他们作为纳税人、债务人、有权使用森林和牧场的人、人民生活所需的农产品的生产者而加以保护，不使他们遭受损失，简言之，尽力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和斗争条件，以便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避免转化时的艰苦和牺牲，同

时为对社会实行有机的改造取得根据地。

社会民主党这样做,既是考虑到公共的福利,也是考虑到工人**运动的直接利益**。因为农民状况的日益恶化必定有损于一切要求实行工人保护和改善工人状况的企图,并部分地使这些企图化为泡影,原因是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不断增多地涌进城市,压低城市工资并从而增加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困难。其次,经济上的衰落今天无疑会使大部分农民堕落下去。但是,为社会主义这一更高的社会制度而斗争,需要的是强有力的人,而不是已经处于贫困的最后阶段,从而不是变得灰心丧气,就是变得逆来顺受的人。因此,社会民主党对促使农民外逃和堕落丝毫不感兴趣,不如说它有一切理由同这两种情况作斗争,努力使农民通过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而依靠农业经营维持生计。反过来说也完全一样,农民明显地感兴趣的不是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如说是希望它尽可能好一些,因为这样一来农产品主要消费者的购买力就会增长,从而农业的地位自然会提高。这就表明,工业问题和农业问题是多么相互关联着,工人和农民不是对立的,而是在利益上有着很大的共同性。

可见,社会民主党是坚决地站在农民一边的,它必须和将要做一切只要是容许的事情,使农民的境遇比较容易忍受,使农民更加容易转入一种更高的生产形式。如果社会民主党能使更多的农民不致真正沦为无产阶级,并且能在他们还是农民时就把他们争取过来,那么社会改造就会完成得越迅速和越容易。如果它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有了彻底的发展,甚至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成了资本主义大企业的牺牲品时才进行这一改造,那对它是不会有好处的。按照这种精神来用公共的资金支援农民,是要带来物质牺牲的,这些牺牲只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才被看作是浪费了的款项;但是尽管如此,它却是一项很妙

的投资，因为它们比在全面改组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节省十倍。

最后也还要考虑到**土地耕作**问题，由于农民的农业经营不可阻挡地衰落下去，土地耕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害。因为农民经济的衰落随着引起忽视和荒废土地，减少耕作，乱伐森林，一句话，土地耕作的倒退。但是，土地耕作绝非仅仅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有关的事。相反，整个民族都同土地的肥沃程度、同土地产量的保持和提高有关，因为土地是必须养活民族的。因此，土地耕作从更高的意义上说是公共利益，社会民主党应当保证促进这一利益。

从所有这些考虑出发，社会民主党人多年来在许多国家，在丹麦、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都极其热心地不仅为农业工人的利益，而且也为农民的利益奋斗，结果是关于“敌视农民的态度”的谎言日益失去效力，这是使敌人感到恼火的。特别是在毗邻的瑞士，那里的农民的经济状况与巴伐利亚农民的经济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了解令人可喜地增进了。瑞士东部的农民联盟对社会民主党日益产生好感，有很多人成了社会民主党党员；巴塞尔州的农民已经同工人一起结成“农民和工人联盟”，并请一个能力很强的社会民主党人担任领导。在德国，黑森社会民主党人在邦议会支持一系列对农民有利的要求。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上，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证明，再也没有人是农民的比他们更加诚恳的朋友，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加热切地愿意参加切实地改善农业状况的工作。这种情况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敌人除了“以更大的将牌取胜”，即提出更进一步的有利于农民的要求外，无法对他们提出任何其他指责。但是这几乎不能使社会民主党在农民面前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时会到来的：农民象工人一样将领会到，他们两者的苦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他们两者同样地（尽管形式不同）被剥削和被奴役，因此他们必须并肩战斗，反对资本主义这个

共同的敌人；只有当城乡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共同行动时，资本主义才是可以战胜的。

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 175—179 页。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 问题的发言

(1898年10月4日)

我起初不打算就这个问题发言，因为我觉得气氛很好，显然存在着良好的意图，想尽可能客观地和慎重地作出判断。但是昨天晚上的辩论发生了变化，使用了神经质的、激烈的语调，搬出了一些大道理，这就促使我想讲几句话。关于党的腐化堕落的说法是很早就有的。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一次党代表大会如果没有发表这样的论调，就是美中不足。(活跃。)每次代表大会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一位启示录中的骑士跳出来，宣告党即将灭亡。这对于新来的人也许有其动人之处。但是不断重复这样的事情不会使它更加有趣。而且重复这一套也完全无济于事，因为党毫不动摇地继续“向上堕落”，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水平和成熟程度。(十分活跃和鼓掌。)因此我是根本不会为这样的事情激动的，而且也往往不说任何一句反驳的话。我只不过对自己说，还是有这样的人，他们的禀性更适合当教条主义者和学理主义者，更适合宗派精神和马迪^①精神，而不适合做政治家。政治家是要同生动活泼的生活打交道的，对于他来说，几条实际的解放工作始终必须比一大堆定理占优势。因此我对于昨天听到的那些话的效果并不怎么担心，尽管如

^① 伊斯兰教对救世主的称呼。——编者注

此，这里老一套的反对论调所用的形式毕竟使我们不能不给以反驳就放它过去。不管人们对芬德里希同志的话在其他方面有什么想法，但是他显然发泄了对一整个派别的愤怒，这一派别同德累斯顿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好几年来，由于他们以狂妄自大、无所不知的态度高高在上地对一切作出判断，已使党生气和厌烦了。（热烈鼓掌。）芬德里希同志昨天正确地对那种象对小学生一样对党内的老战士讲话的妄自尊大的态度提出了抗议。（热烈的赞同声。）我们二十年以前早已熟知的事情，现在他们又摆出老师的架子当作新的东西拿来对我们讲了！

卢森堡小姐看来是表面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装备起来并借此给人以科学的印象。但是仔细观察一下，马上就可以弄清，她的结论大部分不过是骗人的结论。例如她说，因为劳动保护符合资本主义本身的利益，所以它才会产生。但是我记得，一位名叫马克思（这个名字并不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的人，曾经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复兴是从颁布工厂法开始的。（热烈的赞同声。）其次，她向我们说，工联是反动的和敌视社会主义者的。但还是这一位马克思曾经把英国的工会叫作欧洲无产阶级的职业拳击家。（鼓掌。）究竟哪里实际上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获得了更多的成就，哪里事实上在民主化和社会化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是在英国还是在我们这里，这也还是一个问题。最后，卢森堡小姐想激发革命良心，她说，如果1871年法国的工人象我们今天这么聪明，这么成熟，那他们大概就不会开火，而会“安静地躺在床上”。对种种历史事件在事后卖弄聪明，说本来应该做些什么，这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通常都是受自发力量推动的。但是如果法国工人当时“睡着了”，那么他们对自己的事业的贡献恐怕几乎不会更坏。（热烈的赞同声。）无论如何，这一点是肯定的：认为公社似乎简直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东西，那就是最大程度的非历史的臆断。然而这自然

是同卢森堡小姐的整个观点有联系的，因为她的观点似乎是，暴力行动必然永远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卢森堡小姐抗议。）那么，下面这样一个见解不能作别的理解：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随时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社会民主党可能突然取得政权，因此必须作好行使政权的准备。然而这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而是布朗基主义的观点。（热烈的赞同声。）布朗基主义幻想可以不考虑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可以不经过人民，而在随便什么时候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如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曾经有人有过这种观点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幸而也早就过去了。我们今后不能向后退，而要向前进。（鼓掌。）我的说法同卢森堡小姐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遭受到的不幸莫过于过早地处于接管政权的地位，因为我们将不能有效地利用和维持这个政权。我们不想通过人为的手段获得政权，而要利用内在的必然性获得政权，只有这种必然性才能保证政权的不可抗拒性，才能确有把握获得成功，也就是说，要在各种经济条件已经首先具备的时候才能做到。正象我在从前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的，我们不想从人民那里骗取政权，也不想强取政权，政权应该根据人民自己的意志落到我们手里。卢森堡小姐在她的文章中给“革命派”和“温和派”的区别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革命派的活动是考虑掌握政权，而温和派的活动是打算提高工人阶级，逐步扩大社会监督。同志们，如果这不算布朗基主义，那也只不过是一种诡辩，对此我一点也不理解。（很对！）如果我要达到一种目的，那么在各个具体场合是什么样的理论考虑在起作用，我觉得是次要的。（帕尔乌斯喊叫。）请您等一下。您以后可以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二十四篇社论来答复我！（十分活跃。）说人们追求当前的目的就是“推迟最终目的”，这整个的概念是最大程度地非社会主义的，首先是最大程度地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我们整个宣传工作的成就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而符合

我们意愿的发展必须根据内在的必然性进行，现代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的。谁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一句话，在文化上提高劳动人民的地位，谁就使劳动人民能够继续进行斗争，增强他们的力量，谁就可以脚踏实地走上导致最后掌握政权的道路。如果不存在这种内在的、自己起作用的动力，那我们的整个宣传工作就毫无价值。（热烈鼓掌。）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我要说，在我看来，所有那些受攻击的人，海涅、施米特和伯恩施坦由于自己的主动性为党立下的功劳无论如何要比那些只是不断地、一再地向我们发表陈词滥调的人大得多。此外，我丝毫不为一个党拥有象我们这样的处在非常顺利的发展中的力量感到担忧。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制服过许许多多的外部敌人，它也会懂得从空话中摆脱出来。（热烈鼓掌。）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8 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8 年柏林德文版第 105—107 页。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 代表大会关于关税和贸易政策 的发言(摘录)

(1898年10月7日)

我赞同奥艾尔的观点,并且和他一样不会参加理论上的争论。我原来希望除了两个报告人以外还有第三个报告人。(活跃。)因为一个报告人论述了过去,另一个论述了未来,但关于当前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考茨基讲的最好的地方——我决不是说他讲的并不是一切都好——,但是我最满意的是他清除了席佩耳的发言能够引起的那一点误会。席佩耳认为,固然就工业关税来说,不应该把工人当成单纯的消费者,而是也要看成生产者,相反,关于农业问题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说法有可能被理解成似乎农业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甚至似乎还应当明确地要求工人仅仅抱着利己的态度作为消费者来对待农业。似乎要是农业尽可能快地消失,这就是进步的一个标志。我认为情况有些变化。整个争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去年席佩耳在一次报告中声称,对他来说,国际主义不会发展到能使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站在这种立场的地步,即在签定贸易协定时主张与那些毫无顾忌地对我国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家进行绝对的自由贸易。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事情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我们仅仅死守原则,丝毫也不关心与德国人民有密切关系的情况,简单地一成不变地宣布:让俄国和美国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让他们去颁布保护关税吧!我们反正是自由贸易派,这就行了。但事情并非如此。现在有人说,我们愿意在原则

方面确定下来，我本人并不热衷于这种确定下来的做法。我们毕竟也是政治家，而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必要是不应该使自己受到约束的，因为他不能预见到未来的所有情况。因此不如干脆等一等，看看将来发生什么情况，再据此来确定态度。还没有任何情况迫使我们作这种表态，我认为，这确实又是大受尊敬的大学生先生们的一个需要，这种需要在这里也再一次起作用了。老白尔尼曾说过，如果德国人的上衣有一点污渍，那么他在擦掉它之前，要先研究一下化学。（活跃。）世界上的一切必须一般地在德国，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科学地加以检验。一切都必须归结为世界观。当然，党员同志们，由于客观情况并不乐意一贯遵守我们所制定的规律，所以我们终于不得不在事情过后，在另一种场合做另一种科学的深入探讨。（活跃。）倍倍尔在开始时说，他很不赞成哥达纲领，以致他现在认为哥达纲领是不合理的。对此我曾暗暗地发笑，他看到了或者听到了（活跃），于是对我喊着说，你也并不会认为你谈过的一切今天都正确啊！不错，但是在制造决议方面我从来不是一个大罪人。（十分活跃。）这些决议和探讨有很大的缺点，因为人们往往事后才认识到什么是合理的。（活跃。）但是这种情况当然从来没有妨碍我们立刻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来代替它，这时又把这个新决议当成真理的终结，尽管它只适用几年。（活跃。）没有必要，我们应当什么决议也不作。……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8 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8 年柏林德文版第 198—199 页。

在慕尼黑党员大会的演说* (摘录)

(1899年9月25日)

现在谈谈伯恩斯坦问题。用伯恩斯坦同志的名字来称呼这件事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那些记在伯恩斯坦名下而受到反对或者维护的思想决不属于伯恩斯坦个人。许多年来在德国已经有人宣扬这些思想并且曾引起争议。伯恩斯坦去年在《新时代》上、今年在他的著名的书中提出的思想在党内早已存在，伯恩斯坦只不过使它们成型、把它们概括起来罢了。这位苏黎士《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前编辑自己充当了党的自我批评的代言人。毫无疑问，这种自我批评是恰当的。任何一个团体自然都会遇到这种危险：它由于习惯势力把传统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使已形成的东西成为模式，并企图使自己的观点逐渐摆脱事物都在变化的规律，用教条代替

-
- * 这是福尔马尔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9 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作准备的慕尼黑党员大会上就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发表的演说。这次党员大会在结束时一致通过了福尔马尔起草的如下决议：“社会民主党慕尼黑党员大会认为，由于伯恩斯坦的著作而暴露出来的意见分歧无论如何不会损害党的力量或者它的行动自由。

社会主义运动不取决于人们关于这一运动提出的那些理论的命运。党纲的总的原则并不是永恒的真理，而是要随着经济情况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而继续发展的。

把目前公认的学说奉为教条并把怀疑这种学说的人当作异教徒对待的意图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相容的。研究和批评的绝对自由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大会确信，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按照从经济上、文化上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来发展自己的观点和策略。”（《慕尼黑邮报》1899 年 9 月 27 日）——编者注

有生命力的思想之流。结果是一种必然脱离实际的僵化现象。现在伯恩斯坦对党的科学、党的实践活动和策略作了考察，认为今天党内的一系列观点已经过时并且是错误的。

我只谈谈我们大多数人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年夏天已经引起过争论并且已经在党报上发表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和正确地认识形势，我想请比较年长的同志回顾一下，从前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同今天有多大的不同。七十年代，党内通常认为，从今天的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要迅速得多和合乎道理得多。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它表现出来的非正义性和丑恶面目已经如此严重，因此它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有人认为，资本积聚将以这样一种速度进行，肯定将使中间环节没落下去并很快消灭，因而向社会主义生产的转变一定会非常迅速地实现。有人观察到，我们今天的无政府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繁荣时期之后时常导致危机，由此就产生一种理论，即所谓的危机论。根据这一理论，每十年（以前是每二十年）将出现一次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危机。有人声称，这种危机的发生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广泛，直至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并必须由社会主义一举取而代之。这种设想曾经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的经济情况同今天的相比更加符合这种设想。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发现，事物并不是这样简单地按照唯一的公式、按照直线发展的。一系列新形式的中等企业出现了，它们代替了正在没落的形式。尽管资本主义大生产吞并小型和中型企业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但这些企业今天却仍以过去人们没有料到的规模存在着。

这种差别在农业中最为明显。从前我们的人根本不研究农业问题。每个宣传工作者都简单地用类比方法推论说：我们关于不断增长的资本积聚的理论无论在工业方面或是在农业方面无疑都

是适用的。但目前完全可以肯定，从前的那种简单类比的结论是根本错误的。我们在法兰克福就曾探讨过这一问题，我当时也曾说过：没有证据表明农业方面出现了资本积聚和经营集中的现象。农业中的大经营不仅毫无进展，反而是退步了。

有人也曾认为，目前，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经济方面都根本无法为工人争取到略微有些意义的东西，相反，无产阶级遭受到的贫困和奴役一定会越来越深重。

同志们！你们看看事实就会认识到，这种**贫困化理论**恰恰是不对的。我党的全部运动都驳斥了这一理论。如果这种理论正确，那么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全部活动就是多余的了。你们看到，在工会运动方面已有所收获而且还会有所收获。但是，认识到不能坚持所谓**贫困化理论**，却丝毫不会阻碍我们的运动。通向最终目的的道路恰巧不是经过越来越深重、越来越巨大的痛苦，也不是经过绝望。我们即使不能看到最终目的，却能看到它的一些部分——文化部分、地位提高的部分，这恰巧是能够激励工人运动的，如果情况与此相反，长久下去一定会使人灰心丧气。这种逐渐的、几乎看不见的上升运动要以这种和平方式进行多久，我们说不清楚。如果由我们决定，我们是赞成渐进的和平发展的，但这不取决于我们。最优秀的同志对于发展是和平地演变还是剧烈地进行也没有把握。这取决于我们的敌人。但如果从必然发生一场流血革命这个绝对的前提出发，这恐怕是完全同我们的策略相违背的。危机论、贫困论、崩溃论已经动摇了，我们已经能使我们的策略不受这些理论约束了。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纲领**，就会确信，不少方面的内容已经过时并需要修改了。李卜克内西作为报告人曾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说过：一个纲领当它确定下来的时候就开始过时了。我不想把话说得这样绝对，而且人们也不能因为有任何一点怀疑就去修改一

一个纲领，尤其是一个具有历史哲学性导言的纲领。我个人认为，固然我们纲领的导言在准确性和正确性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有待改进，其中某些地方或许已同今天的科学水平不完全相称，然而我也还是认为，修改纲领的时机今天尚未成熟。首先必须把意见确定下来，表述方式必须更加明确，然后才能着手进行也许有必要的修改。所以我认为，这件事还可以等几年。

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伯恩斯坦遵循的路线是一条大部分同志曾经遵循过而且今天仍然在遵循的路线。但这并不是说，大家都能赞成他的主张的全部细节。伯恩斯坦的错误主要是他阐述得太多了。他把方法、学说、策略等等装在一辆车上，于是车子超重了。伯恩斯坦过于诚实，他总是满口的“如果”和“但是”。他是世上襟怀最坦白的人，这样一来他说出了一切，甚至连他还未真正考虑成熟的话也说出来了。于是，他在这部著作中也再次暴露出表达方式非常不清楚和非常不确切的缺陷。所以伯恩斯坦在回答种种驳斥时也这样说：啊，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凡是了解伯恩斯坦的人都知道，情况的确是这样。产生了一系列误解，这些误解甚至是来自他自己的朋友，来自把他的书当作星期日的烤肉立即贪婪地抓到手里的人。仅举几个例子来说吧！例如“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句名言。许多理论工作者，可惜还有许多会议（肯定十分之九的参加这些会议的人根本没有读过此书），都自然地宣称，他们不愿再同那个放弃最终目的的人有什么相干。然而维也纳的阿德勒同志在一篇反对伯恩斯坦的文章中对这一点说得很中肯，他说：这只是措词不当，因而这场争论是一场词句之争。^①伯恩斯坦确切地说：他愿意取得政权并且剥夺资本家阶级。不过这对他来说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

^① 参见 1898 年 10 月 16 日的维也纳《工人报》或《维·柯德勒文章、演说、书信集》1929 年维也纳德文版第 6 卷第 223 页以下。——编者注

他过分诚实地宣称，最终目的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伯恩斯坦也曾说过，当今的阶级斗争越来越缓和，越来越文明了。但是他完全忘记了，尽管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再那样野蛮，但阶级斗争却变得更加剧烈，更加严峻了。有人说，伯恩斯坦透过看英国情况的眼镜来看我们的整个情况。我不想把问题说得这样严重，然而有一点却是对的：多年来他生活在英国，同德国完全失去了联系，因而对许多问题他鉴别不清了。但是必须提醒大家，伯恩斯坦不是唯一透过英国眼镜观察事物的人。马克思也同样基本上按照英国的情况描述过许多事情。

现在谈谈另一个问题：伯恩斯坦也表现出，他对自由资产阶级的评价是过高的，高得出奇。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确实无法单独地实现经济领域中的改革，而自由资产阶级、自由知识界又越来越开明了，所以我们和他们能够互相依靠。我们是了解我们的自由派的，并且可以说，伯恩斯坦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完全不在点子上。

伯恩斯坦还认为，社会民主党已经完全背离了它的革命理论并成了一个改良的政党，我们应该有勇气声称我们是一个社会改良党。伯恩斯坦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要向空话开战，他说这种空话对我们是有害的。我对空话也没有好感，而且也同样肯定，社会民主党在没有改变其最终目的的情况下，事实上已成为一个要求当今的国家进行实际改良的政党。但它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社会改良党，因为我们所要求的那些改良毕竟只是在实践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一种手段。

另一方面，现在党内有个别的人从另一个方向来看问题，他们觉得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已不够恰当了，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称呼更加响亮。如果说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那也无非同“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可见既没有理由把我们改变成一个改良党，也同样没有理由把我们改变成时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

尽管现在也有各种事情使我感到不称心，尽管我也可以声明我对伯恩施坦的许多见解并不赞成，但我仍旧必须说，我认为我有义务对伯恩施坦由于他的见解而受到攻击的那种方式提出抗议。爱德华·伯恩施坦是我们最老的同志之一，他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领导过党的战斗机关报的人，由于他的这一活动，他曾被迫流亡国外。如果说，他现在透过英国眼镜观察事物，这不是他的过失。这是他为他的党作出的那一牺牲的结果。这种人在我们这里总是受到尊敬的，但不象在资产阶级那里通常所做的那样，而正是象我们尊敬那些已尽了自己义务的人那样。伯恩施坦是我们之中最有才干的人之一，而我们现在却可以在这场辩论中看到这种情形：说他是一头向来什么也不懂的蠢驴，是一个草包编辑，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一个应被开除的变节者。如果这样办的话，那我们就是自己贬低自己。过去在他令人满意的时候，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现在他不再令人满意了，就分文不值。这是违背党的起码的礼貌观念的。（热烈的掌声。）

伯恩施坦同党内一部分人的意见分歧、在许多问题上同全党的意见分歧，绝不涉及到党的目的和性质，而是涉及到党的发展的速度。他在“未来将是什么样子”这场争论中绝对没有离开党的原则所容许的限度，而且绝对谈不上有世界观上的原则差别。因此我认为，尽管我们不同意伯恩施坦的一些个别见解并且反对这些见解，但是我们要非常坚决地表示反对对伯恩施坦实行宗教裁判的任何企图。（热烈的掌声。）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党的报刊，就会从中看出尽管大部分决议声称反对伯恩施坦，但是其中却也谈到了必须维护思想自由的权利，这是党内值得庆贺的进步。没有权利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同样，必须坚决拒绝可能出现的想使伯恩施坦无法维持在党内的社会地位的那些做法。

近几年来，党内形成了一个主要由理论家而不是由实践的政

治家组成的派别，这些人不断把一些同他们不一致的观点夸大成原则上的对立，宣称党处于危险之中，并俨然以救星自居。这些争论通常出现在著作界和理论界。通常是在《新时代》或者一些著作中开始的。这些意见分歧不是在科学领域里得到解决，而是扩散到党的各个领域，这已经成了流行的做法，尽管党根本没有要求这样做。然后争论一直继续进行，直至侵害党的机体为止。在德国南部，尤其在巴伐利亚，情况就不是这样。但在帝国的其他地区却是如此。同志们：依我的看法，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对党毫无益处，而只会损害党；这并不是因为敌人的报纸上说现在要发生分裂了。我丝毫不为此担忧。我只希望，其他同志对敌人报刊上登载的东西也采取不在乎的态度。某些人由于自己的爱好，把理论之争强加于党，我认为党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充当这种竞技场，而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一派人企图使他们一时的见解成为党的法律，压制持不同见解的人，或者“彻底划清界限”，即把他们驱逐出去。这种做法过去的确没有这样流行。事实上，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些人气量如此狭小：他们只承认他们自己的见解。

两个星期前，在柏林的一次有罗莎·卢森堡女士出席的会议上作出了一项决议说，思想自由和研究自由、批评的发言权必须得到维护。罗莎·卢森堡女士竟如此轻率，提出了以下内容的补充提案：“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应当得到维护，但只限于在迄今的观点的基础上。”这就是僵化的原因。该决议的提案人罗莎·卢森堡女士因此就使自己置身于最凶恶的反动派的行列。我们的达勒尔^①博士也完全持同样的立场。（大声喧哗和暴风雨般的掌声。）

彻底划清界限！不只是伯恩施坦，还有其他一大批人都要被赶出去。理·费舍很巧妙地嘲笑宗教裁判所的这个告发者说：这

^① 巴尔塔萨尔·达勒尔 (Balthasar Daller 1835—1911)——弗赖辛格的教会法和教会史教授，巴伐利亚邦议会的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编者注

一位女同志想把伯恩施坦、奥艾尔、海涅、福尔马尔和南德意志人赶出去。如果她把大家放在称金子的天平上仔细地称一下，那么还剩下谁呢？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曾经赞成土地问题，^①休恩朗克宣告反对贫困化理论，克拉拉·蔡特金赞成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那么还剩下谁呢？只有罗莎·卢森堡女士了。（活跃。）但工人们很清醒，很聪明，他们之中不会有一人站到她这边来。这样处理问题是不符合我们党的利益的。这暴露出一种令人厌恶的宗派思想，一种无所顾忌的自以为是的态度，毫不关心在实际政治斗争中会产生什么后果，宁可让党四分五裂，这当然只会使敌人高兴。

我本人对这些事倒并不怎么在意。那些人是要彻底失算的。如果党代表大会不在德国中部而是到汉堡、布勒斯劳或者汉诺威去召开，那么大会代表的组成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然而，即使在汉诺威召开，从组成上说不能正确代表我们南德意志人，我们也不害怕。如果我也被列入放逐者的名单，那么我认为，哪怕为此只写一个字，也是丝毫不值得花费力气的。如果并非绝对必要，很可能我在汉诺威也根本不会发言。一定要情况完全改变，我才会感到有必要对此发表意见。

如果说，在这个大厅里有尊重科学——尊重政治科学和社会主义科学的人，那我就是这种人，其他许多人也如此。说我们不关心科学，这是完全错误的。你们永远不会听到我这样说，今天也不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了由福尔马尔和休恩朗克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见本书第241—243页）。福尔马尔作为发言人还对决议作了补充报告（同上）。大会还选出了一个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内的由15名成员组成的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为下次党代表大会起草土地纲领草案以对党纲加以补充。会后，11月14日，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倍倍尔才批评了福尔马尔等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和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他的发言刊登在11月16日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由此才真正展开了一场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编者注

会听到。但是，人们既必须提防低估政治科学的意义，同样也必须提防夸大它的作用。如果证实，前面提到的学说，即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同实践已不再相适应，那么科学必须考虑现实，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你们看看拉萨尔和马克思，他们表达了许多思想，对这些思想党当时不赞同并且今天也不能赞同。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因为伯恩施坦而动摇了，这是不正确的。即使确实如此，但关键毕竟在于，主要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工人阶级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

在已经发生的争论中，我没有发现哪些意见分歧多少会影响本质。但是比分裂党、使它失去或者削弱它的活动能力更加愚蠢、更加对自己有害的事无疑是没有的。阿德勒博士说：我们全力以赴地争取逐步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力量，简直象这就是唯一的最终目的的一样，而我们在进行这一工作时的劲头就象明天要面临一场灾变一样。

争论和分歧总会有的。没有这样一场思想斗争，社会民主党成为过去的时刻就会立即到来。尽管如此，多年来我们在实际行动中一直是团结一致的。以往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争论；那时只要政府拿出狡猾的迫害我们的法律来，我们大家就会团结得如同一个人一样。可见这些争论不会妨碍我们团结一致。所以我认为：这些争论绝不损害党的事业和党的本质；纲领仍可继续存在一个时期；我们无需对它作任何修改；我们一致认为，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带来的将不是争论，而是象过去一样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一致是今后继续进行我们以前进行过的那种斗争所需要的。（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载于《慕尼黑邮报》1899年9月27、28日第218、219号。
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80—187页。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 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发言

(1899年10月12日)

我在发言的开头要对休恩朗克同志讲几句话。休恩朗克念了我们的竞选手册中的许多段话，我作为这一手册的作者也要为此谢谢他。我只希望，他同样也赞成手册的其他内容。不过他仅仅提供了证据，表明报刊上关于巴伐利亚事务的全部争论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妥协和什么不是妥协和了。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对欧洲最不合理的选举法作了一个纠正。(很对!)埃尔哈特已经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做我们已经做的那件事，那么唯一的差别会是：在巴伐利亚的议会里反对我们的人比现在还要多。六个社会民主党人的位置会被六个民族自由党人占据，而他们至少是同中央党人一样糟的。(很对!)我只建议其他同志先研究一下我们的竞选协议，再来象我们一样办事。(活跃。)如果说休恩朗克认为有必要对巴伐利亚同志们的全部政策下一个否定性的评语，那么我就能够满意地引用休恩朗克的一句话，这是休恩朗克在他是巴伐利亚政策的最热心的辩护人的那一时期讲的。1895年11月，他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写道：“我们的透彻了解环境特点的巴伐利亚同志们完成了一项无人否认的光辉业绩，促进了社会民主党的事业。他们的策略经受了考验，巴伐利亚的党对此是赞同的。——巴伐利亚人实行了一项实践上革命的政策，这是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能的政策。怎么

突然一下子又说他们实行了动摇不定的政策呢？”（活跃。）当然这段话是休恩朗克在他把考茨基称为“教条主义的大法官”的同一时期说的。（活跃。）今天他已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一点并且会给考茨基加上别的称呼了。

现在我来谈一般的问题，不过我不想对于已经就伯恩施坦的书发表的许多过分的见解，对于这一切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再补充什么内容了。讲得够多了，我几乎认为装得太满了，很大一部分党员同志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把这满坑满谷的金银财宝花费掉。（热烈的赞同声。）由于双方的过错，整个策略问题乱成一团，成了解不开的疙瘩，再在上面摸来摸去，再在上面打结，不会使事情好转，却会使它恶化。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归根到底还有一个缺点，即由于不断强调细节，全貌反而看不到了，并且被歪曲了。奥艾尔才又一次指出这一点和这一方面的关系。

这里所谈到的争论，决不是仅仅从伯恩施坦的书开始的，而是在去年，当这本书还根本没有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事先作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且要求采取措施反对伯恩施坦，与之同时也反对一切的可能派，一切的机会主义者（或者不管人们给他们什么别的名称）。当然，后来伯恩施坦被人家说服（要是我的话，就不会同意这样做），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这些异端的观点，这就给行将熄灭的火焰加了新的油，于是辩论重新爆发起来。在辩论中人们几乎只限于谈伯恩施坦，象我们这样一个战斗的党，竟然花了整整一个星期争论他所发表的一个观点，而不知道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荣幸。但是，只有很少的发言人，而且恰好是人们起初可能完全没有料到的那些人，除了谈到伯恩施坦外还谈到别人，所以我们这些人吃亏了，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空手而回了，这毕竟不是好事。我总的印象是，在为期一个月的辩论中，出现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从前几乎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

过。几乎任何时候都没有象这样雷声大，雨点小。（很对！）请你们回想一下，现今这次党代表大会被某些派别在事先描述得多么伟大，多么有声有色！休恩朗克说，谈不上举行一次火刑。确实如此。火刑堆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木柴燃烧不起来，也缺乏足够的力量把我们抛到火刑堆上去。应当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这在一大批人看来是确定无疑的。有人明确说过，他已不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叛教者、变节者、叛徒应当开除。还有一些人也应当跟他一起开除。党内一位女作家完全正确地发现，如果人们揪住伯恩施坦不放，而对从事实际工作的一大批伯恩施坦分子听之任之，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小小的、但很有影响的集团（人们是这样称呼他们的）所组成的整个流派，奥艾尔、席佩耳、海涅、当然还有我（我每年都列入被放逐者名单（活跃），这至今对我的健康的影响是十分好的，我对此丝毫没有怨言）——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应当受到追究，党代表大会应当成为一个刑事法庭，应当划清界限，今后应当永远阻止一切机会主义（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出现，应当把“纯洁的”观点奉为党的法律。人们就这样扬起一千张鼓得满满的帆向前进军，但是当以后发生战斗时，究竟剩下什么呢？有人断定，在这个大厅里实际上没有人对伯恩施坦所写的一切全都赞成。我相信，伯恩施坦终究不是蠢人，他自己并不认为人们会赞成他就理论和实践所说的一切。我不同意他书中的一系列观点，尤其不同意他关于自由主义的观点。他无疑是通过英国眼镜朝这一方向看问题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更大的人物也是通过英国眼镜看问题的，只不过人们并不害怕指出什么东西终究是站不住脚的。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并不是伯恩施坦的罪过，因为他为党牺牲了自己，他流亡在外，从而同我们失去联系，并且不再跟党完全一致，他对许多事情可能理解错了。在另一方面，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伯恩施坦在他的书中提到的一系列事情是正确的，即使在正确

性没有完全得到证实的地方，他也至少促使我们进行思考，并不是每一本书、哪怕是每一本被我们传播和颂扬的书都可以谈得上这一点的。人们终究要考虑实际情况。这本书中我们喜欢的，我们就接受，我们觉得不合适的，我们就把它作为错误的东西搁在一边，正如我们对待别的书一样。有些人把每一本党的著作看作是一本福音书和真理的最后结论，这是十分可悲的。不，每一本书都应当首先激发人们去独立思考。由此可见，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为了这本书以及其中藏着的危险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我曾不断地表示，没有人比我更加不愿意讨好群众，因为我认为这是卑鄙的，但是我也必须说，有许多人以为，对于我们来说道德之路太狭窄了，稍微往右或者往左一步就会使人们离开我们，同这些人比起来，我是更加信任我们广大的党员同志们的。（鼓掌。）

因此，如果说我也批判地对待伯恩斯坦，如同对待其他任何人一样，那么，我还是要重复说，在这本书中包含着许多有益的东西，也许当目前的斗争过去以后，还有一些人会发现可以从这本书中学习许多有益的东西。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尽管人们可以反对伯恩斯坦的观点，他是站在我们原则的基本思想上的，因此他同那些竟敢否认他是党员的人一样，仍旧是我们党的同志。

使我真正感到高兴的是，从报刊上，尤其是从《前进报》上看到，在许多地方的表示反对伯恩斯坦的集会上仍然继续不断地重复说：伯恩斯坦是党员同志。我们不会压制自由研究。（累德堡：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好吧，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提出过一项提案，按照这个提案，研究自由只有在它没有脱离我们的基础时才能得到保障。（累德堡：究竟是谁？）看来您一次也没有读过你们最近的报纸。（活跃。）比这更加超反动的要求在社会民主党内还从来没有提出过。当然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要求没有再出现，现在已经完全不再谈论对我们这些人实行总清算了。昨天我们荣幸地

在这里听了一位女党员同志的发言，她是我所说的那一批人中间最得力的先锋。你们会记得，她的文章是按照什么精神写的，请你们把她在这里的行动方式与此作一对比。（很好。）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报告；她以颇得人心的温和态度发表意见，结尾时只是慎重地表示希望伯恩施坦派不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我必须说，我根据以往的经验的确没有料想到这位发言人如此谦虚。我们重新被允许自己认为怎样正确就怎样行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只有得到我们的这位女同志的同意才行动的），她不想坚持用一根稻草来禁止这一合乎自然的策略，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种安慰。但是我只能说，为了生下一个孵不出的蛋，用不着这样大声地咯咯叫。（活跃。主席摇铃。）

（辛格尔插话：发言人固然没有说出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毕竟直接提到了发言的女同志，因此我必须请求他避免使用这类把一位发言的女同志的行动谴责为咯咯叫的说法。）（极为活跃。）

（福尔马尔继续发言）我在议会里呆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不致把一次要求遵守秩序的命令理解得过分走样，哪怕这种命令只是间接的。但是这一次对我却是非常不公平的。（活跃。）我根本没有想到从生理上的意义用咯咯叫这个词来说某一个确定的同志，我只不过是使用一句谚语，咯咯叫仅仅是指大叫大嚷，大声嗡嗡，以及一切与此相连的情况，而且我还提到了后来在这里的谦虚行为！但是我们把这撇开不谈吧！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要使党纯洁化的人和狂信的人的新的进攻这一次被我们打退了，而从前甚至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有关的同志确实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终于到抛弃关于腐化堕落、关于机会主义、关于我们周围的危险的这些陈词滥调的时候了，长年累月重复这些陈词滥调就会使党厌烦，仅仅根据这一理由就应当抛弃它们。我们的大批党员同志不停地工作，为了促进无产阶级和

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愿意在任何一方面付出牺牲。一个这样的党有比连续不断地开赴理论争论的竞技场(在这种场合就会伴随着发生一系列自以为是、吹毛求疵、咬文嚼字的情况)更加重要的事情可做。(很对!)如果这种争吵仍旧长期进行下去,那么最后科学就会丧失一切信用,那时工人就会说:难道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能就随便哪一个人头脑里考虑的任何理论进行争论并且从而消耗掉用来从事其他更重要的工作的力量吗?与此有关的那些人应当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学到这一点:现在终于是停止这一套做法的时候了。人们在我们中间捏造出来的可怕的巨大矛盾究竟在哪里呢?我相信,在这个大厅内外,在我们党里,没有任何人怀疑党。他可能相信教条或者相信目前流行的观点——要知道在这件事上风气也是起很大作用的——但是对于党的本质,我还没有看见任何人发生怀疑。

有人说,伯恩施坦的著作会促使我们厌恶斗争。但愿人们不要对每一件事都如此不恰当地夸大。人们说,谁胆小,就是为反动派效劳。的确如此!但是我要补充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巴黎公社以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谁向人民讲一些虚伪的革命奇谈,就是向启航的帆船提供错误的航线图。(很对!)每一个人都知道,恩格斯有一次在给屠拉梯的信中说,我们在当前的运动中也必须代表将来的运动。但是同样确实的是,由于喋喋不休地谈论在当前社会里根本得不到任何值得努力争取的东西,就一定会对工人运动起麻痹作用。(很对!)但是那些人所采取的最恶劣和最愚蠢的手段是继续不断地做出这种样子,似乎我们这里存在两种类型的党员同志。奥艾尔已经指出这一点,他用激烈的表述方式把这件事说得同我想对你们说的有些不一样。有人说,在一方面是机会主义者,在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在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看来已经不够美好了,他们必须制造一个新的词,并且经常重

复它。这种区分为两个派别的做法是极端荒谬的，尤其是如果想要使一个派别屈服或者说必须彻底划清界限。的确如此！如果以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党（它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被战胜）受到削弱，这会使我们的敌人十分高兴。我毫不掩饰，党内有些事情和有些人也并不使我高兴，我只不过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中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些是不正确的，我考虑到我在这方面的责任，并且相信，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力量的发展终将使事情达到正确的结局。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是我们成功的必要前提。因此我始终维护统一，因此我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反对人们企图人为地挑起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较量，我希望，那些一再想挑起这种较量的人最后总有一天将放弃这样做。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保持这种把每一点细小的意见分歧都说成是整个世界观方面的巨大差别的恶劣做法，如果这种争论继续下去，那么总有一天会使广大党员同志失去迄今所表现的耐心，他们会向有关的那些人指出，党拥有使他们放弃这种习惯的实力手段——不是决议的手段，而是来自舆论的手段。我和我的同志们完全同意倍倍尔的决议。我们对于决议中表述的思想感到满意，因此将愉快地一致赞成这个决议。（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9 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9 年柏林德文版第 212—216 页。

在帝国议会关于海因茨 法案^①的演说(摘录)

(1900年3月15日)

先生们,我必须一开始就宣布,昨天在这里令人厌烦地讨论了卖淫、经营妓院和撮合通奸行为的全部肮脏之处以后,紧接着并且几乎可以说与之并列地讨论了艺术和文学问题,我感到这是侮辱人和损害人的尊严的。(左边:很对!很好!)也是这种感情首先唤醒了文学艺术界的全部代表,使他们摆脱了迄今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促使他们参加集会,向世界响亮地宣告他们的抗议。

先生们,如果我现在考虑一下前天勒伦、施托克曼、格勒贝尔和施特克尔诸位议员先生^②为了证明把艺术置于一种特别的道德监督之下是正确的而援引的证据,那么他们所提到的事情可以归纳成两类。第一,这些先生给我们描述了目前的粗野和不道德的情况——据说我们已落到这种地步了——它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

① 1900年6月25日通过的帝国刑法典修订条款被称为海因茨法,因为这次修订是由于对一个叫海因茨的柏林的娼妓保护人的审讯而引起的。这个修订条款补充和加重了对奸淫媒介和纵容卖淫以及传播淫猥印刷物的刑罚。中央党和保守党在帝国议会辩论中企图把导致大大限制当时还存在的文学和艺术自由的若干规定插到这个修订条款中去。但是,由于广大居民阶层,首先是艺术家和作家的抗议,特别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一反动阴谋遭到失败。——编者注

② 赫尔曼·勒伦(1844—1920),中央党议员;威廉·赫尔曼·施托克曼(1848—1924)自由保守党议员;阿道夫·格勒贝尔(1854—1919),中央党议员;阿道夫·施特克尔(1835—1909),基督教社会党议员。——编者注

想法，原来我们过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所多玛和哥摩拉式的生活。
(左边：很对!)但是我请你们不要忘记，各个时代的道德家都完全是这么说的(左边：很对)，那些怀着遗憾的心情回忆青年时代的、愤愤不平的老年人(活跃)，那些生性喜欢向后看并且认为过去的时代比现在美好的人，他们总是抱怨世风日下。但是每个了解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即使人们今天的伤风败俗勾当有时也许干得比较狡猾，但以前的表现形式却是更加粗野的。从道德方面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当然不合理想，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确实是最不会否认这一点的人，相反，我们却是首先不断指出当前时代的社会弊病的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这一方向上看也不是在没落，而是处于上升状态，即使是缓慢地上升。但是确实存在着道德败坏的情况，就其原因来说，观看艺术作品和戏剧的影响肯定是极小的，不如说——昨天已经指出这一点——首先和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社会方面的，是由于日益增加的财富和奢侈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和受压迫的痛苦形成鲜明对比而造成的。对于这些原因，任何刑法条款都无济于事，只有影响深远的、彻底的社会改革才能有所帮助。艺术对道德败坏所起的作用很小，不如说人民群众对艺术的理想的无知应对这种粗野状态承担主要罪责，他们的无知表现在：缺乏艺术和精神方面的教养，每日都陷在为维持最简单的生活而奔波的苦难之中，无法培养鉴赏能力和过高尚的精神生活、思想生活和感情生活。

其次，前天的上述发言人争着尽可能缩小摆在我们面前的关于艺术的条款的重要性，并且努力向我们证明，这些条款实际上对艺术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其中一位先生大致是对我们这样说的：我们不想干预艺术，只想从公共生活中消除赤裸裸的卑劣行为和令人可悲的对淫猥行为的描绘而已。但是，先生们，谁曾经较长时期地和这种事情打交道并且不是完全健忘的话，他就会对这一突

如其来的温和的说法感到十分吃惊并且发生怀疑，他还会进一步去考察它的原因。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我必须说，艺术界代表的运动——人们这些天来企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法来贬低这个艺术——给这些先生们本人留下的印象似乎要比他们愿意承认的更为深刻。……

如果这些先生除了从公众生活里消除明显的卑劣行为之外不想再做什么，那么这样大吵大嚷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左边：很对！）国会拖拖拉拉地用了五年以上的时间来从事的整个这一项立法行动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知道，你们表面上所希望的实际上你们今天已经得到了。

……

为了消除对执行艺术条款的忧虑，前天发言的先生们说：情况不会很坏；法官会为此操心的，他们无疑会很容易地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恰恰又了解得很清楚，我们应该对德国的司法抱多大的信任，确切地说，应该抱多大的不信任。

……

他们提出的另一个反驳意见并不比这更好，这就是：“纯朴的人民感情”反正是容易辨别出什么事情是无耻的。啊，天哪！这些先生究竟是否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说人民能对艺术作出决定性的判断，这根本不是事实。因为要做到这点，需要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受过陶冶的鉴赏力。但是如果连受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人们都可能是完全不可信赖的艺术上的门外汉（非常正确！），人民怎么可能具有在这方面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呢？一点不错，人民中蕴藏着巨大的艺术天赋，并且常常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表现出对美好事物和艺术品的渴望。但是这种天赋首先必须通过社会的促进工作，通过教育才能被唤醒和得到发展。因此今天谁要声称，在艺术作品方面“纯朴的人民感情”

可以做出决定性的判断，那么他或者是使用信手拈来的好听话装点他的讲话，或者是赤裸裸地献媚——后面隐藏着想法却是，这些先生们想把他们自己的艺术观点强加于人民，并且冒称是人民的观点（左边：完全正确！），从而使他们的观点提高威信和加深印象，否则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先生们，尽管这样，我仍然认为，事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艺术条款显然贬低了艺术，并且构成对文学和艺术的严重危害。因此联合起来举行抗议集会的艺术家们没有受烦琐的法律条文和解释手法的迷惑，而一针见血地指向事情的本质，并且强烈地表示他们的愤怒，这是完全正确的。（左边：完全正确！）……

先生们，你们用尽一切手法来进行解释和辩护，这对你们不会有任何帮助；你们用上述条款反对艺术自由时就是反对艺术本身，正如你们在防止政变法草案^①——这些条款是这一法案的真实写照——中反对科学自由时是反对科学本身一样。这也就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最坚决地反对这一腐败的法律的原因。如果我们无法阻止接受这一法律，如果德国在经受了其他很多考验之后还要接受这一考验，（中间和右边：笑声——社会民主党人席：完全正确！）——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这成了法律，那么请你们等着明年将会发生的一切吧；你们当然扼杀不了艺术，但是将要发生多少愚蠢的事啊，你们将对此目瞪口呆！因此我要说，如果我们尽管作了这一切努力还未能阻止通过这个法律的话，那么社会民主党将与艺术，与文学（社会民主党人席鼓掌——中间反对声）并且与科学一起遭受失败，随后那样的时刻就会到来；这些精神力量将成为社

^① 即1894年帝国政府向国会提出的“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的法律草案，其中有一些反对用暴力颠覆现行制度等等的条文，1895年5月被国会否决。——编者注

会民主党反对任何反动派的同盟军！（左边：热烈鼓掌；右边和中间活跃。）

载于《帝国议会第十届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第6卷第4701—4706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224—227页。

关于米勒兰事件

(1900年12月)

在上一期《社会主义月刊》上大卫和伯恩施坦对米勒兰事件、考茨基决议以及与此有关的大会进程发表了评论，对于这一评论的积极的成果，我在一切基本方面都可以表示赞同。但是他们两人只附带谈到了考茨基在《新时代》第二期上对上述问题的阐述^①。我认为，对考茨基的文章，不仅从所涉及到的问题的意义，而且从他研究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从他所提出的主张来看，都迫切需要详细地作出评价和回答。虽然由于《社会主义月刊》的出版期，现在来做这件事已经有些迟了，但是我已经考虑到，所涉及的问题是不会这么快就过时的。

* * *

首先对事实作一简单的说明。

考茨基在事后对他的理所当然地出了名的决议的理由作了补充说明。这是要向我们表明，作者本人希望别人如何理解他的这一作品。这当然是他的正当权利。只是考茨基必须明白，他的阐述仅仅说明他的个人意见，对于我们这些在巴黎投票赞同他的决议的其他人来说是完全没有约束力的，因此决不能改变表决的性质。可是考茨基声称，他有“一切理由”假定，国际代表大会和法国的代表

^① 指《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员部长》一文。见《米勒兰事件》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71—85页。本文所引考茨基的言论除个别已另作说明的以外都出自这篇文章。——编者注。

大会的“绝大多数人”同他一样，他们投票赞同决议，完全不是想表示对米勒兰事件的批准，倒不如说多数人的意见是“米勒兰的加入内阁是一个错误，他留在内阁已成为法国社会主义的不幸”。这是一个十分武断的假定，考茨基不可能证明这一假定是正确的。

在法国的代表大会上有过两次可以表达代表大会对米勒兰问题态度的特别机会。首先是议会党团的议会活动报告，它为支持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进行辩护，如果大会的多数对此表示反对，那就一定会作出相应的决议，而且众所周知，由于党团的这种态度，四名盖得派议员以及几名布朗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公开退出党团，这就使人更加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决议了。但是报告在热烈掌声中得到通过，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接着讨论的是议员们在著名的夏龙事件中的表决问题，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已经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尖锐化，使它成为在米勒兰事件上的真正的决战，为此他们几个月来不断地要求谴责“内阁派”议员的“耻辱”。但是大会并不愿意赞同盖得和瓦扬的观点，大会不仅拒绝“耻辱”^①这个最重的词，而且甚至拒绝用最轻微的方式表示不赞成。大会认为没有必要对米勒兰事件作出任何其他的决议，虽然除了党的统一外，这个事件是讨论的主要内容。但正是这种情况和大会的整个进程（它以饶勒斯及其朋友们的显著成功和盖得派的重大失败告终）最清楚地表明，大会的多数对米勒兰事件的态度是怎样的。

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考茨基引证了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的讲话。确实，王德威尔得在对米勒兰的道德和思想品质以及他的改革的价值给予公正的评价——在这一点上他与考茨基不一样——之后，仍旧提出了看法，认为参加政府是一个错误。但

^① 瓦扬在这次大会上的有关提议中用了“耻辱”一词。——编者注

是，王德威尔得是报告人，为了使双方接近，他在讲话时显然力图一会儿向这一方面作出让步，一会儿向另一方面作出让步，即使完全撇开这一点不说，同样肯定的是，王德威尔得的同胞安塞尔在他之后发言，以极其坦率的方式对米勒兰入阁的理由和益处发表了意见，并得到比利时代表的热烈赞同。我现在已想不起阿德勒曾经就这个问题在巴黎发表过意见，而且在最近出版的作了删节的记录中也没有找到。然而我从《维也纳工人报》上得知，阿德勒是按照考茨基确定的方针发表意见的。但是阿德勒不是整个奥地利党；我在《维也纳工人报》上也已经发现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远不是那么否定米勒兰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同情他的。大会之后不久埃伦博根在维也纳一次集会上以一种与阿德勒全然相反的观点讲了话，并没有因此在会上或党报上引起反驳。意大利人费里作为少数派报告人为盖得的那个企图一劳永逸地彻底禁止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提案辩护。但是首先，科斯塔能够不容争辩地断定，费里只代表意大利人的少数派；其次费里自己最近在曼图亚提出要求说，如果政府想实行真正的改革，那么就请它“让各人民党派直至社会民主党执政”。由此看来似乎费里对这件事重新作了考虑。关于英国人的意见，除了他们对于饶勒斯的发言以及盖得和瓦扬的发言所持的态度外，其他我一无所知，而这种态度使我觉得他们是不可能与考茨基完全一致的。至于最后说到德国人，那么过去和现在都可以肯定地说，奥艾尔所讲的是忠实地表达了绝大多数德国代表的意见；然而，考茨基并不想援引奥艾尔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在党内，我们参加巴黎大会的代表们的意见不是孤立的，这从我们党报的态度上完全可以看出来。对米勒兰的作用持否定判断的是极少见的，而象考茨基那种样子的怒气冲冲的严酷评论则几乎没有见到；还必须把帕尔乌斯的《世界政治通讯》考虑在内，几周前它发表了两篇痛斥米勒兰、夏龙事件和可能主义的文章，但据

我所知，只有一家党报刊载了这两篇文章。与此相反，在大会前后、尤其是对米勒兰的某些具体行动表示赞同的文章大量出现，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出党的意见倾向何处。

因此，要说考茨基后来所提出的观点是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人”都赞同的，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多数派代表所做的是，他们不顾盖得派和布朗基派的大叫大嚷，仍旧支持了考茨基决议案，从而拒绝了誓不两立地反对米勒兰的人的立场。考茨基自己不得不承认，他的决议的通过“被看成米勒兰的一次胜利，对于工人党的国际同情显著地降低”。考茨基能够并且一定预先就知道盖得派会象那样采取行动的；因此如果他想避免那种“假象”，并且承认盖得在这件事情上是正确的，那他就必须把他的决议案写成另外一个样子。但是考茨基大概意识到，那样一来，它未必能通得过。

* * *

说法国社会主义者参加“保卫共和国政府”是不必要的、不可允许的和有害的，这种论断的理由是什么呢？

首先是不承认人们所说的那种迫不得已的局面，而考茨基决议是把这种局面作为个别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条件提出来的。

对于盖得派（考茨基认为盖得派是整个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点，一切都围绕着它，根据他们的意志而行动）来说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当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并引起全体有教养的人们的愤怒时，只有盖得及其伙伴们无动于衷，并且同民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教权主义者和保皇派一起争着宣称，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案件”，这完全不过是富裕的犹太人的一个骗局，全法国不会有一百个工人关心这件事。整个事件至多只涉及资产阶级，工人们对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甚至当运动逐渐发展成为普遍的国家危机时，当用反动派的钱所组织的、并得到巴黎警察支持的游行示威开

始的时候,当任何一个喊了“社会主义万岁!”或者只喊了“共和国万岁!”的人都受到镇压的时候,最后当任何人都一定认识到反动派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即使这时,盖得派仍旧自鸣得意,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在各派别联合组成的总委员会上有人要求,面临日益增长的危险,社会主义者终于应当奋起并且发起反对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这个提案遭到盖得及其伙伴们的反对和否决;他们不愿意蒙受极大的嫌疑,使人认为他们似乎支持与搞政变的人作斗争的政府。当然并不是所有盖得的朋友都对这种无所作为、袖手旁观的高超政策有必要的理解,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联合起来反对公开危险的要求最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致如果盖得不想完全被抛在一边,他就不得不顺水推舟,并且至少暂时作出让步。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个盖得有一天也会发现早已十分明显的危险,并且邀请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一个警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准备对付面临政变的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不是盖得的朋友们表示承认共和国的确处于危险之中的唯一的一次行动。当人们在隆尚普的那一天^①必须准备对付民族主义者的冲击时,瓦扬及其伙伴们同饶勒斯及其朋友们在一起出动了,他们列队站在共和国总统的讲坛下保护他——资产阶级的总统,反对掌握警察、军队、街道以及政府(杜毕伊内阁)的一部分反动派。此后在布里松内阁倒台前不久,国防部长夏努安在大庭广众之前背信弃义地提出辞职(这是他事先同戴鲁累德商量好的),共和派就把这看成是政变的开始。议会会议开过之后,左派的所有党团立即举行集会,以便成立一个警惕和抵抗委员会;社会主义党团一致决定参加建立这一委员会,虽然它的代表们在委员会中站在可憎的和反动的梅利纳方面。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者居然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有损名誉

^① 1898年6月11日,法国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德雷福斯派在巴黎隆尚普举行示威,反对保皇党人—反德雷福斯派。——编者注

的邻居关系和协作关系”，——这是盖得派在他们想使米勒兰和他的朋友们为政府的一切真正的或所谓的罪恶承担责任时喜欢使用的说法——可见危险一定确实表现得很严重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止盖得及其朋友们在最严重的危险刚刚过去，保卫共和国的事业刚刚渡过最大的难关的时候，就在议会内外不断地给共和国制造障碍，从而使搞政变的人感到高兴；他们立刻又一次否认共和国存在着危险，最后终于完全回到他们关于政治形式无关紧要的浅薄说教和一种狭隘到麻木程度的阶级斗争观念，同时直截了当地提出著名的口号：不管是路贝还是威廉掌权，对工人全都一样！

我当然知道考茨基不同意这种观点，而是相反，他承认共和国确实存在着紧迫的危险，而且在拯救共和国这一问题上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是有切身利益的。正是考茨基本人在去年对盖得的弃权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给饶勒斯的一封信中对饶勒斯以无可比拟的方式“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拯救了法国社会主义的荣誉”表示十分钦佩，接着又说：“作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来说再也没有比在一场席卷全民族的危机中保持中立更为致命的态度了；我认为对于一个争取社会复兴的党来说，再也没有比在一个法律问题上漠不关心更为破坏性的态度了，对于民主主义者来说，再也没有比面对横行的军人而优柔寡断更加不可饶恕的错误了”。如今考茨基不得不惋惜地看到人们过去对盖得派的同情由于他们的不可思议的行为而迅速减少了（我们作为两次巴黎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是见证人），他想尽可能地保护他的这些老朋友——如今考茨基当然只不过温和地指责盖得派犯了“个别策略上的错误”，而宣传和组织方面的巨大功绩已经弥补了这些错误。我不想否认，从前盖得及其伙伴确实有过这样的功绩，虽然当时就已经有并非微不足道的阴暗面同这光明的一面相对立了。任何一种功绩都决不能为盖得派后来的大量严重的荒唐行为提供特许状。如果宣传工作是通过

一种不可救药的学理主义，通过对革命空谈的迷信，通过一种政治上毫无成绩的，以个人为转移的政策而进行的并且在关键时刻暴露出这样一种“不可饶恕的”无能，就是说，如果全党追随盖得派的话，就会使法国社会主义遭到几乎不可挽救的打击，那么为党进行这种宣传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在组织一个集团之后只知道通过不容异见、诽谤和捣乱来阻挠党的统一，而且在即使这样也没有能迫使党接受他们的意志时就宁可公开使党分裂，那么组织集团又有什么益处呢？法国社会主义的多数派在自己的巴黎代表大会上作出实行渴望已久的统一的决定，并且抱着立即加以实现的最良好的愿望，而盖得派对他们一贯采取傲慢自大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我们与其通过不合时宜的恭维和原谅来为这种态度提供新的养料，确实不如十分严肃地对这些人说，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放弃他们的分裂主义，努力协助建立统一的法国社会民主党。

* * *

由此可见，考茨基承认存在着一种危险。但是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证据表明”，为了拯救共和国，米勒兰的入阁是必要的；他宁可认为，通过对一个激进党政府的简单支持，完全同样可以拯救共和国。我觉得，作出这种判断的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产生的历史。要知道是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那时考茨基如此希望成立的没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似乎有一定的可能性。有些被瓦尔德克-卢梭内阁预定为他的内阁成员的共和党人根本不能理解社会党人参加政府这一可怕的思想，因此非常激烈地加以反对，以致瓦尔德克-卢梭退缩了。但是他很快注意到，有人企图迫使他向右转，并且强迫他同那些向还很有影响的民族主义献媚的分子合作，简而言之，如果共和国不是公开转向社会主义并且与生机勃勃的工人阶级的力量相结合，它就必然会不可阻拦地走向政变。经过两天的动摇和试探之后，瓦尔德克-卢

梭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没有社会党人参加的组合都不可能真正地完 成保卫共和国的任务，因此他不予考虑。这样，问题就不再是建立一个有米勒兰参加的坚定的共和主义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还是建立一个没有米勒兰参加的这样的内阁，而仅仅是在以下两种情况之间进行自由选择：要么建立一个有米勒兰参加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要么就是瓦尔德克-卢梭辞职，政府危机就有持续下去的危险，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后一种情况是保皇党人所希望的。当然，考虑到社会党人加入一个按其多数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时所承担的责任，并且考虑到他们的代表在政府中极其艰巨的任务，要作出决断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认为，在这一既定的紧急状态下，不仅为了国家和民主制度的利益，而且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只能作出已经作出的那种决断。

* * *

现在考茨基重复我们经常听到的那种谴责，说米勒兰参加政府是擅自行动，他不是一般地提出这种谴责，而是说得极其明确。“事实上米勒兰既没有询问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五个大组织中的一个，也没有询问法国社会主义协调委员会，也没有询问议会的社会主义党团。”因此，正如目前米勒兰竟敢拒绝盖得一布朗基少数派的要求，而“死赖在他的职位上”一样，他在开始升迁时也丝毫没有考虑到党，而是“不守规矩地”，完全随心所欲地行动的。

不言而喻，考茨基是诚恳地重复这种说法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旧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在利用情报方面不够谨慎，（这种情况在他看来本来是不应发生的），他是在传播一种实际上错误的言论。我在巴黎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调查，并且从最熟悉情况的人士方面得到一份关于米勒兰加入内阁的经过的详细报告，没有一个有关的人对这一报告表示异议，因此我要比较详细地加以转述，因为这里涉及的问题事实上可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米勒兰第一次接到邀请他加入正在组织的瓦尔 德克-卢梭内阁的建议时，他立即通过饶勒斯个人传话给迪布勒伊同志（属于革命社会党）和法尔雅同志（属于盖得派的工人党），请他们迅速报告他们的组织。于是饶勒斯在下一号《小共和国报》上要求社会主义党团立即开会，会议是在第二天举行的。米勒兰出席了这次会议，阐述了形势，报告了对他提出的邀请，报告了谈判中断的情况，并就此向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问题：如果在危机期间他再次受到邀请，他应该如何回答？**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议员劝米勒兰拒绝。**瓦扬和他的朋友桑巴向米勒兰表示完全同情，并对他说，在新的斗争中他们将全心全意跟着他；不过他们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对于这件事最好不要作出一个正式决议。马赛的议员卡德纳（当时是盖得派的工人党的成员）反对不作正式决议的建议。他认为，既然党团全体成员个人都赞成接受邀请，为什么他们不能通过一个共同的决议来表达他们的这种意见呢？米勒兰会遭到严重的指责，如果党团让米勒兰对没有一位议员应加反对的一项行动负责的话，那是不公正的，也是缺乏勇气的表现。卡德纳提议，党团应该通过一项决议明确表示同意米勒兰加入政府。只有瓦扬和桑巴仍旧坚持认为，由于党在组织上是不统一的，最好不要做出任何决议，然而他们再一次表示，**他们将非常热诚地支持米勒兰。**鉴于这种情况米勒兰决定：既然有些同事认为还是不要由于他参加政府而使党正式承担责任为好，那么他愿意个人承担责任。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在危机已经历了上述过程以后，向米勒兰提出了第二次邀请，并且就在同一天晚上组成了保卫共和国政府。

因此，正确的说法差不多是同考茨基的论断正好相反。米勒兰在得到邀请之后，恰恰是首先通知了两个现在表示反对的组织，好让这两个组织通知他们的议员。此外，米勒兰正式询问过议会党团的意见。在提出来的反对意见中唯一符合事实的是党团没有

用一项正式的决议表示它在实际上是赞成的。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在一个组织良好的党内，这种事也许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在法国可惜还没有这样一个党。既然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对党团的意见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因此这一遭到指责的疏忽就更加是一个形式问题了。但是如果有人无论如何都要提出责难的话，那么这种责难与其说应当针对米勒兰，不如说应当针对整个社会主义党团——包括现在表示反对的人在内。

* * *

于是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有什么用处？米勒兰在内阁中起什么作用？他的成就是什么？

关于在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执政下为法国取得的纯政治方面的成果，我认为是几乎无可争议的。当然人们可以希望做得更多一些，甚至做相当多的其他事情。人们可以举出：“案件”^①还决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因为无论是被告及其辩护人所受到的无礼对待，还是军方的可耻行为，都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惩罚。对搞政变的人的胜利没有被利用来更加有力地消除反动派的危害，尽管采取了一切应加称许的措施来使陆军服从，但它终究还占有一定的地位，或早或迟能再一次成为威胁；此外，在国家机体内还存在很多不民主的、因而一再对民主的进步造成危害的因素——包括制度和人员；如此等等。并且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提到把现政府执政十几个个月以后的法国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看成是模范的。但人们难道当真可以认为，有哪一个人曾经能够带来这样一种理想的状况吗？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就职时所遇到的那种形势难道看起来不是几乎没有前途的吗？政变就在眼前；国家大部分权力手段，首先是军队掌握在保皇党的叛乱分子手中；行政机关里尽是

^① 指德雷福斯案件。——编者注

反动的和不可信赖的分子；巴黎为民族主义者所占据；人民由于受到有组织的煽动已激动到极点，毫无疑问不是站在新政府一边！谁只要具体设想一下所有这些情况，我认为他大体上只能对内阁的勇气和智谋表示称许，内阁凭着这样的勇气和智谋挫败了反动派的阴谋，并且领导濒于灭亡的共和国渡过风暴而进入比较平静的水域，从而开辟了良好发展的前景。但是这种对国家的整个文化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成就是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及其在政府内的代表的起决定作用的协助下取得的，我认为这对于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绝大多数来说是政治觉悟成熟的证明和荣誉的标志，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也可以为此高兴并且分享这样的荣誉。

* * *

但是所获得的好处绝不是只有这些。我觉得很奇怪，考茨基在他反对米勒兰的控告书中连有可能记在米勒兰账上的最微不足道的问题都没有忘记，但他却能够心安理得地一字不提他的被告在社会改良方面所进行的特殊活动。因为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显然是必须把这一领域中的行动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不应把它当作无足轻重的事情忽略过去。在柏林的一次集会上，克拉拉·蔡特金也持这种态度，她认为可以这样来论证，就是说“米勒兰作为部长为了实现社会方面的意图所做的或所忽略的事，在评价他担任部长对于社会主义党团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时是完全不必考虑的”。由此可见，在人们对米勒兰横加指责，并且最终否认他具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资格之后，人们又想立即剥夺他用那些最明显地表达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行动来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事实上，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加方便了！这已经差不多等于象最狂热的盖得分子那样直截了当地宣称，在米勒兰担任部长时所发生的事对工人阶级不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且——科德里市盖得派的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用十八行生动的戏剧性语

言对此作了表达——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政府是法国有史以来最资本主义的、敌视工人的政府，在它的统治下工人的处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恶劣……

面对这些情况，我认为通过几件事实说明米勒兰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活动，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在客观上是必要的。

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在法国是做得很差的。虽然有不少规章。但是这些规章对男人、女人、青年和儿童的规定是各不相同的，这一情况和企业家的种种诡计——特别是轮班制——给监督造成了困难，再加上“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工人立法极端无知，对于运用这方面的立法又漠不关心到不可理解的程度”（拉加德尔^①语）。因此这些规定依然只是一纸空文。童工的工作日订为十个小时；实际上他们工作十二、十四、甚至十七个小时；近几年来在大部分工厂里工作日定为十一小时。男工同样是工作到十二、十四、十六、甚至二十四小时。米勒兰立即制定了一项法律，而现在已经生效，他对雇用各种工人的工厂的所有工人规定了同样的标准工作日，1899年至1901年的过渡时期为十一小时，1901年至1903年为十个半小时；**从1903年起法国将实行十小时工作日。**一项关于承担公共劳动的条例规定，在所有合同中都采用标准工作日和标准工资，这就使工人不再受企业主任任意摆布。如果本地区的工资增加了，企业主必须根据工人的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如果没有付给所规定的工资，那就从企业主为承担工程应得的款项里相应地扣除那笔钱，并由当局直接付给工人。除此而外，不遵守劳动条件的企业主不得继续承包公共工程；禁止计件劳动。由米勒兰（作为邮电部长^②）直接领导的制造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迄

① 于贝尔·拉加德尔（Hubert Lagardelle 1875—1958）——法国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运动》编辑，米勒兰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家。——编者注

② 米勒兰在内阁中的职务是工商、邮电部长。——编者注

今大部分转嫁给工人的事故责任保险费现在必须由企业主单独负担了。

米勒兰特别重视工人的组织，他让职工联合会承担不断扩大的社会职能，并使它在与企业主的斗争中成为工人的得到国家承认并且拥有行政职权的代表。劳动交易所（一种地区性职工联合会，主要从事介绍工作，但此外也从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工作，并为工会运动提供场所，它为此接受社会捐助——最近一次达五十六万法郎，其中巴黎占十八万二千法郎）脱离了地方行政官的监督并完全交给工人自己管理。最近成立的全国性的中央劳动介绍所是根据工会和劳动交易所提供的情报开展工作的，因此对工人起着重大影响。工会直接参加监督劳动保护法律的实施，米勒兰责成工商业监督员迅速调查工会向他们报告的工厂里的违法行为。为了正规地维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建立了劳动评议会，它们基本上符合我们的国会党团一再提出的、但遭到拒绝的提案的要求。他们对一切工人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调查现行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研究出现失业和发生罢工的原因，提出消除这种现象的建议，提出关于劳动保护状况的年度报告。劳动评议会及其地方组织由工人和企业主各占一半组成，二十五岁以上的法国人不分性别都有选择权，只要他们属于职业性组织就行。这条措施虽然没有正式规定要组织起来，但是实际上已经使每一个想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有一些发言权的工人必须参加组织，而组织是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前提，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把有效地贯彻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现行法律和设施以及争取新的法律和设施的可靠手段交给了工人阶级自己。米勒兰新近组织起来的最高劳动委员会处于劳动评议会之上，其任务是研究总的劳动情况，并且对劳动情况进行调查，以及准备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为此所必须的准备工作由一个常设委员会来处理，它请最高劳动委

员会注意现存的弊端，并提出实行必要的改革的建议。在选举这个机构时——它成了部长在劳动事务方面的顾问——很多工会参加了，除此而外，米勒兰也邀请了一批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这一机构。

最近米勒兰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一次对朗斯工人的轰动一时的演说中——他在这次演说中“公开承认信仰社会主义学说”，“还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敢于这样做”。（《维也纳工人报》）——米勒兰“提出了一个无论如何是大胆的社会改革纲领”（《前进报》）。由于工人反对资本的经济斗争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具有集体行动的特点，因此这种斗争也不可能是由个别人的利益决定的。所以在工资斗争中，无论是涉及罢工还是复工问题，决定权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此外，米勒兰表示赞成强制性的仲裁机关，通过这些仲裁机关，独断专行的企业主被迫讨论工人的要求，并从而使工人可以避免旷日持久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但是，米勒兰并不想停留在空洞的诺言上，有关强制性仲裁机关的法律草案已向复会的议会提出就是这一点的证明。米勒兰在这个问题上将走得有多远，以及米勒兰的其他思想将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形成为法律草案，这当然不仅取决于这位社会党人部长的愿望，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议会的状况所提供的机会。

* * *

那么我要问：难道所有这些事情——不管人们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都是次要的和没有意义的，以至工人阶级在判断整个问题时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吗？如果不正是为了争取实行同样的或类似的措施，从而提高工人地位以及加强工人为新的目标而斗争的力量，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以及其他地方所从事的工作的一大部分（倍倍尔1890年在哈雷代表大会上说是“十分之九”）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

当然，有差别，我们有一部分人所提出的要求要更加慎重得多，我们几乎不能想象法国工人由于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而已经获得的种种东西。有些自认为特别“自觉的”善良的人把为目前需要而进行的工作看成是“次要问题”，究竟要多少次向他们指出马克思说过英国工厂法的颁布是英国工人阶级复兴的开始呢？考茨基决议开头的一句话固然是人们应当视为理所当然的，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它，而现在已把这个论点看作是无可争辩的了，我认为单是这一点就已经是巴黎代表大会的巨大胜利。这句话是这样的：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袭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好极了！但是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幸运地达到这样的地步，那么应该提防不要由于低估了有助于组织和复兴的措施而重新引起一种信念，即似乎到达目的道路可以笔直地通过蔚蓝色的天空，而不可能是沿着平凡的大地上“漫长难行的”小道前进的。如果人们认识到这条现实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路，那么在这条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最好的旅行者不是仅仅不断谈论“最终目的”的人，而是懂得采取踏实可靠的步伐的人，这种步伐是同他自己的力量和地形相适应的，正因如此能够使他向前迈进。

但是我认为目前法国工人阶级前进的步伐是很稳健的，并具有某种特色，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只能因此对孚日山脉^①那边的兄弟们感到羡慕。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在法国过去十四个多月中关于工人问题在立法和管理方面所实现的比以前二十年中所实现的还要多，而且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或者

^① 界于德法边境的山脉。——编者注

说——如果只允许对社会主义的这个词作狭义解释的话——现代精神的支配。“米勒兰是作为某种高级工厂观察员和官方发言人而受到内阁容忍的。法国社会主义对于社会党人部长和通过社会党人部长所起的政治影响等于零。”——考茨基认为可以用这些蔑视的话来评论这个党员同志，而上述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同志勇敢的首创精神和顽强的毅力造成的，他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至少在法国是人人皆知的。看到象考茨基这样的重要人物由于采取了片面态度竟允许自己错误地作出这样一种在任何一个冷静的判断者看来都是自然不能成立的描述，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

* * *

当然有一些人懂得必须对米勒兰为工人利益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他们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者支持一个激进派内阁的话，那么我们即使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也能够争取到这些好处。无需多说就可以证明，这个假设完全忽视了事实，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我已经指出过，那时要成立一个能够应付局面的激进派政府，没有社会主义者参加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社会主义者不参加政府就有可能使共和国陷入混乱。但是即使假设另外一种情况，那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者能迫使激进派政府听从他们的意见呢？人们难道忘记了曾经一度有过一个激进派政府——布尔茹瓦内阁，它只是靠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的吗？究竟为什么社会主义者未能从那个政府得到米勒兰所做的那些事情呢？究竟在哪里有愿意并且能够实行现在已经贯彻的那一整套措施的激进派呢？不，假如一个纯粹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内阁在当时情况下竟能存在，那么社会主义者就会只限于充当无私的支持者的角色，并且从一开始就必须放弃实现任何一种重要愿望的想法。

社会主义者支持政府，其决定性的原因是拯救共和国，所以社会主义者不能因为政府拒绝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就在斗争中把政府抛开不管。因此，并不是如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内阁似乎掌握在社会主义者手中，而是社会主义者掌握在内阁手中。

* * *

人们对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以及对个别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唯一可以提出来的、有一定道理的指责是：社会主义者处于纯粹反对党立场的简单地位变得复杂化了，我们有代表参加政府就对政府负有一定的义务，就要承担危险的责任。我决不低估这一指责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主义者简单地否认这种危险的存在，并想劝告我们不经过认真考虑就急于接受向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建议，那么我会认为这是愚蠢的和不可宽恕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把危险夸大到极点，那么这与其说是对自己力量有信心，不如说是某种软弱感的表现。谁只要摆脱这两种极端，并且冷静地判断事物，他就一定会在任何个别情况下，既对总的政治情况，也对党的情况深思熟虑，并且权衡利弊。

反对米勒兰担任部长的社会主义者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米勒兰要为与他共事的资产阶级部长的一切措置，甚至要为任何行政机关乃至市长和宪兵的一切行为分担责任。这种对政府责任的理解是过分地不着边际，过分地迎合一定的目的，以致无法加以合理地运用。当然每个政府一定有其每个成员都应负责的共同的东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政府纲领或政府的总政策。在米勒兰这个事例中，纲领是共和国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完全可以为此承担责任的。由于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存在，因此在各个行政部门中会存在并且发生很多使我们社会主义者理所当然感到不愉快、并且希望尽可能迅速加以改变的事情，这是根本用不着说的。但是，如果说社会主义者在国家中的权力还是这样地受到限制

的话，那么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权力也受到限制；不过社会主义者首先可以在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表所获得的权限范围内实行最迫切的改革，此外还可以对总政策发生一种影响，他们能够利用这种影响来进行进步的政治与社会改革。资产阶级部长们的个别行为的责任只能由他们本人承担，从反对我们参加政权的人自己的言论中就可以推论出这一点。虽然这些人认为援引瑞士为例是无效的，——那里社会党的部长已经和资产阶级部长共事，而谁也没有想到要这一方为另一方承担责任——理由是那里实行人民直接选举。但伯恩斯坦已经指出，实际上这种选举只不过是根据进行合作的各个党的力量大小分配政府席位而已。除了瑞士就数英国了，在那个国家里，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也是可以允许的；众所周知，曾经一再有工人代表参加政府。但是根据大家都要共同负责的那种理论，那里的管理商业部的同志就必须对野蛮的英国刑事制度或印度的饥荒分担责任。考茨基本人也认为，在德国受俄国打击、欧洲会受到专制制度统治的情况下，甚至在德国也可以允许社会主义者参加为组织人民战争而成立的政府。即使完全撇开这种参加是否有益的问题不谈，毫无疑问，那时在德国毕竟也还会存在一些机构和习惯的做法，这些东西在战时尤其是不能立刻取消的，而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并且能够为它们承担责任。

这里只有两种情况，或者人们坚持这样的主张：一个社会党员由于进入一个按其多数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就要为资产阶级部长和他们的官员以及国内其他人所做的一切坏事负责。那么社会党人担任部长**无论何时何地毫无例外都是不容许的**，那么就必须接受盖得的原则上采取否定态度的提案。或者人们象巴黎代表大会的大多数那样，认为这个问题全是策略性的，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允许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那么责任问题基本上就已经解决了。

因为那样一来人们必须承认承担责任不可能是普遍的和不受限制的，在政府的共同纲领范围内，除了内阁总理之外，每个主管部门都是自己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而根据米勒兰自己表示，他是十分确定的利益的代表，作为这样一个代表他只需要为他自己管理的部门承担责任。

即使作了这样的限制，党仍旧由于米勒兰入阁而受到一定的束缚，党的行动也复杂化了，这是肯定的，正如完全的行动自由本身肯定具有优点一样。但是只有那些由于弱小而无足轻重的党才能够不作某些预计的自我限制；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同样要受到约束（而且不是互惠的），往往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必须受环境的迫使而行动。法国同志的自我限制并不是为了放弃什么，而是相反，是为了替工人阶级以及公众获得较大利益。当然，即使想尽一切办法，仍旧可能出现相当不利和困难的情况；那时恰恰需要仔细地考虑党及其所代表的事业的尊严和利益的要求是什么。既然继续直接参加政权到目前为止表现出很大的益处，足以克服所引起的疑虑，人们就必须使小事服从大事，使形式服从本质。如果有一天发生了变化，那时也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的同志自己也作出改变。那时他们将简单地解除已经结成的关系，并重新采取老的立场，以便从这个立场出发，改变形式，加强力量，继续进行原来的斗争。

* * *

考茨基认为，米勒兰的“部长威风”不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这是很可能的。工人阶级的敌人自然最乐意或者在政府中孤立并单独地推翻一个这样地对待企业主神圣利益的部长，或者在政府表示支持这位部长的情况下使他同整个内阁一起倒台。巴尔图这位从前梅利纳反动内阁的内务部长，就已经在奥列龙的讲演中提出挑战并在议会中首先发动攻击，当然攻击是失败了。然而，这种攻

击肯定还会继续出现，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已经要求在社会改革方面加强活动，情况就更会如此。但如果保皇派、归顺派、民族主义分子和梅利纳分子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更加巧妙地选择机会，那么，在组成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时被抛在一边、此后对政府不满并且首先想搞垮米勒兰地位的左派集团就有可能同他们合作；如果有意见分歧的社会主义者继续争论下去，从而使米勒兰的资产阶级反对者更加容易这样做，那么很可能，排除社会主义的劳动部长，并由工人阶级的一个敌人取而代之这一个大目标，或早或晚，总是会以这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达到的。如果米勒兰看到他的地位实际上已不牢固，也许他也想为自己寻找一个他认为最符合党的利益的机会。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忘记，不管是米勒兰，或是瓦尔德克-卢梭都是卓越的策略家，而且全国对他们的坚定的共和主义的统治是抱有好感的。因此事情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但是不论今后的过程将如何，我坚信，考茨基所说的全部问题将随着米勒兰的下台而“长时期地、也许永久地被埋葬”的看法将不会应验。如果“米勒兰事件”一旦结束，社会党人部长的成绩完整地、并且摆脱一切附加的个人因素而放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我相信，连社会主义方面的反对者也将学会作出另一种判断，并会看到，这里涉及的是一种不易消除的成见和一个可以在其上继续发展的基础。因为工人们看到了，通过社会主义者坚定灵活地参加政府可以得到些什么。工人们将不再能理解这样的矛盾状况：我们虽然要求实行一切可能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合法改革，却又不允许我们自己通过政府实践来加以贯彻，而宁肯听任资产阶级政客去实行这些改革，尽管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资产阶级政客们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完成这项任务。工人们将懂得，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有朝一日突然出现的、一致的、不可分割的行动，就象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能一下子从经济上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工人们将

进一步看到,在选举赋予的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固然有差别,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自愿放弃我们能够借以对事态产生影响的随便那一点权力,是错误的,要长久地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工人们将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今天已足够强大,可以在各个方面进入资产阶级机构,而不致被它们吞掉,社会主义因此有力量,有权利,有责任向资产阶级社会要求自己的一份权力,并且越来越多地给事物打上自己的印记。

因此,我认为,米勒兰固然是第一个社会党人部长,却不是最后一个!

译自《社会主义月刊》1900年
第12期第766—783页。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慕尼黑 代表大会关于党的报刊问题的发言

(1902年9月16日)

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应当诉诸热情,因为热情通常是盲目的,而只应当诉诸理智。我个人本来对这个问题不太感兴趣,我的性情是简单直率的(活跃),没有什么写作才能。我很少感到需要把自己的每一个思想立即强加给别人。我很少参加,或者根本没有参加对于这里所谈的全部问题的辩论。在党代表大会开会之前,我出于责任把最近几年的各种争论的记录重新读了一遍,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参加争论是对的。在作了详尽考察之后,我不得不对自己说,在我看来,所说过的话十分之九都可以不说(很对!),党不会因而有什么损失。因此,除非必须,我不再介入此事。事实是确定的:有人对于《新时代》长期营业不振表示不满。(喊声。)我想,一个刊物亏损了一万马克,这也许是营业不振。(喊声:过去一直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过去一直是营业不振。(十分活跃)这个刊物情况不佳,虽然有党的威信,仍然有亏损,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月刊》(不管人们对它是怎样想的)不断向前发展,现在传播得这样广泛,其他刊物如果能这样传播也会感到完全满意的。对于这一事实首先用不着进一步谈。我一点不否认,当另一个杂志(它很长时间不是党的机关报,只是这几年来在实际上赢得了这个称号)获得了这样广泛的影响,这对于党来说是并不愉快的,这种情况也是不正常的。但是,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在谈

论这个问题的许多聪明人中间，竟没有一个人明确认识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觉得按理说，应当到哪里去寻找原因，就应当首先到那里去寻找，也就是说到编辑部去寻找，这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一个有党的威信和钱袋作后盾的刊物应当获得异乎寻常的影响并且向前发展，这是具备一切有利条件的。如果没有做到这样，那么只能由编辑部负责。照目前这样的情况，我确信：你们愿意作什么决定就可以作出什么决定，但只要不改变编辑方针，就不会有变化。考茨基跟从前一样把事情说得很美妙。他说过：“人们到底对我提出了什么指责？都是一些小事！”但是，我觉得事情不过是这样的：考茨基（他的功劳和才干我用不着加以恭维，这是确定无疑的）具有一种片面性，狭隘性，他容忍不了不同的意见，我们党的其他著名的党员同志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象他这样的。这是无可反驳的，这一点考茨基本人在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就向我们说过，那时有人对他个人提出了指责，有人谈到了思想自由，我们向资产阶级政党要求这种思想自由，而他认为，在我们党内提出思想自由的同样要求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而加入我们党则是自愿的，所以不能提出这个要求。他还补充说，他把党的统一看作是首要的。歌德说过：“你所说的各个时代的精神，其实只是作者的精神。”^①这句话正适合于他。你所说的党的统一，意味着你的原则，你的特殊的意见。其他的观点都被看作是错误的，不是在文字上同这些观点进行斗争，而是企图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这就是《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月刊》之间存在的差别。至于《月刊》的出版者做了些什么，我一无所知，目前也与我无关。问题在于文章的内容。每一个在《月刊》上发表文章的党员同志都是署名的，对自己的观点承担责任，只是让读者去作出

^① 参见歌德《浮士德》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部第30页。——编者注

自己的结论。但是考茨基恰恰不想这样，他曾声明，他的刊物不是为了代表不同的意见，而是为了捍卫党的统一。他现在说：这都是些小事。我想打一个比喻：有这样的一个会议，它的主席是世袭的，也就是说总是同一个人，他在辩论中只是对我表示怀疑，并且不管是否适当，一有机会就打断我的发言，他从来没有容许我正确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事后却利用一切机会大肆攻击。这样的会议我是不喜欢参加的。不只是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许多人都遇到这种情况。现在有人问，究竟是什么会议糟糕到这种程度。难道你们忘记了最近几年的辩论吗？难道你们不记得，有一批同志（我不把自己算在里头，我是不在乎的。）被加上了很坏的罪名，使他们变得十分可笑？他们的罪名是：他们的行动有利于破坏党，他们站在通往资产阶级阵营的道路上。这些罪名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可不是小事。去年，甚至阿德勒不得不给考茨基写了一小段题词。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曾互相攻击，我们将重新和好，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善。但是，看起来这是考茨基一般说来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我认为，如果编辑部高高在上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外国的社会民主党内所发生的一切加以评判，如果饶勒斯这位法国最大的兄弟党的领导人被称为“党的大破坏者”（这样的人消灭得愈快愈好），这是不对的。而当王德威尔得同志发表了他的信时，人们对他的回答是多么不礼貌，这就用不着再说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轻率态度，在一个自由的刊物上也许可以发生这样的事，但在一个自命是党的科学机关报的刊物中，编辑每时每刻都应当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现在有人说，人们可以提出申诉。部长们每一次也是这样回答我们的控告的。（活跃。）然后又说，申诉在哪里呢？不对，枢密官先生，难道没有吗？（再度活跃。）谁会乐意就考茨基这样的编辑提出申诉呢？我认为，我对他了解得很清楚，我知道申诉根本无济于事。考茨基必然会同现在一样受到保护（活跃。），

他一点不会改变,或者至多只会变得比过去更加片面。(活跃。)倍倍尔去年写了一篇文章来评论我在此地的一次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他指责我:为什么不提出申诉?我反问道:如果党的机关和执行委员会真的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在这方面进行纠正,那么,为什么《新时代》上出现了无数闻所未闻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听到党的执行委员会加以干涉呢?(普凡库赫喊道:干涉了!)是的,是在发表出来之后。在论述机会主义者的一组文章的最初一篇中,你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意图何在,并且可以说: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员同志。但是你们什么也没有做。你们让它发表了,而有关的人就不得不迁就这一点。因此,别跟我来这一套。正是笼罩着《新时代》编辑部的那种精神促使人们离开。一些著名的党员同志、国会议员停止为《新时代》撰稿了,你们究竟能用什么讲得通的理由来解释这件事呢?也许你们想提出一种理论,说什么正在进行着一个阴谋,要破坏党或者把党引导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但是总有一个理由。这就是:由于笼罩着《新时代》编辑部的那种精神,他们感到自己受到排斥,得不到必要的活动余地,因此他们转向别的刊物了。如果在《新时代》中有可能发生变化,我将感到极大的高兴。但是我声明,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永恒的监督的精神,纪律的精神,而这种纪律是虚假的纪律,是人们所反对的兵营的纪律。请你们想一想,你们与之交往的可是独立的人啊!请你们让他们把话全说出来,并由党作出决定。如果有人想阻止这样做,那么这是感觉到自己虚弱。(很对!)奥格斯堡的提案在我看来简直是荒谬的。(活跃。)当我读到这个提案时,我曾以为,奥格斯堡人把对象弄错了。这本来应该是为中央党、为有检查员高高在上的教会报刊(那里只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提出的提案。我不想再说反对这个提案的话了,因为提案人已经用自己的发言出色地反对自己的提案。(活跃。)请你们平

心静气地让一切意见自由地说出来，只要这些意见是通过诚实的和正派的（喊声：正派的！）方式表达的。请你们不要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倍倍尔昨天说，根本谈不到限制言论自由。但是奥格斯堡提案就是这个意思（倍倍尔：我不赞成这个提案！）——固然这样，但是除了你以外大厅里还有别人。这个提案要求，辩论只应在党刊上进行。这不过是说，如果党的出版社不愿采用这篇文章，那么人们就只好把嘴闭上。（很对！）既然一些党员同志企图阻止一些文章发表（他们对这些文章提不出别的指责，只好说它们是发表在一个不属于党的杂志上的），那么，这就涉及到压制意见，这就是说，有人想压制言论自由。我不相信你们会这样做，因为这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单凭这一点我就不相信。唯一可能产生的后果将会是，《社会主义月刊》上展开的朝气蓬勃的活动被扼杀了，但是对《新时代》却没有帮助。如果你们以为，那时有关的同志将会服从考茨基的检查机关，那你们就弄错了，他们将会根本停止写作，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如果有人企图压制言论自由，那么，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会俯首贴耳服从这样的检查。如果加入社会民主党并挣脱旧的不自由仅仅是为了用一种新的不自由来代替，那确实是不值得的。（热烈鼓掌。）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902年慕尼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1902年柏林德文版第138—141页。

在帝国议会关于预算问题的演说* (摘录)

(1903年1月20日)

先生们,在我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估计以前,先就**对外政策**谈几点看法。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不把外交活动——大叫大嚷地对外扩张势力——看作主要的事情,尤其是:坚决反对好大喜功的和冒险的世界政策。但是外交关系的形式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因此就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第一,必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作出牺牲的总是人民。其次,对于其他大国怎样看待德意志帝国这件事,我绝不是无动于衷的。因此,我在观察这些问题时决不会仅仅抱着狭隘的幸灾乐祸的态度,希望一个同我们敌对的帝国领导机构会尽可能多做蠢事和多犯错误。相反,如果我一旦有可能发现帝国的对外政策中哪怕有一点美好的并且是有益于德国人民的东西,那我是宁可表示欢迎的。但遗憾的是很少看到这种情况,或者不如说根本没有。我们在对外政策中看到的仍旧是缺乏坚定的目标,是一种轻率随便的态度,方针变化无常,随时都准备作出新的即兴发挥,对各个大国——即使不说是厚颜无耻地,那也是有意地——逐个献媚,投向它们的怀抱,因此到头来处处得不到信任,注定要落得一场空。

* 1903年1月20日,福尔马尔作为社会民主党团的第一个发言人在帝国议会关于预算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说。这里选录了其中抨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某些专制行为和反社会民主党言论的部分。——编者注

.....

要对至今完全错误的危害极大的**财政政策**实行真正的改良，只有通过改用直接征税并使不可救药地纠缠在一起的帝国同各邦的财政彻底分开才有可能。认真说来，对这样一种新型的财政制度实际上只能提出一点异议：这种改革同帝国的联邦性质是矛盾的，并会使它失去这种性质。我个人决不是中央集权主义者。相反，我认为按照法国的模式或者按照俄国（因为我们这里同它更相近）的模式实行集中制管理，使德国人民多样化的生活由一个中心来确定，这在各个方面都危害极大，而且是背离我们所追求的民主自治制目标的。但是先生们，我看不出由帝国征收直接税会对各个邦的符合宪法的和正当的独立性及其立法有这种危害。当然要实行帝国所得税而又不在于某种程度上干涉各邦的财政和赋税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的制度太杂乱，人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把帝国的直接所得税搬用过去。但是在其他领域也进行了这类必不可免的干涉，在部分领域还做得很多。我只举一个例子，这就是司法制度。

.....

我现在来谈谈狭义的**对内政策**。而且我要在这里——同昨天已经发言的舍德莱^①博士先生一样——我要探讨某些具有大政方针性质的表态演说。这些演说是非常能说明我们的特殊政治情况的，这不仅是由于它们的具体内容，也由于它们并不是出自正式政府机关，而是出自拥有“德国皇帝”称号的德意志联邦元首。昨天帝国首相^②先生看来对这种说法是不喜欢的，但这是我们的帝国

① 弗兰茨·舍德莱(Franz Schaedler 1852—1913)——班姆贝尔格的大教堂参事会成员，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中央党)——编者注

② 指伯恩哈德·毕洛夫(Bernhard Bülow 1849—1949)——侯爵，德意志帝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第四任帝国首相(1900—1909)。——编者注

宪法中为帝国首相先生非常重视的表述方式(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这样,因此他恐怕不得不对此感到满足了。

先生们,我昨天有些好奇,想知道帝国首相对特别棘手的**斯维内明德事件**^①恰恰会作出怎样的回答。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说:我在议会感到失望的经历中又增加了一件事。因为云山雾罩的言词并没有能掩盖帝国首相的窘迫处境,他要为一件事情进行辩护,却除了通过支梧搪塞并用任意虚构的词句去偷换概念以外,再也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央党由于为它效劳的一位部长倒台并从而使它在政治上遭到失败而可以理解地感到愤怒,因而对艺术发泄了它的不满。我不想继续在这里讨论这一事件的说不尽的可耻之处;我认为,除中央党外——顺便说说,如果我得到的消息正确的话,那就连中央党的一部分人也有自己的想法——对这件事不存在意见分歧。但在形式上说,巴伐利亚邦议会的中央党多数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当时我们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的对立如此激烈,但是我从那以后除了站在受到攻击的中央党的一边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发生的事情是巴伐利亚邦的事务,这要由我们巴伐利亚人相互协商解决。这当然不是说,德国国内和国外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对此抱有他个人的看法。但是巴伐利亚以外的任何部门都无权施加官方的有权威的影响。昨天已经有人指出,帝国宪法没有赋予皇帝以任何方式干涉各邦内部事务的任何权利,各邦的事务他管不着。……

而皇帝确实没有对一个议会、即一个人民代表机构作出的决

① 1902年8月10日威廉二世从斯维内明德给巴伐利亚摄政王卢伊特波尔德发了一封电报,他在其中谴责巴伐利亚议院多数派即中央党否决一项增加购买艺术品经费的十万马克预算,并向摄政王表示愿从自己的私人财产中拨付这笔被否决的款项。摄政王谢绝了,并说,邦议会上院有一位议员愿意提供这笔钱。——编者注

议进行任何监督或审查的职权。(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帝国首相先生巧妙地回避了这一点。在这件事上我完全不考虑措词如何；这是爱好问题，或者象帝国首相昨天所说的那样，是分寸问题。我也不想进一步探讨从这次声明引起的国家法方面的观点。可能在东部边境附近，人们是这样理解这件事情的：似乎不是政府而是摄政王个人要求拨付经费并获得了批准，然后似乎他由于不得不插手于执行时的具体事宜（甚至还可能包括艺术品的选择和类似的事情）并且不得不把他的意见到处强加于人而感到个人的满足或者愤慨，但在巴伐利亚情况却不是这样。（活跃。）……

在巴伐利亚，公众自然对这件事议论得很详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先生们，议论时的口气比我们今天在这里所用的口气要明确得多。（左边活跃。）在普鲁士通用的渎君罪法律条款不适用于巴伐利亚，这只能说是一种幸运，否则当时法院的工作会多得可怕了。我也为中央党作证——它自然有一切理由因为那份电报而欢欣鼓舞，因为这使它摆脱困境，突然通过一种简直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善了它的处境（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所以我证明中央党对这种明确的语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这里指的是巴伐利亚中央党，至于德国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普鲁士，中央党的行为无论如何要冷静得多和克制得多。……

现在，我来谈谈另外一点。斯维内明德事件涉及的是侵犯邦的权利和污辱人民代表机构，而**皇帝在克虏伯事件后发表的演说**^①却（议长摇铃）……

① 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Friedrich Alfred Krupp 1854—1902）——当时德国最大的钢铁和军事工业巨头。在几家报纸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揭露了他的同性恋癖好后他自杀了。威廉二世利用在他葬礼上的悼词——和另一次在布勒斯劳的演说——把他之死归咎于社会民主党人，并以特别恶劣的方式辱骂他们。由于国会议长巴莱斯特雷姆伯爵（中央党）禁止对这些演说进行评论，福尔马尔只好限于一般地表示态度。——编者注

议长：

议员先生，枢密顾问克虏伯是一个个人，仅此而已。他在死前遭到的污蔑和中伤也完全是属于私人的事情。在他死后表示悼念和同情的话不论出自何人也只涉及私人感情。我将不容许在帝国议会里在讨论预算问题的时候谈论克虏伯事件。（右边：好极了！）议员先生，请您遵守这一点。

议员冯·福尔马尔：议长先生，我没有想到要对克虏伯事件本身哪怕说一个字。（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好！）我只打算评论皇帝的那两次演说，这些演说同那件事情本身完全无关，何况还确实实地在《帝国公报》上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席：听啊！听啊！）。我的目的是要指出，那些演说必然造成怎样的后果。（议长摇铃。）

议长：议员先生，我坚持我的决定，在那一悲惨事件中作出的演说即使已发表在《帝国公报》上，仍旧是私事。……

冯·福尔马尔：我不得不重复一遍，我一个字也不想提到克虏伯私人的事件，但要谈到我的党由于这件事在那些演说中遭到了辱骂。（最左边暴风雨般的掌声。——议长摇铃。）

议长：我仍然认为，这都是个人的言论，出席这个国会的个人和政党在这些演说中都没有被提到（最左边激烈地打断他的话）。先生们，请保持安静，请遵守这一点。

冯·福尔马尔：先生们，议长先生说，他之所以不允许评论关于克虏伯事件的演说，是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个人，我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吧？但是埃森和布勒斯劳的那两次演说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其中只是一部分以克虏伯个人为题，而另一部分则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书。（最左边暴风雨般的掌声。——议长摇铃。）

议长：我坚持我的决定，请发言的先生遵守。……

冯·福尔马尔：先生们，国会赋予议长的权利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并不是为了压制言论自由！

.....

议长：议员先生，我再次请您停止这样的争论，否则我将不得不遗憾地命令您遵守秩序。（最左边喧哗声。）

冯·福尔马尔：议长先生，我向您保证，我比任何人都更不愿意被您命令遵守秩序。我始终努力使我要说的话也限制在被认为是普遍准则的限度之内。但是如果索性要给我们套上笼头，而且是在一件如此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这样做……

我受委托在我履行议员职责时谈一下一个多月以来轰动全国的一个重要的大政方针问题（左边喊声），就是世界各地也都议论纷纷而现在却突然作出决定，不允许我来谈论这件同我们有关的事件，但在同一场辩论中却可以讨论中央党提出的斯维内明德事件。（议长摇铃。）

议长：我的冯·福尔马尔议员先生，您指责我偏袒中央党，这是出乎我意料的。（最左面喊叫声。）您对斯维内明德事件谈得比议员舍德莱博士先生还要详细，我也没有打断过您。……

冯·福尔马尔：议长先生，我必须说明，我决没有作任何指责，而只是肯定一个事实。斯维内明德事件连《帝国公报》都没有发表，议院却对此进行了讨论。我是最不会对此抱怨的，我自己的确参加了讨论。但是我已明确指出：由中央党提交讨论的那件事可以十分公开地进行讨论（这是完全正确的），而现在另一件同社会民主党有关并直接涉及官方出版物的事情却只字都不能提。（左边热烈的喊声。）但是现在再说也没有用处了，因为我的抗议手段全都用尽了。所以我要在公众面前确认，我没有获得可能在国会这里谈论一项涉及整个帝国的政治事件，并对一个拥有两百万选民的党受到的攻击和辱骂作出相应的还击！（很好！社会民主党人席喊声。）

在我确认这一点以后，我将继续对应由帝国首相负责的帝国

状况作一般的批评。对帝国首相的这一批评当然已经由议长先生大大减轻了。（最左边：喊声。）

帝国首相先生昨天反来复去地谈到帝国宪法，他把它称之为我们政策的坚实基础。但是根据帝国宪法，帝国不是单一的国家 and 专制的君主国，而主权的体现者是联邦议院，帝国首相应当为政策的整个进程负责，这说明他是一个独立行动的、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务活动家。帝国首相先生昨天进一步阐述了负责这个概念，并同时说明了皇帝的书面意见同口头意见、正式政府文件同其他政治性表态的种种差别。我认为这一切细微的区分都是站不住脚的。在真正实行立宪制的国家中，不承担责任的国家元首在政治上只能通过承担责任的部长来行动。因为否则就要彻底倒退到旧的专制制度去，就会任何时候都将取决于有关的君主的意愿。何况这一切区分就本身来说也都是没有意义的。国家最微不足道的和最无关紧要的行动——诸如任命一名会计员或者授与一枚勋章以及类似的事情——都一定需要副署，即需要部长的共同行动，而在采取最重要的宣布政治态度的行动——如昨天帝国首相先生所说，甚至在发布那些应对国家整个方针起决定性影响的正式的政府纲领时，却无需这种共同行动，一切都必须听任君主个人自行作主！

帝国首相先生曾提到，皇帝确实应当具有“同每一个公民一样”的发表言论的权利。但是这种比拟是很拙劣的，因为公民在法律面前要承担责任，而皇帝却不用，相反，皇帝有贯彻他的专制意愿的权力和机构，这二者是任何公民都没有的。……

拥有一种特权就使人们无法主张平等权利。如帝国首相先生昨天所说，皇帝的主动性不能“超出帝国宪法的限度”去起作用，相反只应在宪法规定的形式中，亦即通过承担责任的帝国首相的媒介作用和共同行动来发挥作用。如果违反这一点，就要出现直接

同帝国宪法相违背的个人统治，独立行动的帝国首相就将成为这样一个官员，对于他就用得上从前费奈隆^①向他的国王大声疾呼的那句话了：“你们的部长只不过是一些神学顾问”。……

但尽管不言而喻，受到攻击和受到挑衅的人也可以自由地坦率地给予回答，今天他们要这样做却是很困难的。因为皇帝（帝国的其他君主制各邦的元首也是这样）受到渎君罪条款的特别保护。这项条款的措词，尤其是审判时对它的解释，甚至使公开对上述言论提出非常实事求是的批评也大大受到限制并且成了危险的事情。渎君罪条款所给予的特别保护以及国家元首一般享有的不承担责任和不受侵犯的地位必须具备这样的前提：君主不能胡作非为，他的行动要十分谨慎，他只通过承担责任的部长对一切政治事务发表意见，而个人却不介入党派之争，并且不攻击也不伤害个人和国家机关。而如果一个君主（象在我们帝国发生的那种情况）亲自出面而同时渎君罪条款又继续生效，结果必然是允许君主享有不适当的特权，使唯独他一个人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地说话并且凭借可靠的屏障对别人进行污蔑，而受攻击者却无法回敬。（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先生们！这种状况必然将持久地败坏整个社会道德。因此结论必然是：已经造成非常多的灾难，并且在皇帝每次发表演说时都造成新的灾难的那一渎君罪条款应尽快加以废除，以便受挑衅者至少有理直气壮地回敬的权利。（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

最后我仍想向你们提一个问题：如果让上述情况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那么你们认为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呢？君主制有

^① 弗朗斯瓦·德·萨利尼亚克·费奈隆（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Fénélon 1651—1715）——侯爵，法国作家，18世纪启蒙学派早期先驱者之一，在其主要作品《特列马克历险记》（1699）和《死人的对话》（1700—1718）中，把国王权力受法律限制的开明君主制度的理想与国王的专横相对比。——编者注

两种发展可能性：或者在立宪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或者在波拿巴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甚至英国的皮特也曾遇到过一个感情用事地不断插手国家事务的国王。皮特懂得怎样成功地抵制这种企图，并且一劳永逸做到了保证国家政策只应由承担责任的内阁领导。因此英国在上一个世纪能够极其平静地朝着民主政体发展。法国却不一样，小拿破仑在一个时期内成功地建立了他个人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结局怎样，无需我对你们说。从我这方面说，我希望并且但愿我们今后的发展按照英国的形式进行，我们能够以平静的，有组织的方式达到愈来愈自由的政治状态，而不要走波拿巴主义的道路。但遗憾的是，后者的萌芽和征兆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就连在法国那时也曾对白领工人发表过演说，并且举行过全民投票。（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如果事态这样继续下去，那我确实感到我们绕过波拿巴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按照英国方式前进的希望不大。

先生们，一旦帝国议会重新选出并再次召集的时候，我们将设法使我们倡议的一项提案即关于首相责任的法律尽早提到日程上来，这项法案早已提交帝国议会，但主要由于关税率及其特殊的讨论方式至今未能讨论。我们将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以使我们在德国最后摆脱一种不体面的状态，即我们每次都不得不同帝国唯一承担责任的官员就其负责的事情和范围进行争论。所谓负责任，就它目前的情况来说，确实毫无意义；它只停留在纸上。人们称它为道义上的，这正是因为它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也不可能成功地去使用它。昨天，当我的同事舍德莱博士先生向首相先生质问，他打算用什么办法使类似斯维内明德的事件今后不再发生时，我又一次考虑了这个问题。啊，天知道帝国首相先生该怎么办！（社会民主党人席活跃。）帝国议会又应该怎样去实现在这方面的意愿！为此首先需要一个有效的责任法，并且帝国议会要积极运用它。甚

至首相也需要审慎；他应该懂得，德国人民的代表机构已下决心不容许事情象至今这样继续下去，而是要他——首相——为皇帝的每一次发表政治见解负责，并在必要时对皇帝提出指责。但今天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希望，如前所述，帝国议会不久即在下次会议研究首相责任法，同时也特别希望中央党的那些昨天十分热情地对待这件事的先生们共同努力处理好这件事，否则是无法认真谈到立宪状态的。

.....

载于《帝国议会第十届第二次会议速记记录》第8卷第7413、7416—7422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228—236页。

最近几次国会选举的教训和后果

(1903年7月27日)

如果经过长期准备和争论的一项重要决定作出了，那么对一切参与者来说，集中思想进行考虑的时刻就到来了：人们在紧张的日常活动中要略停片刻，把眼光从局部转向整体，探求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根源，并且努力从已经作出的判断中吸取教训和确定今后的方针。人们在前几周也已经能在各党派的报刊上看到它们对选举的评论，这些评论就其数量来说固然是够多的了，但就其内在价值来说用处不大。

人们毕竟应当认为，既然使用任何手段都阻挡不了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它现在已取得了三百多万张选票，那么这种现象必定不可避免地要使各派的政治家清醒起来，并且用令人信服的证据向他们表明，在德国人民中实际上广泛存在着对当局和各党派的整个政策的深刻不满，一大部分人现在更加期望社会民主党有成效地维护民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样的认识给我们的敌人造成的印象足以推动他们去深思自己的行为 and 未来的那些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但是，在这一方面也再一次证明下面一句话是对的：历史之所以要发生，只是为了使人们不从它吸取教训。因为除了极少的例外，各个党派都向一切其他方面去寻找原因，只是不从它们本身去找。

保 守 派

保守派从选举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人民享有的权利还是太多太多了，有势力的人将尽快地踩住人民的脖子，使他们今后无法表露自己的愿望和不满。要保守派得出别的结论，他们就必须改变他们本来的面貌，就是说必须不再是任何民主制、甚至任何现代国家概念的死敌，不再是最顽固的特权统治的代表，不再是维护这种统治的最冷酷手段的代言人。保守派要德国政府对下面这件事承担责任：它没有利用“良机”来领导新组织起来的支持卡尔多尔夫^①的多数派立即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一次活泼、愉快的追捕，没有采取这一“拯救性行动”；它宁愿这样来利用良机，即承认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合法的工人政党，称赞社会党人饶勒斯和米勒兰，加强选举的秘密性，尤其是它不提出共同进行反对“颠覆”的斗争的竞选口号，而是宁可寻求同社会民主党达成暂时的协定并促进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保守派的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完全撇开他们对我们的十分理所当然的仇恨不谈）公开采取暴力的政策应当说是使德国政府更加从属于容克党并进一步增加后者的赢利的最可靠手段。因此，他们对社会民主党的迫害也永远不会停止，而且每逢适当的机会他们都会重新大喊大叫，要颁布非常法令、剥夺选举权和举行政变。

中 央 党

至于中央党，他们对选举的结局特别感到满意，并且努力摆出“坚不可摧的堡垒”和局势主宰者的姿态。现在它骄傲地自称为

“国之瑰宝”，并且吹嘘说，唯有它能继续执行帝国政策。但是它的这种地位有很大的阴暗面，这将使中央党人日益感到严重的忧虑。首先，它的选举成就毕竟有限。当然，增加了三十四万张选票是可以夸口的。但这是通过什么方式取得的呢！它使用了只要可能使用的最极端的手段。它宣扬宗教战争，并且制造一切良心上的恐惧。它以空前的规模，泼头盖脸地向人民散发成千上万篇漫天撒谎的文章。神职人员不止一次地以前所未闻的方式滥用职权，直接间接地强迫人们违背良心行事，在西里西亚，主教直截了当用拒绝行圣礼来威胁持不同政治见解的人。通过所有这些绝望的手段，中央党也才取得一百八十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早在五年前就取得了二百一十万张选票，并且从那时以来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的选票和二十三个议席，而中央党却失去了三个议席。因此，中央党要进一步加强势力看来是不行了。

中央党对天主教工人是寄予很大希望的，通过单独成立的组织来分裂工人阶级，通过教派的唆使利用天主教徒来反对和损害现代工人运动，将他们驾在中央党的车上，在这些方面的确是不缺乏热心的活动的。但是所有这些努力的成就却很有限。这一点特别是在莱因邦和威斯特伐伦这两个中央党的传统势力范围表现出来了，社会民主党在这些地方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我们慕尼黑和旧巴伐利亚，天主教工人也纷纷投了社会民主党的票。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中央党人失败了，只是在小资产阶级居民和农村居民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它的脚下还有可靠的基础，至少暂时还是如此，特别是在农民认识到他们在整个关税战中是上当受骗者以前是如此。

如果说，因此中央党的重点已经转到反动方面，那么，它的所

① 威廉·冯·卡尔多尔夫(Wilhelm von Kardorff 1828—1907)——工业家，有骑士地产的领主，自由保守党的国会议员。——编者注

有其他政策也会迫使它朝同样的方向发展。

中央党在最近两届帝国议会中日益迅速地而且最后简直是快马加鞭地从一个在野党变成了一个支持政府的党。(很对。)这不仅是对人民的背叛,而且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十足的近视,因为在一个象德国这样新教占优势的国家,中央党生来就是少数党;如果在文特霍尔斯特^①的领导下,党无论如何不会以如此愚蠢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发展过程,他的后继者是由于受盲目贪婪心的驱使才这样做的。现在罪是犯下了(活跃,掌声),而且即使中央党打算挽回罪过,再也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了。今后党的任务在于,不惜任何代价为自己保住犯罪的果实。因此中央党现在被束缚在政府身上了,而且梵蒂冈在6月16日以后投的一票理所当然地表明,现在“中央党同政府的关系比过去更加牢固和更加密切了”。

与此也有关联的是,中央党违反他们原来的口号,并在同帝国政府直接约定以后,在选举中向所有同我们作对的政党一律提供帮助,以维护其作为拥护政府和皇帝的政党的声誉;在一些个别地方,例如在慕尼黑,人们当然没有追随这样的做法,但中央党的这种做法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活跃。)出于同样一些理由(由于关税战和共同的反动目的,特别是在学校的领域,这些理由变得更加强有力了;在普鲁士,即将在学校领域发动一场新的进攻),中央党也将日益接近保守派。简言之:中央党不得不愈来愈反动,人们现在可以预料,任何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它都做得出来,它和我们之间的斗争将愈来愈尖锐化,而它将逐渐从它的势力的顶峰滚下来。

民族自由党人

关于民族自由党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活跃。)当然,他们在选举中失败以后,立刻就又出现了个别异想天开的人,他们要求

自由党毕竟不应当听任社会民主党利用那么多的鼓动材料，而应当自己出来反对不公平，一句话，应当表现出更加坚决的自由主义态度来。是的，近来有一家报纸甚至走得如此之远，它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公共场所等等承认劳动人民有同等的权利；这样一来，社会差别就不会使人感到痛苦，而会被当成一条自然法则，而这样的实践的自由主义将致社会民主党于死地！（十分活跃。）

但是我认为，我们用不着过分恐惧。这个党的整个历史担保它不会变好，而且以巴塞尔曼^②为首的它的一些领导人也已经证明，民族自由党人直到末日都将一如既往，始终是各个时期统治者的热心而恭顺的奴仆。

左翼自由党人

左翼自由党人集团也是这次选举斗争中主要的倒霉者。关于这个阵营中的人曾经培育了什么样的幻想，《法兰克福报》已为此提供了证明，它在选举前写道：社会民主党的确只应当举止谦虚一些，因为它至多会取得六个议席，而“新的左翼”有取得四十个议席的希望。但这个梦醒过来以后却是怎样啊！尽管总的说来参加选举的人增加了，但左翼自由党人所得到的票数完全未变，只略多于社会民主党得到的四分之一。他们的议席从五十个降到了三十六个。这个严重的和彻底的失败（与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同时发生）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一系列重大的具体错误上，但是首先必须追溯到整个自由派的整个荒谬的发展上。

① 路德维希·文特霍尔斯特（Ludwig Windthorst 1812—1891）——国会议员，中央党领袖。——编者注

② 恩斯特·巴塞尔曼（Ernst Bassermann 1854—1917）——律师，曾任国会议员。——编者注

在最大的集团即**自由人民党**那里，过失最为严重。这个集团在关税战中简直起了一种可悲的作用，它在进行竞选斗争时几乎只是反对社会民主党，而且用的是极其可恨的方式，在复选中继续不变地实行这一策略，这就使反动派兴高彩烈。在主要的选举之后，尽管以前发生过种种斗争，我们党却立即建议合作去反对主张关税的多数派，从而使反对派有可能增加到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个议席。但是，自由人民党的全部策略却是为了保证保守党人、中央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能支持他们来反对我们，作为报答它宁可投票赞同这些党派的候选人，而不赞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候选人，这样它便要为下面的事承担罪责：赞同关税的各党派在新的帝国议会中比它们在六月十六日选举失败后所预料的要强大得多。

至于曾多次（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采取比较明智态度的**自由联盟**，众所周知，它从十五个议席降为九个议席。巴尔特^①未再当选，能干的社会政策家勒西克^②又新近去世，失去这两个人将对这一集团的态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无法预料。**民主人民党**只有六个议席了。

在左翼自由党人的队伍中，往往有人针对本身的不幸和社会民主党的兴旺，企图用这样的说法来安慰自己，即强调我们党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我们在公民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面的活动；但是这一领域绝不是专门属于社会民主党的，而本来是属于自由党人的。我现在绝不否认这种说法有很多合理的因素，而且我们在竞选运动中时常强调这一方面的关系。但是他们这样说并不能成为对我们的指责，相反，却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毁灭性判决，因为这种自由主义已经证明自己不能把握和完成它最切身的任务，正因如此，它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历史的任务（它表现出对此不能

① 泰奥多尔·巴尔特(Theodor Barth 1849—1909)——新闻记者。——编者注。

② 理查·勒西克(Richard Roesicke 1845—1903)——酒厂经理。——编者注。

胜任),这一任务最后转到社会民主党的强有力的手中了。不管人们对这个问题,即如果德国有过并且现在还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左派对政治发展来说是否较为有益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抱什么态度,但实际上今天的情况是,经过这次选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再也不可能挽回失去的影响了。这不是说,对资产阶级中真正的自由分子来说(在这些人还没有转到社会民主党的阵营,或者还没有进一步转变的时候)再也不存在什么任务了,如果那些人振作起来,而且至少打算在反对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反动派的斗争中同我们竞赛,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会感到高兴。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明白,很明显,将来德国的情况将象比利时一样发展。今后社会民主党将站在反对派的前列进行斗争,左翼自由党人必须站在它那一边并在它的领导下进行活动。

就此结束,下面谈谈社会民主党本身。

社 会 民 主 党

成功有两种。一种是一时的成功,偶然性的成功,是由于一方的狡诈、强暴和另一方的软弱造成的;我们一向蔑视并且反对盲目地崇拜这种成功。但是,如果一个运动从其开始和在其整个过程中都招致本国和社会上一切有权势的力量对它进行残酷的斗争,却凭自己的力量排除了对它设置的一切障碍,从而现在取得超出种种估计之外的这样一种胜利,那么,这样的成功就标志和证明了这一运动是正确的!(暴风雨般的赞成声。)当然这不是说,因此我们就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而且认为我们的行动都是同样正确的。这样一种自鸣得意的态度是同我们不相称的,是危险的,不如说我们必须寻求我们在哪里能发现过错(即使这些过错同我们敌人的更大过错相比就不显得突出了,而且也许会变成我们的优点),以

便由此为将来吸取教训。但是，我们的选举成功也许重新证明并且比以前更清楚地证明，社会民主党不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十分活跃），是一股很快就要退去的潮水，却是一只由最坚硬的材料制成的、顶着风暴而上的轮船，它沿着正确的航线行驶，正在安全地接近预定的目标——夺取政权以拯救被压迫的人民。

新 情 况

我不会未卜先知，因此我既说不出我们还要多少时间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也说不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些与其说取决于我们本身的愿望，不如说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敌人，但是下面这些我是清楚的：有一个党在反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势力的斗争中今天已经成为三分之一德国人民公认的代表，而且任何地方都不再怀疑它将不可阻挡地进一步发展，以致敌人今天已经对今后的选举感到恐惧，因为他们知道，社会民主党通过普遍选举权成为具有决定性势力的时刻不远了；这个党今天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成为掌握民族未来的党和头等的政治势力。

一种不公正的和违法的复数选举制^①剥夺了社会民主党应得议席的整整三分之一；倘若帝国议会是在6月16日表达出来的人民意志的真实反映，那么，今天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就会包括一百二十五个议员，而不是八十一个了。组成多数派的各党也是依靠这一点，并且力求重新夺走德国人民最近争得的成果，以便继续按照现在的一套维持旧的统治。但是它们忘记了，议会方面的席位

^① 一种不民主的选举制度，它规定某些阶层可以凭较多的财产和较高的教育程度而将其投票数加若干倍计算。——编者注

数目固然重要，但并不是一切，而一个强有力的、肩负人民的意愿的少数派会变为多数，我们在议员人数比现在还少时已经迫使政府和国会做了许多事，阻止它们做的事就更多，而八十一个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数目在一个只是每逢神圣的时刻才有表决能力的国会（活跃）中是举足轻重的，它使我们的实力地位完全改观了。

在签订贸易协定的时候，政府就已经要依靠社会民主党了，这种依赖我们的情况会愈来愈多。只要它被迫为了整个国家而实现现代的要求和多少适应一下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最迫切的需要，它就首先必将寄希望于我们。（热烈鼓掌。）

考茨基在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把新的形势说成这样的：社会民主党成了实际政治的中心，人们不得不打算或者同它一道工作，或者挖掉它的基础^①，我赞同这篇文章的许多观点，但不是所有的观点。接着他对下面一点进一步作了考察：我们的力量的巨大增长和实行一种实际的工人政策的必要性是将促使政府走上作出巨大政治让步和经济让步的轨道，还是相反，要担心它采取新的高压手段。我今天不想进一步阐明这一点。今后我们恐怕还要时常谈到这一点。但是很明显，政府首先必须认清我们的实力地位和它对国家的整个政策的反作用，并且得出相应的结论。

任 务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行动的最艰巨的部分已经随着目前的发展阶段开始了。由于我们在全中国和帝国议会里扩大了阵地，我们的任务（不仅就数量来说）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来适应由此而产生的义务，并且证明选民给予我们的信任是正确的。

^① 卡·考茨基《今后怎么样？》，载于《新时代》第21年卷（1902—03年）第2册第389—398页。——编者注

人们把我们以前的议会活动称为一种“基本上批判性的”活动。我们在选举运动中已经回答说，这一批判性活动首先是一项很重要的和有益的任务，我们通过这种活动起了激励人们的作用，并且还阻止了许多坏事，我们通过这种活动首先向人民阐明了他们的利益，阐明了违背他们的利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但此后我们也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每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知道，绝不是所有的工作）停留在这上面，那么归根到底这也〔不〕是我们的过错。我只能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愿意利用我们现有的阵地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而且没有更高的要求）；也用建设性的方式、改良的方式参与巨大的民族文化任务（鼓掌）；今后一定会看出，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反抗多么无法阻挡我们去这样做。

没有比中央党报纸的政治空谈更愚蠢的了，它们说我们已经“因为自己太大而感到不安了”；如果我们处于必须直接影响帝国政策和从领导角度干预事变进程的地位，那么我们会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我们坚决逃避责任。这样说的人要就是只能设想政治交易和没有原则的自动弃权，如果他们假定我们不会这样做，而在任何情况下只会不折不扣地按照我们的原则即象社会民主党那样行事，那么，他们自然是完全对的。要就是，他们竟相信这样一个党（如果存在合理的代表方式和真正的立宪议会制政体，那么今天在反对这个党和没有它参加的情况下已经不能组成任何政府了）在政治上会有这样不成熟的考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再一次把我们看错了。不，社会民主党必须承担它在政治上和议会中的地位所赋予它的一切责任。

议长问题

我在这里不得不谈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我想随便把它放到

首要地位，而是因为最近以来它成了党内争论的题目)，我指的是我们参加帝国议会议长团的问题。

我不否认，我也觉得伯恩施坦所选择的提出这一问题来讨论的时刻和方式是不恰当的，后果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伯恩施坦一定会懂得象其他人一样正确地评价选举成绩的意义有多大。但是，他的行动方式却使党内深深地反对他的人有了借口，把事情描绘成似乎他在巨大的成绩面前除了副议长问题外根本没有想到别的事情。这样一来，这件相当微妙的事情就被提到人人皆知并且受感情因素影响的领域了，而我赞同倍倍尔的意见，认为这件事情是应当在议会党团中探讨的。但是既然现在已经展开了争论，我认为(尤其是因为已有人向我直接提出质问)我的职责是，就事情本身和人们反驳伯恩施坦的那种方式完全公开地向党员和选民发表我的意见。(热烈鼓掌。)

我确实无法不发表这样的意见，即对于在不止一个方面进行的这场辩论的方式必须坚决加以谴责和拒绝。(热烈鼓掌。)如果一个党员就涉及到党的某一件事发表意见，那么他当然会受到批评。但是他有权利要求，这种批评采取在思想一致和权利平等的人中间必然通行的那些形式。如果人们认为，他是不对的，而他们自己更加聪明，那么，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这一点，他们也许能在这件事上建树功绩。但是他们应当使用启发和说服的办法。只要他们采取同事、同志式的态度，即使在更加棘手得多和重大得多的事情上，他们也会取得有效的成果。但是如果一个人由于某种理由而不喜欢另一个人的意见，马上就把他当一个十足的白痴来对待，用老师或长官的威严口气对他说话，毫无节制地发泄私愤，竟从他的文章中挑出他在那里从来只字未提的内容，——这种做法只能伤害感情，是完全不容许的。如果一家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居然把某一个人的意见不是当作单纯的有同等权利的撰稿人的意见发表，

而是以一种官方文告的引人注目的形式(热烈的赞同声)加以公布,就象《新时代》对待倍倍尔那样,那么,人们对敌人的嘲笑就不能感到奇怪了。(很好!)^①但是我们要的是一个民主的党而不是专制的党!(热烈的赞同声。)

如果没有必要,我就不想再谈这个不愉快的题目了。你们对我是充分了解的,可以知道我是一切个人争论的坚决的敌人,甚至在我显然有理由讲话的时候,我也常常是沉默的。今天我讲这番话,也只是为了维护受到攻击的人和每个党员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鼓掌。)下面我谈谈事情本身。

事情的意义

大多数同志可能都知道,帝国议会中有一个议会惯例(即使不是一条正式的法律): 议长和两个副议长是由几个最大的党派提出的。虽然这条惯例有一次被打破过,那时保守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控制着帝国议会,当时还被当作“帝国敌人”对待的中央党被排斥在议长团之外并以此自豪;顺便说一下,因此如果现在这同一个中央党打算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采取同样不公平的做法,那它就要大大出丑了。无论如何,那种打破惯例的做法今天已被帝国议会的多数人认为是不公平的,因此对我们所要求的权利是不存在任何怀疑的。从我们方面说,我们也必须提出这一要求,关于这一点,党内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在1895年和1898年也已提出了我们的要求,那时凡是一般承认我们的权利的其他政党都附带提出一个条件,这就是,我们在议长团中的成员不仅必须履行议事章程

^① 《新时代》第21年卷(1902—03年)第2册第448页。——编者注

规定的职责，而且必须履行习惯的代表职责。后一类职责主要是指朝见，即国会议长团按照惯例要朝见皇帝，根据议事章程的规定通知他国会已经组成。尽管甚至民族自由党人的报纸也对强制承担这一义务的权利表示怀疑，但无论如何履行这一义务是被说成完全次要的问题的。不过情况丝毫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无疑这一条件要再一次被提出来。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十分合理的要求不只是示威性的，而且要切实生效，那么，我们也必须承担一切例行的义务。

党内的辩论现在是这样进行的：第一，我们是否能接受提出的条件，其次，我们是否应当接受这一条件，也就是说，事情是否如此重要，足以使我们下这样的决心。我认为，后面那个问题，即利和弊哪一方是主要的，这是完全值得认真考虑的，而且也只有它才能起决定的作用。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头等重要的，不是可以惊动世界的，我的确决不会过分夸大它的意义，决不会认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议长团都有很大价值。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完全没有意义和无关紧要的，那同样是错误的。议长团不是由同等职权的人组成的机构，而是全部领导权都操在议长手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如果议长自己未能出席主持某次会议，那么执行副议长（在这件事上第一副议长先于第二副议长）完全可以自主行动，就是说，他领导讨论，确定发言人，决定按照议事章程不需要提交议会决定的一切问题。但是这样一来，副议长通过不断交替执行职务和他的整个地位就能了解办事和讨论的整个过程，而我们副议长的任务自然是要取得这样的影响，好在万一发生强制性的尝试时（只要想一下关于关税率的审议吧！）利用这种影响来大力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单是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副议长这件事本身，再加上人们会想到这个副议长事先能得知某些策划中的派性

活动并能立即加以反对,这就是很有益处的,并且能够起确保公正办事的作用。

由于我们参加议长团,现在和将来无疑会给党造成不小的困难,官位实际上会是一个不轻的负担;只要想一下各敌对党派在某些情况下会使我们的副议长卷入进去的那些冲突就行了,这些冲突要求他高度地慎重、坚定和机智灵活。但是,害怕困难而不是战胜困难的态度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在社会民主党中时兴起来了呢?〈热烈鼓掌。〉我们不是已经战胜了那些完全是另一种的那些困难了吗?〈很对!〉

代表的职责

现在当然有人说: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朝见一位君主,因为这是“牺牲信念”,是一种“违背我们的原则的行动”。于是“进宫朝见”的全部可怕和卑鄙之处就被过分地渲染了。有一位特别热心的人写了一篇不长的奇文,其中就这一点使用了如下的词句:“在君主制政体面前卑躬屈节”、“有失体统的态度”、甘心情愿对君主制宣誓效忠”、“侮辱了三百万选民”(十分活跃)、“宫廷式的奴颜婢膝”等等,写得很有文采。^①近来这个题目甚至在一家党报的娱乐栏上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人们还在死去的同志墓前演出堂·乔万尼之流的场面,激起人们的感伤情绪。(活跃。)

纵然冒着把这一切也记在我的(本来已经够重的)罪状上的危险,我也要说明,我认为这些说法是拚命夸大其词或者也是为了制造气氛,我认为不如说这里涉及的是个形式问题,在实质性的考虑面前,它无论如何是必须退居次要地位的。伯恩斯坦已经指出,个别

^① 弗·梅林《关于特制香肠和其他的香肠》,载于《新时代》第21年卷(1902—03年)第2册第417—420页。——编者注

的邦的宪法上关于宣誓的规定并没有妨碍我们参加选举和当选。那篇文章的作者回答说，“在一个君主制的国家里当然不应违反这种例行的礼仪”。（活跃。）但是，作一次礼节性的国务访问，互相表示敬意，甚至交换一下意见，而且不是自己企求的，是为了履行一次议会的职务，这些事情同一次庄严的宣誓比起来，是不可能使我们承担更多的义务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竟纯洁到这种程度，认为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同一位君主发生接触，就会败坏我们的原则，那么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仅仅限于把我们的回避接触的态度用来对待君主制的最高代表，而不是同样地也拒绝同君主制的其他代表、譬如说次一等的代表即大臣们交往呢？要知道同君主联系的途径通常是经过他们的。但是，我们到底不是只想到政体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因此按理我们本来也就不应当同这些制度的主要代表进行个人接触。大家可以看出我们陷入了什么样的矛盾。

嫌弃同君主会见，无疑有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由于宫廷充满了曲意逢迎、唯唯诺诺的行为，令人感到厌恶。但是，这种理所当然的感情不应当导致形式主义，即把形式同实质混为一谈，即使披上假革命的外衣，这种混淆也并不会因此更加合乎理性。起决定作用的毕竟不可能是会见本身，而不如说是它的目的和它采取的形式：人们是作为仆从还是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而行动，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乐而到那里去，还是为了履行一种职责，作为立法机构的代表而到那里去。这正象尽管多数人在部长们面前曲意逢迎，阿谀奉承，企图捞到好处，但这毕竟没有阻挠也不能阻挠我们同那些先生（特别是也在邦议会中）进行交往和继续保持接触，因为这种交往和接触对于正确地履行我们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决没有损害我们的独立性和我们在维护我们的原则时的坚定性。

不久前我们的法国朋友饶勒斯在讨论另一个礼仪问题（指意大利国王到巴黎访问和社会党人对此应采取的态度）时很恰当地写道：“政党只有通过它的活动才能使世界革命化，并且它只能在历史给它规定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只有那些害怕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会由于同一位国王陛下的交往或者由于一种外交微笑的无往不胜的吸引力而受到损害的人，才容易受到诱惑。”（热烈的赞同声。）

何况对议长问题作出否定性的决定，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而只是推迟问题的解决。因为在下一次选举时这个问题将重新提出来。如果我们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或者晚些时候一旦成为多数，那么怎么办呢？还有，如果我们强大到行政权的应得部分也不得不终于给与我们的话，那么，难道我们也应当让这些公式使我们无法行动吗？不，我认为，应当非常非常重视这整个事情，我也感到遗憾的是，环境迫使我甚至就这一点讲了很多的话。

决定性因素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议长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在其他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在于可以期望得到的好处是能抵消害处，还是相反。但是，如果说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作为国会的代表同法定的国家元首会见，就是放弃了某种原则，那我是反对这种看法的。如果他懂得尽他的本分的话（而且我认为，人们是能够相信将由我们选出的那些人的），那么不如说，他将能够大大有助于使人民代表机构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鼓掌。）如果皇帝打算了解一下真实情况，那么他会听到的，他必定会加以利用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因此，我认为这件事是一个扩大党的权力的问题，而且我要说，这件事使我们有权利和有义务参加领导工作，从而承担与此相

联系的责任。当然我们并不需要单独作出决定,而且尽管如此,多数派各党很可能将会拒绝我们原来的关于实现议会公平原则的要求。但是,那样我们会得到很大的好处,我们的敌人也就会丧失最后一个借口(否则这个借口至少会使他们的拒绝从外面看来显得是正当的或者可以原谅的),他们就会不得不以一件公开的、确凿的蛮横行为来开始新的一届国会。这一点不仅会为我们的选民所理解,并且远远超出这一范围而在德国人民中间得到理解,这会以另一种方式有利于我们的地位。(鼓掌。)

我们的力量的根源

不管上面讨论的和另一些议会问题怎样发展,我们的任务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是更加热心地、不倦地利用一切现实的力量因素去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影响和夺取政权。我希望,如果今天世界对我们的鼓动工作的胜利感到钦佩,那么它很快就会对我们的建设性行动和远见同样感到惊异,我们通过这些行动和凭着这样的远见,打算逐渐地但是扎实地把我们的理想化为现实,并为最高的人类利益服务!

但是,我们的议会活动不是孤立的事情,它只有在得到人民中的一个持续不断和日益发展的运动支持时才能是富有成果的。因此,我们不应当由于我们的选举成就和对这些成就的正当喜悦而误入歧途,哪怕只是一瞬间也不应当在我们的工作中疲塌下来,并且躺在我们的成绩上睡大觉。相反,我们必须不断地继续工作,向人民说明他们的真正利益,指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是维持不住的,并且为我们的解放原则进行宣传。其次,我们必须同样不知疲倦地努力组织群众,因为只有在组织上把他们团结成一体才能使他们正确地估价现实和调整他们的政治活动,使他们从象尘埃

听凭风和任何偶然事件摆布那样的一群乌合之众，变为独立地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一种力量因素。我们的力量的最强大的源泉之一就在这里。我们通过这一点并且通过人民对我们的奋斗和我们的原则的信任得到了支持，这使我们强大起来，使我们变得不可阻挡！（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鼓掌。）

（尽管主席皮克尔曼一再敦促，但是谁都没有要求发言进行反驳，于是主席在结束会议时确认在场的慕尼黑的党员同志是表示赞同发言者的意见的。对此与会者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载于《慕尼黑邮报》1903年7月29日第167—168号。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92—206页。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关于修正主义 问题的发言(摘录)

(1903年9月18日)

党员同志们！倍倍尔在他昨天的发言中按照他心中所设想的那样描绘了党内的情况，并且当然给人造成了很深的印象。当我着手来回答他时，我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对他处于劣势；这不仅是因为我从来比不上他的出色的辩才，而且首先也是由于我缺少倍倍尔一般在演说中使用的、在昨天的演说中也曾使用的许多办法。我既不善于利用想象力，也不善于激发感情，而是求助于冷静的思考。我不企图把我的意见强加于听众，而是力求说服他们。现在我们党内讨论问题的方式往往的确有其困难之处；我们这里有人一讲话就离题万里，常常有人突然出来发言，在最简单的问题上感情用事，讲一些煽动性的套话，于是平静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但是根据我的经验——遗憾的是，我现在也具备了这样的长处，成了你们的“老头子”中的一个了——在这一次争论过程中，战场转移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竟致面目全非，事情也完全遭到歪曲，象这样的情况还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而我的任务将是，把在盲目的愤怒中弄得乱七八糟的各个部分重新整理好，使事情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大家知道，这件事是从副议长问题引起的。我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现在已经印成书了）中已经说过，我对于伯恩施坦评论和

论证这件事的时机和方式都是很不满意的，我在这里没有更加坦率地责备他，那主要是因为，我素性不喜欢对人采取落井下石的态度。在我看来，这一建议本身和提出它的时机都是错误的，不恰当的。但是伯恩施坦有权利提出这样的建议，对此却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一个党员，不管他是不是党的领导人，只要他认为一个问题对党具有重要意义，他就有权利在他所属的组织里或者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把这件事提出来讨论。（很对！）但是促使我也就这件事发表意见的，主要是人们答复伯恩施坦和对待他的方式。

昨天倍倍尔针对我说，人们是知道这类事情在慕尼黑是怎样搞起来的。福尔马尔这个人确实很少讲话，但是只要他一讲话，那时他就拿出十足的劲头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那时就会搞出点名堂来。关于他所说的在慕尼黑的几次集会的情况，我想提醒大家，在1898年的那场辩论中，倍倍尔已经对慕尼黑的党员同志们提出过同样的谴责，当然所用的形式比这一次还要尖锐得多，当时慕尼黑同志们的代表是怎样回答他的，这他肯定已经记不起了。（很好！活跃。）按照倍倍尔的说法，事情简直似乎是，慕尼黑的同志们为了召开他们的大会首先不得不从倍倍尔或者其他什么人那里请求上级领导的同意（好极了），然后，象在萨克森“珍宝”那里一样，或者能被批准，或者被拒绝。（活跃。）倍倍尔认为，只要我一说话，似乎就总是想要发布新的福音。（活跃。）我想要对倍倍尔说，我认为，宣布福音，尤其是发布启示录（非常活跃），是他一手包办的事情（再次活跃），所以我不想插手了。而且他的整个叙述表明，如果倍倍尔的诗兴一旦发作，他就丝毫不能认识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了。（骚动。）

会议是召开了。倍倍尔在《新时代》上指责我“自以为是”、“说教”和“礼仪官作风”——我倒是应该这样谴责他。我本不想对此

作出回答，但是因为这几天来我不得不陪着听非常多对这个题目的议论，并且不想冒被人认为似乎我也有类似思想的危险（好极了！），所以我想告诉你们，我在慕尼黑是怎样对待这些事情的。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我确实无法不发表这样的意见，即对于不止在一个方面进行的这场辩论的方式必须坚决加以谴责和拒绝。如果一个党员就涉及到党的某一件事发表意见，那么他当然会受到批评。但是他有权利要求这种批评采取在思想一致和权利平等的人中间应有的那些形式。如果人们认为，他是不对的，而他们自己更加聪明，那么，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这一点，他们也能在这件事情上建树功绩。但是他们应当使用启发和说服的办法。只要他们采取同事、同志式的态度，即使在更加棘手得多的和重大得多的事情上，他们也会取得有效的成果。但是如果一个人由于某种理由而不喜欢另一个人的意见，马上就把他当一个十足的白痴来对待，用老师或长官的威严口气对他说话，毫无节制地发泄私愤，竟从他的文章中挑出他在那里从来只字未提的内容——这种做法只能伤害感情，是完全不容许的。”^①

我让你们评判一下，客观的评价应当是怎样的。我故意没有指名；当然稍后在这篇演说中出现了倍倍尔的名字，但只是在说到《新时代》用发表倍倍尔声明的形式为他帮倒忙时提到的。因为不愿给这件事情抹上个人色彩，所以除此以外我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

在这件事情上许多方面的人都涉及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倍倍尔对这一情况表示不满。他在他的文章中说，“有人反复喊叫言论自由受到了威胁，他们这样做只不过证明党无能，并且公开使它蒙

^① 参见本书第325页。——编者注

受耻辱”。一点不错，是有人这样做的。但是依我看来，不是抱怨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那些人，而是那些妨害这种自由的人。（很对！）此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倍倍尔提出了这样的指责，不久前，因为别人没有在《前进报》上发表他的几点声明，他就大喊大叫，弄得全世界都听到了。如果有人用这种方式妨害他的言论自由（倍倍尔：不只是我的，也包括其他任何人的！），那就意味着言论自由死亡了（倍倍尔：很对！）。但是，某人的一项书面声明被拒绝发表也好，人们对一个使用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的人进行恶意攻击（就象已经发生的那样）也好，这确实没有多大区别。几十年来，我们这里只要提到言论自由受到威胁，就会有人出来反驳。是的，同志们，纸面上的结社自由对我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四周处处都布置下了蒺藜和陷阱，我实际上不能享受这种自由，同样，纯粹纸面上的言论自由对我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个人一张口说点不合别人心意的话，别人就立即象一群狼一样向他猛扑过来，立即打断他的发言（很对！）并说他是傻瓜或罪犯，这就不是言论自由。这种样子的权利的价值差不多同军队中的申诉权一样。（很好！）这也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申诉，但如果你这样做，那你就倒霉了。（很好！）但某些人正是有计划地用这种限制言论自由的办法来对付伯恩斯坦，而且所采取的方式简直早就使我厌恶了。（很好！）。一位从来没有站在我一边、同我仅仅见过两三次的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党内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伯恩斯坦的对立面，凡被伯恩斯坦曲解了的，他们就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他们撇开议题去观察伯恩斯坦，对他痛斥”。这样的做法只能使人感到是取消言论自由，破坏进一步坦率地和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的气氛。

这就是在这件事违反我的愿望被拿出来讨论并且使我非常不愉快之后我在慕尼黑发表演说的原因。尽管我完全知道这种事已

经完全不可收拾，并且事先对我比较亲近的朋友说过这一点，我还是讲了话。

但是，在那以后我认为我仍然有义务发表演说，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慕尼黑的同志们要求我这样做，而首先是因为从前我在国会党团中已经这样做了。

关于议长问题本身，我想就这件事目前的情况发表几点简短的意见。有几个人说过：啊，修正主义者（他们是这样称呼这种人的）现在突然试图把问题说得那样微不足道，好使自己摆脱已经陷入的困境。倍倍尔在他的文章中说，人们在讲坛上朗读的发言就迥然不同，在那里，人们把这描述成极其重要的行动。因为我知道，这次党代表大会涉及的极不愉快的个人争执已经太多，已使它无法忍受了，所以我出于对党代表大会的尊重，才控制自己，不对这一说法所包含的说我们缺乏勇气的指责作出答复，而我一向是习惯于对任何一个胆敢对我采取这类行动的人作出这种回答的。我只限于向你们表明，这个说法，就其涉及我的方面来讲，是绝对不真实的。我在这整个事情中只在慕尼黑发表过唯一的一次演说，现在已经印出来了。我除了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以前选举代表的大会上在讨论时发表过意见外，既没有在报纸上对此再写过一个字，也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为了弄清事实，请允许我向你们扼要地说明，我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我在演说中是这样说的：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头等重要的，不是可以惊动世界的。我的确决不会夸大它的意义，决不会认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议长团都有很大价值。”^①

然后我对这件事情发表了评论。在我按照我认为必需的那样从各个方面对问题加以说明以后，我继续说道：“不管上面讨论的

^① 参见本书第 327 页。——编者注

问题和另一些议会问题怎样发展，我们的任务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更加热心地、不倦地利用一切现实力量因素去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影响和夺取政权。”^①

然后我又继续补充说：我们全部的议会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最重要的事情是鼓动和组织，以使我们在人民中具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我相信这样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而且我认为，任何人，只要不是由于偏见而不能看到或者有意不想看到，就完全能够清楚地从这些话中知道，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就象在党员大会上多次出现的情况那样，是许多讨论题目中的一个，对于它，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我的选民和同志们提出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因为凡读过我的演说的人，实际上可以看到我也提出了反对的理由。而正是由于这一保持客观态度的义务，我当然认为也有必要指出，这个问题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我认为，任何这类职位，即使它本来还不能具有特别的影响，但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下却能发挥一种对于我们在国会中的实力地位决非无足轻重的影响。当然有人反对这一意见，并且说这完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要反问一下，如果这真是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大家要一道讨论不需要履行代表义务^②的副议长职位呢？（喊声：因为这对于我们是一项很有益的权利！）噢，这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实际作用。如果参加议长团果真没有价值，纯属一种装饰，而另一方面，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副议长席位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又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在我们的力量还不那么强大的时候根本就不要提出这个要求。由此看来，其中必有一些道理，那些说这件事毫无可取之处的人想要论证的太多了。根据这些理由，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履行代表义务问题动怒。我完

^① 参见本书第331页。——编者注

^② 指正副议长应代表议会全体去朝见皇帝。——编者注

全理解这个问题或多或少会使帝国一些地方的人为之激动。倍倍尔昨天就有关的人及其反对我们的言论所说的话我也考虑过了；但是我已经不得不习惯于在政治生活中常常把感情立场放在一边，我对待这件事的态度要冷静得多。正如奥艾尔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样，我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项毫不涉及原则的次要的礼仪，我确信，党总有一天将学会用另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或其他类似的问题，因此，我的话就不会是完全枉费唇舌了。但是完全不必为此而进行争论，党员群众现在的感受是不同的，因此这件事无须多费周折就已经决定了。此外，由于对副议长问题进行讨论的方式，由于我们要其他党派简直按照我们口授的内容来向我们提出其他条件（很对！），这件事反正已经是无可挽回地被耽误了。因而再说任何话都是令人遗憾的，而如果说我终究还是就此发表了一点意见，那是为了使倍倍尔文章中另一个错误的说法今后不再在党内被人得心应手地拿出来使用。倍倍尔断言，党勒和我都说过政体是比较次要的，然后他紧接着绘声绘色地描述如果“一个哪怕现在还是虚无飘渺的共和国”一旦实现，我们在德国就会有种种自由和美好的事物。按照他的说法，纲领第二部分中包含的要求实际上几乎全部（至少是关于民主要求的部分）都是可以实现的。使我感到惊奇的只是，一个持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因为不管是帝国还是虚无飘渺的共和国，都不会使现在的多数派改变自己的看法。而如果我们今天在德国有一个共和国，多数派直接成了统治力量，那么它更有可能更加激烈地反对扩大政治自由。不过这只是顺便说说。共和国这个题目是极其令人关注的，这里没有人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也没有人打算主张，这件事对于我们特别现实的问题，尤其不能这样顺便地把它夹杂到其他事情中处理。因此我不想进一步去探讨它，而只是要说明一下我在我的演说中实际上是怎样说

的。在我列举了其它一系列理由来说明副议长问题不涉及原则以后，我又说：

“我们到底不是只想到政体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是社会制度”。

我请问，手执红铅笔日夜窥测着的最严厉的高等书报检查官（活跃）是否能够对这一措词本身提出什么异议。这不过是说：政体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但它又不是头等重要的，否则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如果倍倍尔在攻击我之前首先更加仔细地考虑一下这种情况，他就不会对我做出这种失策的事，尤其是因为他在他的文章中说的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用语有所不同，而且也因为我的说法是党从它开始直到今天的观点。

我想就此结束副议长问题这一题目。我再重复一遍：问题对于我来说现在已经解决。而如果你们实事求是地表达你们的见解，那么这种情况只能是理所当然的，这样，这个插曲很快就可以结束了。

……

尽管我不得不如此激烈地反对倍倍尔，我却认为全部事件的主角不是他，而是考茨基，这首先是因为考茨基有一个优点：他比较彻底的。考茨基是理论的狂信者，是化身为党的德国教授（活跃），他宁可让全世界、也许还连同党一起毁灭，却不允许人从他的美丽的学说体系上哪怕只取下一小片东西。（赞成声和反对声。喊声：这是胡说八道！）你们用这个说服不了我。我却要提出证据。

考茨基常常告诉我们他对于党内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怎样设想的，他有一次在那篇著名的反对伯恩施坦的文章《一万人的撤退》中说：“打算把我们就思想自由之类向国家提出的要求也向党提出来，这是可笑的。”（听啊！听啊！）他在卢卑克大会上说，出

版《新时代》，不是为了让党内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思想流派在思想上互相比量，《新时代》必须捍卫党的统一性。“党的统一性”，就是他的言论独裁。（很对！激烈的反对声。考茨基喊道：“丝毫没有这个意思。”不停地有人打断发言。）我要安静地等待，直到你们表明至少在这里还略微有一点言论自由。我想，既然你们听了倍倍尔的发言，那么你们活该倒霉，也有义务听我讲。（热烈的赞同声。）否则你们就似乎要实行恐怖了。（热烈的掌声和反对声。）

可见，党的统一性就是他个人的被认为是唯一合法的科学观点！问题就在这里。考茨基有一次明确地说过，新方法（这同现在人们所说的修正主义是一回事，它的名称每年都不一样）是一种“反叛”。压制反叛，在党内树立统一的信念，这是考茨基多年来所追求的，而且他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讨论到此为止。当然，在这以前他这样做是白费劲。现在他认为时机有利了。他认为党内对爱德这个永远的捣乱分子的情绪是够愤怒的了，他早就宣称伯恩施坦对他个人来说已不再是同志（反对声），现在他认为时机有利，可以让党代表大会批准这样的判决了。机不可失啊！他早就在私下说过，有这样的人，他们已堕落到这种地步，居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全面谴责他在科学上的敌人伯恩施坦，他们居然认为伯恩施坦的一些论点是正确的或者毕竟是值得考虑的，尽管他们声称并不赞同许多别的论点。要知道神话毕竟应当结束了，这种神话说，好象人们在为伯恩施坦欢呼，好象他正如倍倍尔昨天所说的那样被人看成了新的救世主。（倍倍尔：没有被你看成，你太冷淡了！）这使我感到高兴，但是为什么你们老是说修正主义者，你们是打算也把我算在内的。（倍倍尔：当然，你是为首的。）好吧！关于伯恩施坦我总共讲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汉诺威党代表会上，第二次在卢卑克之后的慕尼黑的一次集会上，谁回想

一下那些发言，就会清楚地知道，我丝毫没有想到为伯恩斯坦欢呼，而是对他的那些观点作了很多指责。但是，我极其坚决地抗议人们对伯恩斯坦这样脚下使绊。因此我说，考茨基和那些与他想法相同的人认为，人们能够打一次官司就把“修正主义者”连同伯恩斯坦一起清除掉。考茨基长期以来竭力想找到一个能够扼要和精确说明修正主义的罪行的公式。他在三篇文章（两篇在《新时代》上，一篇在《莱比锡人民报》的一期副刊上）中这样描述这一罪行：“可见新的策略就是要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多数派的一员”，这就是说，我们打算追随资产阶级政党。在另一个地方说：“修正主义者说，党必须同意和友党联合，同它们一道形成一个有执政能力的多数。”接着又讲：“修正主义者想象，自由资产阶级会来一个突飞猛进，取得胜利，从而使我们不必为无产阶级最基本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是放弃阶级斗争——这就是要证明的。是的，党员同志们，事实上可能是放弃阶级斗争，而终于如此干净利落地发现了这一公式，这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人们终究摆脱了空泛的说法而达到一些具体的东西。现在我要问您并请您回答：是什么时候，是谁在德国和为德国提倡过某一个这样的原则呢？我在我的慕尼黑演说中谈到资产阶级左派时说过：“实际上今天的情况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来说，随着这次选举的失败，也就失去了挽回已经丧失的影响的最后可能性（听啊！听啊！）。当然这不是说，只要那些真正有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没有转向或者还没有进一步转向社会民主党阵营，他们就根本不再有什么工作可做了。如果那些人（真正有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分子）振作起来，并且至少在反对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反动派的斗争中同我们竞争，这只会使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高兴；不过在其他方面他们应当明白，德国的情况的发展显然会象比利时一样，而反对派的前哨战今后将由社会民主党来进行，左翼自由党人必须站在它的一边

并在它的领导下采取行动。”这是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过的唯一的一点意见。我再次要求，如果人们打算对我们进行一次极其恶劣的倾向性审判，那么，毕竟至少要提出一些证据。（很对！大骚动。）

考茨基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是荒唐的，他就党内遥远的发展前景所发表的想法也是同样荒唐的，这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最近他说过这样的话：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停止批评，必须停止对当前占支配地位的意见、对策略的怀疑。（大骚动。听啊！听啊！）“怀疑！”，的确是这个词！我记住了这个词，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宗教课。（喊声：是这几个字吗？大骚动。）“怀疑必须搁置！”你自己去找这句话吧！（倍倍尔：哎嘿！喊声：这里是“打消”！）这就是说，不应禁止自由发表意见，而是应当推迟，（很好！活跃和长时间的骚动。）不取消批评，而只是停止（eingestellt）一段时间！（喊声：搁置〔zurückgestellt〕！）就我对德语的理解来说，这是一样的！是的，你们在教皇和教会那里也能听到这种说法。（多次喊“很好”；骚动。）那里也停止对圣经的批评，不过也只停止到教皇自己承认批评是正确的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探讨这个问题时为止；然后就也可以进行批评，一直到确定了新的教义为止。

不，党员同志们：自由发表意见即批评的权利要就是完全地、无条件地存在，要就是根本不存在。（很对！）否则，情况就象在今天的国家中那样，纸面上存在着思想自由和讲学自由，但在实践中必须慎重行使这种自由，以免引起公众的愤怒！（骚动。）不，我们可没有讲好要这么办。就社会民主党来说，不仅发表这样一种观点简直就是耻辱，而且哪怕只要想到这种观点也简直就是耻辱。（很对！）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有什么生存基础，有什么生命源泉的话，那么，这就是绝对的思想自由、探讨自由，也就是研究原则、目的和策略的自由！谁想在这里哪怕只是实行最小的限制，谁就是想使党

从一个伟大的文化运动变成一个宗派！（很对！）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象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规模的运动表面上也还会轰轰烈烈地存在一个时候，甚至也许在敌人的眼睛里还要更加轰轰烈烈，因为这一运动具有完全一致的统一的意见。但是，必然的结果是党的僵化（很对！），一点新鲜空气也进不来，从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被堵塞了。但是，这样一来，人们也不得不首先从我们的名称上勾掉“民主”这个词（**倍倍尔**：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当然可以！），也就一定不会去争取并保留独立的、自由的、有着满腔热血的人了。（**倍倍尔**：你看见自己造出来的鬼影！）

我可以对你们这样说：如果有人建议我戴上一个笼头，那么不管这是警察的、教会的笼头，还是所谓民主的笼头，对我来说都完全一样。（掌声和嘘声。）这倒是真正值得我为之付出我的生命的。（**倍倍尔**：付出生命吗？什么地方？！）你不是把你的生命献给党，用你的生命为党效劳吗？（**倍倍尔**：我根本不是说的这一点！）你认为别人不是也这样吗？——因此我说：这倒是真正值得我付出全部生命来进行斗争的，推翻旧的权威，仅仅是为了以一个新的偶像来代替它！能乐意这样做的不是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而只是狂信者！（**倍倍尔**：很对！）但是，哪怕这样一种危险还只是出现在远方，也必须详细地把它描绘出来！

这样，我就说到决议了。关于第一点，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在党做出了决定的时刻——何况它已经这样做了——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谈一谈有关“修正主义的企图”的那几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从这样不确切的概念开始。至于说到我，那么，我肯定是从来既没有把自己称作伯恩斯坦分子，也没有称作倍倍尔分子，甚至没有自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不想成为这类“主义者”和“分子”，也没有这样的才干，我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这对我来

说就足够了。(很好!)因此,我认为“修正主义企图”这样的用语是荒谬的说法,正象整个说来这几句话是一个怪影一样,起草者自己炮制了这种荒谬说法,是为了能够把它当作靶子来打。据说修正主义的企图是要“改变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久经考验和已取得辉煌成就的策略,用一种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代替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来夺取政权的政策”。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我或我的哪一个朋友曾经提出过这种要求呢?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至于谈到我,那么,恰好是我的慕尼黑演说最清楚地谈到了由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

接着是第三句:“这种策略的后果就会是”等等。的确,如果这些臆想出来的企图是存在的并且是起作用的,那么,后果当然会是**不好**的。只不过它们在实际上恰好是**不存在**的。

最后,第四段是:“党代表大会还谴责为了便于投靠资产阶级政党而抹杀当前的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的任何企图。”同我从考茨基的著作中引述给你们看的那些话相比,这已经是退了一步。但是我在这里再问一下:谁提出了这个要求呢?我不知道有谁提出过。

党员同志们,据此我认为关于修正主义的三段话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我不知道谁曾经鼓吹过这里所说的那些主张(无论如何我没有这样做过),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与这种描述相符合的那种“修正主义”。(很对!)如果我是一个美学家,那么,由于这个决议的缺陷,我必须说它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我不是根据美学原则,而是根据其他观点作出判断的。我只是说:虽然我认为这全部都是错误的,但是正因如此它也就对我没有影响。我认为这些原则当前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起草者认为它们也许会在某一个时候出现,并且因此打算事先把它们“拒之门外”,而如果这样做会使大批党员同志感到安心的话,那么,我尊重这种看

法,我不想加以反对。(听啊!听啊!)我认为,根据议会解释的原则,不会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当然,决议的最后一段一点也不使我满意。起草者似乎非常忙于为修正主义概念找到根本找不到的定义,以致在写到对党是最重要部分时已经精疲力竭了。不然,我就无法设想,为什么整段的词藻是如此丰富,但内容却十分贫乏。对我这个有害的“温和分子”(活跃)来说,这一段根本不够激进。(很好!活跃。)特别使我烦恼的是,当人们在原则上向前跨进一大步以后,关于很重要的社会政策问题却无非只知道说,我们必须“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可以想到的话里,这是最软弱无力的话,而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当我们害怕集会被解散的时候所使用的话里,这也是最软弱的话。倍倍尔看到我突然激进起来,刚才做出了惊异的样子。(倍倍尔:你完全误会了!你仍然只是你从前的那个样子!)法国有一句谚语:“人总是比某一个人更加反动的。”这就是说:不管是谁,总会有人超过他,比他更加保守,或者更加激进,而谁也不应认为自己在党内是最右的或者最左的。因此,人们在对待不同事物上会时而站在这方面,时而站在那方面。因为实际上,在国会讨论实际政策时,所谓修正主义者站在一个方面、“激进派”站在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况,我一次都举不出来,(听啊!听啊!)而总是错综复杂的。倍倍尔将为我证明,他和我的意见不止一次是一致的,并且有时曾一起反左,有时又一起反右。(多次喊:听啊!听啊!)因此你们会看到,修正主义无非是个怪影。

考茨基孜孜不倦地攻击别人是机会主义者,如果人们甚至突然在超机会主义的狭路上碰到象他这样的人,那也是值得注意的。他在《新时代》上他的最近一篇文章中劝告人们不要赞同重新分配国会选区,因为否则选举权就会受到威胁。(听啊!听啊!)我们在所有的选举集会上都指出当前选区分配的不合理是一种耻辱,并

且在国会一再提议改变这种分配；如果当我们打算在国会显示我们新的实力时，我们突然打算完全撤回这个要求，那么，我们现在就简直是放弃我们的权利。（倍倍尔喊：当然，根本谈不到这一点。）好的，但是考茨基是这样建议的。（倍倍尔：我赞成你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我们的任何说法都是削弱矛盾，但他们面对我们新获得的实力地位，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确实是说明问题的。（很好！）

我说完了。如果你们要对一样你们不中意的、你们称之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在我看来你们给这一概念下的定义是很不合适的）作出了一项判决，如果你们要对你们认为有害的那些原则（假如存在这些原则的话，我也同样认为它们是有害的）作出了一项判决，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件随着通过这项决议就算解决了的事情。

如果你们抱着个人的目的，那自然会是一回事了。我丝毫不硬说决议的起草人追求这种目的——我向你们保证这一点。从决议看不出这种想法，因此也不允许对它硬作这样的解释。但是这几天来，从我进入这个大厅的那一时刻起，我从各个方面的人那里听到说：某一方面有人企图想出那样一种使某些人感到不快的措词。（听啊！听啊！大骚动和激烈的喊叫声。）许多同志都直接听到了这一点并把它告诉了我们。如果这不符合事实，那就更好！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这整个问题中，虽然关键不在于作出实事求是的决断，而是在于力求把某些使一个人感到不愉快的人排挤出去。（很对！骚动。）但是想做这种事情的人，必须也同样有勇气采取彻底的措施并举出姓名来。他必须指控某些人，并使他们面临屈服还是离开会场的抉择。这是最正确的结论。那时，在德国就会有人知道那些据说怀有这种意图的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时乌云将会消散，党代表大会将发现自己是站在怎样的鸿沟的边缘上！

然而如上所述,我没有能在决议中发现这种意图,因此也就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就要结束发言了。

同志们,我不否认这里或那里可能都有引起不满的原因,例如我认为,有一大部分不满是由于以前几乎不为大家所知的同志可以说在一夜之间就登上了荣誉席位引起的;尽管我对有关的人满怀尊敬,但这种见解我是能赞同的,因为这些同志说得有道理:一个人在得到军官肩章之前,必须服完通常的军役。(赞同声。)当然可以反驳说:是的,那么你们为什么把这种人提名为候选人呢?(许多赞同声。)例如我们最老的选区之一就是这样提名的。我虽然在巴伐利亚的山里,处于那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对此也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尤其是当我读到柏林会议的演说时更是这样。我对自己说:现在有一些不满,而且气氛越来越紧张,直到问题爆发出来。什么地方最薄弱,那里就成了喷火口。从前作为个别现象并不显得严重的事情,现在在许多人看来,党似乎因为它们处在危险之中了。等我们把话说完以后,党就应当确信,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情况被夸张了。我不否认,双方(也包括我)都可能犯了错误——我绝不是那种声称自己任何时候都有理的人。(倍倍尔:你这话是對我说的吗?)啊,哪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非常活跃。)

因此,我想说,如果通过了决议,那么,为了使人安心和弄清问题所能希望的一切就都做到了,从而目的也就达到了。其次我相信,同昨天倍倍尔讲的相反,党代表大会将发现,恰恰现在比任何时候在党内都更没有理由引起真正原则性的争论,不如说,党内的统一和一致的确不是比从前更少了,而是更多了。(赞同声和反对声。)党将认识到,在我们面临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大的情况下,停止这种愚蠢的兄弟之争,(很对!)是最合适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项任务,这项任务需要我们的所有力量,每一种力量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这项任务发挥适当的作用,正象圣经上所说,人们

可以以各种方式供奉上帝。人们在工业区和农业区，在南方和北方的行动应当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到处都能忠实地运用我们的力量，只是必须努力使我们不致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发挥作用。我认为，党代表大会会懂得在这场不愉快的、但是必然要发生的争论之后怎样寻求正确的解决办法，它将坚决地反对任何也许还在冒头的、不是从公务出发、而是从个人出发、以伤害人或强加于人的方式打算干点什么的企图，并且叫左翼和右翼的领袖回到他们的岗位，回到对敌人进行共同斗争的岗位！（热烈鼓掌！）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3年柏林德文版第 321—326、339—345 页。

在巴伐利亚邦议会 关于军事预算的演说(摘录)

(1906年1月11日)

.....

先生们：谴责别人不要祖国，这是极其卑鄙的党派斗争中进行恶毒中伤的故技之一。这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当雅典的蛊惑家们要侮辱和毁掉一个对手的时候，他们便说使他摆脱“米提亚^①的观点”。在新的德意志帝国发生的情况也不例外。从前，当社会民主党还比较小的时候，民族自由党把这一方面的仇恨主要集中在中央党身上。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央党人、罗马教皇的党徒、亲法派、祖国之敌都是一回事，人们一有机会就使用这样的说法。（喊声。）但当中央党变得更加强大和更有影响以后，民族自由党人便怯懦起来，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强大的中央党。……如上所述，总的说来，现在暴徒们不会去打扰中央党，却以双倍的愤怒去袭击壮大了的社会民主党。十年来，我们的发言人可以就这个题目发表他们想发表的意见，但这在民族自由党人看来却完全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对挑唆各族人民互相进行攻击的反人民行径（这种行径随时会引起一场战争并且会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无限的不幸）发出愤怒的呼声，他们就会说：我们的被告已经认罪了，我们有了直接的证据，证明社会民主党是祖国的敌人；当

① 米提亚为伊朗高原西北部的古国，曾和希腊人作战。——编者注

然，他们的用词还会按照需要修饰得更恰当些和编造得更象样些。如果与此相反，我们的发言人在帝国议会、在本院或者其他场合声明（这种情况发生过几十次）我们热爱祖国并且一心一意地准备保卫祖国，那他们又会说：我们不相信，……对这样的人不能寄予多大的期望。

……

我们的党团有一位发言人^①昨天说过，对祖国的概念可以下各种各样的定义，于是人们便一再提到这种说法。但是，凡是懂得事理的人都不会反驳这种说法。认为祖国的概念和他们自称“朕”的概念是一回事的君主是不乏其人的，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这种君主如今是否已经绝迹。（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那些强权政府侵略并且镇压了那么多的民族和国家，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欲望得到满足，以血和火扫荡了一个洲，而且它们在做这一切时还以国家的名义把本国人民当作工具来加以驱使。统治阶级及其党徒把本国的命脉和本国人民辛勤劳动的全部成果据为己有，但对本国人民却进行镇压，与此同时，当这一套做法引起同外国的斗争的时候，它们还是同样要求人民以热爱祖国的名义把这种斗争进行到底。上述的所有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人民被看作是某种纯粹消极的因素，也就是说，人民无须参与决定本身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事情，即战争与和平的抉择，而只需要简单地听凭当时的统治者驱使。但是，一旦这样行动的统治阶级本身的物质利益或者统治利益看来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可以在他们那里看到引人注目的国际主义思想。我不想进一步回顾历史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和其他议会里不知有多少次看到过，一旦我们试图以强制的

^① 指汉斯·罗尔瓦根(Hans Rollwagen)，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祖国这个概念伸缩性很大，你们的祖国概念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在哪里过得好，那里就是我们的祖国。”——编者注

手段对财产征收捐税的时候，立即就有人对我们说，那是行不通的：资本家会简单地移居到他们可以过得更好的别的国家去。（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如果通过使用国外劳力有利可图，哪怕只是几个芬尼的好处，那么，先生们，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在其他方面怎样表现民族主义精神都嫌不够的人，就要不加思索地使国家遭受斯拉夫化或者罗马化的危险。（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好！）

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我那时已在帝国议会提出过了。我想，那是在1903年选举以后的事情，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所得选票大大增加，当时北德意志的一家保守派报纸写道：是否真的对这种情况就毫无办法了呢？假如有一天俄国人开进我国，那也许还是最好的出路，因为这些俄国人毕竟会彻底地清除社会民主党人的。（听啊，听啊！）

那句“哪里好，哪里便是祖国”的古老格言也被重新提到了。先生们，这句每个人、特别是会拉丁文的人——在这个议会里会这样的人是绰绰有余的——都知道的格言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喊声），——请你们等一等，我还要继续说下去呢——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祖国应当给它的孩子们造福，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长期受到压迫，这个国家就是继母般的祖国和残忍的祖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各个不同时期，不仅有上百万的德国工人，而且有上百万的德国农民、市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离开德国到别的国家或别的洲去，在那里寻求一个新的更好的祖国，然后成为那个祖国的忠实的儿子。但是，先生们，这句话并没有把道理说透，因此是不确切的，因此它也不符合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把它收进纲领并且公布于众。（听啊，听啊！）（左边：好极了！）撇开个人的好感不谈，我们同祖国、同特有的民族性、同特殊的共同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况仍旧把我们——尽管我们对按照自己的信念看

到的那些弊病是十分愤怒的——同这个祖国联在一起，并且使我们感到祖国是可爱的。（左边：好极了！）（喊声。）是啊，自由派的先生们，这到底为什么会使你们感到惊讶呢？我们希望，照我们的理解，把我国的情况改造成象正义、理智和文明所要求的那样，而且我们为了坚持不懈地进行这项工作，正在遭受种种不愉快的事情，遭受敌视和迫害，并且作出无数牺牲（这些你们多半也会知道的），这些都是我们具有上述那种感情的一个证明，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明吗？（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

下面我想回过头来专门谈谈我们对军队的态度，但是今天我不想谈什么新的意见，只想重提一下这个议会从前的一次讨论的情况，也就是已经记录在案的情况。十二年前就军事预算问题进行过一般性讨论，我在那次讨论中同样有幸代表我党作了发言，第一次明确表述了我们对军事问题的原则态度。那时我曾指出，今天军队的确处在内部不停地实行民主化的过程之中，不管人们在表面上是怎样地反对这样做。这个议会会有一个发言人针对我的说法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假如情况是这样，那时军队就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竞技场，而且最终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军队“不再能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进行防卫了”。当时我说了下面一段话作为答复：

“问题只在于，人们期望军队进行什么样的防卫。如果这指的是需要保护国家不致受到敌人的进攻，那么人们会看到，社会民主党人决不是不热爱他们的祖国，而且在保卫祖国时不是表现最差、最不愿意作出牺牲的战士。相反，如果使用军队去维护一个摇摇欲坠的阶级统治，去保护无法保持的特权，去压制那些意图（这些意图存在于当代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之中，并且是这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表现），如果一旦产生这种愚蠢的想法，那么我们当然坚信，总有一天军队会意识到，他们来自人民，人民的利益就是他们本身的利益。”

先生们,我受权声明,这个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今天还是一如既往采取同样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人席发出热烈的“好极了”的叫喊声。)

载于《1905—06年巴伐利亚邦议会下院会议速记记录》第2卷第374—376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237—240页。

在国际社会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 委员会的发言

(1907年8月20日)

爱尔威公民已经向各位指出，德国人是心地善良的人，——这是他初次到德国进行考察的结果。他的这种看法完全正确。并不是很多国家的党员同志都能象我这样耐心和善意地听取这类发言（很好！）并且作出同样的答复。爱尔威公民在发言的一些地方谈到要有勇气并且甘心坐牢——每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可以谈论这一问题而不致有吹嘘之嫌，（很好！）——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本质以及其他等问题，诚然有一些德国的党员同志认为他的那些说法已经不是开玩笑。但是我认为，为了自重起见，我们不会斤斤计较那些说法，不会多费唇舌去进行反驳。（德国代表团席：很好！）在这方面，我并没有想到要把爱尔威公民当作法国党的代言人并让这个党对他的言论的每个细节负责。但是，尽管我决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干涉法国同志的内部问题，我却不能不提醒法国同志注意，他们过分迁就爱尔威公民的做法会给自己招致什么危险。因为，饶勒斯和瓦扬即使没有使用爱尔威公民自称为“粗鲁”的那种言词，但却一再作出同样的结论，从而使爱尔威有权洋洋得意地把饶勒斯和瓦扬称为他在贯彻放在我们面前的南锡代表大会决议时的盟友。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饶勒斯劝我们不要把爱尔威公民的作用估计过高。是啊，只要法

国党本身不是十分认真地看待他的鼓动，只要法国党在基本上接受这种鼓动的结论时哪怕只对它所依据的思想的一半加以驳斥，那就好了！至于我们德国人，我们现在已经亲自见识了“危险的反军国主义”，因此我只能说，我们现在对法国党内发生的事情已经有些了解，我们再也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惊奇了！（德国代表团席：很好！）关于爱尔威，我就谈这些，下面我来谈谈饶勒斯-瓦扬的决议案。我也会谈得很简短，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我赞同倍倍尔的意见，另一些问题我认为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不错，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说能使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给人留下印象，但是谈不出什么新东西，我不愿意为这种事占用代表大会的宝贵时间。我也不想学习饶勒斯的高超演说技巧，——也许我根本学不了（活跃），——我只想十分冷静地和审慎地简单说明一下，依我的意见，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思考和如何行动。当然，我不是一味歌颂我们的党而对它不作任何批评的人，我不认为它的所作所为一概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能象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从一开始就较少受到民族偏见——我不想说沙文主义——的影响，并且比它更加坚决地和一贯地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这个灾祸。（很对！）不言而喻，我们也准备毫不松懈地坚持这项工作，不遗余力地继续进行反对国内和国际的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但是我们也不打算容许人们歪曲这种斗争的意义。认为凡是国际主义的东西就等于反民族主义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说我们没有祖国，也是不正确的；而且在我提到“祖国”这个词时，我一点不想对它的概念另加什么咬文嚼字的说明。我知道社会主义必须是国际性的，也知道为什么必须是这样。但是对人类的热爱任何时候也不会妨碍我成为一个好的德国人，正象它不会妨碍别人成为好的法国人或者意大利人一样。尽管我们完全承认各民族的共同文化利益，严厉谴责并且反

对喉使它们互相攻击,但是我们不会产生打破民族界限、使民族消亡下去、使之变成一种无定形的各民族的大杂烩的那种空想。(饶勒斯:到底是谁打算这样做?)饶勒斯同志,我知道您和瓦扬关于民族的必要性谈得很好。但是这个大厅里并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我们就可以屡次听到其他意见。只要爱尔威公民留在你们党内,你们也就不能单靠耸耸肩膀来推卸应当为他承担的责任。我们讽刺敌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是可笑的漫画,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不要给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有理由指责我们的国际主义是可笑的,从而使统治阶级本身有可能打出民族主义的招牌来掩盖它的利己主义,并且煽起民族感情来反对我们!威廉·李卜克内西曾经说过: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宣传教育以及通过取得在议会和舆论中发挥影响来使莫洛克神^①无能为力,而不能通过兵营中幼稚的密谋来达到这个目的。至今德国党内的绝大多数人一直坚持这种观点。这对于饶勒斯—瓦扬决议案中所提出的其他手段也是同样适用的。据说瓦扬曾在南锡代表大会上说过,他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不会去做德国人不同意的事情,更不会去做反对德国人的事情。刚才饶勒斯在这里也说了些类似的话。那么就请法国同志放弃他们的决议,不使这个决议成为进行较量的对象,因为较量只会带来害处。尽管我们恰恰乐于同我们的法国同志携手并进,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放弃我们的观点的,我们必须十分坚决地反驳饶勒斯—瓦扬的决议案,并且宣布完全不能采纳他们的决议案!当然我了解,在军备竞赛不断加剧和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这种压力下,很多人觉得发动群众和夺取政权的工作进展太慢,因此他们便企图采取在他们看来似乎有可能更快地反击军国主义的手段。但是依我看来,不会从这种尝试中得

^① 需要以人体为祭品的神,这里是战争的譬喻。——编者注

到什么有益的、能够促使我们改变我们久经考验的立场的新东西。更确切地说，根本不会得到什么新东西，无非是历次国际代表大会早就知道的。现在向我们推荐的东西不过是些老药方，只是再一次重温纽文胡斯的建议而已，而纽文胡斯的建议已经屡次遭到国际代表大会的坚决驳斥。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确实还有比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更加重要的工作可做！倍倍尔已经指出，如果采取饶勒斯—瓦扬向我们提出的手段，那就会发生什么危险。当然饶勒斯认为，倍倍尔的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了。然而这种反驳太没有价值，饶勒斯必须首先让我们德国人对我们多年来极其慎重地加以考察的那个问题作出决定性的判断。饶勒斯在这样说时援引了考茨基的一篇著作中的一个地方，但谁也不会否认个别人的意见同全党的具有约束力的声明是不一样的。至于卡尔·李卜克内西，由于帝国最高法院已开庭对他进行审判，我认为他在反军国主义鼓动方面所发表的那些言论当然目前就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了。但是，我们声明反对饶勒斯—瓦扬决议案中所提出的手段，这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深思熟虑。更确切地说，我们同时也看出那里存在原则性的错误。（一部分法国代表，尤其是爱尔威，发出抗议声。）我们看到，采取那种手段是对社会主义政策的本质的误解，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只是抓住个别的表面现象，而不能从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本质及其相互关联上来把握它。依我看来，那种以为通过罢战或者类似行动就能消灭战争的思想是愚蠢的，这正象有人以为通过一次总罢工几乎就能在一夜之间推翻资本主义的想法一样愚蠢。如果我们打算采取这样一种策略，我们就会离开正确的道路。我个人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我们简单地重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的那些决议，我觉得这些决议已经完全解决军国主义问题了。但是，既然我们的讨论已经进行到这种程度，我理解你们是打算作出另一项决议，哪怕这项决议谈

不出别的什么东西，但至少形式上是新的。（活跃，法国代表团的一部分人发出强烈的抗议声。）请相信，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正象其他任何国家的同志一样深知战争的全部灾难，并且准备采取一切我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制止煽动各民族互相残杀，同时通过日益加强对当局和舆论的影响来防止军事冲突。我们并不坚持原封不动地采用倍倍尔的决议，而是欣然愿意进行协商。但是，我们必须恳切地请求你们，不要限定我们采取某种手段，从而使我们党丧失自行作出决定的自由，丧失它的生存条件。（德国代表团席：好极了！）

译自《国际社会党 1907 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1907 年柏林德文版第 91—93 页。

在巴伐利亚邦议会的演说(摘录)

(1911年10月26日)

.....

在巴伐利亚，人们从来既没有从理论上又没有从实践上考虑过类似铁路工人罢工这样的问题，而恰好在这个邦里，人们却由于担心铁路工人可能举行一次罢工而采取了行动，这无论如何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①。我希望，有一位外国的政治家或者法学家能够目击这个奇特的场面。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都发生了这样的罢工。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那些已经发生铁路工人罢工并因此造成巨大损失的国家，多数党都没有要求对参与罢工的人采取惩罚措施。

.....

为什么官员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身份不能互相结合起来呢？又怎样从国家法律的角度来论证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官员的全部公务活动是用两项标准来衡量的，他必须进行两项宣誓，当然这两项宣誓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合成一个，但这无关紧要。第一项宣誓是真正的就职宣誓。他在就职誓词里表示他承担履行职守和（特别是如果他不是一个法官的话）服从合乎法律规定的公务指令的义务。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完全能够象其他任何一个人那样去做

^① 巴伐利亚邦交通部长亨利希·冯·弗劳恩多尔费尔于1911年8月15日发布训令，规定要对南德意志铁路职工联合会进行严密监视，以阻止可能出现的罢工鼓动。邦议会的这次会议就这一训令进行辩论。——编者注

这些事；（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因为不同之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是在能够随意发号施令的专制制度下生活，服从的前提是，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发布命令。

第二项誓词是宪法上规定的誓词：“我宣誓忠于国王，服从法律，遵守国家宪法”，看来这真的是中央党的先生们以为有空子可钻的地方。但是首先我想指出，这里所说的誓词即就职的誓词，根本不是什么特殊的東西，不是带有某种神秘性质的东西；至于第二项誓词，就其政治性质来说，只不过是每个公民都要作出的誓言（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一个公民结婚时，他登记入伍以及遇到类似场合时，他都会这样做，因此，一个人作出公民誓言实际上是例行公事，丝毫不说明其他问题。

有人把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描绘成主张进行流血革命的人，除了朝思暮想建立一种譬如说象葡萄牙那样的共和制政体^①以外不知道去做更加重要的事情的人。我根本用不着——重复这些说法。其实情况是这样的：对于我们来说，政体虽然不是完全无关紧要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但是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和社会的本质，并且我们打算以合法的方式通过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使国家和社会的本质得到改善。……倍倍尔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会议上明确地说过：“法国的共和制，英国的君主制，是哪一个更先进，这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说穿了就是，可能有好的君主国，也可能有坏的共和国，如果让我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我当然选择好的君主国。其次，正如你们知道或者本来应当知道的那样，君主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个相对的概念。俾斯麦，正是俾斯麦其人，有一次在帝国议会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英国是个共和国。有很多愚蠢的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妥。但这是完全对的，当然我根本用不着进一

^① 葡萄牙于1910年宣布成立共和国。——编者注

步举出南美的共和国以及类似的共和国为例了。可以肯定，在我们看来，在政体问题上只有内在的性质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先生们，由我们在这里的邻座自由派先生们自己来说明不是会更加清楚得多吗？不久前，中央党的报刊对他们进行了谴责，说他们对君主制的喜爱只是一种虚假的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因为对王国来说要加以考虑的不只是民族的利益问题，因为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不只是理智。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起决定作用，但是，很可能中央党方面的先生们对这一点了解得更清楚。（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好！）

那么官员的誓词，或者确切些说，誓词的后半部分，即政治誓词、公民誓词，这确认了什么呢？先生们，现在这种誓词的前身，过去的效忠誓词，确定了个人同国君的关系，个人对国君的义务，而这个国君的意志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在座的先生们——在宪法制定已有一百多年以后——本来就应当了解这一点。今天我们生活在立宪制国家，在立宪制国家里只有一种按照法律发布命令和按照法律履行义务的权力，只有一种服从法律的义务。守法的公民和官员有义务服从由国王所代表的政权，而且只有在行动和命令具有法律根据并且是由合法当局贯彻执行的时候，他才有服从的义务。……

由国法规定的全部表示忠诚的义务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现在我要问问你们，是否作了这种誓言就不能做社会民主党员了，难道社会民主党员不能问心无愧地作出誓言吗？我不相信，除了不明事理和心怀恶意的人以外，还有人会想到要谴责我们对国家抱有敌对情绪。先生们，如果我站在反对我们的人的立场上，那么我宁可说：他们能够谴责我们对国家过于友好和忠诚了；因为我要说，社会民主党正是一个这样的党，它的全部生命是在有了国家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有了民族的统一的情况下才会实现的。我们是这

样的党，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一切事物交给国家解决，而其他的党却无论如何不容许剥夺私人企业处理这些事物的权力，等等，等等。唯一的区别只是，我们希望我们为之服务的国家具有其他一些形态。但是本院的其他所有的政党也都在这样做。我想再问一句，如果中央党的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那么他们会使巴伐利亚邦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形态？（社会民主党人席：很对！）

……

我根本不想回过头来谈南德意志铁路职工联合会及其某些具体问题。一开头我就说过，根据内阁本身的观点，也并不能证明联合会是社会民主党的；但是现在我要补充说，如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情况仍旧完全一样，因为前面已经讲过，按照宪法条文即法律条文，政府根本没有权利去为官员或者工人具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而操心。你们不妨看看其他国家……我指的不是那些共和国，而是各种形态的君主国！……总理先生^①从前可是在奥地利呆过，他很喜欢奥地利的情况，他会很容易地打听到那里的情况的。有一位杰出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即议员伦纳^②，他今天仍旧担任事务官，他的公职是高级图书馆员。（社会民主党人席：听啊，听啊！）再说意大利。如果我要把在那里既是国家职员、同时仍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官员和教授通通举出来，那么我可以成百地数下去。……

此外我倒想讲一点。议员皮赫莱尔博士先生^③显然忘记了这一点。巴伐利亚的确也已经开始录用官吏，哪怕只是间接行使国

① 当时的巴伐利亚总理是克雷门斯·冯·波德维耳斯(Klemens von Podewils 生于1850年)，曾任巴伐利亚驻奥地利大使。——编者注

② 卡尔·伦纳(Karl Renner 1870—195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修正主义者。——编者注

③ 弗兰茨·塞拉弗·皮赫莱尔(Franz Seraph Pichler 1852—1927)——帕绍大教堂首席司祭，中央党的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编者注

家权力的官吏,并且让他们进行宣誓。在巴伐利亚,我们有社会民主党人的市长及其助手们(在市长不在的情况下他们代行其权力,即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我们有社会民主党人的陪审法官,我们有社会民主党人的陪审员。如果议员皮赫莱尔博士先生及其朋友们要求,即使在这样的领域,特别是在市政府中,也不应当任用社会民主党人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态度只能说是符合逻辑的。那时,非常条款、非常法就可以充分得到贯彻了。

.....

先生们,我想就此结束,只想说一点:照我看来,中央党已经由于它的统治欲和私欲而大大丧失理智,无法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并且它将在适当的时候,即使不是在今天——对于这一点你们是可以放心的——,从人民那里得到应有的报答。如果政府能够洞察这些情况,那时它最终就会在它已经走上的这条完全投向中央党怀抱的道路(我是不怎么喜欢这种态度的)上停下来。政府之所以应当放弃这种态度,是因为它通过它现在的行动会使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干练的工人和官员队伍分崩离析,使一部分人对此义愤填膺,使另一部分人因失去战友以及种种类似事件而受到压抑。其次,我们要求政府最后坚决地回到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来。(社会民主党人席热烈鼓掌。)

载于《1911年巴伐利亚邦议会下院会议速记记录》第13卷第446、449—453页。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集》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241—244页。

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年表

(1850—1922)

- 1850年3月7日 生于德国慕尼黑维尔特海姆的一个贵族家庭。
- 1859年 进奥格斯堡的本笃派天主教学校。
- 1865年 入巴伐利亚骑兵团服役。
- 1866年 作为步兵少尉参加普奥战争，战争结束后自动离开军队。
- 1868年 到罗马参加教廷的外籍军团。
- 1868年底 拒绝执行教皇签署的一项死刑命令，离开罗马回到慕尼黑。
- 1869年 进技术学校经短期训练后到邮电部门任职。
- 1869年 写《巴伐利亚及其与普鲁士签订的条约》一文，认为与普鲁士结成军事同盟会给巴伐利亚带来危害。
- 1870年 参加普法战争，被任命为德军在法国的军用铁路的高级职员。
- 1871年1月29日 在法国布卢瓦左腿受重伤致残，此后长期依靠残废军人救济金维持生活。
- 1871—1875年 在养伤期间阅读《人民国家报》等社会主义刊物和著作，并和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发生联系。
- 1875年 在米斯巴赫秘密组织工人集会，被称为“红色革命家”，并以“菲洛登姆”为笔名给《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报》撰稿。
- 1876年 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撰稿。9月发表《森林的破坏和洪水》一文。
- 1877年4月 任社会民主党萨克森组织的机关报《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后改名《德累斯顿人民报》)主编，从此正式加入社会民主党。

- 1878年5月(或6月) 以违犯新闻法罪受到控告,7月被判处十个月监禁,在茨维考服刑,第二年5月刑满获释。在这期间写了《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文(于1879年7月发表)。
- 1879年10月 被党任命为1879年9月28日在苏黎世创刊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10月到苏黎世。
- 1880年8月 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维登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党在苏黎世的国外联络站负责人。此后不久以该联络站名义发表《告国外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协会》宣言,因措词过左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
- 1881年1月 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职务,仍为该报撰稿。
- 10月 当选为萨克森米特魏达选区的帝国议会议员。
- 1882年5月 第一次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反对俾斯麦的烟草专卖政策。
- 1883年3—4月 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 1883年9月 在开姆尼茨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
- 1884年10月 当选为慕尼黑第二选区的帝国议会议员。在同年11月到1885年5月党内关于轮船公司津贴法案的斗争中站在以倍倍尔为首的革命派一边,反对国会党团内的机会主义分子。
- 1886年 再度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任期到1889年为止。
- 1886年3月 创办《巴伐利亚人民之声报》,5月该报被查禁。
- 1886年底 以秘密结社罪被判处九个月监禁,在慕尼黑服刑。
- 1887年2月 帝国议会选举时在狱中仍被提名为候选人,但落选。
- 1888年 当选为社会民主党慕尼黑选举协会主席,从此成为该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人。
- 1889年7月 出席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巴黎)。在大会前马克思派和可能派的斗争中曾支持可能派。
- 1890年 创办《慕尼黑邮报》并任编辑三个月,后曾较长时期担任该报出版负责人。
- 2月 再度在慕尼黑第二选区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此后

- 在历届选举中连续当选。
- 8月 在不来梅的工会联合庆祝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的新形势下应采取改良主义策略。
- 1891年4月 发表《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一文，继续宣扬改良主义思想。
- 6月和7月 两次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发表演说，提出完整的改良主义主张。
- 10月 由于发表《“黄金国大厅”演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受到批判。
- 1892年6月 在法国杂志《政治和文学评论》上发表《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文，宣扬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在党的报刊上引起激烈争论。
- 11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上讨论国家社会主义问题时表示自己的观点同党的观点没有分歧，并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一同提出谴责国家社会主义的决议案。
- 1893年 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并担任社会民主党邦议会党团主席，此后在历届选举中继续当选。
- 1894年5月 领导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投票赞成邦政府预算，因而在党内引起激烈争论。
- 10月 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的议会活动时发言为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投票赞成预算辩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与布鲁诺·休恩朗克共同提出一项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二人还分别就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作报告，对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宣传表示不满，强调党应要求政府采取保护小农（实际包括富农）的措施。该决议还要求党成立一个专门的农业委员会，负责制定并向下届代表大会提出党的农业问题纲领。该决议获得通过，但后来遭到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批评。1895年的布勒斯劳代表大会否决了按照这一决议精神制定的

- 纲领草案(福尔马尔未出席这次代表大会)。
- 1896 年底 发表《巴伐利亚的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小册子，继续宣扬保护富农利益的观点。
- 1898 年 10 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讨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时发言为伯恩施坦辩护。
- 1899 年 10 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发言为伯恩施坦辩护。在大会之前，曾促使 9 月 25 日的慕尼黑党员大会通过支持伯恩施坦的决议。
- 1900 年 3 月 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反对反动的海因茨法案。
- 12 月 发表《关于米勒兰事件》一文，赞同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未经党的同意擅自加入资产阶级内阁。
- 1902 年 9 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慕尼黑代表大会上发言主张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派别刊物。
- 1903 年 1 月 在帝国议会对德皇威廉二世去年发表的两次侮蔑社会民主党的演说提出批评。
- 7 月 在慕尼黑发表《最近几次选举的教训和后果》的演说，支持伯恩施坦关于争取国会副议长席位的建议。
- 9 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为伯恩施坦辩护。
- 10 月 在一次火车事故中受伤，此后几年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 1907 年 8 月 出席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为“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小组委员会成员。在发言中反对法国社会党人爱尔威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但回避采取积极的斗争策略反对战争危险的问题。
- 9 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埃森代表大会上发言支持古斯塔夫·诺斯克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反对卡尔·李卜克内西主张同军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观点。
- 1914 年 7 月 先后写信给党的领导人哈阿兹和谢德曼表示党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应采取保卫祖国的立场。战争爆发后和党的右派领导保持通信联系，支持他们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917年夏 因本人病重和妻子中风,同外界断绝通信联系。
1918年8月 辞去一切职务,到瓦尔辛湖畔的乡村居住。
1922年6月30日 去世。

人名索引

A

- 阿贝尔, 雅克·勒奈(Hérbert, Jacques-René)。——第 42 页。
- 阿德勒, 维克多(Adler, Victor)。——第 261、266、281、302 页。
- 阿克曼, 卡尔·古斯塔夫(Ackermann, Karl Gustav)。——第 100 页。
- 埃尔哈特, 弗兰茨·约瑟夫(Ehrhardt, Franz Joseph)。——第 267 页。
- 埃伦博根, 威廉(Ellenbogen, Wilhelm)。——第 281 页。
- 爱尔威, 古斯塔夫(Hervé, Gustav)。——第 355、357、358 页。
- 安塞尔, 爱德华(Anseele, Eduard)。——第 281 页。
- 奥艾尔, 伊格纳茨(Auer, Ignaz)。——第 155、156、256、265、268—269、272 页。

B

- 巴尔特, 泰奥多尔(Barth, Theodor)。——第 320 页。
- 巴尔图, 路易(Barthou, Louis)。——第 297 页。
- 巴莱斯特雷姆, 弗兰茨·克萨维尔·冯(Ballestrem, Franz Xaver von)。——第 308 页。
- 巴塞爾曼, 恩斯特(Bassermann, Ernst)。——第 319 页。
-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第 181 页。

- 白尔尼, 卡尔·路德维希(Börn, Karl Ludwig)。——第 257 页。
- 班贝尔格尔, 路德维希(Bamberger, Ludwig)。——第 50、118、193 页。
- 倍倍尔, 奥古斯特(Bebel, August)。——第 161、163、165—168、219、220、222、224、225、257、265、273、292、304、325、326、333—337、339—341、346—348、356、358、359、361 页。
- 毕洛夫, 伯恩哈德·冯(Büllow, Bernhard von)。——第 306 页。
- 俾斯麦, 奥托(Bismarck, Otto)。——第 132、133、170—173、177、196、202 页。
- 卞尼格先, 鲁道夫·冯(Bennigsen, Rudolf von)。——第 94 页。
- 波德维尔斯, 克雷门斯·冯(Podewils, Klemens von)。——第 363 页。
- 波拿巴, 路易(Bonaparte, Louis)。——第 94、171 页。
- 伯恩施坦, 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第 255、258、261—266、268—272、279、296、325、334、336、340—342、344 页。
- 伯勒普什, 汉斯·海尔曼·冯(Berlepsch, Hans Herman von)。——第 176 页。
- 柏拉图(Plato)。——第 40 页。
- 博卡多, 杰罗拉莫(Boccardo, Gerolamo)。——第 37 页。
- 布奥尔-绍恩施坦, 卡尔·斐迪南·冯(Buo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von)。——第 46 页。

C

蔡特金, 克拉拉(Zetkin, Klara)。——第 265 页。

D

达勒尔, 巴尔塔萨尔(Daller, Balthasar)。——第 264 页。

大卫, 爱德华(David, Eduard)。——第 279 页。

戴鲁累德, 保尔(Déroulède Paul)。——第 283 页。

戴蒙(De Mun)。——第 237 页。

丹东, 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第 42 页。

迪布勒伊, 路易(Dubreuilh, Louis)。——第 287 页。

E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第 272 页。

F

法尔雅, 加布里埃尔(Farjat, Gabril)。——第 287 页。

法夫尔, 茹尔(Favre, Jules)。——第 94 页。

费里, 恩利科(Ferri, Enrico)。——第 281 页。

费奈隆, 弗朗斯瓦·德·萨利尼亚克(Fenelon, François de Salignac)。——第 312 页。

费舍, 库诺(Fischer, Kuno)。——第 48 页。

费舍, 理查(Fischer, Richard)。——第 264 页。

芬德里希, 安东(Fendrich, Anton)。——第 253 页。

福尔肯贝克, 麦克斯·冯(Forckenbeck,

Max von)。——第 94 页。

孚赫, 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 (Julius))。——第 181 页。

弗劳恩多尔费尔, 亨利希·冯(Fraendorfer, Heinrich von)。——第 360 页。

弗里登塔尔, 鲁道夫(Friedenthal, Rudolf)。——第 10 页。

弗吕赛姆, 米哈伊尔(Flürscheim, Michael)。——第 190 页。

G

盖得, 茹尔(Guesde, Jules)。——第 238、280—285、296 页。

歌德, 约翰·沃尔弗干格(Göthe, Johann Wolfgang)。——第 301 页。

格勒贝尔, 阿道夫(Gröber, Adolf)。——第 274 页。

谷兹科夫, 卡尔(Gutzkow, Karl)。——第 51 页。

H

哈默尔施坦, 威廉·冯(Hammerstein, Wilhelm von)。——第 107 页。

海尔茨卡, 泰奥多尔(Hertzka, Theodor)。——第 142 页。

海涅, 亨利希(Heine, Heinrich)。——第 51 页。

海涅, 沃尔弗干格(Heine, Wolfgang)。——第 255、265、269 页。

汉奈尔, 阿尔伯特(Hänel, Albert)。——第 94、106 页。

赫希柏格, 卡尔(Höchberg, Karl)。——第 45 页。

J

觉勒, 保尔(Göhre, Paul)。——第 339 页。

K

- 卡德纳, 贝尔纳 (Cadenat, Bernard)。——第 287 页。
- 卡尔多尔夫, 威廉·冯 (Kardorff, Wilhelm von)。——第 316 页。
- 卡普里维, 列奥 (Caprivi, Leo)。——第 177 页。
- 卡瓦洛蒂, 弗利切 (Cavallotti, Felice)。——第 159 页。
- 康拉德, 米哈伊尔·格奥尔格 (Conrad, Michael Georg)。——第 129 页。
- 康恩, 鲁道夫 (Kahn, Rudolf)。——第 69 页。
-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第 179、180、182、193—199、204、256、268、279—282、284—287、289、293、294、296—298、301、302、304、323、340—343、345、358 页。
- 科斯塔, 安得列阿 (Costa, Andrea)。——第 281 页。
- 克鲁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 (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第 69 页。
- 克虏伯, 弗里德里希·阿尔弗勒德 (Krupp, Friedrich Alfred)。——第 308 页。
- 库奈尔特, 弗里茨 (Kunert, Fritz)。——第 218、219 页。
- 昆特尔, 席格蒙特 (Günther, Sigmund)。——第 245 页。

L

-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第 237 页。
- 拉加德尔, 于贝尔 (Lagardelle, Hubert)。——第 290 页。
- 拉萨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第 123、183、266 页。

- 拉斯克尔, 爱德华 (Lasker, Eduard)。——第 50 页。
- 劳贝, 亨利希 (Laube, Heinrich)。——第 51 页。
- 勒伦, 海尔曼 (Rören, Herman)。——第 274 页。
- 勒西克, 理查 (Rösicke, Richard)。——第 320 页。
- 累德堡, 格奥尔格 (Ledebour, Georg)。——第 270 页。
- 李卜克内西, 卡尔 (Liebknecht, Karl)。——第 358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第 155、156、164、165、202、203、206、227、260、265、357 页。
- 利沙加勒, 普罗斯佩·奥利维耶 (Lissagaray, Prospe Olivier)。——第 61 页。
- 李希特尔, 欧根 (Richter, Eugen)。——第 94、114 页。
- 卢森堡, 罗莎 (Luxemburg, Rosa)。——第 253、264、265 页。
- 卢伊特波尔德, 卡尔·约瑟夫·威廉·路德维希 (Luitpold, Karl Joseph Wilhelm Ludwig)。——第 307 页。
- 路贝, 艾米尔 (Loubet, Emile)。——第 284 页。
- 伦纳, 卡尔 (Renner, Karl)。——第 363 页。
- 罗尔瓦根, 汉斯 (Rollwagen, Hans)。——第 351 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翰·卡尔 (Ro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第 30、83、184、203 页。

M

-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第

183, 184, 253, 266 页。

马拉, 让·保尔 (Marat, Jean-Paul)。

——第 42 页。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第 37 页。

麦岑, 奥古斯特 (Meitzen, August)。

——第 233 页。

梅利纳, 茹尔 (Méline, Jules)。——第 283 页。

梅特涅, 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第 49, 50 页。

蒙特, 泰奥多尔 (Mundt, Theodor)。

——第 51 页。

米勒兰, 亚历山大·埃蒂耶纳 (Millerand, Alexandre-Etienne)。

——第 280, 282, 284—292, 294, 295, 297—299, 316 页。

莫斯特, 约翰 (Most, Johann)。——第 68, 69 页。

N

纽文胡斯, 斐迪南·多梅拉 (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第 358 页。

P

帕尔乌斯 (Parvus, 即亚历山大·格尔方德 Alexander Helphand)。——第 218, 219, 254, 281 页。

皮赫莱尔, 弗兰茨·塞拉弗 (Pichler, Franz Seraph)。——第 363 页。

皮卡尔, 厄内斯特 (Picard, Ernest)。——第 94 页。

皮克尔曼, 路德维希 (Pickelmann, Ludwig)——第 332 页。

皮特(小皮特), 威廉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第 313 页。

普凡库赫, 威廉 (Pfannkuch, Wilhelm)。——第 303 页。

R

饶勒斯, 让 (Jaurès, Jean)。——第 280, 281, 283, 287, 302, 316, 330, 355—358 页。

S

桑巴, 马赛尔 (Sembat, Marcel)。——第 287 页。

舍德莱, 弗兰茨 (Schaedler, Franz)。——第 306, 310, 313 页。

施杜姆, 卡尔 (Stumm, Karl)。——第 177 页。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 Karl August)。——第 184 页。

施米特, 康拉德 (Schmidt, Conrad)。——第 255 页。

施泰因, 罗伦兹·冯 (Stein, Lorenz von)。——第 187 页。

施特克尔, 阿道夫 (Stoecker, Adolf)。——第 274 页。

施托克曼, 威廉·海尔曼 (Stockmann, Wilhelm Herman)。——第 274 页。

朔尔茨, 阿道夫·亨利希·威廉·冯 (Scholz, Adolf Heinrich Wilhelm von)。——第 80 页。

斯宾塞, 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第 193 页。

斯陶芬贝尔格, 弗兰茨·申克·冯 (Staufenberg, Franz Schenk von)。——第 78 页。

梭伦 (Solon)。——第 31 页。

T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第 94 页。

屠拉梯, 菲利浦 (Turati, Filippo)。——
第 272 页。

W

瓦尔德克-卢梭, 勒奈 (Waldeck-Rousseau, René)。——第 280、285、
286、298 页。

瓦扬, 爱德华·玛丽 (Vaillant, Edouard-Marie)。——第 280、281、283、287、
355—358 页。

王德威尔得, 艾米尔 (Vandervelde, Emile)。——第 280、302 页。

威廉二世 (Wilhelm II)。——第 173、
174 页。

威纳尔, 威廉 (Werner, Wilhelm)。——
第 163 页。

文巴尔克, 卢道夫 (Wienbarg, Ludolf)。——
第 51 页。

文特霍尔斯特, 路德维希 (Windthorst, Ludwig)。——第 318 页。

X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第 204 页。

席佩耳, 麦克斯 (Schippel, Max)。——
第 256、269 页。

夏努安 (Chanoine)。——第 283 页。

谢夫莱, 阿尔伯特·埃伯哈德·弗里德里希 (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第 30 页。

辛格尔, 保尔 (Singer, Paul)。——第
271 页。

休恩朗克, 布鲁诺 (Schönlank, Bruno)。——
第 241、265、267—269 页。

Y

耶施特 (Jöst)。——第 222 页。

因布里阿尼, 马提奥·雷纳托 (Imbriani, Matteo Renato)。——第 159
页。

雨果, 维克多 (Hugo, Victor)。——第
141 页。